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院通讯

文 | 研 | 通 | 讯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院

2022 年第 1 期 总第二十二期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院

刊 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院通讯》

刊 期：总第二十二期（2021 年 11 月—2022 年 1 月）

执行主编：杨弘博 韩 笑

编 辑：周诗雨

编 审：王 瑞 徐 军

编 务：陈天传

特邀摄影：刘学红等

装帧设计：张 棕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北京
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010-62768010

传真：010-62768010

邮箱：ih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信公众
号

2022 年
第 1 期

总第
二十二
期



目录

注：目录所列数字为该系列讲座序号，其他场次请见官网。

01 文研学术

（一）北大文研讲座

- [230] 谷 裕 | 活人祭与骑士爱情——《浮士德》海伦剧中的古希腊与中世纪 02
- [231] 陈少明 | 物、人格与历史——从特修斯之船说及“格物”等问题 03
- [232] 陈正国 | 苏格兰启蒙思想与亚洲 07
- [233] 奈杰尔 威尔逊 | 西方校勘学历史漫谈——古代和拜占庭时 11
- [234] 奈杰尔 威尔逊 | 西方校勘学历史漫谈——中世纪以及之后的西欧 16
- [236] 奈杰尔 威尔逊 | 古文书学作为辅助学科的价值 23
- [238] 奈杰尔 威尔逊 | 两个传承之间的区别 26
- [235] 斯钦巴图 | 史诗内部张力与《江格尔》类型群的形成 34
- [237] 孙来臣 | 语言的流动——全球史视野下近世欧亚大陆东部的翻译浪潮(约1200—1850年) 42
- [239] 孙飞宇 | 躺椅背后的摩西——弗洛伊德思想与犹太传统 47
- [240] 王 素 | 故宫文献学的价值与意义 51
- [241] 陈中梅 | 关于西方认知史上一个被忽略的概念中介——解析荷马史诗《奥德赛》里 sēma 和 sēmaicepe 的坐标功能 57

（二）未名学者讲座

- [76] 王斯秧 | 1830年的世道与人心——《红与黑》与“贝尔德案件” 66

- [77] 杜 月 | 就地造景与资本平台——农村高端民宿的兴起 70
- [78] 季剑青 | 历史与实验——胡适“文学革命”的思想史逻辑 75
- [79] 彭明浩 | 石窟寺建筑研究的角度与问题——以龙门石窟为例 78
- [80] 施 越 | 俄国对中亚草原的征服与现代中亚的形成 89
- [81] 孙 明 | “法意”：传统中国制度思想中一个基本概念的演生 94
- [82] 陈一峰 | 国际劳工组织、治外法权与民国劳工保护 95

（三）北大文研论坛

- [151] 李庆新、孙键 | 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对话 100
- [152] 经崇仪、韦陀、孙志军 | 观象敦煌：“罗氏档案”中的莫高窟与榆林窟照片 108
- [152] 林伟正、玛利亚 缅希科娃 | 观象敦煌：国际视野下的敦煌学——作为史料的敦煌与作为空间的敦煌 113
- [153] 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范式反思 118
- [154] 刘永华、赵丙祥等 | 景贤作圣：中国圣贤的多学科探讨 126
- [155] 段德敏等 | 镜像中的文明——《波斯人信札》三百周年 134
- [156] 徐正英、常森 | 简帛古书与传世文献 143

（四）邀请学者论坛

- [07] 刘永华 | 十九世纪徽州乡民的生计与社会关系：婺源程家的个案研究 147
- [08] 阿依达尔 米尔卡马力 | 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献举要 149
- [09] 赵灿鹏 | “梁武帝时代”的终点：一个虚拟历史的研究视角 152
- [10] 姜文涛 | 英国18世纪的情感与印刷化——以埃德蒙 伯克之美学观为例 156
- [11] 张国旺 | 元代官吏除授文书体系初识 158
- [12] 张 浩 | 农地再延包三十年：政策衔接是关键 160
- [13] 武琼芳 | 敦煌石窟唐代供养人服饰 162
- [14] 张 涛 | “复原”可以作为方法吗？——信息时代《仪礼》研究进路的思考 164
- [15] 於梅舫 | 铸经与破经：康梁师徒重塑中国文化的路径分歧及旨趣离合 167
- [16] 缪德刚 |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早期学科化 173

（五）文研读书

- [32]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再发现——《丝路风云》《他乡月明》出版座谈会 176
- [33] 另一种现代的尺度：《非洲现代史》研读会 185

（六）OCAT年度合作讲座

- [01] 玛丽 米勒 | “形成中的艺术：玛雅艺术制作”系列讲座——玛雅世界：对材料的探索及对物质性的把握 189

- [02] 玛丽 米勒 | “形成中的艺术：玛雅艺术制作”系列讲座——玛雅艺术：艺术如何变化，如何保持不变 199
- [03] 玛丽 米勒 | “形成中的艺术：玛雅艺术制作”系列讲座——玛雅艺术：现代语境下的玛雅艺术 212

（七）北大文科创新论坛

- [02] 姚 洋 | 儒家政治——理解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一个视角 224
- [03] 渠敬东 | 透纳：风景画中的历史与神话 226

229 文研回望

- 牛津大学古典学系荣休教授奈杰尔 威尔逊主讲“西方古典文献学”系列讲座 230
- 文研院“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系列讲座圆满结束 232
- 文研院“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讲述活动在线举办 234
- 文研院邀请学者项目第十一期圆满结束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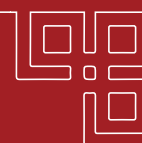
245 文研纪事

C
O
N
T
E
N
T
S





文研学术



（一）文研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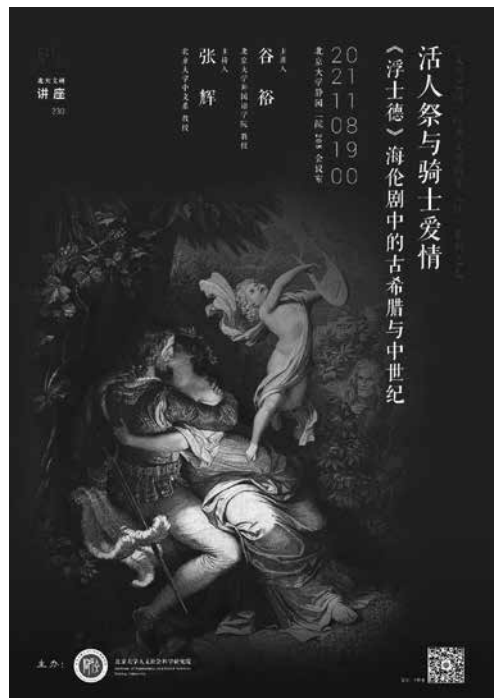
230

谷裕 | 活人祭与骑士爱情——《浮士德》海伦剧中的古希腊与中世纪

2021年11月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30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活人祭与骑士爱情——《浮士德》海伦剧中的古希腊与中世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谷裕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本次活动为“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

系列讲座之一。因讲座所涉内容尚未发表，下文仅以提要方式呈现。

歌德《浮士德》中的海伦剧，分别以特洛伊战争和十字军东征为背景，上演古希腊斯巴达王后海伦作为“被俘的特洛伊女子”受活人祭威胁，逃至中世纪西欧十字军骑士浮士德在“拉丁国”中的城堡寻求庇护，在那里受到赞美和礼遇，被奉为夫人，与浮士德恋爱好合。在这幕被冠名“古典-浪漫的幻象剧”中，歌德以寓意形式，以诗歌格律和音韵的相互接近、融合为媒介，令古希腊异教习俗、海洋文化与中世纪日耳曼-基督教、陆地文明在现实背景中相遇，以两者间强烈的反差表明，古希腊的美唯有在基督教文明庇护下，方得以免遭毁灭的命运；也唯有在基督教-人文主义框架中，其价值方得到认可和尊重。本次讲座受此结论启发，兼拟人文主义体用之分的命题：称此为以古典知识和艺术形式为用，以日耳曼-基督教文明为体。



231

陈少明 | 物、人格与历史——从特修斯之船说及“格物”等问题

2021年11月11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31期暨“北京大学虚云讲座”第53讲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物、人格与历史——从特修斯之船说及‘格物’等问题”。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主讲，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系教授王博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林合、郑开出席并参与讨论。



陈少明教授

引言：一个哲学公案

他们将腐朽的古老船板拆下来，装上崭新而又坚固的材料，以致这艘船在哲学家中间，就事物自然成长的逻辑问题成为一种永恒的实例：一方面是要保持船只是原来的形状，另一方面又极力证明已经大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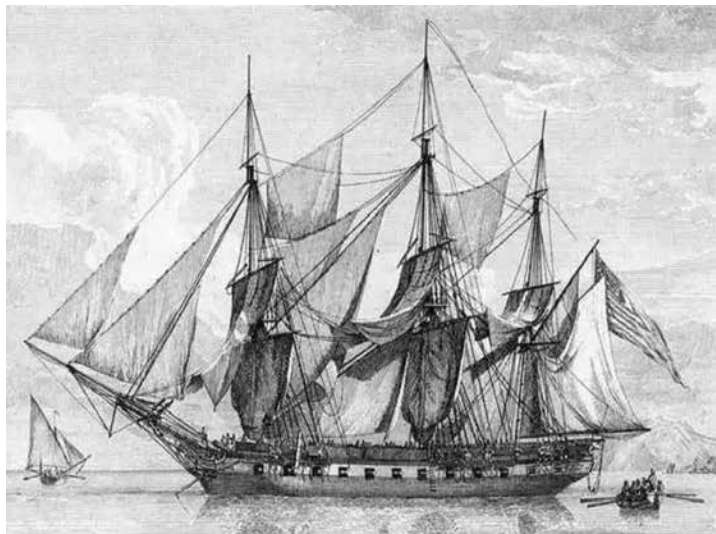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一章

一、霍布斯对问题的延伸

从“特修斯之船”这一公案，引出了

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物的同一性？陈少明老师表示，传统认为如何说明事物的同一性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从质料的角度，即判断事物是否同一取决于其材料的构成。另一种是从形式的角度，即判断事物是否同一取决于其形式是否同一。霍布斯指出，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前者以“特修斯之船”为例，其材料不断变化，但人们依旧认为换了材料的船仍然是原来那艘船。后者以赝品为例，赝品和真品形式上相同，但是人们并不认为两者是同一的。还有观点认为质料和形式的统一可以说明事物的同一性，但是以工业产品为例，批量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其质料和形式都是统一的，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工业产品之间都是同一的。

传统上还有一种观点，即认为事物本来就是变动着的不固定的。但是因此而否定事物具有同一性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同一性，有了同一性之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对事物进行归类，我们对这个世界就有了一种持续感，理性就有了用武之地。对此霍布斯有一个建议说，假如我们确定变动的事物具有同一性，办法是给它命名的话，那么所有变动的事物从一开始给它命名，随之变动而来的那些随后的现象都要把它说成是同一个事物。此外，霍布斯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特修斯之船”中，假如把拆下来的那条船的材料重新组装成为跟原来一样的船，那么究竟哪条船才是原来那条船呢？如果我们说两条船都是原来那条船，就违背了一件事物不能同一时间出现在两个地方的观点，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辨别什么是那个特定的个体。



特修斯之船手绘图

二、人格与历史之物

以上几种观点都是从物自身的角度看问题，无论哪种都无法说明同一性问题，同一性问题并不能单从物的角度去考察。一个事物是不是原来的事物，是从人的角度，依靠人对它的辨识，同一性的哲学基础是“人”。

在人对事物的辨识中，可区分三种情况，首先是人对自我的辨识，人依靠记忆和内在经验把今天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体验成一个同一体，不是依靠名字也不是靠照镜子依靠外貌来辨识自己。其次是对他人的辨识，依靠容貌、名字、声音、笔迹，或掌握他人的生平、社会身份等辨识他人，但我们很难进入他人的内心。我们对他人的辨识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把人作为物来看待，某一类特定的人作为类，如某一性别、某一种族、某一职业的人。其次是把他人作为特定的、具备独一无二

人格的个人来看待。再次是人对物的辨识，从物的外观、材料特性以及可以为人支配的物理价值来辨识物。

“特修斯之船”作为物，不是某类船，而是一条独一无二的船。希腊人维修这条船并不是要让这条船作为一个海运工具继续保留，而是要把它当做纪念品，纪念王子特修斯自愿当人质

后逃生回归的这一段特定的历史。“特修斯之船”不是作为一般的实用物，而是作为文物。

文物是从实用物衍生而来。把一件东西当成文物有两个条件，其一是看这件被我们当做文物的东西在历史中的位置是不是足够长，其使用者的地位是不是足够特殊，或者它是否和历史上某一著名事件有所联系，种种这些因素构成了我们判断一件文物价值几何的标准。其二是需要人，需要有权威性的专家来判断和赋值。

文物的一个作用就是能让人通过眼前的这个器物去看背后的不在场的文化，通过这件东西去看与其相联系的特定的历史事件，去看它背后的意向，使我们能超越当下，与更广阔的时空联系起来。人类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人想突破生命的有限性，可是在我们有限的生命过程中，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东西都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我们需要通过特定的“文物”，通过对它的认知，对它的想象，来扩展我们非常有限的生命的内容。不仅仅是往后回顾历史，也是向往未来，我们是历史链条中的一环，而不是单一的有限的孤立的个人。

“岳阳楼”、“黄鹤楼”、“特修斯之船”……这些不断被修复的文物，作为历史的载体，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具有延续历史的能力，它们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一代一代地被流传，在这个过程中，其身份认定是一种社会认定。文物本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历史的延续。

三、“格物”新解

陈少明老师继而表示，物具有多样性。以“鼎”为例，首先，它是作为用具，其

次是作为审美对象和礼器，再次成为“文物”。一件事物三个方面的价值不同，同一个东西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来看它。物又可分为自然物和人工物。人工物至少有三种，一种是物理意义上作为用具的“工具物”；一种是“象征物”，如“国旗”、“货币”、“红绿灯”……它们象征着社会习俗和制度；还有一些事物，是精神性的，如艺术品、纪念品、文物。把物作为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人最本能和最基础的层面。在人类文化中，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发展出更多的东西，无论是社会性的还是精神性的。

宋明理学家讲“格物”、“穷理”，所格之“物”不止停留于作为“用具”的物质性的“物”，更涉及审美、意向、道德、伦理、制度、文化等层面，所以阳明讲“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朱子讲“理一分殊”，“理一”强调了意义相通性的基础性和预设性，分殊则是防止了日常经验中的范畴错置。

四、物的精神性与衍生问题

人对物总是有一种精神性的投射，不仅是把个体的自然物理解为有精神的东西，更是把世界理解为精神性的存在。在中国传统中，天地作为生命的摇篮，“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精神附丽于生命之上，“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不仅仅天地宇宙、万事万物是精神性的，人的精神更是宇宙精神的体现。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人最贵。”

从物的精神性和人化的物的意义赋权机制出发，属人的历史是一个对物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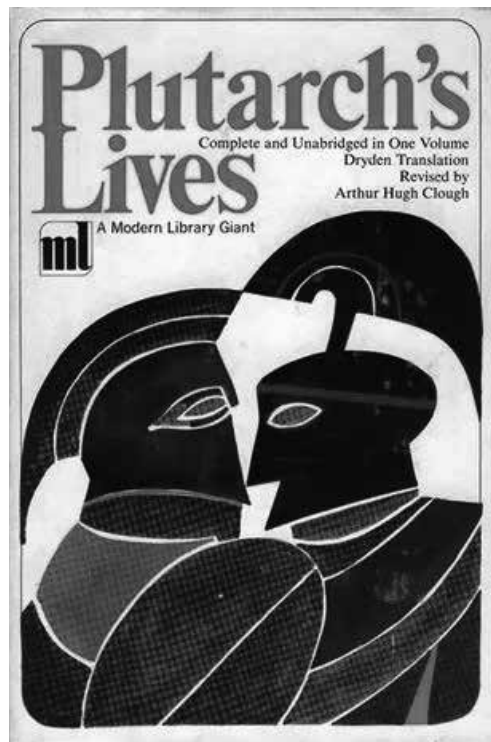
进行持续添附的过程。在这一条从人到物的历史谱系中，物的精神性一直是由人所赋予的，物的精神性也一直建立在“实体物”的基础上。而在当代科学技术和虚拟现实的发展之下，这两点都遭遇了挑战。机器人的诞生，遗传基因的改造，非自然家庭环境下的人工生养的婴儿，还有后天干预人性的脑机对接试验，这些事件都造成了人类身份的认同危机。数字经济的兴起，游戏世界的勃发，VR技术的发展，甚或“元宇宙”概念的火爆，所有这些都导向人类日常生活世界的虚拟化。在这一发展方向中，“真实”的意义何在？人与“物”、人与“人造物”的关系又如何定义？从我

们这个时代开始，人类要如何面对关于精神之“物”的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结语：思想的拼图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从“特修斯之船”的同一性问题导向以人为中心的对物的形象多面性的理解。其中，作为纪念品的物的形象，所涉及的历史意义与人类对自身人格独特及生命时间性的理解相关。这一对物的功能谱系的构想，对观察中国哲学中的“格物”之争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参考框架。由此展现的人与物的关系却在当代面临着新的挑战。整体上看，这一大跨度却具备完整内在连贯性的思考过程可视为一个思想的拼图，以跨越古今中外的经典思想事件作为“边角料”，结合科学、艺术、哲学的各种思想资源，以想象力和思辨力为动力，对当代人们所面临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进行深度挖掘和思考。

（整理：郑怡）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英文封面（“特修斯之船”即出自其中《特修斯》一节）

232

陈正国 | 苏格兰启蒙思想与亚洲

2021年10月13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32期在线举行，主题为“苏格兰启蒙思想与亚洲”。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正国主讲，浙大城市学院校长、罗卫东教授主持。本场讲座为“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系列讲座之一。

讲座伊始，陈正国老师介绍了自己研究的核心关切：对于苏格兰启蒙学者而言，亚洲之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究竟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存在，抑或有着实在的意义？既往学者往往批评苏格兰启蒙学者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Orientalism）眼光，即他们持一种西方话语，在其中东方被创造、被想象、被叙述，缺乏主体性。陈老师指出，这种批评其实仅仅适用于苏格兰启蒙晚期学者，不能一概而论。

在具体讨论苏格兰启蒙与亚洲的关系之前，陈老师首先回顾了苏格兰启蒙发生的背景。18世纪，从苏格兰到亚洲单程平均需要半年。对于苏格兰而言，与亚洲的距离还体现在其与亚洲接触的“后进”性上。相比最早到达亚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其后的英国和北欧，苏格兰在亚洲的接触上是“后进”之国。

随后，陈老师介绍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过程。苏格兰王国位于西北欧顶端，最早建立于约公元843年左右，苏格兰与英格兰于1603年组成共主邦联。1700年左右，苏格兰王国总人口约为110万，人口



艾伦·拉姆齐绘《休谟像》，1758年

与土地大致都是英格兰的六分之一。正如多数欧洲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是该国知识群体借由出版、集会、讨论而形成的一系列知识创造过程。所以，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城市性格，或曰商业性格相当明显。与之相对的是以东欧启蒙为代表的另一立场，部分缘于天主教会或主政者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它们的城市性格相对较弱。

苏格兰启蒙运动主要出现在亚伯丁（Aberdeen）、格拉斯哥（Glasgow）和爱丁堡（Edinburgh）三个城市。因为各地的



《合并法案》，1707年

学术背景与社会经济条件不同，这三个主要城市主导的知识群体也略有不同，因而产生交相辉映、又同时争辉、较劲的知识群体。亚伯丁的神学性格较强，这部分是因为它与苏格兰的神学教育中心圣安德鲁斯地理上接近，同属苏格兰东部。更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常识哲学（Commonsense Philosophy）的大本营就在亚伯丁。常识哲学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晚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爱丁堡是苏格兰的行政中心，因而集聚了相当多的法律从业者。以亨利·霍姆（Henry Home）等为代表的律师出身思想家在苏格兰启蒙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18世纪的爱丁堡，辩论社汇集了大批地方师生、律师与法官。格拉斯哥作为第一商业大城，其辩论社中大多是商人。此外，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格拉斯哥吸引了很多专业人士，尤其是医生。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曾经在格拉斯哥担任教授。他的

《国富论》一般就被认为与他在格拉斯哥的经验有关，格拉斯哥较强的商业和科学性格影响了他对自己观点的发展。整体而言，这几股力量共同在苏格兰形成了城市为主的，出版、集会、讨论构建的知识传播。

接下来，陈老师介绍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生成的原因。政治方面，1707年合并法案的颁布，使苏格兰失去了作为国家（state）的国际政治自主权，但仍保有教育、宗教与金融体系的完全自主。1745年的高地叛乱则使苏格兰知识群体意识到，必须对这个史无前例的政治变革的意义有所回应。经济与社会方面，经济的稳定发展与海外殖民利益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达，如酒吧、学会、舞宴——苏格兰知识社群因为此一物质基础而变得更加具体，更充满能量。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回应这些新物质现象所隐含的道德问题。

随后，陈老师爬梳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盛期的两大性格：相对温和与相信普世意义。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流观点是演化论的，不强调人的天生平等与政治权利（天赋人权），而认为政治与社会的平等是历史演化的现象与结果。他们不强调福音主义，主张宗教或信仰尽量由对自然、社会的观察结果来呈现。当时的知识分子也不

强调理性主义，主张情感是判断道德的基础。这几点共同构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比较温和的风貌。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另一性格是，相信人性普世皆然。由此他们相信，如果外在条件一样，人类社会的走向会是一致的。这个前提推导出一种知识上的普世主义，即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才是了解人类的可靠知识来源。如果人性与知识都是普世的，若继续推演下去，人类社会的形态应该大同小异。但从人类全史的角度观察，人类社会的物质发展必然是步步前进演化的，但是各个民族的荣衰未必可以预测。尤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后期，各个社会之间的分化愈加明显；什么因素造成了各个国家的不同？这是他们要讨论的。

在介绍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致面貌之后，陈老师具体剖析了亚洲历史之于苏格兰启蒙思想的意义。亚洲对于苏格兰启蒙的影响，可以分为盛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来考察。早及十七世纪晚期，欧洲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关于亚洲社会的刻板印象，如专制政治的温床、柔弱与野蛮并存的国家、文明停滞的地区。苏格兰启蒙盛期在某个意义上是对过去这些评论的批判或补充，尤其是方法论上的补充。而在十八世纪晚期以后，亚洲在苏格兰启蒙晚期思想中，呈现出极为黯淡的色彩。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因素是殖民主义的兴起，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及主流认识论的转变。陈老师认为，在启蒙盛期，对于东方的讨论整体上是复杂的，所谓“东方主义”的讨论主要出现在殖民主义盛行之后的启蒙晚期。

之后，陈老师从对“专制”的讨论、对“奢

侈”的讨论、怎样看待中国三个具体例子入手，剖析亚洲对于启蒙盛期的重要影响和晚期的变化。启蒙盛期的“专制”概念主要被用于这样的语境中——表达一种“共和”的期望，即以议会来限制国王过大的权力。而在后来北美的修辞中，与国王一体的议会这个群体也可以被称为“专制”；“专制”的概念其实是浮动的。休谟（David Hume）就非常不支持“专制”这个概念，在他看来中国并非一个专制国家，而是具备法律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进入到启蒙晚期之后，“专制”不再是主要讨论的问题，代之以“东方专制”。这其实意味着一种东方主义的出现。陈老师指出，只是在殖民主义出现之后，东方专制才从政治的讨论转为社会的讨论，也就是认为整个东方社会的统治形态是专制的，在启蒙盛期这种东方主义的讨论并不多见。

另一个例子是政治经济学对于“奢侈”的讨论。奢侈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与道德问题。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看来，奢侈会带来男性的羸弱与女性生育能力的下降，并进一步造成国家人口的减少，从而造成国民的参政意识变低，国家的常备军减少、战斗力下降，衰败下来。

休谟提出一个新方法定义“奢侈”：一个人如果没有负债，买自己买得起的东西，这就不是奢侈。他主要从方法上对“奢侈”的探讨加以推进，反对在奢侈和国家衰败之间建立因果联结。而在启蒙晚期殖民主义的叙事中，奢侈导致人的羸弱的理论则在印度这个例子当中被重述了。如果说在启蒙盛期的作者看来，印度孟加拉地区是商业的，而回教地区是游牧的，前者

是更加发达的社会形态，那么在新的叙事中，回教铁蹄在16世纪得以侵略印度半岛的原因，恰恰正是因为印度商业过盛带来的人力羸弱。而殖民者英国，则是在保护孟加拉地区的印度在地文化，对抗阳刚的回教铁蹄。罗伯特森（W. Robertson）就呼吁，我们可以和回教对抗，但是不要破坏了印度的文化。

再者是关于中国的讨论，背后是对“文明”的理解。在启蒙盛期的主要观点看来，人类文明的发展遵循物质主义意义上的普世逻辑，而不是独断论的唯心主义逻辑。亚当·斯密就将文明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在他们看来，社会的最终形态是一种物质状况相似的状态，尽管不同社会的道德风俗可能不同。而中国、印度，在当时被公认已经进入了商业社会阶段。在这种物质主义的文明论中，中国被认为是以其个别条件而言比较完善的形态。争论的焦点在于，是不是每个社会都可能发展到理想形态？是不是即便两个国家的风俗相异，还可以被认为都是理想的形态？休谟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

陈老师提示，在苏格兰启蒙盛期，针对“奢侈”、“共和”、“文明”等这些传统的概念，都在讨论中发生着变化。这些复杂讨论的主流声音勾画了建立在经验论、宗教怀疑论、物质主义基础上的世界图像，其中中国和印度占据了位置；只是在苏格兰启蒙的晚期，基于认识论上向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常识哲学（Commonsense Philosophy）等的转向，以及现实中法国大革命与殖民主义的发展，这种声音才逐渐式微，“东方主义”

的眼光成为主流。在新的认识论图式中，心灵（mind）的确定性被认为比物质的确定性更加根本，如孔多塞就将社会的进展归类到心灵状态（mind）的进程当中，“语言”在其中成为讨论的核心——通过把中国的科学不发达与语言上不是表音文字的特色联系起来，启蒙运动之前希腊作为文明核心的地位，就经由表音文字这一点被寻回了。

讲座最后，陈老师针对线上听众有关亚洲文化在苏格兰启蒙中扮演的角色变化、苏格兰学者的印度学研究、常识哲学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回应。随后，罗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小结，并向听众推荐了相关书目：布罗迪主编《苏格兰启蒙运动》（浙江大学出版社）、洪特等主编《财富与德性》（浙江大学出版社）、赫尔曼著《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撰稿：来星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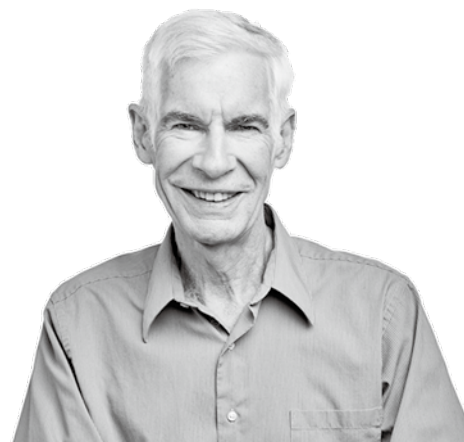
233

奈杰尔·威尔逊 | 西方校勘学历史漫谈——古代和拜占庭时代

牛津大学奈杰尔·威尔逊（Nigel Wilson）教授是西方古典学术史的重量级学者，其代表作《抄工与学者》是经典的古典学术史，同时也是重要的古典学入门著作。应文研院的邀请，威尔逊教授面向中国师生作四场线上演讲，从我们所能依据的本子与古典作者原本之间的间隔谈起，主要讨论古代和拜占庭时期西方校勘学的开端和发展，并延伸到中世纪欧洲西部拉丁语区域希腊文本的翻译和希腊知识的艰难传播。

2021年11月15日晚，“西方古典文献学四讲”系列讲座第一讲、“北大文研讲座”第233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西方校勘学历史漫谈——古代和拜占庭时代”。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古典学教授奈杰尔·威尔逊主讲，文研院院邀访学者、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苏杰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威尔逊教授从古希腊和拉丁文献的重要著作的作者手稿都不复存在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进行讲述。赫库兰尼姆古城纸草庄园的考古发掘中曾被认为存在上述事实的例外。这里发现的纸草卷子包括伊壁鸠鲁派哲学家菲拉德谟的作品，其中一部分被认为即使并非出自作者亲笔，



威尔逊教授

也至少出自作者的口述记录，其上的订正与修改则是作者的修订。威尔逊教授以纸草卷 P. Herc. 1021 为例赞同了这一观点。

公元前2世纪的纸草卷 P. Lit. Lond. 165 是可以确定为古典时期作者亲笔手稿的唯一一例，其他手稿都晚于6世纪下半叶，譬如埃及作家阿佛洛狄特的狄奥斯库若的作品。威尔逊教授由此得出一般性的论断：我们所能依据的绝大多数文本都是在作者死后一千年甚至更晚才制作的本子。最早可追溯到4世纪的希腊文《圣经》抄本和部分可追溯到古代晚期的维吉尔作品抄本是这一论断两大例外，此外还有一些埃及出土的纸草卷是相对较早的希腊抄本残篇；但总体而言，我们所能依据的本子和作者

之间已隔了多次传抄。由于西方直到 15 世纪下半叶才有印刷术，抄本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所有的抄工，无论多么仔细，都会出错。如果抄工漫不经心或者匆促赶工，就会有众多严重错误。这一问题早已被发现，但很长时间后才发展出应对文本讹误的方法。

关于校勘学的开端，威尔逊教授认为，基于当前拥有的证据，公元前 3 世纪到前 2 世纪的亚历山大学者是最早认识到需要解决抄本出错问题的古代欧洲读者。或许因为在为亚历山大图书馆收集的众多同书复本中发现了诸多歧异，他们已经开始努力解决文本疑难。对亚历山大学者工作的认识的主要依据是各种希腊文本的注文，这些注文在中世纪抄本中被抄到了边白处，采撷自古代论著和古代注疏的这些注文被称为集注（*scholia*）。今藏于威尼斯圣马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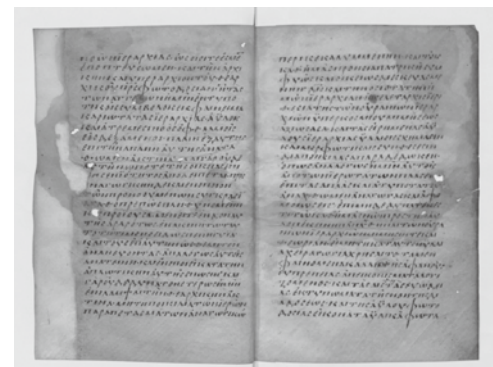
图书馆的《伊利亚特》抄本（Venice, Marc. gr. 454）收集了众多集注，提供了许多古代学者所做工作的信息。人们希望从注文中找到古人对文本问题的讨论，但其中最经常被讨论的是句读问题，其中很大部分可能是公元 2 世纪学者尼卡诺提出的，而提及抄工误写的似乎只有一处注文，而这也就是对句读的讨论时提及的。我们或许希望找到更多此类关于抄工误写的注文，但荷马史诗的抄写极为严谨。

希腊悲剧和戏剧的文本疑难更多，但至少在这一方面，关于这些文本的古代注文较少，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证据。幸运的是，古代作家对读者试图解决错误传抄带来的问题偶有讨论并取得了成功。在希腊化时代晚期，伊比鸠鲁派哲学家德米特里厄就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阅读地文本存在讹误，并曾对虫蛀造成了文本缺失与读者试图补全的尝试有所讨论。几乎同时，据说来自他林敦的医生赫拉克利德注意到了希腊字母的混用，这则记述来自公元 2 世纪晚期到 3 世纪早期的著名医生盖伦，由于文本讹误会影响疾病的治疗方法，盖伦对此类问题十分警觉。

威尔逊教授指出，困扰读者的不只是文本缺损，作伪也绝非罕见。已知最早被证伪的不是文献资料，而是一份雅典人和平条约的刻石铭文。公元前 4 世纪中叶，历史学家塞奥彭普斯基于此文没有使用当时通行的字母形式而将其判定为伪作。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诗人卡利马库斯在为亚历山大图生日编订馆藏目录时也进行了辨伪工作，他曾怀疑某本据称为早期地理学家米利都的赫卡塔埃乌斯的作品系伪作。

他的同事泽诺多图斯在处理荷马文本时发明了名为 *obelus* 的符号用来标记他认为失真的诗句。尽管多数情况下，如何判定伪作的论证尚不清楚，但可以确定，辨伪已然成为一种传统。这对其他文本来说也很重要，例如医学文本。盖伦极为关注文本的准确性，譬如在对希波克拉底作品真伪的讨论中，盖伦曾就其一篇论文的文本状况提出解释：作者可能在修改、增补文本而没有定稿；对希波克拉底的另一篇论文，盖伦注意到一处空白处的对照文字本系读者批注，但在后来的传抄中被错误地阑入正文。盖伦之于文献学，就好比主保圣人之于基督徒。此类问题在古代晚期也有论及，但真正重要的人物是 9 世纪的普世牧首弗提乌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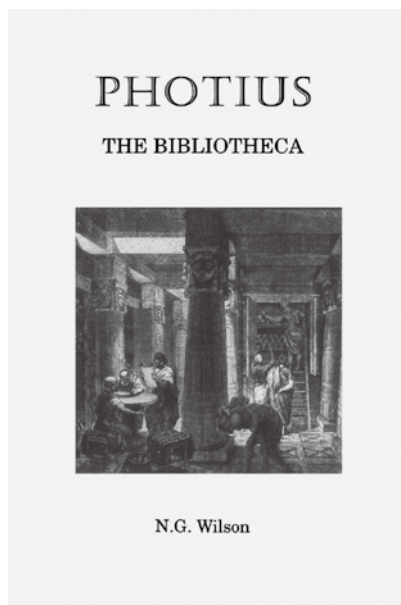
接下来，威尔逊教授进入对弗提乌斯在文本校勘方面的成就与局限的讨论。他的两部著作十分重要，其中之一是《群书提要》（*Bibliotheca*），这是他为许多书做过的摘要、评注，包括拜占庭帝国由于遭遇兵燹而亡佚的古代文本。这些摘要的第一部分展示了关于署名为亚略巴古的丢尼修，——此人在保罗的宣教下皈依，——流传的作品的真伪争议。这些文本很可能创作于 6 世纪早期，采用了一些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克洛的观点，在中世纪极为流行，在公元 827 年君士坦丁堡送给法兰西国王虔诚者路易一套副本后因机缘际地被译成了拉丁文。这些作品直到 16 世纪才被多数知识分子判伪，可即便在当时也有一些信从者对否认这些作品真实性的学者进行批评。但弗提乌斯早已指出，这部作品问世不久后就有长老狄奥多若著书给



君士坦丁堡送给法兰西国王虔诚者路易一套副本，使用安塞尔体抄写，827 年

出四条辨伪意见：第一，如果这些文本写于使徒时代，为何早期教父作家不引用？第二，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所著早期教父著作名录中没有提及这些文本；第三，这些文本里提到一些后世教会才有的做法；第四，这些文本提到了依纳爵，此人在保罗时代往后 50 年的图拉真皇帝时期殉道。弗提乌斯的摘要展现出狄奥多若是一位极为通达的文本考据学家，其论证令人信服，很难相信弗提乌斯不能领会，但他并未明确接受这些论证。如果认为弗提乌斯出于谨慎才没有公开怀疑，但本书最初只是写给兄弟塔拉西奥斯，可能并未打算公开。威尔逊教授指出，有两条奇怪但有说服力的事实，最终将真相指向另外的方向。

在一封给巴兹尔皇帝的信（约写于 873 年）中，弗提乌斯热情地提及了丢尼修；在他的杂集（*Amphilochia*）中也有赞许的称引。但在其他地方，弗提乌斯都清楚地意识到了文本问题。在杂集中，他也指出，即使是一个字母的错误也可能导致文本的晦涩或无意义。例如，对于《旧约》中“Κύριος ἔκτισέν με”（箴八：22）（意为“上帝创



威尔逊教授编著 Photius- The Bibliotheca 书影

造了我”），弗提乌斯倾向于另一个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异文 ἔκτησεν，意为“上帝拥有了我”。威尔逊教授认为，这应当用9世纪的语言状况加以解释，即由于语音的演变，拜占庭人不再区分元音和的发音，抄写员因此容易混淆；但重点问题在于，弗提乌斯倾向的形式源于动词的主动语态“κτάω”，取代了曾经作为标准形式的中动态“κτάομαι”，这是非常晚近的形式，公元6世纪前似乎没有人这样使用，文献资料中也未有用例。虽不能因此苛责弗提乌斯，但他一定已经意识到他曾读过的文献里，中动态才是标准形式，其取舍非常令人遗憾且难以解释。

弗提乌斯也意识到圣经和异教文献中许多其他段落都存在疑难，并指出即使是不正确的句读也可能成为异端邪说的根源。譬如，保罗《哥林多后书》中“ὁ θεὸς τοῦ αἰῶνος τούτου ἐτύφλωσεν τὰ νοήματα τῶν ἀπίστων”（林后四：4），一般译为“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但有人把“这个世界的神”理解为保罗认为世界中有与真正上帝对立的超自然力量，由此推断保罗犯了摩尼教二元论的谬误。弗提乌斯因而提出在“神”和“这个世界”间插入逗号的读法，这样指代的对象就不是上帝，而是这个世界的异教徒。显然这样的读法不成立，因为其造成了非常不自然的语序，把显然一体的概念分割开来。此外，还可以反驳弗提乌斯只是强行解释自己不喜欢的释义，因为古代文献的标点并不精确和系统，古代抄工未必会点断句中停顿，古代作家也不会将正确理解文意寄希望于加逗号。或许弗提乌斯并不知道

这一事实，但再一次地，他没有给出令当代校勘学家认可的结果。

威尔逊教授指出，评估弗提乌斯著作时应当要重点认识到，他是作为正统基督徒而不是作为异教文献的研究者来处理异端学说。目前尚不清楚当时的拜占庭帝国是否还有摩尼教信徒，但其时尚有被称为密萨派（Messalians）或犹凯派（Euchites）的异端学说在帝国传播，弗提乌斯作为普世牧首有充分的理由对摩尼教学说产生兴趣。威尔逊教授猜想，弗提乌斯可能正在处理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要么当时困扰着教会，要么被认为可能会再次发生；换言之，他不只是因为泥古而已。此外，威尔逊教授补充，弗提乌斯对文本问题的关注可能受到5世纪上半叶阿帕米亚的主教波利赫罗尼奥的校勘工作的影响，但由于其著作只保存了很短的节略本，其中概述了一些校勘原则而没有给出例证，我们无法评估弗提乌斯从这位先贤那里受益多少。

最后，威尔逊教授讨论了德米特里·崔克利纽斯依据格律对韵文所做的校正工作。他是14世纪上半叶帖撒罗尼迦的学者、教师，并对希腊戏剧中的格律产生兴趣。他读过约成书于2世纪的赫菲斯提翁论格律的作品，因此能够对当时流传的悲剧和喜剧文本提出许多修正建议。人们忽略了拜占庭时代诗歌创作不再依准古代格律的事实，增加了韵文滋生讹误的几率。崔克利纽斯的成功在于他充分理解基本的韵律规则，而对于韵律模式更复杂的奥德诗，他发现了正旋舞歌和回舞歌的韵律模式必须严格呼应。尽管其校勘意见并没有全部



与会学者线上留影

得到现代学者的认可，但是他的成就意义非凡。

评议环节，高峰枫教授指出，威尔逊教授给出了对古代和拜占庭时代校勘学的全景描述，其中古代文本在复制传抄中讹误不断增加的现象展现出校勘学对古代文本的重要性。高峰枫教授就讲座前半部分提出两个问题：其一，讲座重点讨论盖伦对古代文献的校勘贡献，这是由于古代医生出于职业所需，对文本的准确性更加在意，还是由于我们碰巧有更多的医学文本？其二，讲座介绍的古代校勘学的实践主要来自私人学者，但是否有例子能够支持古代世界中政府出于政治规划而支持校勘学工作？威尔逊教授回应，关于第一个问题，一方面盖伦的确由于职业所需，更加关注文本讹误，另一方面，盖伦此前也曾有其他医生，但著作大多遗失。关于第二个问题，

亚历山大学者即是政府支持校勘工作的一例，当时他们需要在缪斯宫的图书馆进行研究，法老托勒密对此项工作的确有政治的考量；此外还有一例，即希腊化的中心别迦摩，此处也能体现出图书馆对政治的宣传的作用。关于讲座后半部分，高峰枫教授提问，辩伪工作和校勘学似乎存在有机的关联，为何弗提乌斯在《群书提要》第一部分就引用了西奥德若的辩伪意见？威尔逊教授回应，弗提乌斯在该书第一部分就引用西奥德若的辩伪意见，可能是因为对这一意见十分重视。但同时需要看到，本书的创作似乎非常匆忙，不能确定是否有整体的写作方法，自己将在下一本著作中详细讨论这一问题。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设想弗提乌斯是因为重视西奥德若的辩伪意见才在此书第一部分进行引用，但不能给出绝对的论断。

刘玉才教授指出，威尔逊教授为中国听众做古方古典学文献学系列讲座有着中西古典学互鉴的意义。威尔逊教授也认为，中国和早期希腊出现最早文本的时代有着相似性，在后来传播中则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刘玉才教授认为，威尔逊教授在本场讲座给出了从写本时代前到印刷术产生后，西方校勘学长时间的发展历程。事实上，中西校勘学有着共通性也有特殊性，譬如写本时代的书写材质、是否有早期经典的作者归属争议等，并就这些问题与威尔逊教授进行了讨论。

苏杰教授补充指出，关于对医药类文本的准确性的重视，中国典籍中也有记述，比如宋代洪迈《夷坚志》中就有药书刻工因为偷工减字而遭雷殛的故事，而关于盖

伦医生在校勘学上的贡献，《抄工与学者》有一条注文中提到，他已十分接近“难的异文更为可取”这一认识。苏杰教授提出，中国学者往往将辨伪和辑佚作为与校勘相并列的学问门类，西方文本考据学如何看待辨伪？威尔逊教授回应说西方关于抄工似乎也有与《夷坚志》类似的记述，而盖伦非常值得重视，至于辨伪有些的确并不涉及具体文字正误，与一般校勘有所不同。

最后，威尔逊教授就相关问题与中国学者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撰稿：邓晋武)



234

奈杰尔·威尔逊 | 西方校勘学历史漫谈——中世纪以及之后的西欧

2021年11月22日晚，“西方古典文献学四讲”中的第二讲、“北大文研院讲座”第234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西方校勘学历史漫谈——中世纪及之后的西欧”。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古典学教授奈杰尔·威尔逊教授主讲，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

学古籍研究所苏杰教授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英语系高峰枫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研究所赵益教授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威尔逊教授概括了这一时期希腊语抄本传播和研究的状况：虽偶有所成，但至少在早期并没有形成传统。在

西欧中世纪的知识界，拉丁文为通用语，懂希腊语却是极其罕见的造诣，仅有短小的历史片段。最早的例子是7世纪晚期，狄奥多和哈德良在坎特伯雷教授希腊文。在9世纪中后期，出现了三部《圣经》部分文本的双语抄本（Basel A. vii. 3, St Gallen 48.3, Dresden A. 145b）。司各特·

爱留根纳（John Scotus Eriugena）翻译了伪亚略巴古之丢尼修（pseudo-Dionysius）的部分文集。

威尔逊教授认为拉丁语文化区域对希腊语所知之少，令人讶异。在意大利最南端的一些拉丁语文化区域内，希腊语一直是当地口语之一，君士坦丁堡也对该地的宗教和文化产生持续的影响，但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没有促进希腊研究的复兴。12世纪以来大学在欧洲各地建立也没有立刻促进希腊知识的广泛传播或校勘方法的进步。

进步的迹象在12世纪中叶开始显露，表现为译作的范围有所扩展：亨利古·阿里斯提普斯（Henricus Aristippus）翻译了一些哲学和科学文本。威尼斯的詹姆斯（James of Venice）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后分析篇》。比萨的勃良第奥（Burgundio of Pisa）翻译了盖伦的一些医学著作，并在他所依据的抄本上亲笔批注。同期，



讲座于线上、线下并行举办

罗马的尼古拉·马尼亚库提亚（Nicholas Maniacutia）是一位重要的文本校勘者，其成就包括把抄本中发现的错误分成三类——衍文（addition）、脱文（omission）和妄改（alteration），但他的学问并未被传承。此后，一些13世纪的学者也未能避免学问失传的境遇，如林肯郡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和佛兰芒教士莫贝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前者也翻译了伪亚略巴古之丢尼修的作品，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后者曾翻译了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作品。

在14世纪，两位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助推了希腊文知识的传播。来自雷焦（Reggio）的希腊人尼古拉曾在那不勒斯大学学习。他也翻译了盖伦的一些作品，其中一部分已无希腊原本存世。另一位是莱昂奇奥·皮拉图（Leonzio Pilato）。在当时两位学界领军人物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

敦促下，佛罗伦萨大学任命他为希腊语教授，希望希腊研究从此可以在大学里站稳脚跟，然而他并未久留。

与君士坦丁堡的直接接触更有效地促进了希腊文知识的传播。1397年，拜占庭外交官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任佛罗伦萨大学希腊语讲席教授。在这之后，许多意大利人通过向拜占庭流亡者学习，掌握了希腊语。这些流亡者中不乏聪颖有才之人，他们会提醒自己的学生注意文本中的疑难之处，同时告诉他们解决的方法。

威尔逊教授讲述的下一个重要进展是印刷术在欧洲的出现。虽然它没有直接促进校勘方法的进步，但却为其创造了新的条件。它中断了两种古典语言文本进一步讹变的进程，同时为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

提供了思索文本疑难的机会。随后，威尔逊教授将注意力从希腊语文献转移到拉丁语文献，介绍了在15世纪最后30年拉丁字体的研究进展。早在15世纪的上半叶，人文主义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就发现了一些使用不常见字体的古抄本。这些被定年于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抄本极为罕见，他将这些拉丁文早期字体形容为“伦巴第字体的”（Lombardic, litterae Longobardae）。“伦巴第字体”这一术语被其他学者采用。15世纪晚期，著名的意大利语文学家安吉洛·波利提安（Angelo Poliziano）就在他的《丛札》（Miscellanea）中多次使用该词。

在下一个世纪，意大利学者弗朗塞斯卡·罗伯泰罗（Francesco Robortello）对拉丁字体的兴趣推动了校勘学的进步。1557年，他在《古籍异文理校法》（*De arte sive ratione corrigendi antiquorum libros disputatio*）这篇论著中，试图界定所谓“伦巴第体”的使用时期，并确立了校勘的基本指导方针。当碰到文本讹误，最显而易见的办法是找到更好的抄本。另一方法是勘误（emendation）。他列出了八个类别，这是在塔迪奥·乌戈莱托（Taddeo Ugoletto）的三个类别——衍文（addition）、舛倒（rearrangement）和脱文（omission）——之上的推进。几年后，荷兰学者威廉·坎特（Willem Canter）出版了《希腊文本校勘条理纲目》（*De ratione emendandi Graecos auctores syntagma*），纠正了当时在研究上偏重拉丁语文献的状况。

威尔逊教授指出，上述进展源于对一种拉丁文早期字体的观察。但奇怪的

是，尽管希腊文本的趣味性和重要性已成为共识，文艺复兴学者对希腊字体的演变毫无兴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拉丁字体的研究也并无进展。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开始对早期字体进行系统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作为辅助学科的古文书学（palaeography）。这门新学科并不是由文学文本的研究者发展起来的，而是由辨明古代特许状真伪的需求催生的。巴黎圣杰曼德佩修道院（St. Germain des Prés）的法国本笃会修士让·马比荣（Jean Mabillon）为了辩护古代特许状的真实性，于1681年发表了论著《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由书名而来的术语从此被用于欧洲所有主要语言。

在这之后，巴黎本笃会的成员计划整理教父著作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版本。1708年，成员之一伯纳德·蒙弗贡（Bernard de Montfaucon）发表《希腊古文书学》（*Palaeographia graeca*）。这个书名也为欧洲所有主要语言贡献了一个单词——“古文书学”。该书与马比荣的《文书学》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蒙弗贡不关心那些被疑为伪作的中世纪文书，而旨在展示希腊文字体在数百年间如何演变。在古代，希腊文献的文本都是用标准大写字母写就。大概在8世纪末，人们开始尝试改用草体。20世纪70年代，在埃及圣凯瑟琳修道院发现的残破书籍中有草体实验的样本。这种字体实验是为了探索节省昂贵的书写材料的方法。一旦在几乎所有场合都使用小写体，字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有一些变化。蒙弗贡正是追溯了这五百

多年间字体的发展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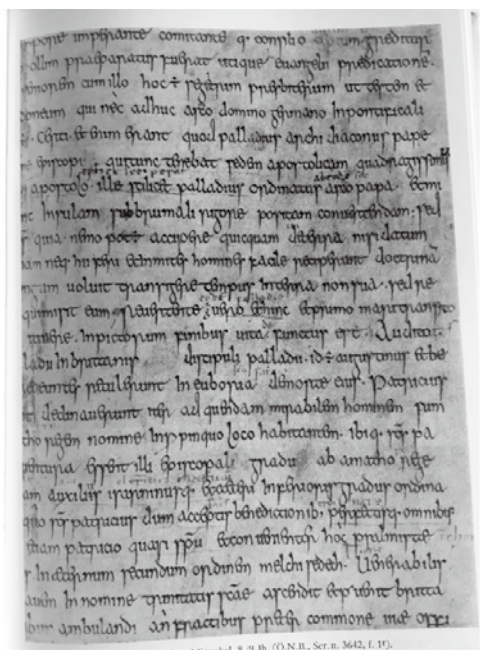
蒙弗贡提供的信息使鉴别古抄本成为可能。人们鉴别古本，是希望古抄本能提供更好的文本，这种希望常常是对的，但并不总是对的。当时的文本整理者一直存在错误判断抄本价值的风险。即使像伊拉斯谟这样杰出的学者也会误判。他将一份《启示录》的抄本（Donauworth, Schloss Harburg I.1. 4o.1）误判为写于使徒时代，但实际上它不过是12世纪的抄本。

威尔逊教授对辅助学科的起源进行了分析。虽然辅助学科对于文学、史学和神学研究非常必要，但它们并没有诞生在一众大学里，部分原因是文学和史学并非是一些学术中心最关注的问题。但是，大多数机构都极为关注神学，它们也没有首先创立辅助学科难以解释。对此，威尔逊教授提出了一种初步的设想：由于教父著作的读者或抄写者对讨论的问题更为熟悉，人们习惯性认为这些作品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误要比异教徒文献少得多，那么质疑抄本或整理本准确性的动机就小多了。

接着，威尔逊教授再一次回到了抄本年代这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抄本年代越早，其文本讹误也相对更少。但并不是所有晚出的抄本都只有次一等的重要性。现代研究表明，有些晚出的抄本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很有可能保存了文本传承的一个独立分支。

由于年代不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标准，学者需要找出其他办法来衡量抄本的价值，这就是谱系法。早在15世纪，波利提安在《丛札》（I.23）中就做过构建文本证据谱系（stemma）的最初尝试。在漫长的停滞





威尔逊教授展示的早期字体的例子——岛型小写字体 (insular minuscule)

期之后，1734年，德国神学家本格尔（J. A. Bengel）提出用他所谓的“谱系图”（*tabula genealogica*）来表示《新约》抄本之间的关系，但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因为，《新约》的抄本数量太过庞大，几乎不可能判定某种抄本传抄自另一种。直到1831年，谱系的概念才有效地付诸实践。德国学者卡尔·聪普特（Carl Zumpt）在整理西塞罗驳斥维勒斯的演说时，使用了“抄本谱系”（*stemma codicum*）这个术语。

不过，谱系法有其局限性。它不仅不适用于《新约》，也不适用于很多教父著作和学校课程文献。此类文献常常会出现“感染”（*contaminated*）的状况：读者通常会在文本空白处添加一些其他抄本的异文。当这个被评注的本子被其他人抄录的时候，抄录者对异文的选择往往不能前后

一致，最后导致传播路线晦暗不清。

威尔逊教授最后提到用计算机处理这些谱系复杂文本的优劣势。他认为新技术只能方便存取不计其数的异文，并没有其他优势。这种状况也许会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所改善，但目前威尔逊教授对新技术持怀疑态度。因为决定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异文中的哪一种，是一个判断问题。

与谈环节

赵益教授首先从三个方面对讲座内容进行评述，重点对比了中西文献学的异同。首先，他肯定中西校勘学在文本错误的类型、文本错误的原因、文本的断代、辨伪等方面有相通之处。两者可通过互相借鉴促进各自的研究。同时，赵益教授也提出了中西文献学的最大差异。中国从11世纪起就开始大规模使用印刷术。印刷术对文本有固化作用，对经典文本的影响尤为突出，这使得中国写本的保存数量很少。客观条件导致中国写本文献学发展不够，应该继续借鉴西方的写本文献学。在校勘学理论总结方面，赵益教授认为，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文献学和校勘学的总体发展水平低于中国，但中国到乾嘉时期才有系统的校勘学理论总结。意大利学者弗朗塞斯卡·罗伯泰罗（1516-1567）所做的校勘学理论总结要比乾嘉时期的王念孙（1744-1832）早约200年。

赵益教授向威尔逊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欧洲抄本的总量和内容。他引用威尔逊教授讲座中提到的数据，13世纪欧洲制作的抄本约为170多万份，14世纪约为270多万份，15世纪有近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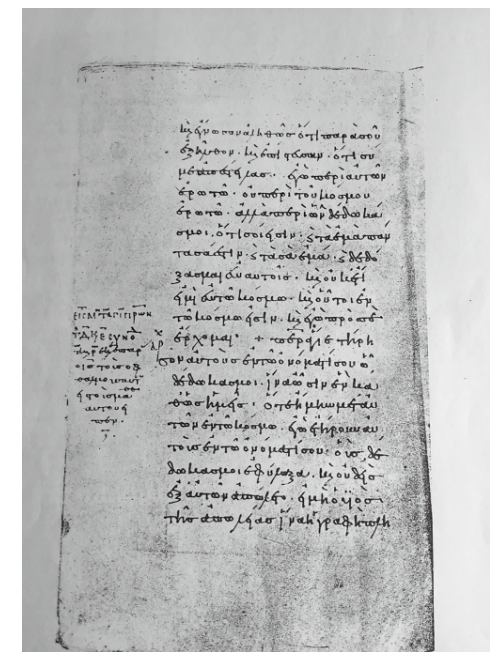
万份。这些抄本是什么内容？其中有多少是希腊文抄本？有多少抄本存世？第二个问题关于西欧抄工的文化水平。中国写本时代的抄工大多是文化水平很高的学者，因此会改写文本。西欧抄工的文化水平如何？是否会改写文本？第三个问题关于西欧抄工的工作方式，是否有通过记录他人人口述来制作手稿的情况？

威尔逊对三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在西欧产生的抄本中，拉丁文和俗语的抄本占绝大多数，希腊文抄本只是一小部分，因为很多希腊抄本并不在西欧制作，而是在黎凡特或埃及等地的希腊语族群里。这些抄本并没有算在欧洲抄本的总数中，但实际上它们占希腊文抄本数量的很大一部分。

至于抄工的身份和文化水平，威尔逊教授肯定了这些抄工都是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数是神职人员或教师。至于中世纪欧洲所生产抄本的数量，威尔逊教授强调这些数据是学养很好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认为在百年间生产百万量级的抄本，其实并不算多，特别是当把这个数字分摊在每个国家的每一年之中。抄本的抄写活动其实较为罕见，大多集中在修道院中，制成之后运送到大城市进行交易。在拜占庭，拥有古典知识是备受尊敬的。对于要成为政府官员和教师的精英人士来说，他们不仅阅读《圣经》，也阅读精选的古典作品。在社交场合，能够展示这些古典知识是非常体面的。弗提乌斯在《群书提要》（*Bibliotheca*）中反复提到某些书记载了古代世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是需要时刻准备，以便在社交场合中一展风采。这种情况在拜占庭的首都常见，偶尔在其他城市

如帖撒罗尼迦、米斯特拉斯也可见。展示信手拈来的古典知识，这对现代人来说是一种炫耀行为，但当时人们认为是非常体面的。

对于第三个问题，威尔逊教授表示他也不完全确定真实的情况，因为学者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完整。对于他所研究的希腊语文献来说，听写的情况可能出现在多人同时开工，制作多份抄本之时，以节省时间和成本。比如在10世纪，拜占庭皇帝想编53卷本的百科全书。当时他要制作多份抄本，那么很可能有一人口述，多人同时记录的情况。第二种可能的情况大约发生在11世纪。在拜占庭，圣徒传是很重要的文类，但有人提出圣徒传的文字不够雅驯，想重新编写一个更高雅的希腊文版本。据说他安排了一些抄工，记录口述的文稿。



最终通行的标准小写字体，抄本藏于圣彼得堡大学，835年

再有就是学校的情况，学者所知甚少。但因为拜占庭的书并不便宜，有可能老师口述文本，每个学生通过记录来制作自己的课本。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学者应该会发现一些带有孩子字迹的抄本，但威尔逊教授承认只遇到过一例尚未成熟的字迹。除此之外，大多数的抄本是私人使用的，不涉及到听写的情况。他表示不确定西欧拉丁语文献的状况，需要请教拉丁语古文字学家。

高峰枫教授回应了威尔逊教授在讲座中提到 diplomatic 和 paleography 两个学科的不同起源。他提到中国学界常以“古文书学”一词指称两个学科。在讲座中，威尔逊教授提到 paleography 源自对希腊字体演变的研究，diplomatic 源自对古代特许状真假的判别，是两个不同的辅助学科。因此高峰枫教授建议将这两个术语的中文翻译加以区分：“paleography”可译成“古文字学”，“diplomatic”译成“古文书学”。他也进一步向威尔逊教授确认，这两个学科在方法论和研究的设定上是否有交集。

对此，威尔逊教授回答道，两者的共同点是都对字体的发展感兴趣。不同之处在于，diplomatic 关注文书是否为真，paleography 不太关心文本的真伪问题，但通常可以用外部证据来确定作品真伪。这两个学科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有一些学者既是古文字专家，又是古文书专家。

苏杰教授对威尔逊教授在开篇部分讲到的关于古典文本翻译的情况进行了回应。他提到，胡适作为将西方校勘学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曾分析过中西校勘学的不同，其中之一是：欧洲的名著往往译成各国文字，有古译本可供校勘。这是西方校勘学

的一个优长之处。中国古代典籍尽管传播到日本、韩国、越南，但都只构成不同的版本，没有译本。关于早期译本在文本校勘中的价值，他引述了威尔逊教授《抄工与学者》的相关内容：16世纪意大利学者皮埃罗·维托利在整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时参考了中世纪的拉丁文译本，并指出：“直译的、不雅驯的译文，可以用来准确揭示译者所依据的希腊文本。”

威尔逊教授在回应苏杰教授的评述时用具体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了译文可作为校勘的文本证据。他提到来自摩洛哥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阿拉伯文译本，它所基于的希腊文抄本有10到12处异文。研究显示该译文所基于的亡佚抄本比现存抄本更好。

威尔逊教授最后就听众的提问做了仔细的解答。该问题关于希腊小写字体的最新研究进展。威尔逊教授补充道，这次讲座中展示的公元835年的小写字体，是能定年的最早例子。有一些小写字体更早，但没有跋，因此没法定年。在公元850年之后，记有年份的抄本更多，下一份可定年的抄本写于公元880年。讲座中展示的公元835年的字体，据猜测是在君士坦丁堡的某个修道院中被完善的。这意味着圣凯瑟修道院的实验字体最后被淘汰了。9世纪早期的史家并不关心文化史，关于图书馆和教育系统的史料非常少，这也导致了政治历史清楚而文化历史不清楚的情况。总之在那个时期内，君士坦丁堡的文化史没有太多可信材料。

(撰稿：王清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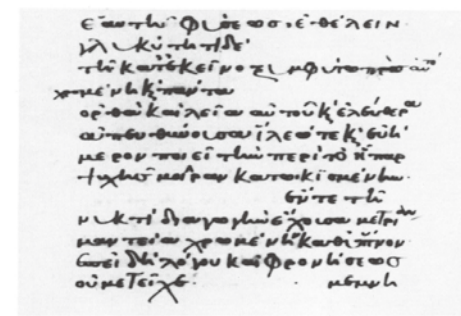
236

奈杰尔·威尔逊 | 古文书学作为辅助学科的价值

2021年11月29日晚，“西方古典文献学四讲”系列讲座第三讲、“北大文研讲座”第236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古文书学作为辅助学科的价值”。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古典学教授奈杰尔·威尔逊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刘淳主持，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陈正宏，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苏杰，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李文丹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威尔逊教授介绍了本讲的主要内容，即古文书学如何可以帮助整理者校勘文本，如何增进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讲座中所涉及的古文书学方法不仅适用于希腊文文本的处理，还可以扩展到拉丁语及其他欧洲语言的手抄本的整理之中。

威尔逊教授提到，古文书学家的第一个任务是正确释读古写本。导致抄工笔迹难以释读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因为急于完成任务而导致的书写潦草；二是为了节省书写材料而使用各种缩写和简省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部分的缩写形式是可以为每一位抄工都认识并使用的。这些缩写包括了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所有语法变化，还有所谓的拉丁语的圣名(nomina sacra)，即基督教关键概念，



Lobc. VI Fa. 1, p. 1259 II pars inf.

布拉格捷克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VI Fa. 1

如上帝、圣父、圣子、天堂等等。此外，一些如语法学、数学与占星术等学科专业的技术术语也被涵括进来。举例来说，阿基米德重写本的抄工就用到了这样的一些术语，至少他使用的代表“圆形”、“平行”概念的符号是可以立即识读的。不过，并非所有抄工都熟悉这些缩写形式，在弗提乌斯(Photius)所著的《群书评要》(Bibliotheca)的抄本中就出现了由于抄工不熟悉缩写形式，而出现的文辞不通的状况。所幸，抄工在抄写过程中尽可能地限制缩写的使用，绝大多数缩写仅出现在行末位置。在抄本整理中，我们有理由认为抄本中许多的错误可以被解释成对一种缩写或另一种缩写的误读。

接着，威尔逊教授指出古文书学家的第二个任务是给抄本确定时代。此项工作能获得的最为理想的结果是能够识别出抄工并且确认其工作的地点。拉丁文抄本的

情况较好，大多数的拉丁文抄本可以精确定位到一个西欧国家的某个地区，某些个别的抄本甚至可以精确到一个具体的修道院。相比较之下，希腊文抄本的情况就不甚乐观，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希腊文抄本及少量的塞浦路斯抄本可以根据所用字体的特点，定位到意大利南部的边境地区以及西西里地区。

在年代的判断上，拜占庭抄本断代的精确度则不尽如人意。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更加潦草、不符合书写规范的字体在古典文学类文本中的使用，这些抄写工作是由学者或者学校的教师完成的，而非教父或修士所撰写，威尔逊教授以“学者体（scholarly hands）”的术语来描述这类字体。二则是11世纪的拜占庭抄工建立了一种书法典范（calligraphic canon），德语术语称之为“Perlschrift”（珍珠体）。奥地利学者赫伯特·亨格（Herbert Hunger）第一次对这种书法风格进行深入研究。据意大利学者简卡洛·普拉多（Giancarlo Prato）考证，这种风格被抄工广泛使用，并逐渐产生了一种复古的传统。复古传统在某些抄本中尤为明显，甚至其中还包括了1280至1330年间的一些古典作家作品的抄本。

接下来，威尔逊教授结合具体实例对于上述整理原则进行阐释。第一个例子是由于不能识别一个颇为潦草的字体风格而产生的断代错误。18世纪，弗洛伦萨美第奇图书馆馆员安吉洛·玛利亚·班迪尼（Angelo Maria Bandini）出版的馆藏目录中记录了一位名叫伊奥阿尼奇奥斯（Ioannikios）的抄工。班迪尼认为，伊

奥阿尼奇奥斯所抄写的抄本的形成时间应该在14世纪，这一判断长久以来被广泛认可。在威尔逊教授看来，从抄本的草书字体的构成来看，这一判断应该是错误的。威尔逊教授举出相应的证据来支持他的判断。在伊奥阿尼奇奥斯的抄本之中页边写着拉丁文注释，这些注释是其中部分希腊文词句的拉丁译文，其中包含了古代医家盖伦（Galen）的医学著作。根据这一线索，威尔逊教授找到了在12世纪翻译盖伦著作的意大利人，比萨的勃艮第奥（Burgundio of Pisa），而比照勃艮第奥存世的其他文书，确认了这一抄本应出自勃艮第奥。至此，伊奥阿尼奇奥斯的抄本的形成时间比原先认为的早了近两个世纪，而由于时间的提前，它的价值也相应地被重视起来。

而复古字体的使用则可能使抄本看起来比其实际抄写年代更早。比如在1983年出版的现代目录中，这部包含柏拉图的绝大多数作品的抄本（抄本编号：布拉格捷克国家图书馆，Prague, National Library, VI Fa 1）被定为12世纪晚期。而在威尔逊教授看来，从抄本字体的特征来看，它不会出现在在那么早的时代。首先，字体间隔比所认定的时代的正常字体更加宽大。第二，在某一个位置上，一个不同的抄工的字迹接替了抄写工作，而这位抄工的字体显然与所定较早时代不相匹配。第三，缩写中的某些特征很明显是较晚时代的。这个抄本应该被视作拜占庭复古之风的产物，其时代可以被判定为1280至1330年之间。

威尔逊教授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古

文书学家的一个相对细小的发现有可能对宏大的历史议题的讨论做出贡献。比如在拜占庭帝国的文化生活的讨论上，古文书学的研究有助于重新看待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关系。威尔逊教授指出，在许多并不受到拜占庭皇帝的政治管辖的地区，希腊文化被教会组织与教育体系保存下来，这些独立国家共同构成了拜占庭这个文化共同体。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藏有约瑟夫（Josephus）所著《犹太战纪》（*Jewish War*）（抄本编号：MS Barocci 151）的一部14世纪的抄本。根据抄本水印，可以将抄本的时间划定在1450-1424年之间，同一位抄工还抄写过色诺芬（Xenophon）所著的《远征记》（*Anabasis*）（米兰安布罗斯图书馆 Milan, Biblioteca Ambrosiana A 78 inf.），并在跋款中表明其完成日期在1374年，同时给出了抄写的地点信息，即阿斯特罗斯（Astros），靠近诺普里亚（Nauplia），这是伯罗奔尼撒东海岸的一个小镇。同样的例子在其他研究中亦有发现，这表明拜占庭外省地方的文化生活或许比预想的更加活跃。

最后，威尔逊教授指出，古文书学常常被描述成一门辅助学科，“辅助”一词暗示了它只是文献整理者的一个补充技能，而其首要任务是文本校勘（textual criticism）。但是，上述例子已经证明，某些情况下古文书学是极具重要性的，并且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具有很高的价值。

与谈环节

陈正宏老师从中国古文献学的角度对

威尔逊教授的讲座做出了回应，首先，陈老师介绍了中国古籍写本鉴定的基本情况。中国古籍的写本鉴定，主要有分为先秦、中古和明清至民国三阶段，分别以楚简、敦煌遗书与明清稿本抄本批校本的鉴定为代表。其中敦煌遗书时间与地点最为集中，鉴定难度最低，不过因其流散的复杂过程，它的真伪问题也引起过学术界的争论，比如藤枝晃先生就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的真实性问题有过质疑。明清写本鉴定量最大，难度最大。对于明清写本的鉴定，比较有效的方式有二，一是根据书法，鉴定名家手迹，二是根据套格纸的颜色及绘制、印染方式。其次，陈老师指出中国古籍版本学中有可以中西比较的内容。中国古籍版本学的中心是版本的鉴定，其中印本尤其是刻本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围绕汉字字体断代和判定不同地域的方法。明清及民国仿宋体的流行与威尔逊教授所提到的复古的现象有相似之处。中国写本方面的研究没有像西方古文献学形成系统的方法理论，但也有其值得注意之处，比如馆阁体的鉴定。最后，陈老师对威尔逊教授所指出的古文书学家的一个相对细小的发现有可能对宏大的历史议题的讨论做出贡献的观点表示认同。威尔逊教授就陈老师所提到的敦煌文书的真伪、中国写本的数量以及写本书写墨水的颜色及纸张的选择等问题上进行了回应。

苏杰老师补充道，正如威尔逊教授所指出的，古文书学的两个任务是释读写本文字和确定写本的年代、地点。但也正如陈老师所指出的，中国的情形与西方有所不同。一是比如出土的先秦古文字材料，

年代、地点基本上是确定的，但释读难度很大，因为相比于西方文字只有二十几个字母，而汉语文字则有数千个不同的汉字。二是中国由于印刷术的使用比西方早几百年，传世古抄本很少，古典文本校勘所依据的主要是雕版印本，而这些古印本是要通过鉴定其年代来判定其在文本校勘中的价值的，这构成版本学的核心内容，也与西方通过鉴定抄本年代以确定其在校勘中的价值的古文书学有相通之处。三是出土的敦煌写本文献与西方中世纪写本时代相当，张涌泉先生在《敦煌写本文献学》中提出，“写本文献学”是一门亟待创立的新学问，相关的学科体系有待完善，而威尔逊教授的报告和他的书《抄工与学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参考。

李文丹老师则对威尔逊教授讲座中的具体内容提出，如何将看起来不同的笔迹进行勘同，威尔逊教授在做出解答的同时也指出，同一个人的笔迹几十年之间会发生变化，而时间的紧迫度，笔和纸的状况也都会对抄写的字迹产生影响。李老师结合在中国学习西方古典学不能实地翻阅古抄本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电子资源利用的问题。威尔逊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的经验指出，虽然电子资源已经相当完备，但是实地翻阅古抄本往往能发现很多翻阅电子资源时容易被忽略掉的细节，解决一些电子资源不能解决的问题。

(撰稿：史瑀欣)

238

奈杰尔·威尔逊 | 两个传承之间的区别



2021年12月7日晚上，“西方古典文献学四讲”系列讲座第四讲、“北大文研讲座”第238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两个传承之间的区别：重写本”。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古典学教授奈杰尔·威

尔逊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林丽娟主持，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苏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睿出席并参与讨论。

一、书写材料

讲座伊始，威尔逊教授从中西方文本传承所使用的书写材料出发，讲述了古代世界的纸张短缺问题。中国早在公元105年就发明了纸张。而彼时，西方人使用的是一种颇为经济适用的书写材料，纸草。其原料是产自埃及三角洲的莎草；少量的也产自邻近的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地区。西方历史上长久以来书籍生产并无障碍，只有在极为偶然的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纸草短缺。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5世纪写到，在很久以前，爱奥尼亚人（Ionians）曾被迫用山羊皮与绵羊皮替代纸草，但他从未提到过他的时代有纸草短缺的情况。在此，威尔逊教授插入了一则关于皮纸的有趣故事。据说帕加马（Pergamon）国王欧迈尼斯（Eumenes，公元前197—158）正要筹建一座图书馆，以超越亚历山大图书馆；埃及的统治者为此而禁止纸草出口（老普林尼《博物志》13.70），结果帕加马不得不使用皮纸取而代之。表示皮纸的单词“parchment”追根究底是从帕加马“Pergamon”这个地名几经音变而来。在意大利语中，表示皮纸的单词是“pergamena”，这更清晰地显示了词语衍生的过程。这个词源分析尽管被广泛接受，但现代学者并不倾向于认同老普林尼的记载。

威尔逊教授推测，纸草供应的受限显然开始于古代晚期。但其原因却并不清楚，并且书籍贸易开始遇到困难的时间尚不明晰。但据研究所知，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地区，纸草已经非常稀缺，直至最终消失；在地中海东部，纸草则一直使用到8世纪早期。由于人们逐渐习惯了以皮纸作为替代品，因此纸草的短缺并未对书籍生产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皮纸不易受损，且经久耐用，逐渐成为一种更为重要的资源。然而，它也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因为一头动物的皮革所能制作的树叶是有限的——最多只能做8叶。在此历史背景下，有一点必须明白，现代家畜经过不断的优选培育要比它们的祖先更加高大。对此威尔逊教授指出，罗马帝国早期及以后，生产一册皮革纸的书籍，如《圣经》，就需要屠宰大量的牲畜。

于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特别是7、8世纪，情况变得非常艰难。一方面纸草逐渐消失，而皮纸则非常昂贵且产量有限。到8世纪晚期，巴格达开始生产纸张，并出口到地中海世界，才使得这种短缺有所缓解。尽管纸张的发明显然有利，但其供应量至少在最初的阶段依然相对较少，其价格很可能没有纸草那么便宜。由于有关纸张价格的史料极为罕见，我们难以判断。但纸张的供应似乎不能满足书写材料的大量需求，这在古代世界是理所当然的。

二、重写本

接下来，威尔逊教授重点讲述重写本。他指出，由于纸张供不应求，重写本应运而生。如果一个文本亟需立即复制，那么



人们不得已只能再次利用那些残损的或者被认为不必再保存的书籍的皮纸。他们尽可能地铲除原有的字迹，以制作所谓的重写本（palimpsest）。这个词，源于一个希腊语动词，指原文本被刮去；但他并不肯定这个说法的正确性，原因有二：第一，在许多这样的抄本中，相当数量的原文本依旧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猛烈的刮擦会伤及皮纸表面，使其不再平滑而难以书写新的文本。

第一位研究重写本的现代学者是法国人让·布瓦万（Jean Boivin），他原是巴黎的法国王室图书馆的助理馆长。1692年，他注意到一部早期的希腊文《圣经》（巴黎，MS grec 9）。一个多世纪后，在1814年及以后的若干年中，意大利人安吉洛·梅

（Angelo Mai）发现了西塞罗（Cicero）的《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的大部分内容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文本。他的同代人巴特霍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发现了一部重要的法律文本，即盖尤斯（Gaius）的《法学阶梯》（*Institutes*），其中一部分的释读尤为困难，因为这部分的皮纸被重写了并非一次，而是两次。威尔逊教授特别指出，这不是唯一的两次重写的案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了阅读原文本而不得不使用强力的化学试剂，由此对皮纸所产生的严重损害至今依旧存在。后来人们发现紫外线灯有助于显示一部分肉眼无法看到的文本，而灯光不会伤害皮纸。即便如此，仍旧有一些段落无法识读。近二十年间，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先有多光谱成像技术（multispectral imaging），后来又有了高光谱成像技术（hyperspectral imaging）。

三、利用新技术研究重写本

对此，威尔逊教授给大家展示了他借助新技术才得以完成的希腊文文本整理的经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项目要追溯到1906年。彼时，丹麦学者海伯格（J. L. Heiberg）根据伊斯坦布尔重写本，整理出版了阿基米德（Archimedes）作品的主要部分，其中一些部分曾被认为已经失传。这部抄本曾属于圣墓教堂（Holy Sepulchre）的希腊修道院图书馆。这一激动人心的发现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当出现新技术时，学者们意识到可以用来研究这部抄本，以辨识出海伯格无法识读的段落，

但此时人们发现这部抄本已经不在伊斯坦布尔；抄本离开图书馆的情况迄今未能考实。最终，它出现在一个法国家族的收藏中。1998年，该家族决定将其在纽约拍卖。购买方并非大学，而是一位富豪，他对科学技术史有着强烈的兴趣。值得感恩的是，他愿意花费大量钱财来修复这部年久失修的抄本。事实上，它不仅年久失修，而且经受了严重损害，堪称野蛮摧残：有4页被画上了拜占庭风格的传道者肖像，或许拍卖方为了提高售价，妄想购买者会更欣赏这些肖像而不是原文本。威尔逊教授在拍卖前夕检查了这部抄本。有一天，他在学校图书馆研究这部抄本时，一位同事从他身边经过，并看了它一眼。她被这书破损的状态吓到了，对他说道：“奈杰尔，你手上这部书怕是治不好了吧！”拍卖会后，新主人请来了专业的修复师。此外，包括威尔逊教授在内的一个专家组重新转写了文本，并于2011年出版。

让威尔逊教授惊喜的是，除提供了阿基米德作品更为精善的文本外，这部抄本和一些其他的水写本一样，不仅有阿基米德的作品，还包含了其他的逸书。其中一些被证明是雅典演说家希佩里德斯（Hyperides）的两部演说稿的部分内容。尽管19世纪中期，埃及出土了一件纸草的希佩里德斯作品，并且包含了他的六大演说稿的主体部分，但他作品的中世纪抄本却从未被发现过。曾经有个报道宣称1458—1490年间在位的匈牙利国王马加什·科尔温（Matthias Corvinus）的丰富藏书中有一部希佩里德斯的作品；但这从未被发

现过，因此有理由认为这个报道是基于一种误解。

至于这部抄本所载的其他部分，其中有一两个无法识别。但其中曾被认为是未解之谜的那一部分，目前人们已经揭露出一些有助于文本辨别的信息。几经尝试，威尔逊教授得以在一处没有像其他部分那样受损的地方，识别出一个名字，那就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是一部尚未发现过的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范畴篇》（*Categories*）的传注。为了释读这部分新的文本，一个新的团队组建了起来，而他又一次成为其中一员。原本他们计划在某个既定日子之前完成转写工作，如果遇到皮纸过于受损而无法识读的情况，便付诸阙疑。但就在收尾之时，尚有一处存疑。在某一行的中间，他们只能部分地读出一个词“daimonioi”，这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与神相关的”或者“神性的”。然而根据上下文，此意不通；并且该词的前后仍有一些字母无法识读。所幸在最后一刻，他们得到了一组比之前更好的新的图片，使他得以识读出“daimonioi”这个词前面的四个字母。它们分别是λ（lambda），α（alpha），κ（kappa），ε（epsilon）。所以文本的原意并非指向神明，而是指拉克戴莫尼亚人（Lakedaimonians），也就是斯巴达人（Spartans）。威尔逊教授在该行末尾又读出了另一个原本未能识读的词，“Argioi”即阿哥斯（Argos）人，也就是斯巴达传统上的敌人。如此便可印证这个读法了。

威尔逊教授指出，最近有另一些希腊文重写本得到了研究。其中包括米南德

(Menander)的两部戏剧作品的部分内容，一部是《愤世者》(Dyskolos)，这部作品原有传世版本；另一部是《乳母》(Titthe)。这个抄本之所以识读困难，是因为这也是一部两次重写本。米南德作品的文本很可能在8世纪或9世纪被覆盖上了一部哲学作品，即叙利亚艾米萨(Emesa)主教奈美修斯(Nemesius)所著的《论人性》(On the nature of man)。显然，一个急于获得书写材料的叙利亚抄工决定不得不将这个重写本再加利用。

对于研究希腊文的学者来说，还有两项正在进展中的研究十分有趣。第一项是现藏于维也纳的抄本(hist. gr. 10)，其有10叶内容抄自古代最重要的语法学家赫罗狄安(Herodian)的《韵律概论》(Katholike prosodia)。这仅是一部希腊文韵律学长篇著作的一小片段。大约五十年前，奥地利的大学者赫伯特·亨格(Herbert Hunger)研究过这几叶内容。他用紫外线灯找出了古典文本的一些新的残卷。然而，大部分仍不能识读。在技术进步的激励下，奥地利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小型研究团队重新展开研究，威尔逊教授也是其中一员。绝大多数新见残卷都极为简略，可能只会引起一些专家的兴趣。但其中有一件可以引起广泛的兴趣。根据一些古老的史料，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曾被迫面对一起司法诉讼，起因是他被指控泄露了当地神秘仪式的秘密。以往，人们很难理解这个针对他的指控，但近期释读出的新文本提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信息。威尔逊教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发表这些内容。

第二项为维也纳的另一部抄本(hist. gr. 73)，其包含的文本应能引起广泛的，特别是研究罗马帝国晚期史的学者的兴趣。抄本中有4叶抄于11世纪，内容是3世纪的一位叫做德西普斯(Dexippus)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他是《斯基泰人》(Skythika)的作者，该书描述了公元238年之后，巴尔干地区的罗马人抵御哥特人入侵的历史。这个抄本的8页内容中有6页已在新技术的辅助下得以识读。此文本对我们认识德西普斯的著作是很有用的补充。他的部分作品还在其他的文献中被发现，其中包含了一部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的重写本(Vat. gr. 73)。

既然《斯基泰人》(Skythika)讲述哥特人入侵的历史，那么书名为何不叫《哥特人》(Gothika)呢？原因正是，德西普斯是希腊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的典型代表。整个罗马帝国时代乃至此后很久一种风尚经久不衰，那就是模仿公元前5至4世纪雅典散文作家的语言和风格。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总是带着乡愁回望着那个时代。这种复古的风尚被称为阿提卡主义(Atticism)。历史作家必须尽力模仿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语言和风格，而在修昔底德的时代并没有哥特人。居住在黑海北岸的所有族群都被称作斯基泰人(Skythians)，于是德西普斯就不得不以此命名。

然而模仿并非易事，威尔逊教授用一个细节展示这一点。在第195叶末尾，德西普斯写到了菲利波波利斯(Philippopolis)之围，该地是今天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迪夫(Plovdiv)。哥特首领找到了五位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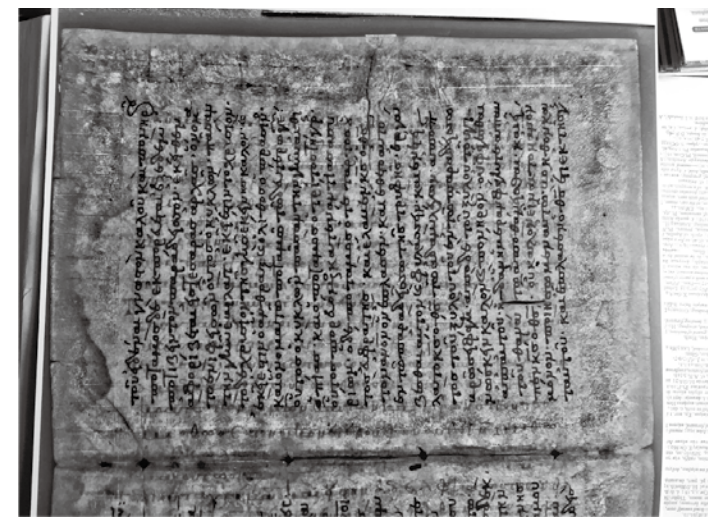
士，他们将连夜翻墙突袭守城的罗马人。第一个登上城头的人将会得到重奖：一笔巨资，500大流克(dareikoi)。大流克乃一种已不再流通的波斯金币；德西普斯为什么不用当时的标准说法，即可路撒货币(nomismata khruza)来称呼金币呢？这是因为他要使用一个不同于罗马通行货币的词。不幸的是，修昔底德并没有提到任何非希腊的通行货币；因此只能从另一位黄金时代的古典作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作品中借用一词，尽管这样就必须使用一个阿提卡作家未用过的词。

讲座最后，威尔逊教授着重感谢了一家美国的机构，由麦克·菲尔普斯(Mike Phelps)领导的早期抄本电子图书馆(Early Manuscripts Electronic Library)以及一个专业的技术团队。他指出，如果他们继续提升技术，那么下一代学者就可以从更为有利的位置上来解读这些抄本。

与谈环节

史睿老师提出，中国古代典籍也存在重写本的情况。在敦煌以及新疆出土的木简，以及石窟里的题壁都存在重写的现象。20世纪初，斯坦恩在敦煌挖掘到木简和削衣。削衣指的是在木简上刮下的带有墨迹的木屑。木简和削衣本身就构成了初写本和重写本的关系。还有在

吐鲁番、敦煌出土的4至10世纪的纸质写本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利用旧的写本，在其纸背，甚至行间书写的情况。还有一些正反两面都有文字的写本，它们是卷在一起的，因此在受潮之后，字迹都印在纸的背面，最多能形成三到四层的文字。还有一些特殊用途的纸，因材质较厚而用于制作封皮包裹书籍，后来被揭下来时，也粘到了一些文字。要用特殊的光源才能加以识读。中国的造纸术大概分为两个阶段，早期是把纸浆灌在一个有孔眼的，用于过滤的薄膜上，形成灌制的纸张。大约在5，6世纪后，人们发明了纸抄，即在纸浆水里捞出纸张的造纸方法。不同的造纸技术，使得纸的分层不一；对于抄制的纸，可以通过特殊的技术使其分成若干层。这样的分层，使得中国古代的写本产生墨迹渗透程度不同的多层纸张。新技术让我们得以看清不同层次的墨迹，这也是我们辨别真伪的方法。现在中国古代写本研究已经开



威尔逊教授展示的阿基米德重写本，表层文本为阿基米德作品，底层实为希佩里德斯演说稿，与表层文字成九十度交错。

始采用光谱,尤其是高光谱技术来识别不同层的墨迹,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技术来研究收藏的河田新疆文书。因此史睿老师认为,不论是中西方古籍,这些方法和技术可互相交流、借鉴。

苏杰老师对威尔逊教授的精彩报告和史睿老师的与谈表示感谢。他提出,西方重写本的出现,有几个条件,一是皮纸缺少,需要对写本书进行再利用;二是皮纸有一定的厚度,可以刮除先前的笔迹;三是皮纸厚度有限,不得不留下先前笔墨的痕迹。这是典型的重写本。他认为这与中国的竹简不太一样,因为竹简有足够的厚度,删削一般不会留下先前的笔墨痕迹。史睿老师所提到的削衣应是罕见的例外。他进一步想了解,是否还存在其他类似的书写材料能够形成重写本。还有,对于中国古代的抄工,笔和刀是同时使用的。他看到西方的一些画有抄工的图上,也是一手有笔,一手有刀。他想知道,刀在抄工的使用过程中,是否有删除文字的作用?因为他曾经看到过在西方的一些写本中,出现文字下面画点以表示删除的做法。另外,关于用“斯基泰人”指代“哥特人”的“阿提卡主义”的拟古手法,他说中国人可能很容易理解。威尔逊教授在《抄工与学者》一书中有一句:“拟古到这种规模,可谓世无其匹——中国也许是个例外,毛泽东可能会认为用8世纪诗人李白的风格写诗是不错的选择。”不仅是毛泽东,在1911年之前,中国的举子都被要求用13世纪的《平水韵》写格律诗,直到今天有不少人还在这样做。

威尔逊教授指出,讲座里给大家展示的阿基米德的文本摄于2007年,也就是14年前。如果用现在的新技术再研究这些抄本,他相信能解读出更多的内容。最早的重写本出现的时间已不可考,尽管他猜测是公元7到8世纪。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抄本上通常没有注明日期。一般而言,研究者通过辨认字体来推断日期,但古代抄工的书写偏保守,没有证据表明某一时代里字体有了快速的发展。但也有一个例外,即亚美尼亚手抄本(Armenian manuscripts),它们一般会有一清楚的跋款和日期。至于刀的使用,尚缺确切证据。如果使用刀的话,容易损坏皮纸的表面。讲座所提及的维也纳抄本中有一页凭肉眼已辨认不清;这是否因为抄工用刀刮除,他不肯定,因为这做法并不寻常。或许有人用液体来覆盖了这些文字,但这只是猜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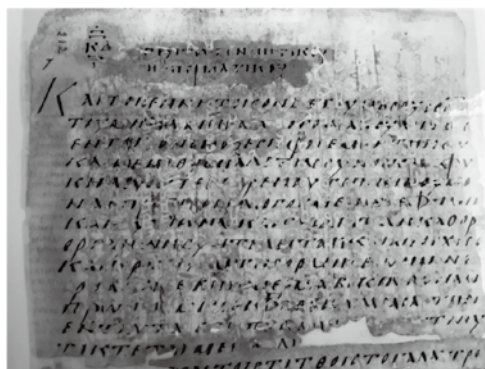
林丽娟老师对威尔逊教授讲座中所提到的两个重写本非常感兴趣。她指出,如果查找梵蒂冈图书馆,会发现很多重写本已经被数字化;但唯独威尔逊教授所提到的这两个重写本没有数字化。尤其是那个既有叙利亚语,也有希腊语的双语重写本,第一部分的前几百页已经被数字化,但这部分内容并没有出现重写的现象;但有重写现象的后半部分却没有被数字化。这是什么原因?她认为,如果有数字化图片,那么中国学者在中国也可以研究。另外,要校勘一个古希腊数学文本,需要古典学家具备数学知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古典学家都同时是数学家。古典学家是否应

该与数学家合作,还是鼓励数学专业的学生学习古希腊语,或者反过来让学习古希腊语的学生学习数学知识?对此,她也想了解更多。威尔逊教授在校勘阿基米德这个文本的经历。

对此,威尔逊教授回应道,现在仍未收录电子版,是因为获取高清图片比较困难。他与另外一位意大利的教授原本计划出版此文本,然而因为那位教授事务缠身,出版工作尚无进展。他认为梵蒂冈图书馆希望他们能先出版,然后再收录电子版。至于阿基米德这种数学著作,他更推荐多个专家合作共同完成。他不擅长数学,在校勘这个文本的时候就经常咨询数学专家。

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提出,西方重写本的出现除了因为纸张缺少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如宗教、语言方面的原因?敦煌出土的抄本中有汉人在突厥如尼文上直接书写的现象,因为汉人不认识突厥如尼文,而且书写方向正好成90度。因此他推测威尔逊教授所提到的叙利亚语-希腊语的重写本是否因为抄工不认识希腊语,所以直接在上面写?

威尔逊教授认为西方重写本的形成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认为之前的抄本不再重要。如果当时的抄工亟需抄写一个新的文本,那么一般会选取已经损毁、不全、价值不大的文本制作重写本,尽管个中原因并不明说。对于谁最早制作重写本,我们不得而知。或许那人还会引以为傲,以为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废物利用。至于语言层面,当时那个地区里人们通用的语言不止一种,



使用安色尔字体抄写的奈美修斯哲学作品《论人性》片段

希腊语只是其中一种。而且希腊语使用比较广泛,时间也比较长。一直到9世纪仍可见希腊语著作被翻译为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其实是讲叙利亚语;大部分人基本都能使用三种甚至更多的语言。

最后,苏杰老师对威尔逊教授的四场精彩讲座表示由衷的感谢,他认为这系列讲座推动了中国的古典学研究,以及中西方学术交流,尤其是在文本校勘以及古文书学方面,影响深远。威尔逊教授也表示,这四次讲座对他而言也是非常宝贵的经历,他为自己被中国最好的大学邀请来做讲座感到非常荣幸,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非常

(撰稿:钱丽雯)



235

斯钦巴图 | 史诗内部张力与《江格尔》类型群的形成

2021年11月29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35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史诗的内部张力与《江格尔》类型群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斯钦巴图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

系副教授史阳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阿地里·居玛吐尔、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陈岗龙评议。本场讲座为“史诗遗产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之一。

讲座伊始,斯钦巴图老师首先介绍了本次讲座的主要讨论对象——“《江格尔》史诗”。《江格尔》是我国“三大史诗”之一,最初产生于我国新疆卫拉特蒙古民间,并随着卫拉特蒙古的迁徙足迹流传至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比如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图瓦共和国等)和各个蒙古族聚居区,是欧亚大陆跨国、跨民族共享的伟大史诗。“江格尔”即史诗叙事的主人公江格尔。在内容上,史诗讲述了洪古尔、阿拉坦策吉、明彦等十二位英雄和六千名勇士在圣主江格



斯钦巴图研究员

尔的领导下保卫家乡、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的故事,描绘了蒙古族古代社会波澜壮阔的征战画面,表达了人类向往和平的美好理想。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叫“江格尔奇”。

随后,斯钦巴图老师带领大家简要回顾了俄罗斯、蒙古国、中国三国《江格尔》的搜集、出版、研究史,介绍了中国《江格尔》首个版本《洪古尔:蒙古民族故事》的编者边垣的生平事迹及其发现经历。有关《洪古尔:蒙古民族故事》的出版史,在众所周知的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和作家出版社1958年修订版之外,斯钦巴图老师首次介绍了此前学界并不知道的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印版。根据1957年版印数编号确定1950年版印数为2000册,1957年版印数为1000册,并由此解开了学界普遍

了解和利用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洪古尔》,而利用1950年版的极少且完全不知道1957年版的“谜底”——这两个版本印数极少、传播范围有限。斯钦巴图老师继而讲述了如何根据1958年版《后记》关于编者工作经历的极其有限的信息,经过一段怎样的调查经历,最终发现《洪古尔》的编者边垣完整的人生经历的过程。

接下来,斯钦巴图老师带领大家进入了史诗文本的结构——《江格尔》情节结构的张力。他认为,与荷马史诗、印度两大史诗、《格萨(斯)尔》《玛纳斯》等史诗相比,《江格尔》的情节结构特色鲜明、独具一格。《格萨(斯)尔》史诗中格斯尔始终是贯穿史诗的主要英雄;《玛纳斯》史诗八部则叙述玛纳斯和其子孙八代的英雄业绩,玛纳斯则是其第一部《玛纳斯》贯穿始终的主要英雄。《江格尔》里的江格尔在少数诗章中作为主要人物出现,在绝大多数诗章里,叙述主人公是他的多名勇士和他们的英雄事迹。绝大多数诗章没有先后顺序,每个诗章开头都有序诗,长短不一、繁简不同,但核心内容大同小异:描绘“圣主江格尔”“宝木巴国”和阿拉坦策吉、洪古尔等左右翼勇士们。《江格尔》的数百个诗章以其序诗相互关联,成为相互并列又统一的“并列-复合型史诗”。

为探讨史诗的内部张力如何推动类型群的形成,斯钦巴图老师首先分享了他对《江格尔》史诗类型群的划分:

- 具有序诗及其标志性人物的数百部诗章(核心和扩展型)
- 与《江格尔》史诗密切相关、具有《江格尔》某些因素的史诗(边缘型)
- 叙述洪古尔等英雄人物事迹的英雄故事(体裁转换型)
- 《江格尔赞》等民歌
- 与《江格尔》相关的神话传说
- 所有这些,汇聚成《江格尔》口头传统,并为观察研究《江格尔》类型群的发展演变轨迹提供线索。

其一为核心和扩展型,包括具有序诗及其标志性人物的数百部诗章;其二为边缘型,包括与《江格尔》史诗密切相关及具有其某种因素的史诗;其三为体裁转换型,包括叙述洪古尔等英雄人物的英雄故事;其余包括《江格尔赞》等民歌、与《江格尔》相关的神话传说。

谈及《江格尔》并列-复合型结构的形成,斯钦巴图老师认为,《江格尔》是在蒙古史诗传统胚胎里孕育、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因此对其并列-复合型结构的探讨应置于整个蒙古英雄史诗传统中。幸运的是,蒙古族拥有各种篇幅规模、各种类型、各个地方传统的史诗,为探讨该问题提供了条件:

- 按篇幅规模:短篇史诗;中篇史诗;长篇史诗。
- 按主题类型:征战型史诗;婚姻型史诗;结义型史诗;内斗型史诗。
- 按结构:单篇型史诗;串联复合型史诗;并列复合型史诗。
- 按地域、部族:卫拉特-卡尔梅克史诗;布里亚特史诗;喀尔喀-巴尔虎

按篇幅规模分为短、中、长篇史诗;按主题类型分为征战型、婚姻型、结义型、内斗型史诗;按结构分为单篇型、串联复合型、并列复合型史诗;按地域和部族分为卫拉特-卡尔梅克史诗、布里亚特史诗、喀尔喀-巴尔虎史诗。

关于蒙古史诗的结构类型,许多学者曾试图进行归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波佩、海希西和仁钦道尔吉。波佩基于喀尔喀史诗资料,认为蒙古史诗有“单结构”史诗和“多结构”史诗,其中任何一个单独的结构都是一个最简单的史诗。斯钦巴图认为,这一归纳虽然抓住了蒙古史诗最基本的两个类型,但是未能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蒙古史诗结构类型的形成发展过程。德国学者海希西归纳了蒙古史诗母题结构

的时间、英雄的出生、英雄的家乡、英雄的外貌性格及财产、与英雄有特殊关系的马、启程远征、助手及朋友、受到威胁、仇敌、遇敌和作战、英雄的计谋和魔力、求婚、婚礼、返回家乡等 14 个大类，这 14 大母题类似于帕里 - 洛德理论中的“主题”或“典型场景”。斯钦巴图认为，海希西的母题类型归纳和揭示了蒙古史诗的一般结构模式，却没能析出史诗的基本情节结构，不足以说明蒙古史诗结构类型的发展变化。同时，在 14 个大类下位的第二、第三、第四层级的母题中情节性单元和描述性单元混合在一起。

斯钦巴图认为，仁钦道尔吉的创造性贡献在于把波佩的情节单元划分法与海希西的母题类型划分法结合起来，将两者融合，提出史诗母题系列概念：体现蒙古史诗古老传统情节之周期性和规律性的、构成蒙古史诗基本情节的、具有自身结构模式和固定基本母题的情节单元。这种情节单元，与波佩提出的单结构史诗相对应。仁钦道尔吉认为蒙古英雄史诗有基本的两种母题系列，即：婚姻母题系列（由此构成婚姻型单篇史诗）和征战母题系列（由此构成征战型单篇史诗）。两个或两个以上母题系列构成串联复合型史诗，之后出现并列复合型史诗（《江格尔》），其中包含上述所有类型。斯钦巴图认为，仁钦道尔吉准确描述了并列复合型史诗的结构规律，同时，他把单篇型史诗、串联复合型史诗、并列复合型史诗内部各种类型题材同蒙古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过程结合起来，是对蒙古史诗结构类型的一次科学总结。但在串联复合型史诗到并列复合型史

诗转变的具体环节上，斯钦巴图老师认为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斯钦巴图认为，从串联复合型结构到并列复合型结构是蒙古史诗结构发展的一次飞跃。为了弄清楚这种飞跃的发生，不仅要回归到蒙古史诗各种类型的文本，从文本中寻求突破口，更要回归到田野，回归到艺人的演唱实践，从文本中、从艺人的演唱实践中观察其在传统何种观念支配下如何记忆和演绎史诗的。

基于文本分析和田野观察，他提出“演唱单位”“记忆单位”两个概念。具体来说，一般的单篇史诗、串联复合型史诗演唱单位是结构完整的——这是蒙古史诗传统一个重要规矩。也就是说，所谓演唱单位，按照蒙古史诗传统规矩，就是结构完整的单篇史诗或串联复合型史诗。相比演唱单位，记忆单位可大可小，大到一整部史诗，小到一个主题、典型场景，或者更小的程式化诗句。

斯钦巴图提出，最小的演唱单位同时还是单篇史诗、串联复合型史诗的基本记忆单位，其记忆功能在基本情节叠加数量较多的串联复合型史诗中尤为明显。在基本情节叠加数量较多的串联复合型史诗中，每个记忆单位都有提示诗句，其形式是表示英雄每次业绩的简单陈述句或短句。一部史诗所有提示诗句串联起来，就能概括记忆一部长篇史诗。

串联复合型史诗的提示短句是内置的，它是并列复合型史诗分部名称的雏形。斯钦巴图老师举出长篇史诗《宝玛额尔德尼》和《岱尼库日勒》以辅助说明该现象。

史诗名称	记忆单位的提示语句
布尔罕开父亲 布拉姆给母亲的儿子 好汉宝玛额尔德尼 （串联复合型长篇史诗的提示语句，在该史诗只叙述一个英雄的事迹时，提示语句中英雄名字可提可不提）	宝玛额尔德尼的政教之第一章
	宝玛额尔德尼出生之章
	宝玛额尔德尼备马之第二章
	宝玛额尔德尼金副武装之第三章
	铲除五个哈尔赫吉思之第四章
	宝玛额尔德尼与哈吉尔哈日结义之第五章
	铲除哈达、哈日盖两个大力士，夺回哈吉尔哈日的部众之第六章
	消灭青杰、克里之第七章
	消灭十个蒙古思之第八章
（与库克铁木尔告别）结义之第九章	

这是叙述宝玛额尔德尼英雄事迹的串联复合型长篇史诗。自始至终叙述一个英雄人物的事迹，因此有的时候提示诗句中提示英雄名字和他的英雄事迹，如第一至第三章，第五章，有时只提示英雄业绩，如第六至第九章。

最小演唱单位内部，也有很多不同层级的记忆单位，相应也都有提示诗句。在史诗开头的静态描绘部分，记忆单位的提示诗句一般围绕一个名词构成；动态叙述部分的记忆提示诗句一般围绕一个动词性短语构成。在艺人头脑里这种提示诗句有着巨大的张力，通过不同层级的提示诗句，艺人能够创编出细节丰满、形象鲜明、结构完整、富含历史文化信息的史诗。

当串联复合型长篇史诗中英雄人物增多时，例如《达尼库日勒》史诗中主要英雄达尼库日勒之外还叙述扎恩布伊东、额尔德尼库日勒等不同人物的业绩，因此，这些英雄业绩的记忆提示诗句，均由英雄提示和业绩提示两个部分构成。而这，与并列复合型史诗分部名称完全一样，说明是它的前身。

斯钦巴图认为，对于长篇史诗，英雄业绩的增多和反面人物的增多并不会把史诗演唱复杂化。但是，独立完成业绩的英雄人物增多，会给史诗结构、艺人记忆和

演唱带来困难。为此，就出现了艺人把串联复合型长篇史诗的基本记忆单位转化成演唱单位，把长篇史诗的分章变成独立演唱的诗章，把分章名称前置，变成分部名称的现象。这样，串联复合型长篇史诗完成了向并列复合型史诗的转化。《江格尔》的并列复合型结构就是在这种转变中产生和发展的。从此，《江格尔》在总体上呈现并列复合型史诗，但在每个分部的形式上却回归到串联复合型史诗。有些学者说《江格尔》不是长篇史诗，而是并列复合型史诗、史诗系列、史诗集群，都是根据《江格尔》史诗的分部回归到串联复合型中小型史诗这一事实。但如果考虑到它由长篇史诗发展而来的过程，说《江格尔》是长篇史诗并无不妥。

随着《江格尔》从串联复合型长篇史诗向并列复合型史诗的转变，艺人记忆和演绎史诗的提示系统中产生了分部名称这一提示层级。分部名称的结构有规律性。

史诗名称	分部名称中的英雄提示	分部名称中的英雄业绩提示
《塔黑朱拉汗的后裔、唐苏克宝木巴汗的儿子、乌宗阿拉达汗的儿子、孤儿江格尔传》	江格尔	与阿拉坦蒙古战斗之部 续杀之部
	洪古尔	活捉阿拉坦蒙古之部 与老乃汗战斗之部
	萨纳拉	与哈白吉拉汗战斗之部 征服扎恩布伊东之部
	明彦	驱赶阿拉坦蒙古汗的马群之部
	萨布尔	活捉库尔德汗之部
	和顺乌兰、哈日吉拉干、阿里亚德那尔	征服凶残的撒拉汗之部 活捉巴达玛乌兰之部

从图中可以看出，并列复合型史诗分部名称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即英雄名字和英雄业绩。这两个部分分别有极其重要的记忆和提示作用。在艺人掌握许多《江格尔》诗章的情况下，分部名称中的勇士名字，首先区隔了不同勇士的故事。例如洪古尔的名字把他的故事同江格尔、萨纳拉、萨布尔、明彦等勇士的故事区隔开来。

分布名称中的英雄业绩部分把同一位勇士的多个故事相互区隔开来，例如图中关于洪古尔的4个诗章，是用业绩提示部分相互区分的。

“史诗名称”、“分部名称中的英雄提示”、“分部名称中的英雄业绩提示”三个部分，只是艺人在开始演唱前对演唱内容的选择和提示的三个层次，它们层次分明，区隔清楚，在并列复合型结构中给各个分部做了准确的定位。艺人一旦选择到第三层，就已选定了《江格尔》并列复合型结构中的特定篇章。接下来具体演唱的时候，那些更小的、不同层级的记忆提示诗句将发挥它们的作用，引导艺人创编出肢体丰满的史诗。

并列复合型结构的形成，为《江格尔》类型群的膨胀提供了广泛的前景。斯钦巴图老师认为，一部伟大史诗一经形成，将产生对传统中其他史诗的吸引力，这在蒙古史诗的三个中心就存在。在新疆，就有除了那些公认的《江格尔》英雄的诗章以外的其他史诗被纳入《江格尔》系列的倾向（沙日古尔古汗之部与《格斯尔》的《沙莱高勒三汗之部》的高度相似性（科津）和卫拉特史诗传统向《江格尔》聚拢的特征。这个特征是在《江格尔》史诗系列在新疆卫拉特史诗传统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其影响不断加强，其吸收力不断膨胀的过程中形成的。而《江格尔》史诗系列的并列复合型结构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为新疆卫拉特史诗传统的上述发展态势提供了可能。而在青海蒙古族地区，《格斯尔》史诗吸收了除核心诗章外的《古南布克吉尔嘎拉》《额仁赛音歌格思》《道

利静海巴托尔》等当地古老史诗。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蒙古地区，《格斯尔》也产生了这种影响力。布里亚特《格斯尔》第一部是传统的《格斯尔》诗章，而第二部格斯尔之子奥希尔·博克多的史诗、第三部关于格斯尔的三子胡仁·阿尔泰的史诗、第四部关于格斯尔曾孙辈奥希尔·博克多之子的史诗，实际上都是被纳入《格斯尔》系列的布里亚特蒙古其他史诗。

斯钦巴图老师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一味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到繁滚雪球式单向发展的。史诗也一样，尤其是像《江格尔》这样结构松散的史诗更是如此，它经常处于形成与消解的双向发展过程中。促成这种发展格局的因素很多，例如艺人很容易学会或创编一部诗章，也很容易忘掉一些诗章；一部史诗在特定条件下被当作《江格尔》的一部诗章演唱，在其他时候又恢复其独立原貌；在《江格尔》诗章与英雄故事之间经常处于体裁变换当中；在一个地区《江格尔》持续保持着发展的强劲态势（例如新疆），在其他地方则失去典型特征进入衰退和变异的轨道（例如在蒙古国），而另一些地方却已经消亡而仅保留着有关《江格尔》的传说和民歌（例如阿拉善卫拉特地方）等等。《江格尔》在中国新疆、在中国内蒙古阿拉善盟、在蒙古国呈现出的不同发展态势就已经说明了《江格尔》形成与消解的双向发展过程。

另一方面，《江格尔》类型群中存在核心诗章、扩展型诗章、边缘型诗章和体裁转换型篇章的事实，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江格尔》类型群所处的“形成和消解”双向发展过程。

斯钦巴图老师把《江格尔》史诗典型诗章，按人物归于以下几种：

其一，关于江格尔与敌人战斗的故事；其二，关于江格尔与各位英雄结义的故事；其三，关于江格尔的勇士们与形形色色的敌人战斗的故事；其四，关于江格尔祖先和子孙的故事；其五，关于江格尔手下勇士们下一代的故事。斯钦巴图老师认为其中前两种是核心部分，后三种是扩展部分。

斯钦巴图老师认为，除核心诗章和扩展型诗章，还有一部分史诗处于《江格尔》史诗系列的边缘地带，即边缘型篇章。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均出现传统《江格尔》的某个主要人物（人名有时还有一些变异），但不提宝木巴国和江格尔的其他勇士。例如《额日古因古南哈日》《准布尔达赖汗》等史诗。从蒙古国西部卫拉特人中记录的《江格尔》，相当一部分均属于这一类型。边缘型诗章是蒙古卫拉特其他英雄史诗进入《江格尔》史诗系列，或者该诗章脱离《江格尔》史诗系列的一种过渡形态。

体裁转换型篇章一般包含与史诗相关的卫拉特英雄故事，是蒙古卫拉特英雄故事进入《江格尔》史诗系列或《江格尔》史诗篇章进入蒙古卫拉特英雄故事时产生的过渡篇章，反映了《江格尔》史诗系列与蒙古卫拉特英雄故事的紧密联系，其存在可辅助史诗与故事两种体裁的关系研究。《江格尔》传统中存在边缘型诗章和转换体裁的《江格尔》英雄故事是《江格尔》类型群形成和消解的双向运动的切实例证。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斯钦巴图老师详细阐释了《江格尔》类型群与蒙古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史诗固

然有它自己的结构规律和机理，史诗艺人也有自己的创编才华和技巧，但并不是掌握了史诗结构和创编技巧的艺人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决定《江格尔》类型群形成、发展的是蒙古族历史文化，每种类型都是蒙古族历史文化的产物，它们一道反映了蒙古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回顾以往，学术界也曾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观察《江格尔》等蒙古族史诗类型与蒙古族历史文化的种种联系，例如，仁钦道尔吉认为蒙古英雄史诗的婚姻母题系列和征战母题系列均与蒙古族婚姻制度史和北方民族历史上的战争有内部关联（《江格尔》恰好包含着两种母题系列）。因此，史诗的内部张力，最终都来源于史诗所赖以产生并反映的历史文化。

斯钦巴图老师认为，《江格尔》等蒙古史诗高度浓缩地反映蒙古族从远古以来的历史文化，其中的每种题材、主题、母题、程式都有信息的巨大张力。为了撬动蒙古史诗被压缩的“地质层”，中外学者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借助于蒙古族古代历史文学文献，尤其是用《蒙古秘史》解读蒙古史诗。例如，符拉基米尔佐夫、科津、波佩、米哈伊洛夫、劳伦茨、涅克留多夫不仅发现蒙古史诗与《蒙古秘史》在题材、结构框架、形象塑造、语言等方面的相似之处，而且认为蒙古史诗为《秘史》提供了叙事范例。符拉基米尔佐夫说，卫拉特史诗塑造的艺术世界与草原游牧民族真实生活的典型状况十分相近，而作品中反映的社会政治结构与《蒙古秘史》中所发现的情况也非常一致。的确，《蒙古秘史》及其后续一系列蒙古

历史文学文献与蒙古史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蒙古史家们不仅利用蒙古史诗框架结构、题材创作历史著作，甚至把关于叙述蒙古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整部英雄史诗都收录到自己的著作中。例如，罗卜桑丹津的《黄金史》中成吉思汗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的故事，就是典型的史诗作品。其从结构、母题到语言，都保留着鲜明的史诗特征，尤其是它的语言和幽默风格与《格斯尔》史诗十分相似。这说明，直到16-17世纪，蒙古族民间仍然产生叙述关于成吉思汗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史诗。但不能因此而认为所有蒙古史诗都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原型创造，从而一味地追求发现史诗人物的历史原型。

斯钦巴图老师认为，把《江格尔》同《蒙古秘史》比较，目的不在于发现史诗人物与历史人物的对应，不在于寻找史诗人物的历史原型，而是找寻解读《江格尔》的一把钥匙，找寻蒙古族史诗如何叙述蒙古游牧社会历史的规律性策略，以打开史诗文本所隐藏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和分析研究《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对蒙古族历史的叙述手法后，斯钦巴图老师发现《江格尔》等蒙古史诗中“狩猎”“盛宴”“结义”“婚姻”“合而驻牧”“收养孤儿”等母题具有特定的含义，在史诗叙事中具有意义转换作用。

小结部分，斯钦巴图老师特地强调了多文本比对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要想对史诗进行历史解读，单一文本是不够的，必须在一部史诗或一部诗章的多个异文中



《江格尔》史诗手绘插图

析出稳定传承的母题和情节。在稳定传承的情节母题基础上结合一些母题的解读法，才能透过表面看到蒙古史诗所展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否则，在蒙古史诗高度程式化、类型化条件下，只能看到故事的表面，看不到故事的实质，得到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牧民的婚事故事。蒙古史诗内部张力来自情节结构的张力和历史文化内容的张力。

最后，斯钦巴图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行归纳：《江格尔》史诗的并列复合型结构是在蒙古族串联复合型长篇史诗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串联复合型长篇史诗中英雄人物逐渐增多、不同英雄人物的业绩逐渐增多的情况下，艺人把串联复合型

长篇史诗的基本记忆单位转化成演唱单位的结果。从而，《江格尔》在总体结构上呈现并列复合型特征，但在具体演唱的诗章上回归到了串联复合型中小型史诗。一部伟大的超大型史诗一旦形成，深刻地影响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史诗传统，对传统内部其他史诗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并列复合型史诗经常处于形成与消解的双向运动中，能够体现这一趋势的，是《江格尔》类型群中不仅有典型的《江格尔》史诗诗章，同时还有边缘型诗章和体裁转换型篇章。决定《江格尔》类型群形成、发展的是蒙古族历史文化，每种所涉类型都是蒙古族历史文化的产物并以高度程式化、高度浓缩的形式反映蒙古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我们只有在研究和观察中准确地找到解码“钥匙”，才能打开隐藏在史诗文本背后的文化实质。

评议环节，阿地里老师认为，本次讲座中斯钦巴图老师基本上将近年来《江格尔》最新的研究成果都呈现了出来，尤其是“记忆提示”和“形成与消解的双向转化”部分的创新都是《江格尔》学、史诗学的研究前沿。对比《玛纳斯》史诗等其他史诗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斯钦巴图老师围绕对《江格尔》的研究，继承性地推动了口头程式理论“史诗文本情节结构与艺人创编技巧的内部逻辑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也很好地为比对、探讨“史诗文本与特定民族历史文化关系”这一重要研究课题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评议中，阿地里老师还举隅了《玛纳斯》史诗艺人自述记忆、传承史诗的采访个案，回应了两部史诗共同涉及的艺人

记忆、传播史诗的共性和差别；结合荷马史诗文本与历史的关系再次强调了历史比对的重要性，并呼吁不要单一进行对号入座和直接对应，作为史诗研究者，我们应该牢牢抓紧解码“钥匙”，更加深入地洞悉文本与历史背后深邃的文化记忆。

陈岗龙老师认为，斯钦巴图老师稳健的研究思路和涉及“记忆提示”“形成与消解的双向转化”的新成果能为大家重新审视、观察“史诗遗产与文明互鉴”带来启发。反思史诗的各维度的研究成果后会发现，前人研究史诗时归纳的情节单元和结构类型都是根据文本总结出来的，其归纳和分类始终是“从文本出发又回到了文本中”，而斯钦巴图老师在处理史诗情节结构的理论问题的同时，结合了艺人记忆史诗的规律，将分离已久的文本的结构研究和同艺人记忆、创编研究的有效联动在一起，是史诗文本研究向艺人表演、传承研究层面上的延伸和创新。这样，我们对史诗文本的探索和史诗学学术史的反思就会更加宽广和深厚，书面文本中的史诗与演唱中的史诗就能再一次走向聚拢，实现还原。同时，陈岗龙老师认为，其对串联复合型史诗和并联复合型史诗的理论归纳也迈向了新的台阶，以往被分开讨论的两大史诗的结构类型在其研究中因诸多要素举证和分析呈现出的“双向转化”，个案全部都能够印证《江格尔》史诗“形成与消解”这一动态过程，因此，这样扎实的研究就更能为理解北方史诗文本与历史的深刻关系带来便利。

(撰稿：乌哈娜)

237

孙来臣 | 语言的流动——全球史视野下近世欧亚大陆东部的翻译浪潮（约 1200-1850 年）



2021 年 12 月 5 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 237 期在线举行，主题为“语言的流动——全球史视野下近世欧亚大陆东部的翻译浪潮（约 1200-1850 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敦分校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来臣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日本成城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陈力卫、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王宏志与谈。

讲座开始，孙来臣老师首先指出，“近世”一词就是西方学者所使用的“early modern”，接着他阐释了本次讲座的主题。本讲中的欧亚大陆东部主要指东南亚、东亚地区，强调全球视野，比较研究。关于翻译的重要性与深层意涵，孙来臣老师引用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和季羨林的话，指出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是异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翻译是文化交流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

孙来臣老师紧接着介绍了本研究的构思过程。首先，他指出全球史历来重视物品（瓷器、农作物、白银等）与人员（移民、奴隶、学生、使节、间谍、商人等）的流动以及科技思想的传播。物质、人员以及语言都是知识传播的媒介，但均需要借助翻译才能完成交流。

传统历史研究并不重视翻译史研究，全球史研究历来强调不同文明、文化、民

族之间的联系，但对翻译史问题却注意不够。如卜正民在《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中提及国际贸易中翻译的重要性；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在其编撰的全球时著作中也开始涉及翻译问题。从全球范围内看，学者们更关注西欧的翻译问题，较少注意亚洲。这次讲座将主要聚焦对亚洲翻译史的新思考，试图与传统的国别翻译史、“翻译研究”进行对话，运用多学科、多角度囊括东南亚和东亚等地区，形成全球视野。目前，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翻译史研究（即“历史转向”historical turn），但还需要“大地区转向”（supra-regional turn）和“全球史转向”（global historical turn）。讲座也强调注意“比较翻译史”：既重视亚欧之间、又重视亚洲各国之间的“深入”比较；既重视西风东渐对亚洲翻译的有力推动，更重视来自亚洲内部的巨大活力。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认为欧洲地区是文化交流中持续、强劲翻译的代表，但孙来臣老师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看法表示怀疑，他指出亚洲的翻译活动同样充满活力、持续不断。在探讨这方面内容时需要考虑跨学科方法，包括历史学、全球史、文学、语言学、翻译研究等多领域。

接下来，孙来臣老师试图对亚洲翻译史重新分期。目前国内已有多部翻译史研

究专著，采用中国国内传统分期方式，将公元二世纪到 1839 年的翻译活动一概称之为“古代翻译”，过于笼统；孙老师将公元二世纪至 1200 年前后视为亚洲的“古典翻译”时期（classical translation），公元 1200-1850 年左右为“近世翻译”时期（early modern translation）。近世时期的翻译在广度、深度、内容、数量等方面都大大超过古典翻译时期。近世翻译的动力源泉大致可以归结为七类：其一为由异族（元、清）入侵中国所需的日常行政翻译；其二为上情下达类的行政翻译，目的是让百姓听到政府的声音；其三为外交翻译，例如明清时期的四夷馆与四译馆，服务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外交；其四为宗教（圣经）翻译，如玄奘所谓“佛兴西方，法流东国”，此类翻译用于儒家、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宗教由西到东的传播，从而使日本、朝鲜、越南、琉球以及东南亚等次生文化国家得以学习借鉴原生文化；其五为科技翻译（农业、医学、军事等）；其六为商贸翻译，最著名的为日本的“唐通事”；其七为文化翻译，包括白话小说等文学翻译。

随后，孙来臣老师谈及“近世性”这一概念。“近世性”指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早期特征，根据傅礼初（Joseph Fletcher）的界定，表现为人口增长、节奏加快、城市化程度增加等多方面特征。随着商业贸易与人口流动的增加，信息流动也大幅增加。学者丸山真男、加藤周一以及王宏志均强调翻译铸就了近代亚洲，那么近世性与翻译有什么关系呢？翻译在近世亚洲发展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接下来，孙来臣老师以具体例子来说明“近世性”的问题。现代东亚的“言文一致”、白话文运动、普及国语运动的根源都可以追溯至“近世”时期。例如，中国从元朝开始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越南以及中国周围地区发明字喃，朝鲜于 1446 年创制谚文，目的都是为了言文一致。近世各国翻译的目的之一就是普及知识，如元朝贯云石在《孝经直解》中所说：“使匹夫匹妇皆可晓达，明于孝悌之道”，通过翻译使中央政令与思想传达至百姓之中。同样的情形也见于东南亚，如将梵文（Sanskrit）与巴利文（Pali）翻译为缅甸文、孟文、泰文 / 暹罗文、老文与傣文；把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文（Arabic）翻译为马来、爪哇等地语言；把西班牙语、荷兰语等欧洲殖民语言转换为菲律宾、爪哇等地语言等。

全球史家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在其巨著《奇异的平行》（Strange Parallel）中强调近世欧亚大陆政体的发展趋势，包括疆域的扩张、行政效率的提高与文化的整合，而造成这些趋势的多种因素包括人口增加、经济增长、市场扩大、识字率（literacy）提高等等。然而，在识字率这一项因素中李伯曼却忽视了翻译在欧亚大陆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故孙来臣老师试图拓展翻译在提高识字率、从而促进行政效率提高与政体整合的作用。例如，由于语言的不同和差异，各国中央政府在向下传达政令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翻译。而农书、医书的翻译传播了技术，导致了人口的增长；根据韩国学者李泰镇的

研究, 朝鲜王朝 15-16 世纪的人口因此而大幅度增长。在 1550-1683 年亚洲的“战争世纪”中, 编撰、翻译兵书对各国战争产生了巨大作用。从这些角度看, 可以说翻译就是生产力。

本次讲座试图深度挖掘“翻译”行为, 从狭义到广义, 从国际、中央到地方, 从显性到隐性。孙来臣老师认为可试图拓展现有的“翻译”概念。除了传统定义(主要指不同文明/文化/国家的不同语言之间)外, 还包含同一语言内部不同语体的翻译(如古代日语与近世日语、白话与文言、老满文与新满文等等), 也不局限于一字一句地翻译, 还包括各种自由体例的翻译, 如改写、注解、意译与摘要等。只要内容从一种形式或风格的语言转向另一种, 就可被称之为“翻译”, 即使有些不算严格意义的翻译也可算在其中。

基于以上定义, 孙来臣老师将力图在显性翻译(文明、文化交流与国际贸易等所涉及的翻译)之外, 挖掘隐性翻译。行政类隐性翻译主要发生在元朝、清朝建立在翻译之上的外来征服王朝中, 包括“直解”类翻译(从文言到白话)、亚洲各国“经筵”涉及的翻译、汉文史书编撰涉及的翻译以及国家政令下达涉及的翻译等。隐性翻译包括将汉文口语或外语翻译成文言。例如, 东亚国家“实录”或其他记载里的上谕、对话等都以文言写成, 在中国其实是由白话“翻译”而来, 而在朝鲜、越南、甚至日本、琉球则系翻译本国语言而来。如《大越世纪全书》1390 年载: 时漏下三鼓, 上皇睡熟惊起, 以为贼犯御营。及闻捷奏云: “已获蓬莪藪。” // 乃大喜, 召群臣谛视。百

官朝服呼万岁。// 上皇曰: “我与蓬莪相持久矣, 今日始得相见。何异汉高祖见项羽首, 天下定矣。”

张中行在《文言与白话》中曾说: “在文言占上风的时代, 对话一般是经过文人的笔就变成文言。”例如, 永乐二年(1404): “武臣边将不谙文理, 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 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计六奇《明季南略》、《朝鲜王朝实录》中也有类似例子。这些实录将说话人原本的地方口语转换为汉文或文言文, 均经历了翻译的过程。此外, “翻译”还应该囊括日本的“训读”与“小儿锦”(中国西北用阿拉伯文解释汉语的文字)、口头翻译(如遍布东南亚的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演绎, 以及基于西班牙文本的菲律宾的民间表演)。

然后, 孙来臣老师以一个国家为例说明具体的翻译活动。越南古籍大概分为三种, 越南人所写的汉语文言文、字喃语(即在汉字基础上创造的表达当地语言文字)、越南重印的汉文书籍。孙来臣老师更关注第二种, 这类文本主要翻译汉语的典籍。所有翻译的文本可以大致分为儒家文献、历史文本、宗教技术与文学文本四类。经典典籍包含儒学、杂学、类书、蒙学、家训、兵家几方面。在宗教文献中, 包含佛教、基督教、道教、降笔文, 其中佛教占比最多, 又分为对经、律、论、注疏的翻译。基督教文本则多译自欧洲语言。例如, 18 世纪晚期-19 世纪早期, 越南的知识分子还将中国宗教文本传至近代越南。正是这些翻译活动使中国的民间宗教文本传至国外, 并在越南社会生根开花。

在大陆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流行一种双语文献(nissaya), 即将巴利文、梵文翻译为缅文、孟文、泰文、老文、高棉语逐字或逐句对照翻译。这种翻译从 12 世纪开始, 并于 18-19 世纪达到高峰。如赫胥黎(Andrew Huxley)所述, 缅甸法典的传播有赖于这种翻译。19 世纪末, 纯巴利文法典已经残存不多, 大多要依赖于双语文献传播法典。

此外, 朝鲜王朝也对翻译高度重视, 经常组织翻译活动, 如世宗大王(King Sejong)于 1443 年组织编写的《训民正音》就对谚文(俗语)与文言之间的翻译作出了重要贡献。政府出面组织的翻译活动, 将中央政令、儒家经典等传达至乡野妇孺, “命以谚字, 反译印处, 颁中外, 使妇人、小子, 无不周知。”

类似的情形见于日本近世, 此时的翻译包括古代日语翻译为近世日语, 也包括汉语文言文翻译为近世日语, 以及欧洲语言翻译为日语。关于最后一类翻译, 日本本土学者研究较少。西语著作中, 黎贝卡·克莱门特(Rebekah Clements)的《近世日本翻译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Japan*)一书于 2015 年出版, 系涉及日本近世翻译史的首部著作。日本翻译的内容当然也包含军事类书籍, 如朝鲜 1601 年文献记载, “倭贼兵书, 孙、吴、六韬、三略, 以倭语翻译读之云。”

接下来, 孙来臣老师又举医书和兵书的翻译为例。如朝鲜、越南对中国重要医书的翻译, 日本对中国及欧洲医书的翻译, 东南亚对梵语、伊斯兰语及西语医书的翻

译。上面提到, 朝鲜对中国医书和农书的翻译活动甚至直接促进了 15-16 世纪人口的急速增长。通过翻译医书, 并由医生传播医学知识, 广大平民得以受益, 正所谓: “宜令老医, 抄其切于常用者, 译以谚文用铸字, 印布民间。”

孙来臣老师接着介绍了关于兵书的翻译。在 1550-1683 年间的“战争世纪”中, 在全亚洲范围内有大规模军事战争活动。但由于各国迫切需要将大多数汉语及西语兵书翻译成自己的语言。由此, 产生了朝鲜、越南对汉语兵书的翻译, 日本对中国及荷兰兵书的翻译, 晚明中国对西语兵书的翻译, 满族对汉文兵书的翻译等等。编撰外语教材与字典与翻译又密切关系, 而近世时期也是大量编撰字汇、字典的时代。琉球语-汉语字汇《使琉球录夷语夷字附》即为例证。

最后, 孙来臣老师再次强调了翻译的重要性。他指出, 如果没有翻译, 亚洲之间、东西方之间的经典文本以及哲学思想、科学技术等等都无法传播互通。他将本次讲座归结为三点: 其一, 从翻译史的角度对我们理解欧亚大陆东部的近世历史至关重要; 其二, 翻译在近世亚洲政府的运作、国家的整合、行政效率的提高与文化的交流中举足轻重; 其三, 在 1200-1850 年间, 由于亚洲内部的强劲动力与东西文化汇聚所带来的推动, 使得亚洲的近世翻译在广度、深度、规模、数量等方面远远超过“古典翻译”, 形成巨大浪潮, 同时也表现出诸多“近世性”。

评议阶段, 王宏志老师指出, 本次讲座的重点在于指出翻译在人类历史中的重

要性。翻译研究领域的学术性讨论较短，过去多数学者只注意到翻译的技巧性，而忽视了翻译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接着，王宏志老师联系“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背景指出，翻译作为文化活动，与历史背景相关。翻译并非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基于文化背景下的多重因素影响下进行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所有的翻译研究都应该是翻译史研究。此外，讲座还拓展了翻译的定义，将“不完美”的翻译也囊括在内，对翻译采取最广义的定义，又讲述了翻译在近世的动力源泉，关注到行政、商业、宗教等各方面的翻译，但王宏志老师认为，直到今天，这些动力源泉仍在推动翻译。未来的翻译研究可以不局限于国别翻译史，而关注全球视野下翻译的开展和传播。

陈力卫老师指出，1604-1868 处于日本的“近世”时期，与孙来臣老师在讲座中所采取的不完全重合，又有着某些程度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他对讲座内容补充了三点。其一，讲座中提到了丸山真男与加藤周一在《日本的近代与翻译》中的观点“翻译铸造了近代日本”。该书的原话是从 1854 年佩里舰队叩关到 1904 年日俄战争共计 50 年间的日本翻译打造了近当代的日本。其二，训读本身就是一种翻译汉文的形式。这种翻译产生出专门用来训读汉文的体例，与日文本身的和文体相对。可以说，日本的文言文体系就是从翻译汉文的过程中形成的。日本思想家荻生徂徕就是觉得训读汉文是翻译，无法深刻了解朱子学的精髓，所以才呼吁直接学习中国人平时使用的白话，导致江户时代中文白话

在日本普及流传。日语实际上通过汉文训读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也吸收了汉文式的表达，充实与完善了日语自身的表达。其三，在讲座中孙来臣老师所引用的日本翻译西方各国文献数据中，荷兰的反而较少。但陈力卫老师认为荷兰文献在日本近世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最多才对。例如，传教士麦都思在巴达维亚传教时，通过荷兰商馆人员拿到日本编的荷兰语与日语的对译词典，将其荷兰语翻译成英语，便编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本《英和和英语汇》，将日本介绍给英语世界。

最后，李伯重老师作总结发言时表示，本次讲座从全球史框架看亚欧亚大陆东部地区的交流，涉及广泛。孙来臣老师与陈力卫老师都提到翻译铸造了现代日本，他认为翻译也同样铸造了现代中国。晚清以来，特别是戊戌变法以后的翻译活动对今天的汉语起到重要影响。今天的大量社会政治词汇源自日语，现在中国的整个政治体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而这也翻自日语文献，因此很多表达采用日式汉语。其次，现在全球史研究的初衷是破除欧洲中心主义，但在中国也有汉文化中心主义倾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国家的盟主国家，与邻国关系密切。受脱亚入欧的影响，全球史主要讨论亚洲与欧美国家的交流，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与近邻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历史都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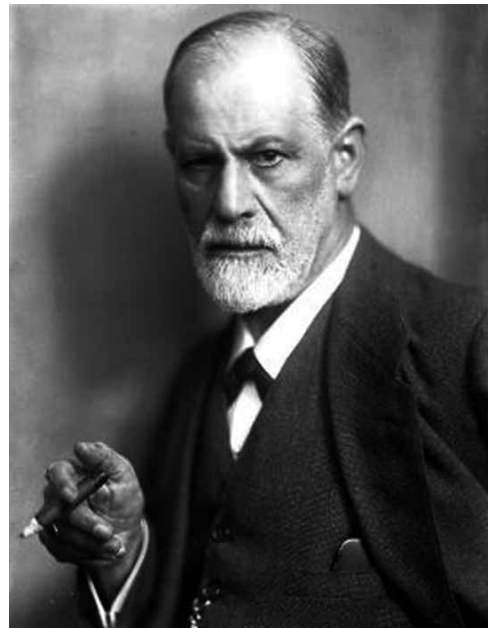
（撰稿：吴宛妮）

239

孙飞宇 | 躺椅背后的摩西——弗洛伊德思想与犹太传统

2021 年 12 月 15 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 239 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躺椅背后的摩西——弗洛伊德思想与犹太传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主持。

本次讲座将围绕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为“弗洛伊德作为和认同为一个犹太人”。1856 年 5 月 13 日，在西吉斯蒙德（Sigmund Schlomo）诞生一周后，弗洛伊德的家族族谱记载，他施行了割礼，“进入了犹太人与上帝的契约”。弗洛伊德在对希伯来文《圣经·旧约》的阅读中长大，毕生都在强调他的犹太身份。在这种反犹氛围和对于父亲不满的心态中长大的弗洛伊德，认同于汉尼拔（Hannibal）——一位越过所有障碍，征服罗马的闪族统帅。1900 年 5 月，处在人生困顿时期的弗洛伊德将自我描述为“一个年老邈邈的以色列子民”。在 1925 年出版的《自传研究》中，弗洛伊德明确写道：“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我也依然是一个犹太人。”1938 年，弗洛伊德最终作为一个受迫害的犹太人流亡到英国。孙飞宇老师对此指出，上述身份认同并不意味着弗洛伊德认同于犹太传统的全部；弗洛伊德也曾表明，其父亲“允许我在完全忽视所有和犹太教有关的事物中长大”。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讲座第二部分为“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中的摩西”。弗洛伊德被视为“精神分析之父”。自 1902 年秋开始形成的“星期三心理学会”，弗洛伊德和斯特克尔（Wilhelm Stekel）、卡哈内（Max Kahane）、赖特勒（Rudolf Reitler）、阿德勒（Alfred Adler）等人定期召开讨论会。如格拉夫（Max Graf）所言，“仪式般的程序……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新宗教成立的气氛，弗洛伊德是这个宗教的先知”。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犹太性值得注意。弗洛伊德自视为一位科学家，甚至在某段时间认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Wissenschaft）。不过，即使在他本人定义的自然科学研究前提下，弗洛伊德的研究也依然有着浓厚的犹太特性，如他在1897年6月致弗里斯（Fliess）的信中提及“正在搜集深刻的犹太故事”。《梦的解析》里各种深刻的线索中，浸染着犹太文明的传统。而最为重要的线索，是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和《文明及其不足》等著作中关于罗马的思考和线索。弗洛伊德阐述，“我发现我对罗马的热烈向往乃是一种神经症，它可联结到从孩童起就对闪族英雄汉尼拔的热情”。

接下来，孙飞宇老师指出，精神分析被视为一种“犹太人特有的学问”与弗洛伊德的反抗。维也纳学界对于精神分析与弗洛伊德的攻击非常强烈，认为精神分析是“犹太人特有的学问”。面对这一攻击，弗洛伊德则强调精神分析工作的科学性和普遍性，而非犹太性。这一立场与弗洛伊德著作的英文翻译情况类似——通过强调科学性而获得精神分析的普遍性，进而拓展出犹太人的圈子。弗洛伊德本人的反抗性格，使得他往往在面对压力时选择对抗的立场。弗洛伊德的反抗还体现在，为了推广精神分析而特别青睐非犹太人的合作者，如对荣格（Carl Gustav Jung）、琼斯（Ernest Jones）等人的赞赏与合作，期望借助非犹太人的分析工作，进而将精神分析扩展到犹太文化之外的领域中去。

但随后，弗洛伊德与荣格决裂。弗洛伊德认为，雅利安与犹太科学不应相异，

他们的结果应该是相同的。精神分析是一种科学，而非宗教，应该独立于“雅利安的庇护”。无论这一派系秉承何种名义，精神分析都必须独立于派系的考量之上。然而，此种独立性，要服从于弗洛伊德本人。弗洛伊德与他的老师和弟子们不断的决裂，都是为了保证精神分析要完全服从于他自己——只有他可以定义精神分析。由此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将“反抗作为自我认同的方法”。他一直在犹太人形势危急的时刻，强调自己的犹太属性，同时强调自己是一个非犹太教的犹太人，表明自己的无神论立场，展现出强烈的世俗化倾向。

讲座第三部分为“精神分析作为弗洛伊德的理解文明与人的方法”。弗洛伊德向来从文明的角度来理解精神分析，他认为，精神分析并非是自己的发明创造，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中，早就存在着精神分析。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的实质是理解人。

“精神分析的唯一主题是人类的灵魂进程（*seelischen Vorgänge des Menschen*），只有在人类中才能研究此种学问。出于某些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患有官能症的人类比起正常的人类能够提供更多赋予指导意义的材料，这些材料也更易于为我们所接受到。”在其著作《文明及其不足》中，关于罗马的阐释是理解这一主题的佳例。

弗洛伊德以罗马（the Eternal city）为例来说明何为精神分析，是他对于征服（理解）罗马之迷恋的绝佳体现。弗洛伊德借用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最古老的罗马城是位于帕拉丁（Palatine）山上有围墙的居住点，名为“罗马方城（Roma Quadrata）”。后来，罗马城经历了不同

历史时期的巨变。他假设了一位有着最完备的历史知识与地形学知识的访客，在造访今天的罗马时会发现，今日的奥勒良的城墙几乎原封未动，其他的建筑至今已无处可寻。更为重要的是，古罗马还有大量东西掩埋在这座城市的泥土之中，或者是那些现代化建筑的基底之下，这正是过去被保存的方式。

弗洛伊德认为，在精神分析的视角下，如果假定罗马并非一处人类聚居地，而是一种有着类似悠久而丰富历史的心理实体，那么在这个实体中，曾经出现过的所有东西都不会消失：所有早期发展的过程都会与新近的阶段持续共存。这意味着访客只需改变视角或位置，就能够看到不同的景象。这一弗洛伊德自认并不是非常妥当的比喻，却恰恰表明了弗洛伊德对于理解/征服罗马的急切之心，正如他将其等同于理解人的灵魂那样。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文明史与个体的生命史有着完全可以比照并观的类似结构。

第四部分为“弗洛伊德的摩西认同及其意义”。在1935年，弗洛伊德致莎尔美（Lou Andreas-Salomé）说：“摩西这个人物萦绕在我的心头已经一辈子了。”引起弗洛伊德思考的是，是什么创造了犹太人的特殊性格？也即，犹太人是怎么成为犹太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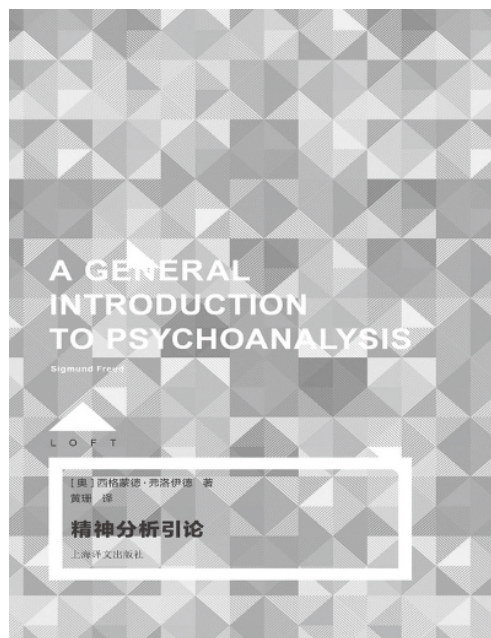
面对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摩西》雕像，弗洛伊德并未对这一作品进行他一贯的分析，而只是在力图理解这尊雕像。针对雕像《摩西》外形及面部表情的解读，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米开朗基罗意将塑造摩西一生中某一特定的时刻，或者说最有意义的时刻，即金牛犊事件中即将爆发的摩西。

而弗洛伊德并不认同这一解读。弗洛伊德认为，米开朗基罗是想在摩西身上创造出“对性格和气质永恒的研究主题”。正如他自己而言，“我们复制的摩西画像中，摩西既不会跳起来，也不会把圣书扔掉。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不是激烈行动的开始，而是已发生的行动的延续……因为恰恰是因为考虑到《十诫》，他才控制住自己的愤怒；为了维护《十诫》，他才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弗洛伊德对于《摩西》雕像的膜拜与解读，同样表现了他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认识：为了他所献身的事业（文明），他成功与自己内心情感进行了斗争。文明必须建基于对驱力的



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摩西》雕像，现位于罗马圣伯多禄锁链堂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精神分析引论》书影

控制与否定之上。弗洛伊德从摩西的名字等线索出发，对于摩西的身份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推论：作为犹太人的先知，摩西是一个埃及贵族。摩西为犹太人打下了信仰的烙印，缔造了犹太民族，也在同时为其带来了苦难和来自世界的仇视。在弗洛伊德的研究中，摩西本是犹太人的敌人，在复杂的历史变动中，为了维护和延续在埃及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一神教，率领部分希伯来人逃离古埃及，在旷野间经历了 40 多年的艰难跋涉后，终于到达了应许之地。在这一艰难的漂泊过程中，尤其是在经历了通过反叛而杀死摩西，以及此后漫长的潜伏期之后，犹太人终于实现了自我认识，完成了对于戒律的认同，最终达到了应许之地。但是在此前就已经被“弑父”的摩西无法进入应许之地。弗洛伊德以摩西的

命运自诩，认为自己有着同样的命运。正如当时的犹太人被视为欧洲的敌人，然而由于弗洛伊德的发现，开启了率领现代人自我认识的历程。

摩西不仅是政治领袖，还是立法者、启蒙者、教育者，是一种新宗教的创立者。摩西的犹太教与埃及宗教之间存在着极为强烈的反差：一神教与多神教；抽象性与原始性；放弃不朽概念与延续生命的努力（木乃伊）。而这也正如弗洛伊德的工作与启蒙之后的时代大潮之间存在着极为强烈的反差如出一辙。摩西给予犹太人的并非一种新宗教，而是来自于埃及文明和历史的深处的宗教，正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自于欧洲文明和历史的深处。

弗洛伊德认为，个体与宗教的历史发展之类似，即人的成长过程与摩西及其一神教的历史命运类似。这正是人之为人的特性：“神经症是人类的一种特权”。于弗洛伊德而言，既然每一个人都无法自足，人人都患有神经症，那么精神分析自然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的“宗教”，而他也就是那位必将被杀死的“摩西”。弗洛伊德指出，若要认识自我，首先得承认自己的渺小与非理性存在。正如摩西为犹太人找到皈依（超验上帝）之时所获得的认识那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总结了人类自尊心在历史进程中遭受的三次打击，第一次为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打破了“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论点；第二次为达尔文和华莱士等人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剥夺了人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第三次为精神分析的出现和发展，证明了人并非是自己的主宰。

孙飞宇老师最后总结道，对精神分析的期许是弗洛伊德将自己视为摩西的最好例证。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应该扩展出犹太人的圈子之外，成为所有现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弗洛伊德的野心是，将精神分析视为与科学、宗教和艺术具有同等地位的东西。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作为犹太人）用来征服世界的武器，同样也是现代人获得自我理解，求得自我认同，找到自我疗愈，达到应许之地的“戒律”。

正如当初摩西塑造犹太人那样，弗洛伊德期待运用精神分析来塑造现代人。

在提问环节中，孙飞宇老师与到场观众就本场讲座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一回答了听众关于弗洛伊德思想的若干疑惑。

（撰稿：刘建）

240

王素 | 故宫文献学的价值与意义

2021 年 12 月 24 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 240 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故宫文献学的价值与意义”。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王素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凤瀚主持，本场讲座为“故宫与故宫学”系列讲座的第八讲。

王素老师将“故宫学”概念的提出作为本场讲座的引入。2003 年 10 月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先生在庆祝南京博物院成立 70 周年举办的馆长论坛上首次提出“故宫学”的概念。郑院长指出，故宫学是一门涵盖历史、政治、建筑、器物、文献、

艺术等多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王素老师应郑院长之邀，撰写出版《故宫学学科建设初探》，在“故宫学”下分设十二个子学科，“文献学”是其中之一。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文献”一词最初为何意？王素老师指出，“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为政》，郑玄为《论语》作注，将“文献”一词作如下解释，“文”指“文章”，“献”指“贤才”。“文章”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几千年来靠“贤才”传承发展。西汉经学，即得“贤才”而传，田生言《易经》，伏生传《尚书》，齐鲁韩毛授《诗经》，高堂生讲《士礼》，胡毋生、董仲舒宗《春秋》。孔子最重诗、礼、

郑玄注遍诗、礼，最得孔子心法。清代学术，汉、宋分野，尤重师承，江藩所著《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即以“贤才”为中心，记叙一代学术流变。

讲座的第一部分围绕“故宫文献学”之渊源展开。自古而今，宫廷皆是收藏文献的渊藪。从历史看，文献与宫廷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谈文献离不开宫廷，谈宫廷也离不开文献。先秦两汉的典籍有老子为周之史官，管理周之藏书室的记载；秦丞相、御史具体代理天下事务，萧何收其府中所藏律令图书，助刘邦成就霸业，自此之后，每逢改朝换代，后王朝攻下前王朝的国都，都遵循故事，首先封藏前王朝的宫廷图书。两汉宫廷，“书积如丘山”，设有石渠、天禄、麒麟三个藏书阁，以及兰台、东观、石室、金匱等众多藏书室。隋唐两代，均重视书籍之收藏，专设书院、书屋，并编撰目录。宋元明清从写本进入雕版活字印刷时代，皇家和官府自己刻印书籍，宫廷藏书之繁富，更胜往昔。清宫藏书号称“卓越前代”：文渊阁专藏《四库全书》，武英殿专藏殿本书，昭仁殿“天禄琳琅”专收善本特藏，养心殿《宛委别藏》专收《四库全书》未收之书，清宫摘藻堂和圆明园味腴书屋各藏一套《四库全书荟要》，还有其他零散藏书之所，而故宫博物院的藏书主要继承清宫廷藏书而来。宫廷藏书，更是官修正史的《艺文志》与《经籍志》编纂之依据。

随后，王素老师特别介绍了清宫所藏的《天禄琳琅》与《宛委别藏》。乾隆皇帝喜好善本，集中陈列昭仁殿，赐名“天禄琳琅”，为清宫善本精华。当时已编《天

禄琳琅书目》10卷。嘉庆初不幸毁于火，又重辑，再修《天禄琳琅书目续编》20卷。《续编》之书绝大部分都流出北京故宫，大宗在台北故宫，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台湾中研院，民间不少个人也均有收藏。《宛委别藏》则为养心殿所藏失传善本。嘉庆四年，阮元任浙江巡抚，留心访求《四库全书》未收的珍本秘籍，先后获得175种，依《四库全书总目》例，为每书撰写提要奏进。嘉庆皇帝得书非常高兴，藏之于养心殿，根据旧传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故事，亲笔赐名《宛委别藏》，现藏台北故宫，但其中已有遗失，仅存160种。

讲座的第二部分以“故宫文献学的内涵”为中心展开。故宫的藏书主要继承清宫藏书而来，故内涵极为丰富，但这些图书文献同时也命途多舛，如同甲骨文献、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一样，因清末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劫掠，清逊帝溥仪“小朝廷”的盗运，大量的文献和档案流散到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

王素老师首先回顾了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管理藏书、文献之历程。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即设古物、图书两馆，图书馆下设有图书、文献二部。图书部之执掌在于集中古籍，按照顺序整理、编目，审定版本，校阅无误。文献部的主要责任在于整理卷帙浩繁的明清档案，分别登记编目。图书馆的主要工作由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陈垣领导，图书部由时在北京大学教授目录学和图书馆学、兼图书部主任的袁同礼负责，而文献部则由北京大学国学门导师沈兼士负责。1927年，故宫

图书馆文献部改称掌故部。1928年国民政府派易培基接收故宫并任首任院长，设立古物、图书、文献三馆。1933年，马衡接任第二任院长，并确定文献馆职掌主要是对实录、档案及其他历史文献进行编目、陈列、摄影等，并进行了人事调整，以专门小组负责。1949年后，有关方面给故宫定性为

“艺术博物馆”，对图书文献的收藏进行了一些调整。

其次，王素老师介绍了故宫文献之收藏。故宫所藏文献大抵可分为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明清档案三大类。传世文献指在世间流传的文献，即所谓地上文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入故宫古籍善本2600种、10万余册，大多都是传世文献，宫廷和官方刻印的精品。故宫所藏传世文献可分为汉文刻本文献、汉文抄本文献与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三类。

汉文刻本文献指通过刻印流传的汉文文献，可分为四部书与大藏经二小类。四部书指中国传统目录学中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清宫四库收藏量大，校刻精美。四库书大部分入藏台北故宫、部分划拨国家图书馆，现仅有37万册；大藏经种类多，保存完好，故宫所藏大藏经最著名的为《永乐北藏》和《嘉兴藏》，前者原有正续6771卷，后者原有正续12600卷，传世均



王素研究员

无全本。故宫《永乐北藏》存6732卷，《嘉兴藏》存10888卷，保存最为完好。

汉文抄本文献指通过抄写保存的汉文文献，可分古籍与尺牍二小类。古籍包括四部书和大藏经，最早的当属唐贞观廿二年（648）十二月十日国谕写《善见律》和唐王仁煦撰、长孙讷言注、裴务齐正字的《刊谬补缺切韵》；明清汉文抄本古籍最多，版本精善；尺牍则多为建国后的收藏，含明代尺牍1万馀件，清代尺牍3万馀件，不少为名人、名臣的作品。

此外，故宫藏有满、蒙、藏等少数民族文字图书2000种近3万册，刻本、抄本，四部书、大藏经皆有。清廷编纂的《实录》《圣训》均有满、汉或满、蒙、汉等文字抄本。这些少数民族文字的图书文献是研究各民族语言学、翻译学的珍贵资料。此外，故宫还藏有清代四译馆于乾隆十五年（1750）编定的《西番译语》九种，分别记载当时藏语安多方言牧区语、农区语，藏语康方言、

白马语、嘉绒语，以及尔苏语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等。

出土文献指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献，即所谓地下文献。目前已出版的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累计收入故宫珍贵古籍将近 200 部，其中即含有出土文献。故宫所藏出土文献可分为五类，分别为甲骨、金文、简牍、石刻碑志、敦煌吐鲁番文献。

甲骨文献指在龟甲、兽骨上刻写的文字材料，均为 18 世纪末以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故宫收藏的甲骨有 22463 片，居世界第三。主要为加拿大人明义士及马衡、谢伯炆、李绍白、夏锡忠、薛贵笙、倪玉书、陈鉴塘等旧藏，少部分曾为《甲骨文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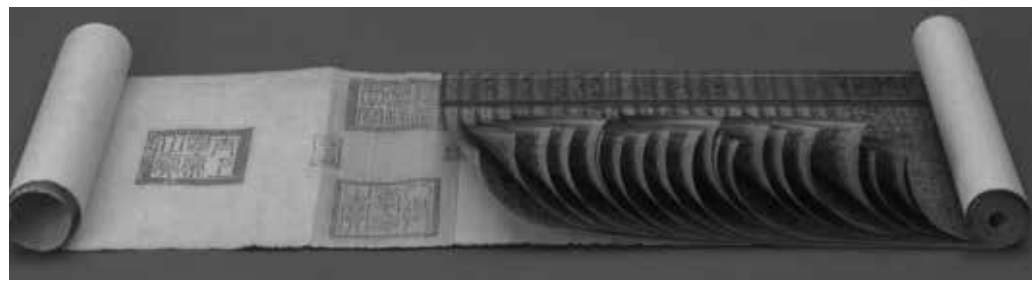
唐写本《善见律》

《甲骨文合集补编》等书收录。2014 年故宫古文献研究所牵头申报的“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与研究”项目成功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整理出版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金文文献主要指在青铜器上铭铸的文字。故宫的金文收藏也颇为丰富，现藏青铜器 12000 余件（不含铜镜、钱币），部分涵盖了元明清宫廷旧藏，部分为后来收购、私人捐献和考古新获，其中商周有铭青铜器就多达 1600 余件，收藏量居世界第一，大部分尚未系统整理。2021 年故宫古文献研究所牵头申报的“故宫博物院藏商周有铭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项目成功入选中宣部、教育部等八部门领导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整理工作正在启动。

故宫文物收藏实际并无简牍，只有秦汉封泥几百件。最近在马衡捐献物品中发现了他用蝇头小楷书写的居延汉简释文两册，而此一释文是何时著成的呢？这与近年来颇受关注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关系甚大。1931 年初，西北科学考察团返回北平，瑞典学者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汉代烽燧遗址发掘出土的汉代简牍一万余枚也同期运回，最早对这批汉简进行释文整理的就是马衡和刘复（半农）。马衡所著释文的精准度超过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不仅是关于居延汉简整理与研究的重要学术史资料，同时也弥补了故宫文物收藏没有简牍的遗憾。

石刻碑志主要指在石头和砖陶上铭刻的文字，故宫所藏石刻碑志文献大部分为建国后所藏，包括石鼓（10 个）、石经、



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旋风装）

石碑、墓志、塔铭、造像等，有近 1000 件。此外有“碑帖”将近 2 万 6 千件，还有战国燕齐郑滕等国及秦汉有铭陶片 3077 件。2021 年故宫古文献研究所牵头申报的“故宫博物院藏陶文汇编”项目成功入选中宣部、教育部等八部门领导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整理工作正在启动。

敦煌吐鲁番文献指 20 世纪初以来敦煌莫高窟和吐鲁番古代墓葬及遗址出土的文献。故宫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基本是建国后收藏，大致可分古籍、文书、写经、墓砖四小类。古籍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1 件名为《无上祕要》的道教类书；文书则主要包括书信、酒帐、财产分配帐、斋愿文、社司转帖等。故宫藏有写经有将近 100 件，稀见的北凉、北魏、北周、隋朝的写经多已归入法书、碑帖类，并曾公开发表；大部分为唐宋写经。墓砖为“高昌墓砖”，均为黄文弼 1928 至 1930 年到吐鲁番考古发掘所获，尤为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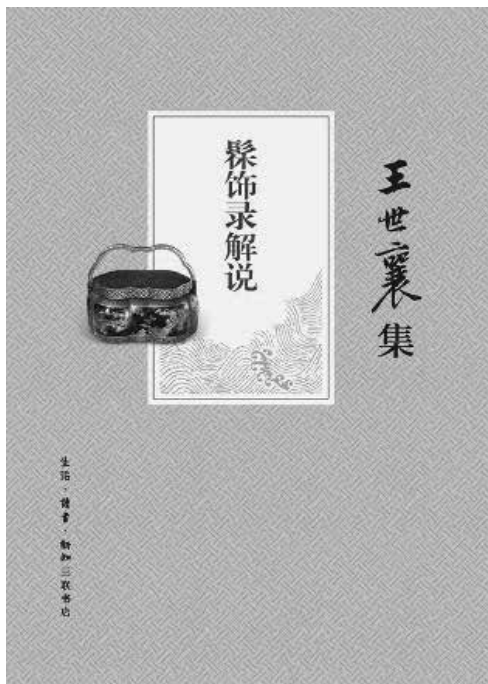
明清档案原为故宫收藏之大宗，不过经“八千麻袋”事件与档案划拨后，故宫所藏不多，主要有内务府陈设档，“样式雷”建筑图档，还有养心殿造办处的史料若干，

以及舆图、清宫旧照片、清中晚期帝后服饰和器物小样等。其中，内务府陈设档是复原各殿物品陈放原状的重要资料。

讲座的第三部分，主题为“故宫文献学的价值”。故宫文献之收藏，第二部分已做介绍，已能初步展现故宫文献学的价值所在。在此部分中，王素老师则以专题和人物为中心展开，举例说明故宫文献学之具体价值。

故宫传世文献虽多有逸散，或划藏他处，但仍有其独特价值。北京故宫所藏明清刻印的古籍，多为明内府司礼监经厂和清内务府武英殿修书处刻印的书，质量精良，价值非凡，一般明清古籍，也多为善本。如清乾隆刻《大足县志》与清光绪刻《平山县新编乡土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前者现仅存一部，后者为海内孤本。

从出土文献来说，价值更“不同凡响”。故宫收藏甲骨数量甚多，多为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旧藏，且极少公布，被学界称为甲骨文献最后的宝藏。故宫收藏的敦煌吐鲁番写经，不少有纪年，且绝大部分尚未整理出版。黄文弼在高昌获得墓砖，还有



王世襄《髹饰录解说》书影

约三分之一的图版从未整理发表，含有丰富的研究信息。

文献之传承有赖于“贤才”。王素老师专门介绍了从事故宫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前辈们，除了前面提到的陈垣、沈兼士、袁同礼、马衡等先生外，还有唐兰、罗福颐、顾铁符、王世襄、朱家潜、单士元、王璞子、于倬云等多人，以及他们培养的正在成长的学术梯队，他们对于故宫文献学的传承与文献学学科的建设，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在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古文字学大家唐兰先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代表故宫，参加了长沙马王堆帛书整理工作。金石文献整理研究大家罗福颐先生，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顾铁符先生都曾代表故宫参加临沂银雀山汉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的

整理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传世文献之整理也同样“贤才”辈出。王世襄先生涉猎广泛，但其最擅长的还是文献整理工作。他的《髹饰录解说》对明代漆工黄成的著作进行详解，对古代漆器的研究、美术史的研究和文物考古研究都有很大裨益。他晚年搜集流散多年的“清代匠作则例”，编辑整理的多卷本《清代匠作则例汇编》，是研究清代建筑、手工业、工艺美术规则的重要文献资料。朱家潜先生也对包括目录学、版本学在内的图书馆学极有研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入故宫古籍善本 2600 种、10 万余册，都是由他主持鉴定和编选的。他还撰著、主编了诸如《故宫藏善本书目》《两朝御阅丛书》等一系列图书。

故宫为古建筑博物馆，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之宝库，对于古建筑文献之搜集整理是故宫文献学的一大独特贡献。单士元先生以档案学和古建筑文献整理为业，曾受聘于中国营造学社，在明清古建筑学领域耕耘，成果甚多。王璞子先生也为古建筑文献整理研究大家，他对清工部《工程做法》研究尤深，在故宫工作期间，他的研究以元大都古建筑为中心，上溯辽金，下及明清，颇有建树。于倬云先生科班出身，长于主持宫殿建筑的维修与保护，研究范围包括故宫古建筑、明清皇家建筑以及中国宫殿建筑发展、中外宫殿建筑比较、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等，成果显著。

最后，王素老师指出，故宫有着丰富的文献资源和众多的文献整理研究的“贤才”。重新设立如古文献研究所这样的专

门的文献机构，着力培养“贤才”的“传承人”，整理出版故宫的文献资料，尤其是从未刊布的文献资料，使之能够为学术界利用，并进一步挖掘故宫文献学的价值与意义，是一件势在必行的重要举措。

评议环节，朱凤瀚老师从故宫文献的历史渊源、文献收藏和文献价值三方面总结了王素老师的讲座。朱凤瀚老师指出，故宫所藏文献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王素老师如数家珍地讲述，离不开他在故宫亲

自爬梳整理文献的经历。整场报告历经将近两个小时，王素老师向线下线上的近两百位听众介绍了故宫文献学的内容、价值与意义，并与朱凤瀚老师与在场同学围绕文献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交流。

（撰稿：史瑀昕）

241

陈中梅 | 关于西方认知史上一个被忽略的概念中介——解析荷马史诗《奥德赛》里 sēma 和 sēma eipe 的坐标功能

2021 年 12 月 29 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 241 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关于西方认知史上一个被忽略的概念中介——解析荷马史诗《奥德赛》里 sēma 和 sēma eipe 的坐标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中梅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史阳主持，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陈岗龙、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陈斯一评议。本场讲座为“史诗遗产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之一。

讲座伊始，陈中梅老师围绕认知与认知史研究的必要性，结合自身学习、翻译、注释和研究荷马史诗的经验，详细讲解了本次讲座涉及的相关研究背景和概念知识。他的铺垫性解说以宏观视角切入带动微观论证，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析 sēma 在西方认知史上的标示功能，促使我们理解词语身份的从具体指对到概念化表征的品质升华。

陈中梅老师首先介绍了希腊认知史上出现的一次主流思想及其学识立足点从神



陈中梅研究员

话到哲学的转变。自1940年德国学者威廉·奈斯特勒发表《从神话到逻格斯：从荷马到智者和苏格拉底希腊思想的自我发展》一书之后，书题中的“from ... to ...”渐成一种规范化的标准模式，其实际应用也产生出各种变异和延伸表述，影响深远。之后，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于1949年发表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出著名的“轴心期理论”，从中亦可领略到“从神话到逻格斯”的模式效应。雅斯贝斯认为，轴心期（指公元前8至前2世纪）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这一时期“希腊贤哲如云”，思想勃发景象与世界其他地区并行不悖。但是，陈中梅老师将目光投向了轴心时代希腊具有的独特性，并对其研究转向史作了进一步解释。法国古希腊思想史家让-皮埃尔·韦尔南，在赞同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的同时也强调了希腊的独特性。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希腊文明展示出不同于其他文明的鲜明特点：希腊人开启了“对真理的

哲学探索”。陈中梅老师认为，神话与哲学之间既有本质的区别，又有达成通连、顺接和递进的一面。他提及古希腊哲学家塞诺芬尼和赫拉克利特对神话以及荷马的批判；援引戴维·林德伯格和威廉·巴雷特等学者的相关论断说明哲学兴起后神话在希腊主流思想界渐

趋式微的态势。同时，陈中梅老师也对巴雷特教授的提法进行了反思，认为西方文化基本结构中二元格局的雏形早在公元前6至前4世纪的古希腊就已经基本形成。希腊神话日后的衰落并没有导致神话本身的消失，神话在基督教及其教义中改头换面，东山再起，实现了自己的华丽转身。

接下来，陈中梅老师详释了荷马史诗与自然哲学之间存在的显示认知水准递进的过渡阶段，并指出荷马史诗的主体虽系神话，却新旧观念杂陈，内含为历史和哲学提供注重共性、客观性以及探察与实证取向的文本潜质。首先，荷马史诗讲故事，是文学，但也重视人和事物的共性以及由“命运”所体现的客观规律，还在一定程度上着力描写人物以实证方式探索和认知世界，因此必然蕴含催生哲学和科学的文本潜质。他举出多位西方学者的论述以说明荷马认知世界的方式所具有的潜在哲学意蕴，认为确实应该将其纳入哲学史的范畴来考察。他还认为，西方学者谈论

荷马史诗的哲学潜质时，往往忽略该史诗所内含的重视探察和求证的维度。需要指出的还有，荷马史诗对人性 and 人类生活的客观审视也先于哲学，比如通过对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和“仇敌”阿基琉斯于酒足饭饱后互相赞慕对方俊美长相的生动描述，诗人成功展示了一种“超然的客观性”以及客观性背后支撑它的思想底蕴和观念基础。其次，陈中梅老师在介绍“荷马观念场”的同时强调了荷马史诗作为古代百科全书所具有的思想启蒙价值。他认为，荷马史诗既积累知识，也对故事作了净化，却无力对海量的知识进行仔细和系统的分辨，致使诗中新旧思想杂陈。比如诗人既相信宙斯和诸神掌控自然，又谈及自然具备某种内在的受规律支配的巨大能量；既肯定巫卜和梦幻的认知有效性，又注重探察和实证对了解事态真相的不可或缺。然而，较之过去的清晰，荷马的模糊有时毋宁说是一种进步。另一方面，史诗诗人的模糊似乎又在期盼一种更高层级上的清晰，等待或者说呼唤苏格拉底的出现。美国古典学家维范特用了“转折点”（a turning point）一语来表示荷马所处的人文位置。荷马站立在新旧时代交替的门槛上，身处一个“革命时期”，并且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核心人物。

为说明这一转向的模糊性和过渡性，陈中梅老师比较了希罗多德的《历史》与荷马史诗在人物塑造、叙事目的等维度上的异同，并认为荷马史诗与《历史》差别显著，奥德修斯作为一位史诗时代的英雄，其认知观必须实现一个质的飞跃，才能达到希罗多德和泰勒斯的水准。探寻事

物真相的坦诚愿望，只有在总体上摆脱神话意识的干扰，经过理论思维的淬炼后，才可能上升为科学探索的自觉。荷马史诗对后世希腊文学的影响极大，并在赫西俄德、品达和雅典剧作家那里结出了丰硕的智性果实。赫西俄德的作品在神话与形而上学之间建立了一种真正的过渡形式（沃格林的观点），《神谱》代表了这样一种以思辨意图来探究奥林波斯神话的萌芽。此后，更有一些哲学家的“先辈们”的言论，具备了“宗教神秘性和哲理教义的双重特征”（韦尔南语）。陈中梅老师认同“在早期希腊思想中两种思想类型之间的界限尚未清楚明确，而是模糊的、摇摆不定的”，因此它是一种“准理性”思维的提法。沿着这种“准理性”的思路继续精进，早期哲学家们尝试借助科学的方法提供支持论点的依据，比如泰勒斯主张“水”的本原地位，阿那克西曼德设想这一地位应该属于“无限”等。相比自然哲学家们，苏格拉底则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西塞罗语），着力于寻找行为的知识基础，其探讨道德观念之知识背景的做法，极大地发展了传统的知识论，也为公元前6至前4世纪希腊思想“from mythos to logos”的转向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

哲学的兴起标志着希腊乃至西方文化二元基本结构的大致形成。陈中梅老师在谈及哲学兴起的原因时，将近当代西方学者众说纷纭的观点择要归纳如下：一，突发论。约翰·伯奈特认为，希腊哲学的产生与神话无关，是一个叹为观止的人文奇迹。哲学理性没有铺垫，也没有警示地与神话断然决裂，它使人们眼前为之一亮，

就像盲人突然看见了光明。二，渐进说。弗朗西斯·康福德指出，最初的哲学在思路和叙事结构方面更接近于神话，而非推崇观察与实验的科学理论。它用一套世俗化的术语和更抽象、条理性更强的方式，巧妙移植了神话和宗教已经确立起来的世界观。三，“城邦的产物”。韦尔南倾向于赞同康福德的研究。他认为，城邦政制的构建使得法治取代国王的专制，言论自由取代政治上的高压，公民个人能力得到伸张，成为社会与学术进步的助推器，促成了观点的多元和思想的繁荣。韦尔南区分了米利都哲学家的物理学和后来出现的南意大利埃利亚学派创始人巴门尼德的“纯粹的抽象”，并称前者的特点是“实证思维”，而后者的特点是体现纯粹智力观念的“抽象思维”，“它的性质只由自己确定，这就是理性思维的本原，logos（理性自身）就是其表现形式”。

韦尔南教授的此番论述极具启发性，其实是在以一种不为他本人所意识到的方式促使我们联想到 *sēma* 与 *logos* 的区别和分工或可产生某种广延效应，这种效应可以被应用至定位哲学内部智识过程的递进，为有条理解析希腊哲学的发展进程提供坐标。韦尔南先生无意中以自己的方式，间接然而却是精彩演绎了 *sēma* 在希腊哲学史上的标示功能。为帮助理解希腊哲学思潮发端的重要意义，陈中梅老师援引了英国哲学家格思里（W. K. C. Guthrie）的观点，后者认为希腊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把科学带出了实用的层面，使其摆脱就事论事的纠缠，接受理论的精炼。古典时期

的希腊人熟悉 *logon didonai*，这一短语的指义之一便是：“将零星的证据，即把可资证明的事实收集起来”。公元前5世纪，古老的神话因哲学的兴起而受到“虚构”、“谎言”和“非理性”的指责，逐渐变得名声不佳。理性（*rationality*）指要求提供合理的解释，即 *logon didonai*，在那个提倡用新的方法进行探索的时代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或一句“口令”。

结合理性时代提出的实证要求，在讲座的第二部分，陈中梅老师着重讲解了荷马史诗《奥德赛》里 *sēma* 和 *sēma eipe* 的坐标功能。首先，他对 *sēma*（塞玛）概念进行了解读，*sēma* 的主导含义为“标记”或“记号”。*sēma* 可指神致的“兆示”（《伊利亚特》2.308），亦可指认路的“标志”（10.466）和表明认知正确性的证明（《奥德赛》23.202）。*sēma* 还是荷马史诗里最接近于意指“文字”的词汇（细察《伊利亚特》6.168、176、178；比较7.189）。该词在两部史诗里都有大量见例，其所在的诗行不仅以大致相似的方式出现在同一部史诗里（《奥德赛》11.126，23.273），而且还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出现在两部史诗里（《伊利亚特》23.326，《奥德赛》11.126）。其次，结合史诗的文本和人物行为，陈中梅老师进一步解释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里人物所体现的不同认知水准。《伊利亚特》里的英雄们几乎都是探察的门外汉，比如阿伽门农唐突试探，弄巧成拙；阿基琉斯指派帕特罗克洛斯外出打听消息，但事后却都对“消息”本身不管不问；奈斯托耳做事虎头蛇尾，郑重其事地派遣奥德修斯和狄俄墨得



《荷马的吟唱》，勒卢瓦尔绘，19世纪

斯夜探敌营，但当后者回来后，这位睿智的老人却像所有在场的阿开亚首领们一样，对探察的结果毫不关心，仿佛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之前的一幕。对于他们，“探察”似乎是一个新鲜事物，可以尝试，但不必在意结果。而《奥德赛》恰是一部探察史诗，各种形式的辨认和探察几乎贯穿始终。较之《伊利亚特》，《奥德赛》里人物的质疑心理得到增强，求证意识大幅度提高，探察的手段亦有了明显的优化。文本类型的不同固然是一个原因，但相信《伊利亚特》的作者不会为了显示人物的英雄气概而故意调低他们的探察水准。

在《奥德赛》里，奥德修斯既探察家中的仆人，也探察自己的亲人，细致观察

前者的善恶程度，以及后者对待自己的亲情是否依旧深沉。与之并行展开的，是一条更为重要的展示探察与发现的线索，即忒勒马科斯、欧迈俄斯、欧鲁克蕾娅、裴奈罗佩和莱耳忒斯等人物，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达成了对以老乞丐面貌出现的奥德修斯真实身份的发现。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对“发现”的评析很有见地，但也可能存在稍显生硬，忽略诗人本意和脱离文本现实需求的弊端。通过对方主动出示证据达成的发现，也许会比人物于不经意中获取的发现“缺少艺术性”，但场境的因素也很重要，诗人不宜也不会为了一味追求“艺术性”而让置身紧要关头中的人物节外生枝，在发现上浪费时间。陈中

梅老师强调，在《奥德赛》里，探询与发现不仅是一种求知行为，而且还明显具备某种道德内涵。绝大多数求婚人直到临死前才知道奥德修斯已经回返，而作为求婚人首领之一的安提努斯，更是至死都没能弄明白这一点。比较苏格拉底的告诫“美德即知识”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哲人的道德哲学思想在不断切磋中变得更加精细和缜密。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aretē，复数 aretai）分两种，一种是智性美德，另一种是伦理美德，由此不仅肯定了知识的德性背景，而且将知识（或智德）与伦理（或道德）区隔开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知识和美德都是“德”，都是人或为人的（依据该词的本义来理解）“佳好”或“精湛”。

探察会导致发现，而发现的依凭是证据（sēma，复数 sēmata），这回应了上文所示背景知识中提到的 logon didonai。陈中梅老师举出实例，比如《奥德赛》23.104—230 里裴奈罗佩对丈夫奥德修斯的身份验证，24.307—348 里莱耳忒斯对儿子奥德修斯真实身份的确认，以及 23.226—230 所示裴奈罗佩对奥德修斯的放心相认和相认的理由：nun d', epei ēde sēmat' ariphrađa katelexas eunēs hēmeterēs（But now, since thou hast told the clear tokens of our bed）。从这些例证中可以看出，尽管史诗思想中新旧观念并存，但人物的宗教感却并没有妨碍注重观察和细致求证的时期品质的醒目展示。裴奈罗佩爱听故事，相信巫卜，容易被对方声情并茂的叙事所感化，但也知道如何妥善区分情感和理智，表现出很强的实证意识。在关

键的时候，她甚至显得比奥德修斯更为冷静，审时度势，顺水推舟，娴熟运用高超的探察技巧，欲擒故纵，引而不发地致使对方主动招供，和盘托出了那张自制睡床的机密（sēmata）。像裴奈罗佩一样，老英雄莱耳忒斯显然已初步掌握有助于进行演绎推理的认知技巧。在《奥德赛》24.329 里，面对已经自报家门的儿子奥德修斯，莱耳忒斯展示了强烈的索证意识，要求对方自我证明，当面出示证据，喊出了那个时代的强音：sēma ti moi nun eipe ariphrades（现在告诉我某个明确的标记）。24.329 出现在《奥德赛》最后一卷中间偏后的位置，仿佛是对作品高调倡导的人物求证意识和行为的概念总结。面对已经明确自表身份的奥德修斯，莱耳忒斯仍然坚持要他出示证据（而奥德修斯给出的证据不仅有腿上的伤疤，而且还有需要凭借推理得出的“隐证”），其行为代表了史诗人物疑证和索证努力的顶点。我们知道，莱耳忒斯乃伊萨卡前任国王，身份厚重，地位显赫，加之年龄上的长辈优势，由他来承担上述“概念总结”和“代表”的历史使命，应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沿着莱耳忒斯家族开辟的道路，希腊人在追求实证的道路上不断精进，步步为营。

陈中梅老师认为，后世自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学理上延续了他们的思路，把探察和实证的触角分别引入自然研究和人类社会探索的领域，从而缓慢促成了希腊学观的范式转变，牢固确立了逻辑斯在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但是，史诗语境中的 sēma 尽管受到青睐，却并非“完证”。莱耳忒斯不曾想过，提供证据的一方完全有

可能从别人口中听知所需的信息。此外，sēma 只是通过实物和话语提供证据或证明，而不是针对某个学术、理论或重大政策问题，借助逻辑严密的言辞做出周详的理性陈述，因此和 logos 相比，sēma 在理性的“纯”度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从 sēma 到 logos，从 sēma eipe 到 logon didonai，从面向

通常缺少追问和疑证意识的史诗人物提供证据，到直面具备更多怀疑态度和更强批判精神的公众提供理性的解释，希腊认知史的递进图谱由此直观和比较明晰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信证的程度级差体现不同时期国民素质和智识水准的高低，反映时代和生存环境的变化。较之“前哲学”时代的史诗人物，“后哲学”时代的公众会对“证据”和“证明”提出更高的要求。

陈中梅老师指出，塞玛并非只是一个指对具体事项的“标记”、“记号”或“证据”的普通词语，它还是一个有能力接受从具体指对到表征化词品升华的符号，一个有待于顺理成章地接受呼唤并可望得到学界认可、能够在希腊乃至西方认知史上展示定位功能的坐标。研究西方认知史和思想史的发展进程需要有这样一个符号或坐标。西方学者其实是有类似的“呼唤”意识的，他们所说的“经验地基”、“准理性的”观点和“有意义的前奏”等，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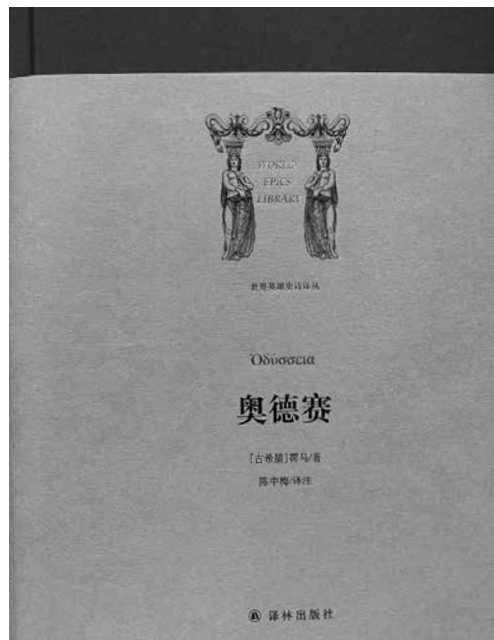


《奥德修斯被老妈妈认出》，布格罗绘，19 世纪

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可以寻找，事实上也未能找到一个贴切的词语将他们的思想更精准也更有条理地表达出来。学界人士似应达成某种共识，他们的学术工具箱里应该有一个定位那一时期希腊认知史发展阶段的坐标。爱德华·策勒尔在《古希腊哲学史纲》一书中说到，荷马史诗的调子“如此感人，继续在响着”：“就在英雄史诗及其神奇故事的表面之下，逻辑斯开始萌动，接着很快就变得大胆，并抬起头来。”策勒尔所说的“逻辑斯”不具备实指的意义，它的作用是象征性的，其符号功能实际上等同于塞玛，并因此可以由塞玛来代替。象征可以脱离具体的词义，但更合宜的做法似乎应该是，为了避免引起混乱，象征最好能以具体的词义作为依托。上文说过，荷马史诗里的 logos 作“话语”解，不含“理性”之义。如同海德格尔等人一样，策勒尔教授在自己的叙事体系中有时似乎过度开发了 logos 的

潜能，区别在于前者经常会在需用 *mythos* 的时候让 *logos* 勉为其难，而后者则是在本该使用 *sēma* 的语境中，屈从于西方学界通行的叙事惯性，稍显不甚恰切地强行征用了 *logos*。试想如果塞玛的符号功能在策勒尔生活的年代已经得到开显，情况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讲座最后，陈中梅老师总结了塞玛及其观念史意义。塞玛 (*sēma*) 是 *Mylo* (米罗) 中潜在“尚理”气质的初朴展示，是逻格斯精神在其自身表义范畴内尚未找到原词表述之前的初始载体，其坐标位置当在作为两个元概念的秘索思 (*Mythos*) 与逻格斯 (*Logos*) 之间。在荷马史诗里，从字面上体现并见证史诗人物观察和求证意识的词汇是 *sēma*，而非 *logos*。塞玛出自秘索思，却又对接逻格斯，一头粘连



荷马著《奥德赛》书影，陈中梅译注，译林出版社出版

英雄史诗的古老，另一头却衔接新兴的实证和科学理性，身份独特，地位重要，是连贯展示希腊思想和认知史发展进程的概念中介。希腊思想的主流表现样式从神话到理性 (*from myth to reason*) 的转变不是突发和一蹴而就的，过程中应该也必定会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并非如许多西方学者所认定的那样开始于荷马时代之后，而是以较为初朴的方式开启于荷马史诗之中。塞玛的发现为这一渐进转变提供了一个标志，从而不仅使上述演进看起来更显合理，也在国内外同行的研究和论述之外，为它总体上的立论可信度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力的学理支持。西方学者熟悉 *logon didonai*，了解它的定位功能，却似乎不曾设想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过另一个“口令”，不曾想到经过必要的提炼和符号化处理，同样出自古代典籍的 *sēma eipe* 也能发挥类似的定位作用，能够从前点上与 *logon didonai* 形成合理的对接。我们的研究为 *logon didonai* 找到了它的侧重于探察与实证的既符合学理旨归，也吻合经验判断和文本事实的史诗开显。作为两个具备重要坐标功能的短语，*sēma eipe* 和 *logon didonai* 一前一后，遥相呼应，标志着希腊人认知意识的逐步增强，展示了希腊认知史由前者向后者缓慢递进的发展轨迹。

接下来，讲座进入评议阶段。陈斯一老师在肯定陈中梅老师认识史切入视角的同时，对荷马史诗作为文学文本的科学潜力提出了几点疑惑，首先，他认为荷马史诗作为文学创作的经典文本，存在着与哲学研究、史学研究截然不同的参考潜力，

史诗作为文学样本，其内容的实证性是否能够印证当时古希腊哲学思想的过渡有待考量；其次，同时期哲学思想的比较中，当然可以将荷马史诗作为研究对象，来进一步印证当时的思维转变，但其可比性仍需努力寻找更多的前提加以说明，进而建筑相同话语范畴内的对话平台；最后，他认为荷马史诗的内容和诗人道德思想还是在诗文中存在着一致性的。正因这样一致性的存在，该史诗才能在较大的范围内和较久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经典化、勾起人们的认同感。陈中梅老师对陈斯一的评议作出回应，认为在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更加注意比较的平台和方法，因此韦尔南的观点至今也是存疑的，但当我们面对荷马史诗的丰富思想内涵时仍旧不能放弃其作为古希腊思想发展的一面“镜子”，忽略其中切实可感的研究价值潜力，将其排除在哲学思想发展史之外避而不谈。

陈岗龙老师认为，陈中梅不仅详细地梳理了荷马史诗思想认知史、研究史，还作为荷马史诗、《诗学》经典的权威译注者、研究者推动了“史诗遗产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中不同背景史诗研究跨学科、跨地域对话的无限可能。其中的启发性在于三个方面，第一，陈中梅把希腊政治思想史等维度的大背景、大框架清晰地梳理了出来，把荷马史诗放在希腊哲学和认知史的语境下面去讨论，意义重大；第二，从史诗研究的角度，陈中梅的讲座涉及神话时代到人的时代的思想过度，链接哲学思想和认识史思想，关注了诸多史诗文本细微之处的宏大观念性问题，见微知著；第三，陈中梅的视角从文学故事的情节内

核上升至哲学思想的提炼过程，不仅启发我们在进行史诗文本研究的同时更多地思考认同背后的思维转变轨迹，还使我们在对比中反思民间文学、民俗学、史诗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以实现真正的学科沟通和对话、了解史诗文本所具有的经典文本价值、创新思辨价值和认知史价值。

史阳老师认为，陈中梅清晰地展现了史诗文本具有的“文学传统+哲学思辨”的模式，启发了我们进一步思考不同地域中文化思想发源的文学经验基础，更启发我们关注了史诗文本很强的内在逻辑和不同体裁文学所特有的创编机制，就这一点来说，陈中梅的成果不论是从文学研究还是哲学思想史研究上都具有突出的参考价值。

(撰稿：乌哈娜)



(二) 未名学者讲座

76

王斯秧 | 1830 年的世道与人心——《红与黑》与“贝尔德案件”



王斯秧老师

2021 年 11 月 2 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 76 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1830 年的世道与人心——《红与黑》与‘贝尔德案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王斯秧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映虹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田庆生评议。

首先，王斯秧老师从讲座标题入手，解释司汤达为何以“贝尔德案件”为蓝本创作《红与黑》，因为他“在其中找到了关于人性新发现的宝藏，当激情将人推至无路可走时，人能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司汤达认为理想的作家是“诗人哲学家”，既深刻地认识人性，又能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触动人心。《红与黑》的手稿页边注释中多次写到的“木桩”一词，又叫“真

正的原因”，思考人物性格如何导向行为，证明作家把小说当作认识人性的工具。

在司汤达之前，文学艺术作品有一种古典主义的人物观，认为人性普遍而永恒。司汤达却强调思想与情感的历史性与相对性。《红与黑》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不是超时空的人物类型，而是由大革命之后法国新的风俗所塑造的典型的历史人物，归属于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阶层、政治立场和经济地位。“德·莱纳先生和瓦勒诺是 1825 年左右法国一半有钱人的画像”，德·莱纳夫人是外省烦闷、拘谨的新风俗所塑造的单纯自然的迷人女性，德·拉莫尔侯爵是旧体制的大贵族，等等。小说副标题定为“1830 年纪事”，因为作者借助司各特开创的历史小说类型来记录当下，以司各特描写中世纪的手法来描写当代，把历史小说转变成了现实小说。

王斯秧老师指出，呈现混乱且难以捕捉的当下，这与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提出的“浪漫主义”的定义是一脉相承的：“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表现他们时代的真实，因此感动同时代的人”。这样的写作观念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创新：于连正是新时代所造就的、身份与性格都处在变动之中的人的真实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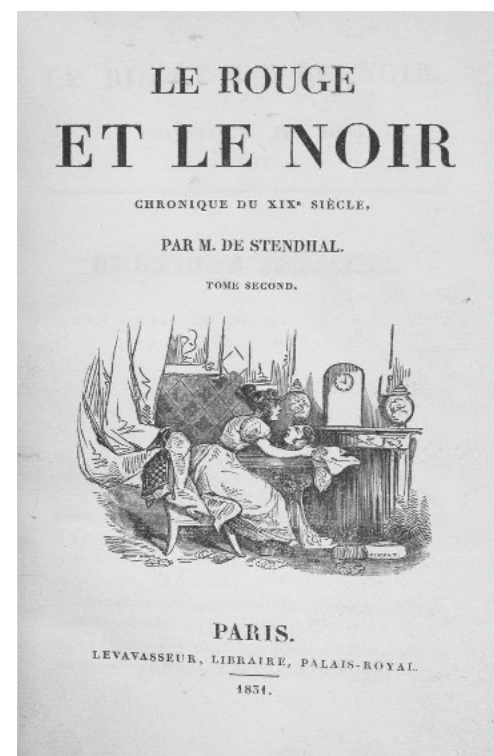
接着，王斯秧老师梳理了评论家对小说标题《红与黑》的解读。读者普遍接受的政治象征层面的解释，是红代表士兵的服装，黑代表教士的道袍。像于连这样出身卑微的穷青年，如果早生 20 年，就可以追随拿破仑，在军队建功立业；可惜他晚生了 20 年，在教会势力猖獗的复辟时代，他只能披上教士的黑色道袍才能有出头之日。这种解释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当时的军装并不是红色的，黑色也不仅仅是教士的服装。在整部小说里，于连当家庭教师、教士、秘书，自始至终穿着黑衣服，这实际上代表着那一代年轻人的卑微地位。而于连摆脱自身身份的几个时刻，穿着由贵族馈赠的蓝衣服。如果仅从现实的角度解读颜色，这部小说应该是“蓝与黑”的对立，而不是红与黑。

有批评家认为红代表革命、鲜血、青春、热情，黑则代表森严、肃穆、压抑和死亡，还有人认为红代表爱情，黑代表野心，等等。不过，各种猜测并无定论，只是感觉到红色似乎更倾向于诗学层面，黑色则更倾向于现实层面。它们的组合也许表达一种对立或共存、甚至互相转化的关系，也许暗示着于连这个人物的矛盾属性。

于连身上所集合的多重矛盾既源于他本身的性格，又与他的时代和社会处境息息相关。他的斗争始终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出身低微而才华横溢的穷人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外部斗争，一个是自卑又自尊的年轻人克服敏感的天性、给自己强加责任的内心斗争，两者相伴相生，但后者更为激烈，构成小说暗潮奔涌的深层脉络。小说这样形容于连：“在这个奇怪的人身上，

几乎天天都是风暴”。评论家普雷沃也说：“巴尔扎克的主人公首先在与世界作战；司汤达的主人公尤其在与自身的敏感作战，不断地跟自己为难。”

不过，从整体来看，变动不居的人物其实仍然具有内在逻辑。司汤达笔下最为关键的概念——力 (énergie)，有助于理解于连的种种行为。这种“力”指的是生命活力与动力，小说中德·拉莫尔侯爵无法定义的于连性格深处“可怕的东西”，包括意志坚定、愿望强烈，也包括情感强烈、感受深刻，使得人物能够更深地体会生活，介入生活。而于连枪击德·莱纳夫人的行为，最终显露了他被野心所掩盖的敏感与高傲，



1830 年《红与黑》初版第二卷封面

使他转向激情。这个行为让他在现实利益的层面失败,却让他小说层面得到拯救。

王斯秧老师援引卢卡契的观点加以解释:“于连和司汤达的其他人物一样,不会向现实妥协,因此选择了死亡,以对抗现实的腐蚀。因此,不是贝尔德让于连举起枪,而是司汤达身上不可救药的浪漫精神。”小说家只讲述人物突如其来的行为,对其动机与信念故意保持沉默,让人物享有充分的自由,同时让读者感觉到事件强烈的任意性,而这种任意性反而是真实的标志。

由此,王斯秧老师点明,在于连这个脱胎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浪漫精神并不是现实的对立面,而是与现实合一。现实唯一的法则则是无序、易变,人心的现实更是如此,小说也应通过多变的人物、无常的事件,呈现现实的丰富与厚度,这才是最忠实的现实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司汤达被称为浪漫主义作家,又是现实主义的代表。



刊登于19世纪法国著名的《司法公报》上的“贝尔德案件”

接下来,王斯秧老师借助评论家杰本明·富兰克林·巴特提出的“平行故事”概念,从小说的结构、人物形象和语式三个层面,分析了小说家是如何在贝尔德案件的基础上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同他穿越的外部世界联结起来,在文本内部营造巨大的叙事空间。

第一,小说结构建立在大革命之后、因中央集权而形成的“巴黎/外省”对立之上,以于连的上升为线索,呈现了复辟时期整个法国的社会面貌,把个体融入更为宏大的时代历史进程当中。司汤达由此展开早年在哲学论著《论爱情》中所划分的两种爱情,即激情之爱 and 虚荣之爱。维利埃和巴黎是催生这两种爱情的土壤,德·莱纳夫人在外省隔绝、谨慎的氛围里成长起来,得以产生激情之爱。而文明过度的巴黎,只能催生出虚荣之爱。

第二,王斯秧老师指出,小说在于连这条主线之外,还并行进展着两个平行故事——拿破仑与瓦勒诺。拿破仑是于连的偶像,在这个困顿于现实之中的人身上注入浪漫主义的激情和英雄主义。而读者关注不多的瓦勒诺,则像是于连的分身。小说刻意让他和于连形成鲜明对比,代表一种现实的态度:于连这样的穷青年在教会势力猖獗的时代本该像瓦勒诺一样,低三下四、不择手段,他

因为不肯遵循社会法则而失败。小说最后由瓦勒诺宣告于连的死刑判决,是现实的于连宣告了理想主义的于连的死亡。这三个故事的交错展现人物承受的外在与内在的力量。世道塑造人心,但不足以严格地解释人心:个人的才能、意愿与想象,与时代的难题、社会的变动时有冲突,心理现实和社会现实并不重合。

第三,王斯秧老师认为,小说通过语式与时态的运用,呈现出了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复杂的关系。《红与黑》中运用了大量条件式过去时和虚拟式过去时,形成嫁接在小说主干之上的、指示故事发展诸多可能性的“平行故事”(para-stories)。小说由此突破了严格的线性叙事框架,“在虚构的内部创造出了虚构”,在文本内部拓展了更大的叙事空间,更是洞察人性、表达价值判断的工具。

王斯秧老师以司汤达为《红与黑》写的介绍文章的最后三段作结,指明司汤达在小说再现现实与认识现实方面所作出的创新:

“有件事会让读者吃惊。这部小说并不是小说。它所讲述的一切都于1826年真实发生在雷恩附近。主人公正是在这里去世,他朝前一个情人开了两枪,他曾是这家孩子的家庭教师,而这个情人写了一封信,妨碍了他和第二个情人、一个富家女成婚;德·司汤达先生什么都没有编造。

这本书敏锐,生动,充满趣味和感情。作者做到了以简单的笔法描绘温柔、单纯的爱情。

他敢于描绘巴黎的爱情。在他之前,从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也没有人细心

描绘过19世纪前30年各种各样的政府给法国人带来的风俗。有一天,这部小说会像瓦尔特·司各特那样描绘古老的时代。”

田庆生老师随即对讲座进行了评议,主要就司汤达在《红与黑》中追求现实的特点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一方面,这体现在书中对于社会风俗的精准刻画,从底层农民到大资产阶级均有所涉及,并对王斯秧老师强调副标题“1830年纪事”的观点表示赞成,指出这直接点明故事是讲述当代,要知道《红与黑》本身就是于1830年11月发表,这也就意味着故事的发生时间和叙事时间几乎重合,可以说是一种可信度和真实性的极致,因此国内现行的张冠尧和郭宏安两个译本中省去了副标题的情况实际上是对重要细节的忽略;而另一方面,在本书上卷开头写到的“事实,无情的事实”这一题记也是对于客观记录现实的强调,但值得注意的是,维里埃这座城却又是司汤达虚构的,从虚构的背景中反映真实的故事,正如书中叙述者所提到的“小说是行走在大路上的一面镜子。它映入您眼帘的,时而是湛蓝的天空,时而是路上的泥泞”,仿佛只有在小说中才可以达到真实,历史反而做不到。

田庆生老师还指出,《红与黑》现实主题下蕴含着作者对教会、上帝、贵族、金钱等强烈的批判意识,比如运用反衬的手法描写维利埃这座小城,自然景色优美,但却散发着锱铢必较的铜臭味。他还将《红与黑》与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进行对比,指出现实主义作品中英雄主义的消解,人物形象的溃散。

(撰稿:饶畅)

77

杜月 | 就地造景与资本平台——农村高端民宿的兴起

2021年11月10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77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就地造景与资本平台——农村高端民宿的兴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杜月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评议。

杜月老师首先从一个真实的经验问题讲起。杜月老师指出，近年来中国农村高端民宿逐渐兴起，自己之所以会关注农村高端民宿的发展，与十年前的成都调研有关。她在调研中看到，农民大规模上楼后，资本进入农村大规模流转土地，然而当时却不清楚它的收益点在何处，农业本身周期长、回流慢，还有各种人工费、流转费和其他成本，这使得当时的调研者都困惑于资本为何投资农地？

通过此后十年对于成都的调研，她获知了在投资高端民宿之前，资本与农地结合的一些方式。第一种盈利方式是打政策的“擦边球”。例如，当地一公司流转了



杜月老师

620亩农地，购买了60亩挂钩指标，在购买指标后，利用国家农业补贴违规建设住宅并出售，售价为每平方米2000元。因为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能修建住宅，所以该项目被判定为违建，老板也因非法集资罪被逮捕。投资农地的资本另一种盈利方式是搞政策投机，即等待流转的农地被开发征用。当地一家大公司流转了大面积的农地，利用国家补贴进行农地改良并建设地上附着物。一旦被国家征地拆迁后，土地补偿费用归土地所有者，地上附着物补偿归流转土地者。总之，上述两个投机的现实案例都说明了，下乡的资本并没有找到与农地结合的点。换言之，资本投资到农地，并没有找到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关于资本为何没有找到与农地的结合点，杜月老师从社会学的理论和框架去思考这个问题。资本投资农地，其实关乎到“土地商品化”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中对于土地商品化的讨论，最早是从马克思开始研究的。马克思认为，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的过程，必须“将土壤（soil）变为资本（capital）”，即将具象的土地变为抽象的地租；同时，具体的人抽象为挣工资的劳动力。接着马克思的思路，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了富有洞见的观点，将土地作为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y）进行思考。在波兰尼看来，土地是自然的一部分，本身并不是商品，并非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的，只有将其虚拟化，才能抽象为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商品。并且依靠这种虚拟，市场才能组织起来。沿着这一脉络，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会出现“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和“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必然过程。过度积累是指剩余资本无法找到可谋利的出口，因此只能被闲置；而剥夺性积累则是指一系列资产以非常低的价格释放出来，过度积累的资本就可以进入这些资产，将它们做更有利的用途。前些年，资本疯狂涌入楼市，导致楼市竞争愈发激烈，准入门槛也越来越高，而资本的收益率随之不断降低。大量过剩的资本找不到可投资的出口，继而转向征用农地，以一种非常低廉的价格将土地资源释放，将其修建成楼，通过房子的买卖，赚取一级土地市场的价格（买地）和二级土地市场的价格（卖房）

之价差，满足投资的需求。这解释了在全球各地出现抢夺土地（land-grabs）的现象。所以，土地的商品化往往伴随着两种结果，一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征地），二是土地用途的变化（工业、地产）。

但是无论是农地所有权的变化，还是用途的变化，近年来在中国都变得越来越难。这和我国近十年实行的特别严格的耕地保护法规和实践有关。如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永久基本农田”概念，指出任何情况下禁止改变基本农田用途，不得以任何方式挪作他用；2009年，国土资源部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保增长、保红线”行动；2017年，国家完成了全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防止耕地“非粮化”的意见。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技术治国”的治理理念下，国家通过“制图”的方式，要求地方政府把新增耕地落实到图上，并通过卫星遥感的手段，实现了对基本农田的精准执法和有效监控。这解释了为何资本难以与农地进行结合，因为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不能轻易使农地发生任何所有权和用途的变化。

随之，杜月老师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在国家严密控制之下，所有权和用途都无法发生变化的农地如何商品化？沿着提出的问题，杜月老师引出她最新的研究发现，资本找到了与农地结合的新方式，那就是投资高端民宿。杜月老师的田野地点是在成都R区，从自然环境和自然禀赋来看，有着工业污染历史的R区并不是发展高端民宿的最佳选择。但恰恰是在R区，于2016年引进了多个高端民宿的项目，并且该区的旅游收入在2016年之后有了快速增

长。

杜月老师结合在田野地点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发现资本用来流转的农地，很多都被用来“造景”了，大面积的农地被用来种植草坪、花卉、果树等。被制造为“景观”的农田，本质上是为了衬托和点缀资本修建的高端民宿。这种“农田造景”的理论意义与英国和北美经验的“农村绅士化”（rural gentrification）理论完全不同。农村绅士化的理论是指，大量中产阶级从城市涌向农村，是受自然环境（河、湖、森林、山）或是乡村社会生活的吸引。而R区“农田造景”的最大作用是将民宿与它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分隔开来。首先是将高端民宿与污染的农村空间相隔离，其次是将民宿与自然风景区相隔离。脱离自然的民宿，看似是反逻辑的行为，但高端民宿做的是小众市场，注重挖掘乡村的价值，具体挖掘的就是用来造景的农田价值。

“农田造景”也使得民宿脱离于农村社区，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上都与村庄完全隔离开来。物理隔离较为容易做到，但要做到与村里人完全不接触的社会隔离却很难。在民宿中运行着一套成熟的体系，它能保证住客与村民的接触呈现出高度选择性的特征。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民宿老板于当地挑选的民宿管家，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如清洁、做饭等。15个院子配置18至20个管家，分为A、B角，职位与人员配比为1:1.3。此外，公司还会对管家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如怎样处理客人与村民发生的矛盾。

脱离了村庄和自然环境，民宿的空间

被彻底独立出来，看似是一个完全真空的环境，既接触不到外在的自然环境，也接触不到外来的社会生活。这个真空的空间为资本提供了极佳的平台。首先，这个独立的空间实质上是一个综合性的客户体验店，客人可以深度体验民宿提供的一系列产品，如高级家庭影院、最新的智能家电和高端护肤产品。在这种意义上讲，民宿成为了资本平台，各种品牌对客户展示和开放。资本不但占满了空间，也充斥了时间。这体现为民宿为客人安排的行程满满的日程表。例如，观看展览、组织团建和会议、体验传统手工艺、开展亲子活动和儿童教育等，所有行程均由专业的内容商提供。总之，客人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被资本细致规划。

这种民宿的发展和运营模式可复制性很强，在本村运行的高端民宿，可以完全复刻在另一个村庄。最初的民宿培训是用来培训当地的农民。但到后来就变成了标准化的培训模式，培训对象也由农民变成了当地的领导干部和充当未来项目经理的当地年轻人（多有政府关系）。这种培训模式是高度上的抽象化，它能将本村具体的经验抽离，然后复刻到任何地方，无关于复刻地方的自然和社会条件。

研究发现，民宿产业吸引了一部分楼市的资本投资农地。资本之所以能够农田造景，与国家大面积的土地增减挂钩和农民上楼有密切关联。土地增减挂钩实施后，造成的结果首先是大片的土地被复垦和连片化，其次是农民耕作半径增加，使得耕种土地越来越困难。结果就是，村集体面临巨大的农田流转压力，大片的农地以比



农地被改造为草坪，用于造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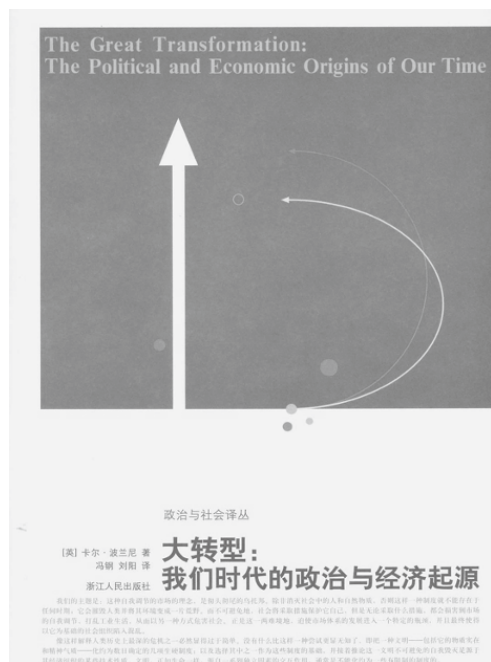
较低廉的价格流转。在这种背景之下，地产公司、地产联合基金和政府资金（一部分扶贫款）等纷纷投资于高端民宿，被抽离出来的民宿空间变成了一个资本的平台，各种家电、家具、家居和化妆品等品牌，以及多种多样的内容商都涌入其中。

接下来，杜月老师讨论了大规模的农田造景对村庄造成的影响。首先，从农业方面来看，林木从经济作物变为景观作物，民宿公司对种植的林木没有产量要求，只求林木保持景观的功能。从当地的统计数据来看，R区的年均播种面积和年均粮食产量均在2016年后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下降的时间点恰好与引进这些大型造景的民宿项目的时间点相吻合。其次，从村庄方面来看，由于村庄的土地基本流转在一家公司手中，容易出现价格垄断和流转费拖欠。例如，调研中的一个村落，公司老板拖欠村民的土地流转费，导致村民到镇政府上访，最后镇政府通过规自局申请了区

政府的维稳经费来解决公司的拖欠问题。

杜月老师最后总结道，在国家严格的农地保护法规和实践下，农地的所有权和用途都得到了严格的限制，使其难以成为虚拟商品进入资本链条。资本通过“农田造景”的方式解决过度积累问题，转向发展高端民宿，使土地从自然与村庄中脱离，实现完全的虚拟化，完全抽离于它的自然和社会空间。虚拟化的空间成为了资本平台，吸纳多方资本填入。可以说，高级民宿本身成为了吸纳城市楼市资本溢出的一个出口。现在看来，这种经营模式可能会导致农业的减产和农地的垄断。

在随后的评议阶段中，周飞舟老师将“土地商品化”的问题放在国家宏观政策背景之下进行讨论分析。周飞舟老师指出，杜月老师的理论研究框架是土地的商品化。中国第一轮的土地商品化，指的是住房制度改革和征地制度改革之后，全国住房商品化热潮兴起，资本在各地圈地，地方政



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府“大兴土木”，引发的后果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问题。第二轮土地商品化则是指资本到农村圈地，即资本下乡。资本下乡后，大规模征用农村的流转土地，利用政府农业补贴，在农村社会开展农业规模经营。但资本在下乡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挑战和难题，一是由于国家对于基本农业保护的严格规定，致使资本无法在圈来的土地上进行开发，无法修建商品房；二是下乡的资本投向农业领域后，往往与当地社会“水土不服”，投资的农业无法达到预期的收益。这是近些年农村社会学、农业社会学领域讨论较多的主题。面临两大困境之下的资本，近年又转向了投资农村地区的高端民宿，其

实资本在农村不仅仅是“原地造景”，更重要的是建造了一个个庞大的“庄园”。

周飞舟老师认为，运用“政府——资本——农民”三方关系来理解土地政策问题会更加清晰。地方政府往往与资本纠缠不清，但是中央政府对于资本非常警惕，在第一轮土地商品化过程中表现为对土地指标和土地规划的利用保护，在第二轮土地商品化过程中则是强调基本农田保护，强调耕地“非粮化”问题。当资本的洪水越涨越高时，国家则是要把大堤修筑更高，以此来保护基本农田和农民的权益。中央政府的意图就是要防止耕地“非粮化”一般，防止农民无产化，筑起围墙抵御资本的侵蚀。这三者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土地政策的核心要害。

提问环节，围绕不同地区民宿发展的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的保护、资本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资本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等问题，杜月老师逐一进行了解答。杜月老师补充道，真正理解资本在农村社会的做法，需要从土地制度入手，来理解国家、资本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目前，高端民宿就地造景的发展模式是它在数轮经验做法中总结出来的道路，这个做法非常有理论讨论的价值，因为它使农地高度虚拟化——也正因为高度的抽象性，使得这种模式可以在诸多地点，甚至是没有自然禀赋的地区进行复刻。

(撰稿：刘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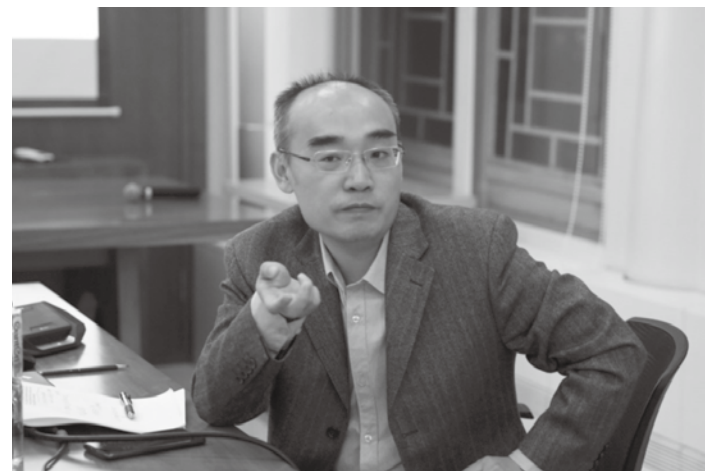


78

季剑青 | 历史与实验——胡适“文学革命”的思想史逻辑



2021年11月16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78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历史与实验——胡适‘文学革命’的思想史逻辑”。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季剑青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王凤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评议。



季剑青老师

季剑青老师首先引用胡适的自述，即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胡适的“文学革命”包含了“实验”（胡适的白话诗实验）和“历史”（胡适关于白话文学的历史叙述）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发生学的思考方式和习惯与胡适的文学革命的关系。

从胡适所谓“历史的观念”或“历史的方法”入手，季剑青老师按时间顺序理清了胡适对相关话题的论述，然后将胡适“前杜威”时期对历史的眼光或方法的理解做出总结，包括三个层面：一、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即所谓“文本批评”和“高等批评”，主要是一种校勘文献和确立文

献之真实性的技术方法；二、从西学眼光来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学的价值，也可以说是某种比较的方法，所谓“与古俱新”；三、历史连续性的意识，这是从他早年接受的进化论中生发出来的，即经由历史通向未来的面向。第一点作为技术性的工具，胡适一直在采用；后面两个方面——特别是第三点——在他后来的思想中也有所延续，但在经历了杜威实验主义思想的洗礼后，有了崭新的内涵。

随后，季剑青老师梳理了胡适在文学革命的实践中于“历史”和“实验”二者之间摇摆的心路历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两个问题：其一，这种“试验”到底与杜威的“实验主义”是什么样的关系？其二，胡适的“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方法”如



胡适，摄于1914年

何与他的“实地试验主义”相协调？对此，季老师提出一个假设，即胡适来自杜威的对“历史的方法”的新观点，可以帮助他把“实验”和“历史”这两面有效地结合到他的文学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来，告别那种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困境。

追本溯源，杜威的“实验”或“实验的方法”其所指是怎样的呢？季老师总结杜威的相关论述，总结出其“实验的方法”至少包含了两层内涵：一、实验是面向未来的，是开放性的。观念作为假设是临时性的，指向各种可能的方向；二、实验是对环境有意识的控制。借助实验科学，人们可以创造条件来控制自然，将自然的力量运用于社会，以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与福祉。正是这第二层内涵，让实验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发生了联系。

在阐述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的时候，胡适提到了实验主义的两个根本态度，即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和实验的态度。其中“历史的”对应的是 genetic，而不是早年常用的 historical，严格地说，应该翻译成“发生的”或“发生学的”。胡适所读过的杜威的著作中，对发生学方法的阐述也有两个面向：一，发生学方法具有批判性，当某种思想或制度被还原为它在历史上的发生过程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把它历史化了，可以对它做出价值的评判。二，发生学方法有引导和控制事物发展趋势的一面，掌握了有关物发生过程的知识，就可以知道如何继而得到想要的结果。以上两个面向中的第二个面向恰好可以和前面说的“实验的方法”的第二层内涵结合起来。如果说实验的方法让我们得以控制自然界的物质力量，那么历史的或发生学的方法就让我们从一个过去与现在不可分割的连续性的立场上，控制精神事物的发展走向。两者的逻辑是一致的。

接下来，季剑青老师阐释了胡适在文学革命中对实验主义的运用。杜威的“实验的方法”的基本精神是开放性的，面向未来的。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会提出各种假设性的观念，它们指向各个方向，需要逐一通过实验来验证。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刍议”这个词就很典型地体现了一种试探的、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态度。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所谓文学改良可以入手的“八事”，按照“实验的方法”的逻辑，可以说是八

种假设性的观念，严格地说，它们都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但胡适只选择了第八条“不避俗字俗语”来自己“实地试验”，也就是白话诗的实验。具体到这一条上来，胡适更明确地提出了“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观点。这个观点作为假设的话，不仅可以通过当下的白话诗实验来验证，还可以运用“历史的方法”，引导历史上的趋势来支援当下的实验。于是胡适就这样，将“历史”与“实验”两者结合起来，这同时也是他的那篇著名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的主旨。

结合“历史”与“实验”，胡适反复在中英文文章里申说文学进化的自然趋势和自觉革命的关系，所谓“革命”即是“理智的控制与实验”。胡适明确提出，文学革命的成功依靠的就是“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五四”之后，胡适关于文学革命之历史渊源的论述，逐渐成为一个更大的、关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论述的一部分。胡适提出这一论述，是要努力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内部，发现那些现代性的因素，它们在适当的条件下仍可以复苏和“再生”，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杜威“历史的方法”的某种运用。

最后，季剑青老师总结道：如果说“历史的方法”帮助胡适建构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本土现代性的传统的话，那么“实验的方法”则确立了他作为这个传统在当代的自觉的推动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就文学革命而言，在这两方面可以说胡适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关于白话文学的历史叙述深入人心，他作为文学革命的领导者的角色更是毋庸置疑。季老师表示，自己

没有要把胡适的功劳都归到杜威的名下的意图，相反，他认为胡适对杜威思想方法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在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里面，无论是实验的方法，还是历史或发生学的方法，基本上都是抽象的、普遍的方法论，但胡适则将它们应用于他念兹在兹的“再造（中国）文明”的事业，这样——用实验主义的语言来说——产生了它在美国本土、杜威自己也不可能预料到的效果。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比较思想史或跨文化思想史的课题。

欧阳哲生老师评议认为，胡适与实验主义的关系是一个老话题，而季老师在新的问题意识下试图给问题一个新的解释，可贵处在于着重讨论文学革命和思想史及思想方法之间的关系。胡适和一般的文学



胡适《尝试集》初版封面

者不同，他是有哲学背景的学者，特别注重方法。实验和历史这一对表面看很矛盾的要害在胡适身上是统一的，给了文学革命的理论比较牢靠的思想基础。这个角度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欧阳哲生老师提出了几个仍待解决的问题：严复的进化论观念得到了很好的接受，但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却没有在中国生根，这背后是什么原因？他还指出，胡适在接受杜威的理论的同时，也对实验主义进行了改造，任何理论的本土化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最后，欧阳哲生老师强调，目前对胡适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成果，并且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主持人王风老师指出，对于胡适怎样汲取杜威实验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整合到自己的思路中去，季剑青老师的报告做出了关键性的论述，在当前的相关课题的研究中提供了最清晰的

逻辑分析。他继而做了如下几条补充：胡适的“文学革命”和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并不完全重合，胡适强大的历史叙述能力将他放在了核心的位置，但实际上文学革命的发生含有很多复杂的因素；胡适表面看起来缺乏理论彻底性，太具妥协性，但这恰恰是他的成功之处，或许应该从胡适自己的角度重新去理解这一点；胡适将发生学的方法微妙地转换为历史的方法，他的《白话文学史》中更强调连续性的历史叙述，不完全是发生学方法的运用；需要区分胡适的论述中当时的言说与事后的阐述两个层面，因为胡适事后有将自己逻辑化的倾向。最后，王风老师表示，未来应该有多学科的学者一起来参与胡适研究的课题。

(撰稿：李成城)



79

彭明浩 | 石窟寺建筑研究的角度与问题——以龙门石窟为例

2021年11月24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79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举行，主题为“石窟寺建筑研究的角度与问题——以龙门石窟为例”。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彭明浩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怡涛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评议。

围绕石窟寺建筑研究角度与问题的探讨，彭明浩老师从梳理研究史开始。彭老

师首先指出，从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先生的《云岗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开始，石窟寺建筑研究即反映出两个层面的取向，一者是通过石窟中的建筑形象丰富我们对早期建筑的认识，二者则是将石窟整体纳入建筑营造研究的视野。

这样的取向一方面来源于早期学者们受西学影响而形成的艺术观，视雕塑、建筑、壁画为一体三支；另一方面也缘于上世纪学科尚未发生大的分化，或者说当时的学者们在有意削减这种分化，正如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铃先生之言：“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顾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只是随着学科分化，对石窟寺建筑形象的研究倾向较为突显，而从营造视角出发的研究亦成为一条相伴的暗流。

当然，石窟寺建筑研究绝不是建筑史的专述，来自其它学科的关注反而可能更多，亦更有启发性。如考古学研究者论及石窟寺时谈到的崖面、空间、组合、外观等一系列关键词，又如美术史学者巫鸿先生提出的观看问题，都同石窟寺建筑



彭明浩老师在讲座现场

本身及其开凿过程、时空次序、景观关系等紧密相关。特别如初师宾先生由麦积山石窟排年问题关注到的竖直壁面上的栈道走向、岩体情况、洞窟分布等要点，经日后学者们的发展和探索，已经在方法论意义上形成了诸多硕果。

因此，彭老师指出，在石窟寺建筑研究中探讨学科边界的意义不大，古人围绕其发生的活动本身就具有综合性。彭老师认为，重要的是发现新的现象，开发新的角度，讨论新的问题，深化我们对石窟的认识，而这也是他此次讲座的初衷。以此为出发点，选择龙门石窟这一案例也就不是在狭义的石窟寺建筑形象方面，而是更切重于石窟寺作为一种建筑营造活动整体展开讨论。

彭老师的讲座按照营造的空间次序，分为选址环境、斩山、前廊、窟室、窟前附加建筑五个层面逐步推进，其中窟室与窟前附加建筑是本次的重点内容，且更多讨论集中在相对此前彭老师针对云冈石窟

的研究，于方法上具有独特性或进步性的部分。

一、选址环境

针对龙门石窟的选址环境，彭老师谈到了两个重要特点。首先是石窟与道路的关系。龙门所在区域从地形上看，是洛阳盆地通往南部地区的一个重要交通孔道；加之其两山夹水的地貌特征，造就了龙门石窟开凿时距离河道及道路都非常近，从而形成了非常开放的石窟空间，也继承了从云冈开始出现的“山上寺院，山下石窟、石窟直面道路”的空间部分格局。另一个特点是山体岩层的分布。在龙门，造山运动塑造出的斜向岩层为开凿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而人们顺岩层攀登的习惯，就使得在这个过程中开凿的窟龕形成了顺岩层的斜向区段，如奉先寺南部区域就有这样的大段落。而在区段内部，各窟龕开凿的时间节点也是顺岩层分布，如鹿洞段就是从北魏开始开凿下方的鹿洞片和陇骧将军洞片，至唐高宗时期开始向中部进行，再到武周时期扩展到上方的极南洞相关区域，整体上形成了顺岩层的时空走向。基于这一点，彭老师提醒道，这类非水平空间关系的石窟平面画法，应当顺岩层划分后分别由更层平面向大地投影而成，方能更好地表达洞窟关系。



路洞段石窟分布图

二、斩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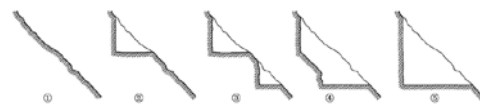
关于斩山工程，彭老师则强调了对斩山侧壁的关注。斩山作为石窟常见且必要的工式，其主要目的是在坡状的山体空间开凿出洞窟正壁，然后在正壁向后开凿洞窟或龕像。在这个过程中，两侧的斩山侧壁和前方窟前平台随之形成，从而与正壁一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斩山空间，这是斩山的宏观结果。尽管斩山侧壁只是伴生产物，却十分关键，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具体的石窟工程，因为它不仅反映了该处原始山体的坡度，更卡定了一个洞窟的规模，亦即营造的工程范围。如著名的古阳洞，一般认为这是一处因凭自然溶洞开凿的洞窟，其内龕像分布较为不规则，似乎缺乏统一设计。但通过对斩山空间的探寻却可以发现，尽管有所坍塌，古阳洞具有明确的斩山正壁；更重要的是两侧非常鲜明的凿痕标志出了明确的斩山侧壁，且古阳洞不断向下开凿的空间层次在其初始斩山侧壁上得到了反映。这些都说明古阳洞是一个有明确工程范围和目的的洞窟，同利用溶洞开凿者如莲花洞的整体窟形和外部环境都不一样；也进一步印证了对斩山的识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洞窟性质及其规模的研究内容。

此外，彭老师还通过对宾阳三洞的分析指出未完成的斩山工程同样值得关注。文献记载宾阳三洞“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

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可以见得斩山工程之浩大。此外，这条文献还说明斩山尺度属于设计尺度，是用于控制石窟规模的标尺。事实上，文献很少涉及石窟方面的内容，涉及者讲的则都是斩山相关，也足以说明斩山之于石窟营造的重要性。官大中先生认为宾阳三洞上方高处的断崖正是其早期斩山遗迹，但彭老师在此提出了新的观点。他通过实地勘察发现这里并无明确的人工凿痕，而呈现出明显的自然样貌；更重要的是，在宏观视野下，距此处断崖南端不远的同一高度位置还有一持续向南延伸的断崖，二者似本应为连续的，那么这就不符合人工斩山必然通过侧壁限制开凿规模的工程逻辑，反而说明其更可能是地质原因造就的天然断崖。因此，彭老师相对认同宾阳三洞原始斩山实际上位于后来的奉先寺区域的观点。一方面，文献记载奉先寺的开凿时间非常短，推测其在早期斩山的基础上开工是完全合理的。另一方面，通过分析斩山壁面可以发现，其正壁上部范围是大于实际利用的，且奉先寺窟前平台下部也存在斩山侧壁的向下延续，这说明奉先寺斩山的宽度和高度都超出了它本身的开窟范围，确实存在着利用早期斩山空间二次生成如今窟前空间的历史过程。但彭老师对此仍保持谨慎的态度，认为若要将初次斩山的形成上推至北朝，仍需借助更多遗迹情况加以验证。

对宾阳三洞斩山的追寻，促进了彭老师在整個龙门区域对辍工斩山的发现，其中一处斩山的正壁及两侧壁都十分鲜明，其重要性在于清晰地保留了分层施工的痕迹，向我们再现了当时完成上层斩山后再

开展下层的这样一种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施工过程。另一处斩山的辨识则需要明确的斩山概念的支撑才可以实现，因为其斩山正壁上分布着诸多随意分布的小型窟龕。但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在小型龕周边的未利用壁面却非常笔直，且分布有大量凿痕，而这些壁面并不在任一小型窟龕的开凿工程范围内。此外，该区域两端未凿干净的突出岩体则是明确的斩山侧壁遗迹，因而可以勾勒出整个辍工区间。那么，现存小型窟龕就必然以此处斩山的整体开凿为年代上限，结合二号斩山所在龙洞段的时空次序，以及龙门在唐代的大型工程都和武周施事有关，因此应不早于武周时期。而这一结论又可以同小型窟龕中的题记，和既有的相关研究形成互证关系。那么从这个层面上将，对斩山的关注就不仅能揭示洞窟性质及规模，还可以丰富相应基础史料，产生年代学判定的价值。



通过斩山辍工遗迹推测其开凿过程

三、前廊

随后，彭老师谈到了龙门石窟前廊空间的特质。龙门的许多窟室前都会设置前廊空间：在北魏时期，虽然大量洞窟是在正壁上直接开门洞营建洞窟，但也已经出现了简单的前廊空间，主要是做一个屋顶而没有下部的斗拱、柱子等，如皇甫公窟、唐字洞；至唐代时，龙门的前廊则多形成了明确的、相对更深的内凹空间，但没有任何木构元素。值得明确的是，前廊空间

无论其形式简单与否，都是在斩山基础上有意营造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空间，需要同斩山正壁或斩山空间相区分。体现在平面图绘制中，窟口线的表达便是重要的，否则斩山、前廊两者存在次第关系的空间就容易因平面上的连贯性而被混为一谈。而前廊空间不仅可以通过空间界限直接确认，还可以借助廊下力士雕凿方式加以判定。因为有前廊时，廊下力士可以伴随前廊空间的生成出坯造像，从而具有空间体量，表现出圆雕法的特征；而对于没有前廊空间的石窟，其守门力士则往往只能浮雕或向内雕凿，展示出与前者不同的生成属性。

针对龙门石窟相较同时期周边的其他石窟所表现出的木构元素缺乏的现象，彭老师提出了他的见解，认为常见的北朝仿木构前廊与龙门北魏时便出现的内凹型前廊空间是形异实一的关系，表达了共同的空间意象。天龙山从北齐到唐石质窟檐建筑的发展可以视为二者联系的一个证据。在天龙山北齐开凿窟龕的前廊中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木构元素的表达，有柱、斗拱、阑额、屋顶等形象；但到初唐时期，其洞窟前廊空间就已完全简化，没有了立柱、屋顶，而只留下最具有木构标志性的斗拱这一层。尽管天龙山窟檐建筑展示出的仿木构前廊与无柱型前廊之间似乎是历史演变形成的历时关系，不同于龙门内凹型前廊空间与仿木构前廊的共时性关系，但至少证明了二者空间属性的一致。而我们不妨将北朝时期对木构元素表达丰富性上存在差异的两种前廊空间视作不同规格洞窟对应的等级形式。如李裕群先生先生调查

的山西高平石堂会石窟，尽管其前廊空间形式十分简单，在前廊侧壁上却能看到用柱及阑额的细微痕迹，可以看到它在追求前廊建筑形象方面做出的努力，也就显示出木构元素表达可能带来的等级差异。

除龙门前廊空间历代保持的简练特性外，彭老师还将前廊空间置于整个石窟谱系中进行了讨论。从各个石窟不同时期前廊空间形式或石质窟檐建筑的演变都可以看到，在石窟发展历史中，存在着一个木构元素逐渐减少的过程，而这似乎有悖于随着时代变迁，建筑技艺不断进步，建筑形式装饰性不断增强的逻辑。但彭老师认为，若将北朝仿木构前廊空间视作石窟寺建筑中国化的象征，这一现象也不一定指向一个逆向进程的发生，而有可能是随着窟前附加建筑的营建，真实的木构建筑替代了早期的石质仿木构。此外，有趣的是，各个墓葬出土石椁中的仿木构表达也呈现出类似的演变趋势——最早在北魏出现的石椁都是非常复杂的仿木构，如宋绍祖墓，其柱、额、斗拱等各个构件甚至可以拆卸；但到隋唐石椁，从李静训墓就已经开始简化这些表达；至于唐代，大量石椁都采取了只有柱子和屋顶而省去了其他一切仿木构构件的形式，丰富的石面雕刻也使得石椁的空间意象同木构建筑渐行渐远。而宏观的跨地域比较也同样具有启发性，即仿木构形式在中原地带的逐渐式微同大量复杂仿木构集中出现在民族政权地区相映成趣。这些都启示我们思考对木构建筑意向态度的变化和差异是否与文化心理有一定关系。



龙门内凹型前部空间

四、窟室

在谈到窟室时，彭老师首先强调了研究视角的问题。一方面，从北朝后期至唐以后，石窟窟形本身并不复杂，因此当从建筑视角研究窟室时，对窟内空间整体生成过程的讨论或许值得更多重视。另一方面，由于石作空间营造本质是一种“减法”逻辑，在开凿窟室空间的同时还兼需预留主要像设的粗坯，因此这是一个集合了空间生成和造像生成的完整过程，也是石窟营造工程的特别之处。

基于此，彭老师从另一个面向上再举宾阳三洞之例进行了分析。三洞中仅宾阳中洞于北魏时期完工，其正壁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结伽趺坐，两侧壁两立佛，左右各胁侍菩萨，总体形成三佛题材。南北两洞则于北魏时辍工，至唐初补凿完成，正壁一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两侧壁为直壁，补凿了许多隋唐各时期的窟龕。按文献记载三者为组合关系，那么其原始设计就都应如中洞是三壁三佛样式。但若细推其空间生成过程却会发现，南北两洞的侧壁上并未预留立佛坯体，似乎没有造侧壁佛像的计划，这就使将宾阳三洞视为

形式统一、一体设计的组合关系的认知出现了被颠覆的可能。但通过对中洞的细致观察和反复体会，彭老师发现中洞两侧壁立佛有内陷之感，其后壁面也呈现出后缩趋势，说明这些佛像很可能是在直壁基础上向内开凿形成的，如此一来南北两洞辍工留下的直立侧壁也解释得通了。而经过照片建模和切片，这一假设也得到了验证，从不同水平高度位置做出的剖面可以看到，中洞侧壁的两座立佛整体都相对壁面内凹。从而宾阳三洞的营造过程，至少就两侧壁而言，其空间生成与造像生成就不是完全共时的。而这一点还可以带来对宾阳洞佛像题材的新认识。彭老师认为，从设计逻辑上讲，宾阳洞先完整雕凿主尊，后内推生成两侧佛，表现出了三佛语境下对主尊地位的强调，这与云冈的三佛题材存在取向上的一致性；而从营造结果来看，宾阳洞三佛体型均等，呈对等关系，又与北魏晚期以后的三壁三佛样式相同。以故宾阳洞三佛的营造实际上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

再进一步复原宾阳三洞营造工程时，彭老师还发现了另一个较重要的时空节点。他注意到南洞两侧壁都呈现出上方壁直、下方突起的特征，这暗示着下方空间层次的存在。而在对龕像关系的分析中，该层次的存在则更加明显。一方面，唐代补凿的立像及各个大龕下边沿都去地有一段距离，尤其如理应位于低坛的胁侍菩萨亦是如此，很可能就是受到了下部工作层的约束。另一方面，通过对侧壁龕像纪年及时代特征进行排布可以明确看到，这些随意分布的小型窟龕最先利用的是中部壁面，

随后转而向上；而下层距地一米以内壁面上的窟龕都时代较晚，距离最早开龕已相隔二十余年。不仅如此，底部工作层遗迹不仅存在于窟内，在斩山侧壁下方也同样存在突出的岩体，其中后期还利用北壁的突出岩体做成了台阶。因此可以推断，南洞的开凿具有纵向空间层次，并非一步到底，且北魏辍工时尚未进行到底部工作平台。而这从施工逻辑上说也是合理的，因为在石作施工过程中，无论取石、雕凿、运料，都很容易对地面造成破坏，只有当窟室主体营造完成后再开出底部空间，才能确保地面及整个下层壁面雕凿内容的完好。顺着开凿空间层次的视角，彭老师还找到了洞窟中部又被分为上下两个空间层次的证据，并最终完整复原出了南洞的营



宾阳中洞

造过程。即先斩山，然后定位上部空间并向内开凿，同时雕凿窟顶，随后将下层空间凿出，再整体搭架雕凿窟室。

鉴于南洞并非一个独立工程，而属宾阳三洞整体营造工程之一部。因此，结合对中洞及北洞的分析，这项总体工程的历史进展也是可复原的。彭老师指出，由于北洞窟顶并未雕凿，且补凿龕像集中于高宗时期及以后，南洞的大量民间补凿龕却在初唐就已完成，因此北洞在北魏辍工时所停留的工作平面应较高，很可能窟室空间尚未成型。也就是说从三洞北朝时期的开凿进度来看，中洞最快，南洞居中，北洞几乎动工不久便停滞了。

结合这项创新性研究，彭老师提出了洞窟平面绘制的第三个要点，即不仅要关注如一般建筑在半米或一米标高形成的平面，石窟寺建筑不同高度的平面都可能具有时代意义和研究价值。正如宾阳三洞由于底层平面受后期干预大，故在一般平面图中，三洞的关联性很难得到有效表达；但当切割面渐次上抬，就能愈来愈接近早期的平面生成状态，三洞在规模、布局、层次上强烈的一体性会被揭示出来，三洞间距的控制模数也更易观察和讨论。除此之外，彭老师也提醒大家善用技术手段，记录与处理数据的技术工作同样可以成为助推研究、发掘问题的有利工具。

五、窟前附加建筑

在窟前附加建筑部分，彭老师借助万佛洞和奉先寺两例，从更具有方法论指引意义的层面讨论了他对石窟寺建筑研究角度与问题的思考。

万佛洞位于龙门西山中部，平面布局为前廊后室，正壁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洞窟两侧壁为千佛题材，壁面中部均为优填王造像，窟顶莲花中有纪年题记：“大唐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十一月卅日成，大监姚神表，内道场运禅师，一万五千尊像龕”。

首先，在万佛洞前廊空间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窟前建筑的遗迹。前廊南壁上有脊枋、檐椽和檐枋痕迹，顺檐枋向下还有设墙或设柱的痕迹，至底部则有地袱方孔，紧邻的窟前地面上则保留有方形础坑，另外在脊枋缝对应的两侧力士旁也有明确的内柱础坑。前廊北壁因前部坍塌严重，遗迹保存状况相对较差，但脊枋、檐椽、柱础等痕迹亦清晰可见。辨识出窟前建筑后可以发现，前廊小型窟龕的分布与附加建筑空间紧密相关。绝大多数补凿龕都位于柱缝线以内、檐椽槽以下，而分布于侧壁前端、建筑外部的零散小龕也都与檐柱间存在一定距离，有意为设墙留出空余。这些都说明窟前建筑之存不晚于前廊诸唐龕。

而若要进一步将建筑断代精细化，就需要先明确补凿龕的年代问题。通过对万佛洞各龕像题记统计排布可以发现，万佛洞的窟室营造、龕像补凿及窟前建筑营建三者都是大体同期的，前殿后窟一体设计，营造出一个封闭的窟室空间，而这又同万佛洞石窟的空间意象及功能联系了起来。

万佛洞在当时的洞窟景观中占据了一个明确的中心位置。但有趣的是，周边其他主要洞窟都有类似前廊空间，却无一者设置了窟前殿堂建筑，万佛洞的特殊性由

此可窥见一斑。彭老师认为万佛洞的以上诸多特殊性都与其主题息息相关。曾布川宽先生和罗炤先生曾经就万佛洞的主题进行过讨论，认为其与《佛说佛名经》相关，念诵佛名可以消灾灭罪，万佛洞是一个行法、礼忏的功能场所，而龙门东山擂鼓台中洞及南洞也都是上万五千佛题材，考古发掘报告发现两洞皆存窟前建筑遗址，且认为是与洞窟一体营造的。而除“上万五千佛”题材外，万佛洞的整个前廊还出现了大量行香礼佛的龕像场景，这在龙门的其他洞窟都是非常罕见的，一定程度展现了万佛洞内曾经的法会场景。

考虑到洞窟的功能，有助于发掘万佛洞内可能的使用遗迹，如前廊地面的圆槽，过去往往被视为后代干扰，并不为大家所重视。但彭老师认为，这种遗迹现象值得重新考虑，如极为偏僻的万佛沟第七窟窟内佛像前，就存在一个类似的圆槽；而在同样偏僻的擂鼓台一、二窟前廊下，伴随着窟前建筑遗迹，亦有圆槽的出现，其很可能与洞窟行香礼佛相关。除此之外，万佛洞老照片还显示，在后室两侧壁的主尊下方各分布有三枚圆孔，至今仍存，且经测绘发现其位置呈对称关系；而窟顶莲花中央同样发现了大小相近的圆孔，考虑到万佛洞窟前殿堂的封闭，窟内光线较暗，推测这些圆孔或为燃灯的挂孔，白居易《吹笙内人出家》中“道场夜半香花冷，犹在灯前礼佛名”一句，或许能为我们今天想象唐代万佛洞的行法景观提供最直观的帮助。

第二个例子——奉先寺，与万佛洞具有相似之处，其窟前附加建筑与补凿龕也

是同期的；但不同之处则在于奉先寺补凿龕像与主体造像并非同期，而这与龙门的整体政治景观及其历史背景都有着深远而密切的关系。

据文献记载，大卢舍那像完工于上元二年，开元年间在像龕壁面补凿了大量龕像。壁面建筑遗迹包括正壁上的六缝梁孔，两侧壁上的三椽架椽孔，檐椽下的枋孔和斗拱遗迹，以及两侧壁中部的三缝梁孔，挑承悬山屋顶的脊椽槽和山面设墙的构造痕迹；完整表现出了一座七开间正殿与两侧各三开间配殿的窟前寺院布局。奉先寺补凿龕同龕前建筑的共时关系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两斩山侧壁前部的补凿龕虽杂乱分布，却顺配殿山面排列。其二，以建筑山面为界限，其两侧补凿龕的形式截然不同，位于建筑内的龕像均为浅龕立像形式，而建筑外的龕像则都是深龕或者深窟的形式，明显是有防风避雨的考虑。其三，龙门石窟在高出开凿的窟龕普遍是先在下方凿出龕孔、铺设木板，以搭建工作平台，然后再进行开凿。但奉先寺造像间的补凿龕下方却并不见这类痕迹，加之这些龕均为浅龕，不可能以窟室地面为工作面，因此它们只可能是在营建窟前建筑时因凭室内脚手架同期开凿的。相应地，位于室外高处的补凿龕周边则可以看到龕孔的分布。这些都说明，奉先寺玄宗时期的补凿龕与其窟前建筑是一体营造的，二者可以视为一项系统工程。

这意味着大卢舍那像龕在景观上的巨大转变，其始建时，即高宗、武则天时期，这是一个开放空间，人们在河道行船或在两岸时都可以遥望或礼拜大像。但到玄宗

时期，窟前寺院建成，大像被屋檐遮覆，人们只有进入寺院空间内才能实现礼拜，大卢舍那像龕的影响范围因而也被缩小、限制在奉先寺内部。这一变化可能与唐玄宗时期诸多意在消除武则天政治影响的政策相关，如在诏敕中隐去武周时期，又如变谥号、改明堂、毁天枢等。因此，在宏观历史语境中，以大卢舍那像龕营建窟前寺院为代表的整个龙门景观在玄宗时期的变化，或许同时是一种政治景观的转变。而立足于卢舍那大佛已成为龙门之象征的今天再回望这段历史，其社会文化内涵随历史变迁而不断变化的故事或许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持续思考的话题。

结语

最后，彭老师对本次讲座总结道：“我们从建筑的角度来考虑石窟寺，我觉得更好的一个词可能是营造。”他指出，从营造视角考察石窟寺，在形而下层面包含对洞窟形式的判定，和通过现存遗迹现象和空间关系对开凿过程展开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建筑空间结构关系，可以对洞窟内景及外部观感进行一定程度的复原，而这些又同洞窟功能紧密相关，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石窟寺建筑与社会群体互动关系的演变历程，并揭示出石窟群整体景观的历时性变化。

唐代诗人杜甫曾来过龙门，留下了“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的诗句，韦应物也曾为龙门写下：“精舍绕层阿，千龕邻峭壁”。营造视角下的石窟寺建筑研究应当能帮助我们推想和复原这样的

诗文场景，让我们得以不断靠近中古时期人们眼中的龙门气象。

评议环节

郑岩老师首先以“体大思精”概括了此次讲座带给他的感受，他认为彭老师的研究既具备宏观视野，在技术层面上的处理也很精妙，而这些内容未来在各个学科都有可发展之处。郑老师谈到了本次讲座中许多极具启发性的闪光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彭老师站在学术史的角度提醒了我们一件几乎被现代学者们遗忘的事，其实不仅是营造学社各位前辈，如上世纪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在中国史学的宏观语境下关注着中国美术史、建筑史，可以说整体观和系统构想是那一代学者研究视角的共性，也是值得学科分化体系下的我们努力的方向。从考古学的角度看，郑老师认为彭老师从环境、技术、营造过程等诸方面再谈年代学问题，能极大地丰富我们对年代关系的认识，使之不仅是地层学意义上的叠压打破关系，而且揭示出可能存在的共时或共存关系，从而在分期问题的有关讨论中引入了更立体丰富的历史过程。从艺术史角度出发，郑老师还指出彭老师的空间生成视角对美术史研究极具借鉴价值，对一件美术作品而言，其形成也应当有起始、中辍、完成、使用、改造等若干时间点，而彭老师通过对奉先寺窟前建筑研究复原出的大卢舍那像龕历史景观变化实际上也是对龙门石窟这一整体景观作品的生成在进行讨论，那么不止是龙门，历史上其实有许多经长时段完成的作品，如



奉先寺

乐山大佛，如科隆大教堂，在政权更迭之间它们的面貌都在持续发生着变化，而这些都是值得各学科领域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此外，郑老师谈到，彭老师对万佛洞的研究揭示出的皇家工程允许平民适度参与的历史事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社会似乎通过石窟营造活动将各个社会阶层凝聚了起来，而这在社会史视角下将是一个极具价值的线索。

接下来，郑老师则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方面，可以再对营造视角下的石窟寺建筑研究方法论进行提炼，概括出其中的“小过程和大过程”，前者如一尊造像、一座洞窟、一个时代内的时空关系，后者则可以放眼整个龙门石窟探讨其大的发展阶段，乃至中国石窟寺建筑谱系的演变脉络，如从龙门到云冈、从北魏到唐的继承关系等。另一方面，针对彭老师提到的石窟寺仿木构窟檐建筑减退及木构窟檐建筑增益的历史趋势，郑老师认为这个发展似乎既不是进化的，也不是退化的，而是一种概念的转变，是一个起起伏伏的复杂过程；而这种建筑语言的增减问题及其背后建筑空间意向的变化或许还应与材料、技术、观念、



龙门石窟

仪式、宗教义理等的关系一并考虑，以更好地解决长时段、大过程的研究问题，而这也将带来方法论的重要进步。

而围绕此次讲座，郑老师还提出了卢舍那大像的观看问题。彭老师对此的回答是，卢舍那大像龕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大龕，其窟龕形式已经昭示了要使大像佛光普照，使人们可以遥拜的设计意图。而这种观看意图其实是与云冈一期洞窟一脉相承的，尽管这些窟室都有前壁，但从明窗、窟门的开凿来看，当时保留前壁主要是出于结构的考虑，否则大窟上部崖面极易坍塌；从视点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发现，云冈早期洞窟窟内其实除大像外并没有空间设计，近距离的观感反而并不协调，这就说明其真正的视觉功能主要是通过云冈河道上礼拜实现的。因此，这种“为帝王立佛”的概念从北魏开始再到奉先寺，有一定的相关性，奉先寺的露天观看更可能是一种概念上的延伸。

徐怡涛老师认为，彭老师对石窟寺的

研究非常深入全面，从建筑营造入手，结合历史、宗教等各方面信息及考古学研究方法，很好地综合了文物建筑与佛教考古两个学科——一方面将对建筑外观的认识和关注发展为整体建筑观，从工程视角转变为历史视角，另一方面也将佛教考古中的断代问题做得更加精细深入，因此能够形成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

徐老师也围绕本次讲座谈到了一些他的观点。首先，唐高宗和武则天对大卢舍那像的选址可能不仅是出于利用早期斩山减少工程量的考虑，从建筑方位来看，祭天建筑往往位于城市南侧，因此将大像置于龙门南端或许也具有这方面的象征意义。而唐玄宗时期对奉先寺的改造也值得寻味。如是用技术和新的营造，而不是用暴力灭佛手段来实现意图转变的目的，是一种遮掩却不毁掉的委婉做法，其实非常符合当时在处理武则天的问题上都较为谨慎的政治氛围。其次，徐老师也谈到了“石窟寺仿木构元素逆向化”的问题，他认为龙门

本身仿木构元素少于同时代石窟寺建筑有可能也是因为，石窟寺与地面寺院的关系在龙门有了一种新的呈现，它的地面寺院多于云冈，从雕凿规模和技艺来看则又似乎逊于云冈的皇家寺院，那么就存在一种

可能是当时更多的人、财、物力被投入到地面寺院中，石作工程整体也就因之变得更为简练。

（撰稿：王凤歌）

80

施越 | 俄国对中亚草原的征服与现代中亚的形成



2021年12月2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80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俄国对中亚草原的征服与现代中亚的形成”。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施越主讲，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袁剑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评议。

讲座首先从回顾沙俄征服中亚的传统叙事开始。捷连季耶夫于1906年出版的《征服中亚史》奠定了后世各方叙述这一历史进程的基调，即在议题上侧重于军事和外

交，在时段上侧重于19世纪后半期，在地域上侧重于中亚南部。此次报告继续探讨了沙俄征服这一议题，但将问题聚焦于如何理解19世纪沙俄征服对现代中亚的塑造作用。与此同时，施越老师从军事外交转向制度史和地方史，地域上从中亚南部回



施越老师主讲

归北部草原地区，旨在跳出过往研究范式，尝试同时展示征服进程中俄国自身的转变和对草原地区的影响。

施越老师将俄国对中亚草原的征服划分为三个时段：18世纪30年代为开端，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为“停滞时期”，19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征服草原地区。19世纪60年代至1917年间，草原地区为沙俄所统治。

就18世纪初俄国草原边疆的形成而言，两个历史事件使沙俄获得了介入草原地区政治的机遇。其一为1730年哈萨克小玉兹阿布勒海尔汗（Abulkhayir Khan）遣使会见安娜女皇，宣誓效忠以寻求沙俄的保护。这使沙俄当局看到了构建其东南边疆新战略布局的机遇。阿布勒海尔汗的臣属为沙俄介入草原西路的地区政治以及后续干预小玉兹内政提供了合法性。其二是



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 (M. M. Speranskii)

阿布勒海尔汗邀请沙俄修筑要塞的提议和由此衍生的1734年“奥伦堡远征”。以奥伦堡要塞为基础，俄军沿乌拉尔河构筑要塞线，以武力和物质利益使这一地区的乌拉尔哥萨克、巴什基尔、卡尔梅克和哈萨克小玉兹等势力相互牵制，避免其形成合力，进而威胁欧俄核心地区。而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要塞线也将成为俄国进一步征服和统治草原地区的基地。

如上所述，尽管前人学者一般将沙俄征服草原地区的开端定于18世纪30年代，但实际上俄军大举兼并草原地区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为何中间存在近一个世纪的“停滞”？从前人研究出发，大致可以得出三类解释：一是从本地人群视角出发的解释，即草原游牧集团的“多元外交”，主要指的是中玉兹和小玉兹会各自联络希瓦、波斯、布哈拉、浩罕、清朝等周边力量，避免形成对沙俄的过度依赖；二是从本地自然环境视角出发的解释，即草原和荒漠环境对后勤补给造成的困难；三是着眼于沙俄战略方向的解释，即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初，沙俄始终以东欧和黑海沿岸作为主要的战略方向。

近期全球史的研究为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约翰·达尔文在《帖木儿之后》一书中提出18世纪后半期“欧亚革命”的概念。他强调，“欧亚革命”实际上是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领域的革命。在地缘政治领域，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之后的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将整个欧洲的权力格局洗牌，此前法国精心维系的大西洋、欧陆和近东的均势格局被彻底打破。沙俄迅速吞并波兰和

奥斯曼领土，将其西部边界扩展到中欧和巴尔干；1815年“五强共治”的机制形成后，沙俄在亚洲的扩张并无其他列强掣肘，而且一定程度上与英国在南亚的扩张形成竞争和模仿。就经济层面的变革而言，第一次工业革命、欧陆战争以及全球化的贸易活动共同促成了达尔文所谓“军事—财政国家”的形成，即国家、资本和工业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军事技术和战术在战争刺激之下迅速迭代。19世纪中期欧洲军事技术和交通、通讯技术的新成果很快应用到沙俄对中亚的征服和统治中。而政治经济层面的剧烈变动自然也促成文化层面的变迁。以商业、理性和文明等概念为中心的各类学说逐渐支撑起“欧洲人”的共同身份和所谓“文明使命”的普遍信念。值得注意的是，参加19世纪中期征服草原重要战役决策的沙俄高层和前线军官大多经历过拿破仑战争。他们以欧洲强国的身份为荣，大多默许前线军官向前推进的冒险行为，也往往难以容忍俄军在“亚洲人”面前的军事失败。这三方面共同构成的“欧亚革命”在不同维度上促成了沙俄对中亚草原的征服。

随后，施越老师讨论了1822年《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下文简称“1822年条例”）与草原管理体制的创制。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政治家斯佩兰斯基（M. M. Speranskii）推动颁布和落实1822年条例标志着沙俄重新开启了在草原地区扩张的脚步。这一条例适用的地理空间是距离欧俄核心区更为遥远，但水土条件相对优越的草原东路。1822年7月22日，沙皇谕令正式颁布《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单

方面规定草原地区中玉兹牧地的管理体制。该条例共计十章319条，旨在以沙俄要塞军力为后盾，以草场划分和边界管控分隔各游牧部落，以沙俄法律压缩传统游牧社会习惯法的适用范围，以商贸、文教和社会服务吸引游牧人弃牧从农，消解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所蕴含的军事潜能。在部分认可并吸纳草原游牧政治和社会传统的基础上，该条例为沙俄深度介入和改造游牧社会提供了一套系统方案，并为后续逐步控制整个草原地区，以及在中亚南部的农耕区大规模用兵奠定了政治和军事基础。

继1822年条例后，1865年，俄国军事改革的发起者、时任陆军部长米留金（D. A. Miliutin）推动成立跨部门机构“草原委员会”，在调研哈萨克草原东西两路自然地理、居民生产方式、生活习惯、风俗信仰和现行统治制度的基础上，起草新的管理条例。值得注意的是，草原委员会的成员中并无外交部的代表，而19世纪中期以前，草原西路长期由外交部和奥伦堡省督军双重管理。由此可见，自草原委员会组建开始，沙俄已不再将哈萨克草原视为“域外”，而将其作为内部边疆地区。草原委员会所起草的1868年《草原地区临时管理条例》（下文简称“1868年临时条例”）旨在促进游牧民与俄罗斯人“接近”（sblizhenie），促使哈萨克人“公民性”（grazhdanstvennost'）的增长，推动哈萨克人适应“文明秩序”。这一目标充分体现了19世纪中期欧洲流行的“文明论”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俄国军政精英在版图扩张问题上对这一“帝国理由”

的灵活运用。

至此,从中亚历史的宏观角度来观察,18世纪初沙俄军政官员所关切的草原游牧民的军事威胁已不复存在:自1847年肯尼萨尔起义失败之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草原地区未出现全局性的反抗运动。从社会经济角度观察,尽管在19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1868年临时条例涉及社会经济问题的条款尚未完全落实,但“游牧民占据土地被视为国有”及其他土地利用政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挥了作用,成为草原各省当局剥夺游牧民土地并分配给新移民的法律依据。从当代哈萨克斯坦角度回溯19世纪历史,1868年临时条例不仅首次统一了草原东西两路的行政和司法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作为统一制度空间的“哈萨克草原”概念,为20世纪初将这一空间被改造为单一政治单元奠定了制度和观念基础。

施越老师最后总结了俄国征服对于现代中亚的形成的四点影响。一是现代边界的形成,这一点是沙俄征服带来的最直观的影响。在开始征服之前,18世纪中期构筑的要塞线成为当代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的陆上边界的雏形。19世纪中期沙俄入侵隶属于清朝的巴尔喀什湖东南部地区,后来以19世纪后半期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清俄边界走向,初步塑造了我国与现代中亚国家的边界。除了外部边界以外,内部各级行政和司法边界促使游牧民逐渐转向定居或半定居生产;而统一的制度边界为后续欧俄资本和移民的大规模流入创造了条件。二是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建立。三是游牧社会的定居化,沙俄征服带来内



约翰·达尔文著《帖木儿之后》书影

外边界和新管理体制叠加19世纪后半期的交通、通讯技术革新,以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移民政策,将中亚地区更为深刻地卷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使这一地区民众的生产形态从自然经济转入商品经济,社会组织形态从以血缘到以地缘为纽带。四是现代政治社会观念的传播,以定居秩序为基础的现代国家观念、欧洲中心观、启蒙思潮和反封建的革新思想均逐渐进入中亚社会。

评议阶段,罗新老师肯定了施越老师本项研究的两点突破。一方面,在研究视阈上,前人关于沙俄征服中亚的研究较多集中在绿洲地区,即浩罕汗国、希瓦汗国和布哈拉埃米尔国,着眼游牧民族的研究也多关注土库曼,甚至在捷连季耶夫所著的《中亚征服史》中关于沙俄征服草原地区也未见系统化的论述。施越老师的研究

深挖线索,第一次对此作出整理,同时侧重于制度和观念的思想层面。研究以1822年和1868年条例为中心展开,前者带有理想色彩,并未立即实行,但对后续草原管理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者是沙俄在全面实践后形成的更符合时代形式的章程,提供了理解沙俄在进入绿洲地区前,于草原地带的扩张、征服、统治的制度线索。俄国和其他老牌殖民帝国不同,其殖民地与本土相连,殖民扩张在制度和理念层面上更接近于扩展自己的国土,而非像西方帝国一样在海外建立殖民地。此外,俄国统治殖民地的时间较其他帝国也长得多,即使在20世纪后半叶全球去殖民化浪潮下,中亚地区的境遇也未发生改变。这也是沙俄统治值得研究的一点。

另一方面,施越老师本项研究在深入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极高的细度,分阶段、分层次讨论了沙俄在草原地区的统治,涉及到法律、行政,甚至是思想观念诸多层面,这也为施越老师自身的学术关切,即古代扩张中对于异文化人群的统治提供了新的启示,如探讨不同阶段的殖民统治所考虑的不同问题。当然,这与其所处的经济形势、具备的政治和技术条件有关。沙俄对于中亚的直接统治和定居化管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全球贸易网络形成、新的作物品种输入的大背景下实现的。俄国人对其在草原和绿洲的扩张的官方定调是“将文明带给野蛮人”。诚然,以进步史观的视角叙述,沙俄对中亚的统治的确废止了奴隶制,并为其带去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因此,进步史观一方面认为沙俄入侵之举为扩张征服,但同时也承认其将中亚地区纳入了

现代文明。总而言之,施越老师此项研究所做的如此细度的工作构成了研究中亚史的基础,这将是更好地理解被征服者如何处在现实的行政实践中。

针对罗新老师就研究计划的提问,施越老师回应道,中亚草原地区和绿洲地区的传统差别较大,包括史料所涉语言文字种类、周边区域状况以及相应的核心研究议题等。例如,研究中亚南部地区的近代历史需掌握同时期英国和英殖印度的视角以及伊朗和阿富汗等周边地区的形势。相比之下,对这一时期草原地区历史的研究则主要涉及俄国,故在掌握俄文史料阅读技能的条件下便可展开较为深入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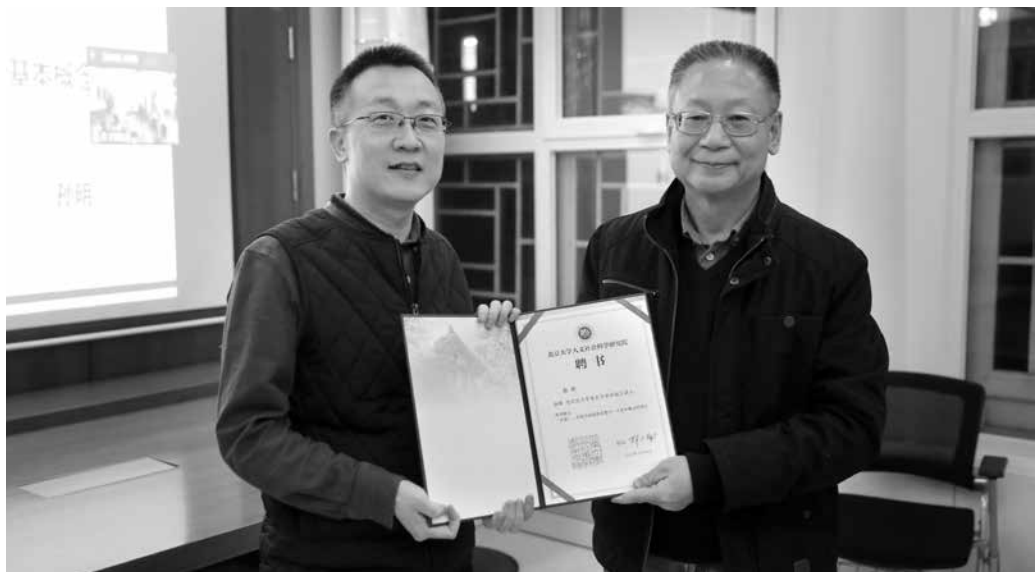
提问环节,围绕草原地区伊斯兰教信仰状况、哥萨克在沙俄征服中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等问题,施越老师逐一进行了解答。施越老师补充道,当前学界对于游牧民族宗教信仰是否虔诚这一问题存在争议,这牵涉到历史书写的主体性,即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信仰状况往往由定居地区的他者书写,而书写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代入定居人群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草原地区人群往往践行本地化的信仰仪式,因此从当代人类学的视角思考上述问题或许会得出更为贴近现实的答案。

(撰稿:马萍)



81

孙明 | “法意”：传统中国制度思想中一个基本概念的演生



孙明老师（左）手持聘书

2021年12月9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81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法意’——传统中国制度思想中一个基本概念的演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孙明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评议。因讲座所涉内容尚未发表，下文仅以提要形式展示。

“法意”是传统中国制度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经过魏晋隋唐玄学与佛学的

阐发提升，“法”“意”互缘，中国本有之“意”的概念形上化而获得主体地位，“法”成为更具弹性的规则概念，要通过“法意”来实现其规范意义。这一哲学发展经由宋代治道“向上提”而进入政治制度场域。在宋人的“法意”论说中，治道与制度义理化，形成了以意驭法、于法求意的制度思维与实践逻辑。“法意”思想是宋人规复三代之法、变法、遵循祖宗之法等一系列制度损益的思想基盘，也形塑了中国制度之“活法”的特点。近代变革中，“法意”成为接引西法的思想桥梁。

82

陈一峰 | 国际劳工组织、治外法权与民国劳工保护

2021年12月17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82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国际劳工组织、治外法权与民国劳工保护”，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一峰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爱玉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闻翔评议。

讲座伊始，陈一峰老师介绍说，劳工保护是20世纪构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治理话语，也是中国革命、反抗帝国主义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课题，他将从历史和政治学的角度重新解读民国时期的劳工立法及其实施。报告主要围绕1923年北洋政府《暂行工厂通则》出台的台前幕后和1929年《工厂法》的实施两个案例展开，

将相关各方的互动和背后的利益关系进行了梳理，把劳工问题和外交与治外法权进行关联，将民国时期劳工政治放在了国际政治的视野中理解。报告以域外法权作为切入点，指出民国时期劳工问题是中国和西方国家争夺管制权的竞争场域，劳工立

法是中国政府对抗帝国主义的重要策略。

学界通常认为，民国时期劳工立法只是肤浅地移植了西方法律，脱离了社会现实。这也是民国时期劳动法学者孙绍康和社会学家陈达等人对当时劳工立法的重要批评。而陈一峰老师则提出，民国劳工立法的重要目的是通过借用劳工保护来限制列强的治外法权，试图将中国政府的劳工法律在外国租界推行。移植国际标准主要是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示文明的国际形象、提高国际地位；而借力国际劳工组织则主要是为了在与列强竞争劳工管制权的时候增强话语权。在欧洲国际法扩张过程中，国际劳工霸权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叙事的特点。而报告特别强调中国并非机械地接受欧洲话语，民国时期中国政府策略性地利



陈一峰副教授

用国际劳工组织的普遍主义话语，来对抗上海公共租界的治外法权。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国际劳工组织在中国的历史研究较少，探讨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国际劳工组织在亚洲的历史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中国融入和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具有参考价值。

陈一峰老师首先讲述了北洋政府农工商部于1923年3月29日制定《暂行工厂通则》这一案例。国际劳工组织认为，《暂行工厂通则》的制定，体现了国际劳工组织活动在中国发挥的积极影响，是对1919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有关中国劳工保护建议的积极回应。但陈一峰老师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指出，1923年《暂行工厂通则》的制定实质上是中国和外国租界争夺劳工管制权的产物。

《暂行工厂通则》的起因是租界童工问题。1922年，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建议，主张公共租界应处理童工问题。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联系上海总商会，商讨禁止童工事宜。为了避免上海公共租界别订章程、自行立法，上海总商会则电报立法院、内政部和农工商部，敦促其尽快立法。在总商会敦促之下，北洋政府农工商部不待立法会通过，以部会命令的形式颁布《暂行工厂通则》，规定包括租界内外国工厂在内的全国工厂均应适用该条例。1923年6月，公共租界工部局宣布成立童工委员会处理童工问题。1924年7月，童工委员会向工部局提交报告，建议工部局通过附律（by-law）形式将童工问题纳入工部局管辖范围之内。工部局采纳了该建议，但是在中国各商会团体和社

会组织的抗议之下，附律草案最终未获多数票而不得不搁置。

陈一峰老师指出，1923年《暂行工厂通则》的通过，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上海公共租界试图扩张对劳工问题管辖权的尝试。虽然《暂行条例》在实际中实施程度很低，但其影响不在于其实施，而在于对中国立法主权和劳工管制权的申张，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中国劳工法适用于租界内工厂的立场。

第二个案例是1929年《工厂法》的制定与实施。1929年《工厂法》大量采取国际标准，但却引起广泛质疑。质疑者认为该法的规定和实际工业状况距离过大，严重影响了该法的可施行性。陈达教授的社会调查支持了这一观点，并提出了一系列修法意见。国民党政府最终决定将该法的施行推迟到1931年。

《工厂法》实施中的核心争议是管辖权问题，即该法可否在公共租界内实施。中方主张，治外法权是属人的，并不及于工厂，工厂的劳工保护更是属于人道事项，不在治外法权的范围内。中方希望通过《工厂法》进一步强化主权，对抗治外法权。而公共租界则以“行政统一性”为由，拒绝中国的工厂检查员在租界内进行工厂检查。

为应对公共租界的主张，中国政府策略性地寻求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技术援助”。1931年，时任实业部长孔祥熙去信国际劳工局局长阿尔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希望其遣专家委员会来华调查和协助解决技术困难。托马斯出于希望扩大国际劳工组织在中国影响力之考虑，委

派阿德莱德·安德森（Adelaide Anderson）和卡米尔·波恩（Camille Pone）来华提供技术援助。托马斯局长认为，虽然中国的请求存在政治因素，但国际劳工组织将仅帮助中国建立工厂检查制度和实施劳工立法，而不涉及治外法权，从而将其处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安德森和伯恩来沪与公共租界工部局、法国总领事等进行会谈并达成初步协议，由中国政府安排统一实施工厂检查。但很快，公共租界转变立场，主张租界内的工厂只能由工部局职员进行工厂检查。

此后，公共租界采取了单方面行动，于1933年通过第34号附律赋予自己劳工检查权，并对工厂的设立规定了许可制度。中国政府与公共租界在1935年最终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但是该方案遭到西方驻华使团的否决，中国政府最终未能获得对外国工厂的检查权。此后公共租界对工厂的检查基本由辛德领导的工业社会委员会（industrial social committee）展开。陈一峰老师指出，《工厂法》的实施基本都是在围绕治外法权展开讨论。《工厂法》的实施程度非常有限，基本上是纸面上的文件，但是该法的制定及其实施为中国政府反对治外法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个案例是中国对国际劳工大会的参与。中国于1929年首次派出完整代表团参与国际劳工大会，提出的第一个议案就是希望外国人在华工厂遵从中国政府所施行之劳动法。由于英、美、日本等国的抵制，大会没有达到法定人数，因此议案未通过。1933年，中国再次参与提出类似议题，但仍未获通过。



1937年时，中国政府代表提案，要求统一保护中国工人，要求企业无论是否在外国租界或享有治外法权，都应当遵守中国的劳工法律。中国政府代表一再强调该议案的技术性质。这一决议在比利时、日本、瑞典等国工人代表的支持之下，最终以103票赞成、0票反对获得通过。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议题上取得成功。

陈一峰老师指出，中国试图通过国际劳工大会等场合赢取国际社会的谅解和支持，利用国际机构为反抗殖民主义获得正当性。中国政府的做法在国际劳工大会内部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对于实际瓦解殖民主义统治效果仍然有限。

同时，中国对国际劳工公约的参与是具有策略性的。在1934年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前后，中国批准了一系列公约，

其原因在于中国需要通过批准劳工公约显示其参与国际劳工组织工作的诚意，表明中国社会正迈向西方工业文明，能够有效参与西方劳工话语。中国参加劳工公约并非出于本国经济或社会的考量，更多是出于融入和参与国际社会的需要。

最后，陈一峰老师作出了三点总结。首先，民国时期的劳工立法并非纯粹是一个劳工保护或者人道主义事项，更是重要的政治和外交议题。劳工问题上的竞争关系不仅涉及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在劳工保护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也涉及到了国际劳工组织和第三国际等国际维度在中国劳工问题上的展开。同时，它也生动展现了中国如何利用劳工话语反对治外法权、强

化劳工主权的政治和外交努力。其次，国际劳工组织对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虽然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在中国的实施确实有限，但国际劳工组织及其工作对中国在劳工保护的知识论和路径选择方面，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中国早期的工厂立法以及劳工标准的设定，都表明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影响。

再次，国际劳工组织在中国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国际劳工组织可以是欧洲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提高劳工条件的有效途径。另外一方面，中国也策略性地借用国际劳工组织的普遍性话语对抗殖民主义和治外法权。它为中国对抗殖民主义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政治空间。《暂行工厂通则》的制定、《工厂法》的管辖权之争以及中国在国际劳工大会的提案等，都体现出了中国对国际劳工组织的创造性利用。但是，这一政治空间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国际组织的权力在对抗帝国主义霸权上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有限。国际劳工组织的治理方法是一种社会改良路径，但产业工人在民国社会占劳动者总数的比重很低，大量劳动者被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这也预示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评议阶段，闻翔老师首先对讲座进行评议，他认为陈一峰老师的研究最具新意之处在于将劳工问题与治外法权关联在一起，从而将民国时期的劳工立法放在一个国际政治的视野中来考察。在此基础上，闻翔老师提出了四点讨论：第一，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例如陈达教授和史国衡教授，主要是从两方面对当时的劳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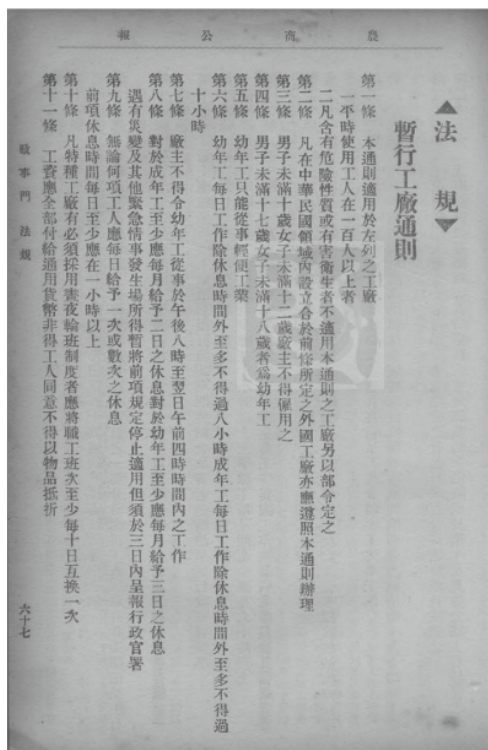
立法进行考察：一是在立法原则上主张法律应与民情相匹配；二是指出需要对法律能否施行进行经验调查。闻翔老师认为当时的社会学家对民情的关注是出于对民国的失望和祛魅的心态，因此较之于形式制度和政治博弈，更关注法律实施的社会后果。第二，劳动法的政治性不仅体现在其成为跨国角力的一个场域，还体现在劳工作为新型社会阶级所具有的强烈象征性意义上。中国产业工人人数飞速增长，并具备强烈的政治能量。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也因此提出了“劳工神圣”这一看法。工人阶级成为了各社会力量希望召唤、动员和改造的对象，成为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之一。劳工立法意味着政府试图将工人这一新型社会阶级纳入国家治理轨道，以立法构建现代化劳工秩序。劳工问题的政治化具有复杂多元的面向。

第三，在本次讲座涉及三个案例中，与国际劳工组织相比，更加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似乎是政府。因此，如何从理论层面来定位国际劳工组织的角色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第四，民国时期的劳工立法存在资本积累与合法性之间的矛盾。《工厂法》具有强烈的移植色彩，过于理想化而难以落实。南开大学经济学家方显廷在其调查中看到，《工厂法》第13条关于女工不得在午后十时至翌晨六时之间工作的规定将会导致30%左右的女工由于取消夜班而被解雇。该规定原本是为了进行劳工权益保护，但企业经营之需求将会导致该法在落实过程中产生工人失业问题。一方面企业经营需要利润，这体现出资本积累之需；另一方面劳工权益保护又是国家政权合法

性的来源，劳动法需要在积累与合法性之间寻求平衡。

提问环节，陈一峰老师对《工厂法》制定中的社会过程研究、苏区劳动立法、女性在劳工立法中的作用、劳工保护与国际政治等问题都做出了回应。陈一峰老师总结道，中国的劳工保护与全球市场的联系越来越深入。国际劳工标准、国际贸易标准、全球供应链体系都深刻影响着全球分配制度，对中国劳工保护有着重要意义。在全球化条件下理解中国工人保护机制，不仅需要了解国内劳动法，也需要深刻地理解全球政治经济秩序。

（撰稿：郭笑多）



《暂行工厂通则》，1923年发布



(三) 北大文研论坛

151

李庆新、孙键 | 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对话



海上丝绸之路路线上的沉船示意图 (中国)

2021年11月28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51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对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庆新、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孙键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前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纯艳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李庆新老师以南海海丝考古为中心发表学术演讲。李老师首先指出，历史学与考古学是“一家人、亲兄弟”，彼此都以实证为基本方法，靠史料说话，并且目的一致，即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与轨迹，殊途同归。随后李老师由三方面介绍海丝考古相关问题。

一、海丝时间史。在海丝“史前史”方面，人类早期海上交流史成果，几乎是考古学的“功劳”，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史前史”非考古学不能为。考古发现与文化遗存证明，早在数千年前，人类就以

海洋为纽带，通过海洋进行远洋的文明交流，而且一直延续到公元一世纪前后“海丝”出现，人类早期海上交往历史或许可以称为海丝“史前史”。关于海丝具体时间和断代，李老师以勿里洞沉船之“宝历二年”（826年）长沙窑碗、井里汶沉船之“戊辰”（南汉大宝十一年，北宋开宝元年，968年）越窑刻花莲瓣碗等为例，指出前者为9世纪上半叶唐敬宗时代的阿拉伯沉船，后者为五代南汉后主末年从兴王府（广州）归航的东南亚商船，这两艘沉船发现对研究晚唐和南汉末年中国与亚洲海洋贸易均具有重要意义。海洋考古发现遗物上的任何一件器物都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蕴藏特殊的历史信息，确定了年代，就可以通过时间标记观察器物所处的时代，进而达到证史、补史的作用，因而器物的时间断代非常重要。而关于具有特殊意义的海丝时间或概念，如“亚洲地中海”（东方地中海）、“东方大航海时代”、“广州时代”（唐宋、明清）、“泉州时代”（宋元）、中国瓷器外销的“明代空白期”（Ming Gap）等，考古学研究都是当仁不让的“主力”，结合历史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多重证据”互相参证，对相关历史进行综合考究和整体考察。

二、海丝空间史。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史主要包括三方面内涵。其一为海丝/海洋知识空间，如南越国官署遗址发现木简书写的“南海”、“番禺”等词，显示秦、南越国前期（即赵佗时期）对南海已有认识，秦置“南海郡”也体现了海疆治理的概念。马王堆汉墓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首次将珠江水系和南海绘入图中，表明西汉对南海、

珠江口湾区已有较确切的认识。宋以后一些舆地石刻将南海绘入图中，也表现了与海丝密切相关的海洋意识、海洋观念与海洋知识的不断演变与增进过程。其二为海丝特殊地理空间，通过对公元一世纪前后数百年东亚海域各港口与聚落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结合历史文献、图像等资料，可以串联起海上丝绸之路初兴期东亚的港口与航路体系。如泰国南部的三乔山（Khao Sam Kaeo）海港遗址出土众多遗物，年代属于前五世纪末至公元二世纪，其究竟是大都会式的港口城市，或是南海上的一个城邦国家，还值得继续探究，但是由此可以确定它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史居于前列的重要港口。此后中国番禺、徐闻、合浦、越南南部Oc Eo等海港遗址考古发现，也显示了各自在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三为海丝特殊航段或区间。目前东亚海域发现的古代沉船大多处在古代海上交通的主要航线和贸易区域，例如南海北部华南沿海海域，西部中南半岛海域，泰国暹罗湾，南部马来半岛-加里曼丹海域，马六甲海峡-印尼爪哇海域，菲律宾西海域，其中包括屡见于中国文献记载的七洲洋、交趾洋、昆仑洋等处。这些贸易繁剧的特殊航段或区间也是海难频发的场域，成为今天沉船考古的重点区域。通过上述港口、沉船等考古发现梳理与排比，结合历史学研究，可以发现湾区、半岛、海峡、岛屿等地理空间对海丝发展的重要性，这些小微地理空间大多处在交通要冲或兼备多样性，是海丝发展、海洋活动的重点区域/海域，重要节点，重要区段，北部湾、珠江口湾区、暹罗湾等具备多种有利的海



井里汶沉船上的爪哇风格金柄佩刀

洋地理形态，成为早期海丝发展的重要地理空间。此外，随着航海技术与能力提高，交通航线的改变，上述海洋空间在海丝史上的重要性也是变动的，出现地位上升、下降、旁落、衰微等情况。

三、海丝专题史。一船一世界，一艘船就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海洋考古发现为海上丝路研究提供难得的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实物资料，由此能够衍生对涉海人群、制度与政策、航运与造船、经济与社会、生活与信仰，以及地理、气象、环境、技术、物种等相关问题的延伸探讨。而海洋考古对思考与海丝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理论与体系建构，同样能够提供重要支撑。如泰国湾沉船、勿里洞沉船、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南海1号沉船等考古发现，不仅可以补充8-13世纪东西方海洋交往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史，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改写唐宋社会经济史的若干重大内容。现有沉船考古及相关研究显示，唐宋之间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市场“无形之手”，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与海外市场消费互相联

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历时数百年的深刻社会经济变迁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既有来自唐宋中国的内部力量与内在逻辑，同时也有来自海洋的外部力量的影响，内外关联、海陆互动，海洋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发展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海洋发展最值得骄傲的辉煌时期，看不到唐宋“大航海时代”，看不到“海上丝路”与“海洋中国”，那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此，从域外看中国，从海洋看陆地，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基本研究视角。

最后，围绕海丝研究的思考。李老师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史可以看作是一门专题的世界史，或专题的海洋史。历史学、考古学都大有作为，需要各展所长，互相补位。当前亟需以海洋史或海域史为本位，观察海陆互动的理念、全球史视野与区域史方法的结合，关注海丝的基本空间，按专题把研究做深做实做细，避免概念化和肤浅化，浮在上面。在史料上要讲求“多重证据法”，中外结合，注重挖掘涉海图像、海图（地图）、文艺作品与民间文献等。加强多学科交叉合作，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创新与学科发展。

孙键老师以“舟楫之利，以济不通”为题，探讨史学框架下的水下考古问题。孙老师首先强调水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或分支之一，是陆地考古向水下的

延伸；而考古学又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是历史学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延伸和拓展，阐明了三者间的关系。对水下考古而言，沉船是其重要考察对象。船舶是沟通联系的桥梁，沉船是海丝文化的载体，是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文化遗产，具有众多意义。如船舶制造通常是同时期人类文明所能达到高度的标尺之一；船舶深刻触及社会，是观察社会的一种方式；出水沉船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是研究船舶技术史的重要途径，能够弥补文献记载的缺陷，特别是古代科学的建造记录表述。因此在沉船考古视野下，我们也能观察各地交流与文明融合的种种情形。

随后，孙老师以不同时空的多艘沉船为例，详细介绍了沉船蕴含的众多历史信息。

其一为航行于东北亚的绥中元代沉船，船载大量瓷器多为元代磁州窑器物，也出现了铁锅、铁犁等铁器，应是在磁县就地装船，出海前往东北亚地区的一条商船。说明元代的商品流通业发达，磁州窑的生产技术、产品销售的辐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绥中沉船采用沿渤海西北岸近岸行驶，沿途多处停留，可见葫芦岛海域是环渤海地区古代航线的重要一环。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北方环渤海贸易体系亦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

其二为西沙沉船之珊瑚岛一号沉船与华光礁一号沉船，船载瓷器多为德化窑，应出自福建，并且船上发现了浮雕“八仙纹”石板与石像。以此结合东南亚等地现存宗教石板、石柱与石像依存可见，船员们

将本地信仰与宗族、宗教性质物品在新地区重新构建起来。

其三为“南澳一号”沉船，船体基本上按等距排列舱室，这种新的舱室布局方式与以前中国传统的舱室布局区别明显，或许参照了西方密肋的远洋风帆商船的设计理念。由此可见，“南澳一号”沉船紧密联系着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路，给东南亚地区经济带来重大影响，船体舱室布局的变化也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海外贸易环境。

其四为异地发掘的“南海一号”宋代沉船，船上出土的金箔（金叶子）有地理位置的标识，而铜钱则以货物形态出现，其中部分从临安流出，这与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密切相关。此外还出土了大量动物遗存，反映宋代海员在航海过程中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情况。植物方面则多为适于腌制的果品，是为远洋航海特意准备的。船载瓷器多为来自北方的耀州窑和定州窑产品，以及具有草原民族特色形制的陶瓷产品。船上也出土了一些小型造像，由此可以管窥航船的社会，以及海员们的文化与信仰。

其五为小白礁沉船，其结构工艺比同时期中国木船明显落后很多。由此延伸到传统造船术的式微与学习问题，孙老师强调，中国古代的传播图样通常只是采用标注文字和尺寸的示意性图样，而通过引进和学用西方的比例绘制工程图样、连接木构件、工具后的中国木帆船建造，在制作精度、质量、效率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极大促进了我国木船的建造水平。

综合上述个案考察，孙老师总结了当前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一些困难与缺陷。

一为全面摸清“家底”的困境；二为晚唐五代以前遗存的整体缺失问题；三为50米以深遗存的零发现问题。这既与当前潜水技术有关，又因与近岸相比，深水航行是相对安全的，故沉船相对较少。四为出航与回航的不对称，即目前发现的沉船大多是离开中国的，只有个别西沙北部礁盘周边存在向中国航行的沉船。并且对国外材料的掌握也并不全面。为此，应在遵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相关考古活动与研究工作。

围绕以上两位老师的主题发言，出席本论坛的其他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见解。汪前进老师由“多重证据法”与历史地理学中的“地理证据”入手，将古地图与考古、历史研究结合，图文并茂地探讨历史地理学对海丝与水下考古研究的重要性。历史与考古研究都需以地理证据为基础。地理证据包括两类：历史地理证据与现代地理证据。历史地理证据体现历史时期的地理状况与变化，是由古文献记录的、和通过现代科学手段研究出的历史地理证据组成。现代地理证据则是通过现代手段观察、统计、分析、研究所形成的能够反映历史时期的地理证据。两种地理证据均存在着以下富有张力而内在统一的特点：地域性与全球性；时段性与稳定性；客观性与主动性；联系性与孤立性；连续性与间断性；整体性与层次性；共同性与差异性等。故此，应注意选择、具体分析和巧妙使用，才能收到好的学术效果。

随后，汪老师分别举例，介绍多重证据对历史研究的不同作用与意义。首先由

现代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可以观察中国沿海的历史地理状况，尤其是海岸线的变迁。现代地理证据也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思路，如关于马可波罗在锡兰（斯里兰卡）周边的航线问题，由现代卫星地图与地理勘测可见，印度本土与斯里兰卡之间的海峡（保克海峡）中有许多小岛断续相连，平均水深仅2-3米，大中型船只难以通过，所以过去所绘的航行路线图直接从印度与斯里兰卡间的海峡穿过是需要斟酌的。至于古地图证据，近年来大量古地图被发掘和出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源。古地图作为图像资料，与文字材料提供的信息与解读方式不同。无论是中国或西方人绘制的中国古地图均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汪老师以近年发现的“塞尔登中国地图”为例，指出其将南海与东南亚全部绘出，是此前几乎未见的。中国的传统航海图多为“航线图”，本图则为重视整体情形的“海区图”，并且关注内陆情势。该图引用了中国的分野概念，欧洲人既不懂也反对这一概念，据此可知这幅地图应为中国人或海外华人所绘。这幅图上比较详细地画出了南海上的西、中、东三条航线，尤其是东面那条是首次见到且具有重要意义。汪老师认为，这条航线应是回航中国的路线，该航线的发现也涉及解释黄岩岛为何由中国人发现的问题。

黄纯艳老师从李老师和孙老师的发言出发，强调历史学与考古学互补的必要性。历史学与文献史料能够解决制度背景、社会经济背景（包括区域经济、贸易运行方式）等问题，同时需要辨析史料性质。考古学则能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特别是对民间

海上活动的记载，时间越往前，越是如此。可以解决文献缺载而难以解决的问题。此外，考古学也能揭示文献忽略的面相，水下考古呈现的是文物和船只，反映民间商业活动状况、贸易的兴与衰、政策的开放与封闭。真正从海洋的视角观察中国。如“南海一号”的考古工作者提出“聚落考古”的思路，对历史环境、海上生活进行综合研究。要让这些发掘的“静物”活起来，就需要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结合，甚至更多学科方法的运用。并且，水下考古能够解决技术方面的问题，采用最先进精确的测绘技术和各种现象、三维模型等数据采集模式，提取文物准确的三维坐标和数据模型。

黄老师继而以船舶大小、载重与铜钱使用两例阐释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的意义。在船舶大小方面，“南海一号”沉船作为孤例，难以判断其在宋朝船舶中的比较大，因此需要通过文献系统了解宋代造船业发展状况，但需要注意辨析史料的性质。由于宋代漕运以运粮为主，征税以力胜税为主，因而内河船以容积单位“料”计算大小，关注的是载货容积。海船则由于市舶征税以货物税为主，方式是比例税，故以梁宽（面阔）计算大小，关注的是航海能力与稳定性。但吴自牧在笔记《梦梁录》中按内河船习惯，以“料”描述海船大小，显然不能作为划分海船等级的标准。以此



南海I号的发掘现场

类推，《岭外代答》对木兰舟的描述、《萍洲可谈》关于海船“深阔各数十丈”的记载都不能作为准确的数据使用。可供参考的是宋朝官府征调和雇佣民间海船时的等级划分，再结合其他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南海一号”在宋代船舶中的规模。至于船舶载重情况，现有文献不足以提供梁宽与载重间的对应关系，由海船大小难以推测其载重量。但考古学技术可以对甲板以下保存完整的“南海一号”作出精确测量，大致推算其排水量。

而在铜钱方面，由沉船考古和陆地遗迹（窖藏等）可见，宋代铜钱在东亚和东南亚诸国广泛行用。并且文献记载比沉船和窖藏发现单次外流量要更大，足证文献记载不虚。但有关宋代铜钱“国际核算货币”特性的讨论，却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在宋钱行用的同时，各国都对铜钱采取允许流入而禁止流出的政策，不能自由流通；其二，铜钱的铸造与行用存在地区差异，如高丽未能广泛行用铜钱，东南亚的大宗

贸易则多用白银。因此，铜钱在一些场合，如宋朝的市舶贸易中作为计价货币，但难以成为支付手段，在其他地区也不一定是国际贸易的计价货币。并且当时的国际贸易主要是以物易物的形式，宋钱当然尚不能成为亚洲国际贸易中统一的核算标准或支付手段。如此种种讨论，都需要将历史和考古学综合考量检验。毫无疑问，只有将两个学科相结合，才能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新局面。

秦大树老师以考古视角切入，观察考古成果对推进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考古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取得新的研究成果，陆上陶瓷考古的成果使我们对陶瓷器物的生产时代、规模和特征不断取得新的、更准确的认识，不断向更准确阐释文物资料、给予物质材料更准确断代与定性的方向发展，由此会对历史学家提出随时关注考古进展的要求。秦老师随后结合以“明代间

隔期”问题为例，探讨历史结论与考古发现的互动与互进。布朗（Roxanna Maude Brown）博士曾提出“明代间隔期”（The Ming Gap）的概念，认为14世纪中后期中国出口瓷器极少，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东南亚沉船中几乎未见明代的青花瓷，15世纪中期前后中国瓷器在东南亚市场占比也由100%暴跌至1-5%。她认为这都是明初海禁政策所致。这是基于沉船情况统计的结论，但也有局限性。沉船作为“时间胶囊”，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瓷器输出的整体情况，沿海地区长期使用的遗址更能反映中国瓷器外销的面貌。随着龙泉窑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改变了龙泉窑瓷器均产于宋代或元代的看法。被认定为南宋和元代的海外龙泉窑瓷器中，有相当部分是明初所制。成功的识别出明初的龙泉窑瓷器，使我们看到，明早期中国瓷器输出的规模并不小，“间

隔期”的说法不准确。与该问题相关联的是，以往学界认为“郑和下西洋”活动并未带动大量海上贸易，是较单纯的外交和政治活动，现今在海外识别出大量明初龙泉窑瓷器，证明自元末至明宣德年间，中国的瓷器外贸始终处于高峰时期。至于此时未见青花瓷的疑问，秦老师指出，根据最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证明明初景德镇受战乱冲击，



塞尔登中国地图（局部）

生产能力大降，民窑的产品质量很差，不生产青花瓷。因此外销以龙泉窑为主，民窑在宣德末期到正统年间开始生产青花瓷，大量外销出现在弘治以后，而朝贡贸易的规模很少，自然不会有青花瓷被发现。布朗的结论是明朝的海禁政策极大地阻碍了商贸活动，但在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地区沿海遗址考古发现的资料可知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宣德末期到成化年间是中国海上贸易受海禁政策影响比较强烈的时期。这也需要历史学科进行更进一步的诠释。

此外，水下考古资料也对历史学界提出了完善已有结论、解释“新题”的要求。如此前学界根据文献资料，得出南宋政府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以补充财政所需、维持政府运行的结论。但海外发现的南宋早中期瓷器极少，因此海外贸易与政府财政需求之间或许并无直接关联。而从北宋中期直到南宋孝宗时期，海上贸易的规模都特别小，这是否与宋人追求风雅生活、忽视外贸有关？此外，还有一些由考古成果生发的问题，亟待学界予以解释。如从新判别出的大量明代早中期瓷器出发重新讨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在政治外交活动之外是否也具有拓展贸易的目的？在隆庆开关前的弘治与正德朝，为何出现了中国瓷器外销的一个小高峰？中国瓷器在奥斯曼帝国主导下的海上贸易体系中，如何通过东南亚向伊斯兰世界转运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定制瓷器，并且有相当数量被转运到欧洲？如此种种都需要考古与历史学科共同努力，将诠释历史资料和考古发现对应起来。

荣新江老师由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整体情况出发，指出目前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缺

陷与不足。当前，考古学不断发展，学科体系日趋完善，逐渐走向独立化。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而言，考古学资料也越来越重要。但历史学也不能完全让位于考古学，海丝研究仍应从历史学与文献史料出发，并在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的整体框架下开展研究工作。如冯承钧、向达等前辈学者治中西交通史时，都是西域与南海“两手一起抓”，整理了大量海内外传世史籍，奠定了研究基础。随后，荣老师结合自己在丹麦、德国等地寻访敦煌文书时发现汉文针录图等史料的经历，指出仍有众多中国海丝史料流散于外，应系统、全面地调查各近代殖民国家的图书馆，如穷尽敦煌文书一般搜集流散于外的海丝史料。

而在史料使用方面，当前中国学界的视野也具有局限性。域外文献在研究中外关系、海外贸易与补充中国史料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其中尤以波斯—阿拉伯文的文献为重，但中国历史学者对发掘、翻译域外文献的投入显然不足。尽管前辈学者做了不少发掘海外资料、翻译如《道里邦国志》、《世界境域志》等经典域外名著的工作，但这显然已不能满足当下的研究需求。因此，与考古学、古地图学者相比，专事历史学的海丝学者在史料运用上是极为有限的，制约了研究视野。此外，海内外金石材料与中国腹地地区的文献也亟待发掘。关于海外的金石材料，沙畹（Edouard Chavanne）在百余年前曾探究印度的中古时期汉文碑铭，但显然尚存有较大研究空间。中国内地的海丝材料以陕西泾阳发现之《杨良瑶神道碑》为代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各地方志、家谱等材料中，仍有不少值得关注的海丝史料。

最后荣老师总结道，随着“一带一路”成为热门研究领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探讨也日趋学术化。中国学者需要改变传统观念，将研究视野由陆上农业国家转变为海洋国家，以海洋为中心视角展开论述，并以海洋国家意识支持相关海外典籍的翻译与研究。

最后，李伯重老师为本次论坛作结。强调在“多重证据法”的指导下，尽管文字材料有时是残缺、错误的，但仍应将域内与域外文献作为整体历史背景的参考。

此外，汉文与伊斯兰世界的史料文献都是亟待开发的宝库，使其与考古发现结合，能够相得益彰，得到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结论。为此，大学历史系需要培养更多研读域外文献、投身水下考古的学生，将语言、历史与考古相联系，整合各方力量，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各项研究。

(撰稿：徐伟喆)

152-1 经崇仪、韦陀、孙志军 | 观象敦煌：“罗氏档案”中的莫高窟与榆林窟照片

2021年11月30日晚，“观象敦煌：‘罗氏档案’中的莫高窟与榆林窟照片”系列论坛第一场、“北大文研论坛”第152期在线举行，主题为“敦煌‘罗氏档案’的整理与使用”。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经崇仪（Dora C. Y. Ching），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荣休教授韦陀（Roderick Whitfield），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孙志军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刘晨主持。本场论坛为“敦煌学”系列活动之一。

论坛伊始，“观象敦煌”丛书总编辑经崇仪老师介绍了“罗氏档案”的基本情况，

以及如何将其运用于多样的学术研究中。

“罗氏档案”（Lo Archive）即1943年至1944年间，罗寄梅及其作为摄影助理的夫人刘先等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拍摄的大量历史照片集。1943年，时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自费前往敦煌拍摄石窟照片，申请了一年的休假。早在1941年，他的朋友、著名艺术家张大千先生就曾多次前往敦煌。在他的鼓动下，罗氏夫妇经过充足准备，前往莫高窟与榆林窟，并驻留18个月之久。所摄照片包含莫高窟492个洞窟中有雕塑和壁画的340个，以及榆林窟42个洞窟中的21个，总数逾3000张。

《观象敦煌》共九卷（册），计3128页，近4000幅插图，印刷这套书共耗费38万张纸和238公斤墨水。全书尽收罗氏夫妇拍摄的3000余张照片。

在制作实体书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专注以顶级质量印制照片，尽量保持照片的原始样貌。以此表现黑白照片的纹理与质感，以及沙漠景观的特色样貌。印刷纸张也是精心选择的，以便尽量减少全书的重量与厚度。在出版时，书中附上了对洞窟内拍摄位置及照片内容的英文介绍，以尽可能完整地提供“罗氏档案”照片的信息，并使读者以沉浸式视角浏览照片，感知洞窟内部空间与“罗氏档案”的纪实性与艺术性，能够最大程度地方便学术研究。从4世纪至14世纪间敦煌石窟的规划者、建设者、绘工与雕塑家，一直延伸到20世纪的探险家、摄影师，以及21世纪的学者和艺术家，敦煌艺术始终备受瞩目。这离不开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书中也以清晰的地图，引导读者以丝绸之路的视野观察敦煌，及其作为连接中原地区与中亚地区门户的地位。

接着，经老师通过展示“罗氏档案”照片，论述这些照片的历史价值。将“罗氏档案”照片与今天的情形进行对比，可见1940年代的洞窟外壁遍布着不匀的砾岩与碎石，甚至在外就能看到壁画。如今洞窟外壁已被加固，并建起了门和墙，也有了更易通行的廊道，这得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敦煌研究院的工作。显然，罗先生的摄影对观察大规模人为介入和修复工作前敦煌石窟的面貌具有较大价值。罗氏对壁画细节的拍摄对艺术史学家的研究也



莫高窟85窟外侧南壁，出自罗氏档案照片

颇具意义，我们能够清晰观察到壁画线条的使用，以及壁画相对原始的面貌。如榆林窟第25窟的照片，由敦煌研究院1990年代拍摄的照片可见，右侧墙上的壁画都不见了。因此，“罗氏档案”能够体现洞穴在破坏程度较轻时的情状。

罗寄梅在拍摄过程中也颇具“匠心”。如北周时期的莫高窟第428窟是一个中心柱窟。罗先生对其拍摄的方式很有趣，他对洞窟的三维空间很感兴趣，因此从各个角度进行拍摄，甚至将自己悬于洞穴的顶部和壁龛里。视点越高，视野越广，也能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再如莫高窟第251窟，罗寄梅先生从业已坍塌的洞门和外墙的“锯齿状”边缘拍摄已经暴露在外的雕塑和绘

画，由特殊视角观察洞窟全貌，并以多角度的拍摄清晰地表现角落的塑像，并形成“美丽的剪影”，颇具艺术气息。为了充分展现罗寄梅拍摄的“匠心”，《观象敦煌》书中特地制作了大量洞窟空间示意图，在二维的纸张平面上展现三维的洞窟空间，以及罗先生的拍摄视角与洞窟内部空间结构，传达罗先生的三维感及其对拍摄空间的考量。尤其是在大部分破坏性空洞已被密封后，这些照片更具参考价值。该书将洞穴空间布局与摄影作品并列，并精心地安排照片与三维示意图的位置关系，充分展示了一位浏览者仰首、低头所能看到的各种壁画与雕塑，以便使读者获得沉浸式阅读体验，仿佛身临其境，置身于洞窟中。

此外，罗寄梅先生也创造了不少优雅而和谐的图像。如他以佛像的视野进行拍

摄，使我们感知佛像眼中洞窟的形貌，能够唤起我们对佛教雕塑、肖像学及建筑等艺术领域的思考。还有一些分层摄影，将图像和摄影技术的复杂性与抒情美学相结合，产生了独特的视觉体验。总之，“罗氏档案”作为无价的摄影成果，充分展示了敦煌石窟的绘画和雕塑在不同时段、复杂主题下的特征，也记录了洞窟内外无法挽回的变化，表达了罗寄梅特殊的摄影思想，能够为佛教艺术和中国艺术史研究所用。从美学角度来看，这些照片也提供了由一位对艺术摄影有着深刻了解的摄影师，所创造的不同寻常的艺术形象，具有深远的艺术史意义。

韦陀教授以“罗氏档案”照片为主，详细介绍了照片的价值、有趣之处及其反映的艺术史问题。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与洞窟保护措施的不健全，罗先生的拍摄活动十分艰难。他一定设法用梯子或支架搭在洞窟的外壁上，尽力从很多“危险”但却美妙的视角记录敦煌石窟的多样风貌。如对洞窟外残破的木构斗拱细节的拍摄，可窥见数百年来木材是如何变得干燥而坚硬的。而远处透迤的三危山与斗拱共同构成了美妙的艺术画面。

“罗氏档案”中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细节。由莫高窟第 249-

251 窟的照片可见，其外壁被掘破，洞壁的厚度与砾岩的颗粒表面暴露在外；同时也有很多空白的洞壁，原因尚不知晓，许是尚未完成壁画绘制，或被沙石侵蚀，抑或遭到人为破坏。而现在通过加固、涂漆、建起混凝土墙柱，能够使洞窟拥有完整的前墙，不再有脱落的危险。此外，通过对主佛（药师佛等）及其侍从以及壁画层次的多角度拍摄，得以还原佛教经文所述的原始情状，令人对佛教（尤其是创始人释迦牟尼）产生敬畏之心与信念感。部分洞窟也有一些被划破的画面，所绘妇女或为“敦煌军事总督”（注：应为归义军节度使）的妻子。他们的图像为何被毁坏，也是耐人寻味的。以上种种均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孙志军老师从 1984 年至今一直在敦煌研究院从事石窟摄影工作，是“数字敦煌”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已经和团队共同完成了莫高窟 258 个洞窟的高分辨率数字图像采集。他以“罗寄梅对敦煌石窟的摄影表现”为题，由罗寄梅敦煌之行的性质、对敦煌石窟的摄影表现以及彩色照片影像去踪谜题三方面探讨“罗氏档案”的价值与意义。罗寄梅先生在抗战时期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他在工作之余为何会来到敦煌？这一问题引起了孙老师的关注。首先，中央社大事记表明，罗氏来敦煌拍摄是中央社派出的公务。而据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档案，罗氏以研究员身份出现在职员名册中，领月薪 320 元。此外，敦煌艺术研究所也称按“罗研究员”设计方法进行洞窟拍摄，并将购置摄影材料所需费用纳入上呈教育部的经费条目中。常书鸿在《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

书中亦有类似记述。因此，综合以上国家机构档案以及相关人士讲述，我们认为罗寄梅先生在敦煌拍摄，是公职人员的工作。

随后，孙老师结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拍摄要求与罗先生的拍摄实例，详细解说了“罗氏档案”照片的摄影表现。罗氏摄影对象的选取标准有石窟外景与石窟内容两项。前者包括石窟全景、本所概况、本所整理清沙工作概况，及其他有关的历史建筑物等；后者包括窟内各种结构之代表作举例（如对 435 窟的拍摄反映中心柱窟内部与须弥座式中心柱的结构，以连续的 10 个拍摄面的转折和递进表现 420 殿堂窟的内部空间关系）、各时代各洞窟绘画图案造像之代表作（全部或局部）、有关于历史考证之重要题记（如清晰拍摄了 156 窟前室各年代累积下来、接连不断的游人题记）、历年来石窟内藏人为的与自然的损坏遗迹及现状（如 46 窟的涅槃佛像，与 1908 年法国探险队所拍摄的照片相比，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主佛旁的众多小造像已经消失）、有关制作技术上之痕迹，以及相关石室秘藏经卷花幡及其他已被窃取重要物件之设置。显然，“罗氏档案”遵循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制定的上述摄影标准。

接着，孙老师以莫高窟第 61 窟为例观察罗寄梅先生的拍摄方法与构思。61 窟壁画面积大、层次多，罗寄梅先生采用了拼接全景图的方式，对各壁分别拍照，并拼接合成。各壁都是作为独立的单幅画面来拍摄的，照片的四周都留有充足接口，以方便彼此之间的拼合。对于部分被遮挡的大五台山图，在空间极其狭小的环境下，罗先生用 16 张照片，将遮挡部分完全拼接



《观象敦煌》书影，共九卷（册）



与会学者线上留影

起来，下足了功夫。而对 61 窟的顶部，罗先生也分别拍摄了藻井和三个角落的天王。由此，能够保证对壁画对象的全部摄取以及影像质量，充分展示细节。罗寄梅先生对 61 窟共拍摄了 93 幅照片，其中有 73 幅用于全景拼接。而在全部拍摄的 340 个洞窟中，摄有全景画面的洞窟数量达到了 83 个。所以将“罗氏档案”与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及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等个人或团体的拍摄相比，其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大量使用了全景式拍摄。

从专业角度看，罗寄梅的敦煌石窟摄影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具有摄影方案，兼顾整体与局部，几乎每个洞窟的内部结构、壁面和佛龛都得以完整反映。特别之处以特写表现，对细节也毫不吝啬，如 251 窟斗拱中夹杂的小木块。其次，构图遵循中国绘画的对称原则，并注意画面中“势”的化解和内容的延展。并且用光精致，无

论是塑形还是阴影的处理，用光都极为精准，充分利用光影表达有纵深感画面与空间。此外，罗先生始终追求壁画、塑像的质感表现，体现壁画机理，并恰当运用摄影技巧，处理摄影背景，使菩萨雕塑有远离尘嚣之感。由此可见，罗寄梅先生在拍摄敦煌石窟时，凭借自身专业的摄影水准及一定的考古知识，既考虑了内容的完整性及照片的细节分辨率，同时注意了洞窟内外的空间关联。

通过对“罗氏档案”的分析可见，罗寄梅先生对莫高窟、榆林窟的原始景观和 340 个洞窟进行了或详或略的拍摄，所获照片具有上乘的技术和美学品质，这使得“罗氏档案”具有纪录摄影 (Document Photography) 的性质。“罗氏档案”以三千余幅照片凝固了伟大敦煌石窟在漫长沧桑的历史进程中的一瞥，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将其全套出版，有利于我们全面

认识敦煌石窟的原貌，以及近 80 年来莫高窟的一些变化，对于研究敦煌艺术和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此外，多方资料显示，罗氏摄影“内中并有彩色照片”、“彩色者亦有三百帧”，另有“罗寄梅所摄之敦煌风景电影片”、“敦煌千佛洞活动电影和幻灯片”。现在这些彩色照片和电影片都下落不明，孙老师期待大家能够留心这两宗敦煌石窟珍贵史料的去踪。

最后，刘晨老师向听众们简述了三位学者学术演讲的内容，并总结道，罗寄梅先生拍摄活动的目的是记录敦煌石窟这一

历史遗迹，而照片本身也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当代学者通过这些影像能够了解到莫高窟与榆林窟相对原始的环境及其变迁。另一方面，他们拍摄的对象是敦煌的艺术品（雕塑与壁画），而这些照片在当下也成为了艺术品，摄影艺术在其中表现地淋漓尽致。罗氏夫妇以自己的“匠心”，为国际敦煌学界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撰稿：徐伟喆)



15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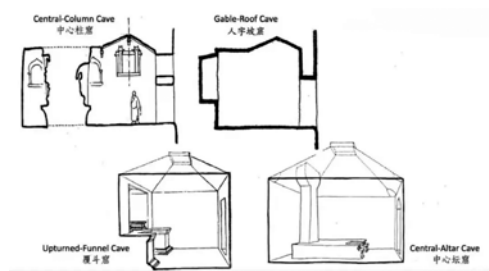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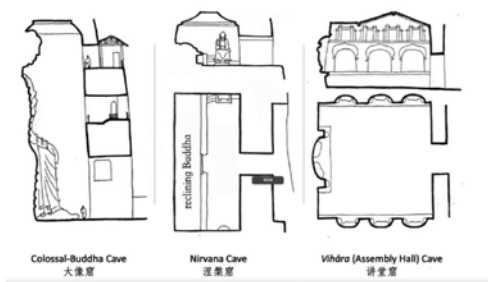
林伟正、玛利亚·缅希科娃 | 观象敦煌：国际视野下的敦煌学——作为史料的敦煌与作为空间的敦煌



2021 年 12 月 6 日晚，“观象敦煌：‘罗氏档案’中的莫高窟与榆林窟照片”系列论坛第二场、“北大文研论坛”第 152 期在线举行，主题为“国际视野下的敦煌学——作为史料的敦煌与作为空间的敦煌”。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林伟正 (Wei-cheng Lin)、俄罗斯冬宫博物馆东方部高级研究员玛利亚·缅希科娃 (Maria L. Menshikova) 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刘晨主持。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包弼德 (Peter K. Bol)，

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包华石 (Martin Powers)，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经崇仪 (Dora C. Y. Ching) 与谈。本场论坛为“敦煌学”系列活动之一。

论坛伊始，林伟正老师提出，“罗氏档案 (Lo Archive)”的编辑出版嘉惠学林，对其中莫高窟与榆林窟照片信息的详细整理将激发艺术史学界新的研究热情。他的研究也在这些图像材料基础上展开，主题为：“观象敦煌 (Visualizing



敦煌洞窟形制

Dunhuang) ”中，“建筑”何为。林伟正老师认为，对于建筑史学者而言，敦煌石窟研究的难点并不在于解读石窟修造的技艺，而在其研究的对象——“建筑”具体如何理解。

典型的建筑史研究往往以洞窟形制为基础作出类型学划分。要言之，敦煌洞窟可以分为大像窟、涅槃窟、讲堂窟、中心柱窟、人字坡窟、覆斗顶窟和中心坛窟等不同类型的，又以后四种最为流行。相比修造的方式，研究者更加关心“石窟建筑”创造了何种类型的空间。许多学者认为，建筑本身服务于其中供奉的佛教图像。他们的研究也围绕着石窟形制如何有助于窟中墙面、壁龛、佛台与窟顶等部分图像的组织而展开。

与既往研究不同，林伟正老师强调，石窟的类型传统事实上限制了其内部图像的组织。莫高窟南区近五百个装饰各异的彩绘窟均依照寥寥数种特定的洞窟形制修凿而成，洞窟形态与其图像装饰的联系实则有限。他还提出，相较于聚焦洞窟的物理形制，“石窟建筑”研究更应当关注“建筑”如何先验地作为洞窟内部图像组合的一部分，在宗教的可视化过程中发挥作用。

林伟正老师通过一组个案研究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从分类法角度来看，学者认为，敦煌洞窟的不同形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度、中亚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各类建筑。如覆斗顶窟可能与临近地区的墓室形制有关，甘肃酒泉地区北凉时期的丁家闸五号墓墓室顶部的结构和壁画装饰都与莫高窟南区 249 窟的覆斗顶颇有相似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筑形制与图像模式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以覆斗顶和人字坡窟为例，莫高窟北区许多此类洞窟均无壁画与佛像装饰，但它们的空间形制却与南区的彩绘窟十分相似。其间的相似性恰恰否定了建筑形制与特定图像程式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流行的形制虽然几经变迁，但相对“过时”的类型也仍在被工匠使用。四种洞窟的并行展现了地区性的修造传统，也可以佐证修凿洞窟的考量与内部图像无关。

在此基础上，“石窟建筑”研究如何超越类型学的局限？林伟正老师认为，关键在于认识到“建筑”不止于石窟的物理形态与结构，研究者应当从观看的角度出发理解建筑。仍以此前提及的覆斗顶彩绘窟为例，虽然它与丁家闸五号墓和莫高窟

北区的洞窟在空间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彩绘窟所要求的感知主体则是其他两者均不具备的。窟内的图像依照步入其中的观者之眼而构思、设计。

著名的莫高窟 254 窟是莫高窟最早的中心塔柱式洞窟，中心柱四面开龕，其中各设佛像，形制与文殊山石窟相类。此窟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心柱位置的偏移。洞窟内部的空间被靠近东侧入口的人字坡顶与偏向西侧的中心柱一分为二，延展出东西向的轴线。进入石窟，映入观者眼帘的不仅有东向大龕中的交脚弥勒佛，也包括轴线尽头西壁的白衣佛说法图。白衣佛周身所绘千佛，营造出如《观佛三昧海经》所云，“想一室内满中佛像间无空缺”的视觉效果。林伟正老师历数莫高窟早期十四座中心柱窟，均有与此相似的壁画出现。这既体现出石窟建筑对其中图像的决定性影响，也显示了建筑如何生产出对内部空间始终如一的认识，从而定义了观者对石窟中图像及其宗教意涵的体验、觉察与理解。

林伟正老师提到，石窟建筑空间结构上的任何改变，都将导致图像系统、观看方式，甚至于宗教意义的变动。六世纪早期，带有西壁主龕的覆斗顶窟兴起，本质性地改变了观者对石窟空间的感知。中心柱的移除扩展了观看者的视野，使之物理上更加靠近龕内的塑像；这一变动也将东西轴线延伸到壁龕中，使得原本割裂的内部空间合为一体。

有趣的是，八世纪晚期部分覆斗顶窟中出现了“帐型龕”变体。西壁主龕中分割出一个独立的“龕中之龕”，其顶部装饰条带形如“斗帐”。莫高窟 361 窟就采

用了这种形制。石窟顶部所绘的“十二天”与“四方佛”形象，暗示了中心卢舍那佛的存在。赵晓星研究员推断，窟内西壁帐型龕中心残损的形象原为卢舍那佛。林伟正老师据此认为，帐型龕有如“窟中之窟”，壁画上的卢舍那佛在工匠的设计中宛如居于洞窟之中，在观念世界中垂直飞升。由此，建筑为观者构筑了想象空间，视觉化地呈现出超越性的所在。

九世纪末期，张淮深曾这样形容莫高窟的特点：“方太室内，化尽十方，一窟之中，宛然三界”。林伟正老师籍此指出，石窟建筑与其中承载的图像共同参与了洞窟的视觉营造，“观象”敦煌中的石窟建筑“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它渴望达成什么”。发言最后，林伟正老师以莫高窟 61 窟的案例作为结尾，此窟为中心坛窟，坛上曾有



文殊菩萨骑狮像，窟中的装饰程式显示了五台山信仰的流行。观者自东而进，绕坛而行，在昏暗的室内近观壁画，随着视线的起伏与图像的引导，有如登临五台，体验了一场虚拟的圣山之旅。借用汪悦进教授提出的概念，敦煌石窟中“游走的眼光（peripatetic vision）”得以实现，有赖于石窟建筑这一不可或缺的视觉化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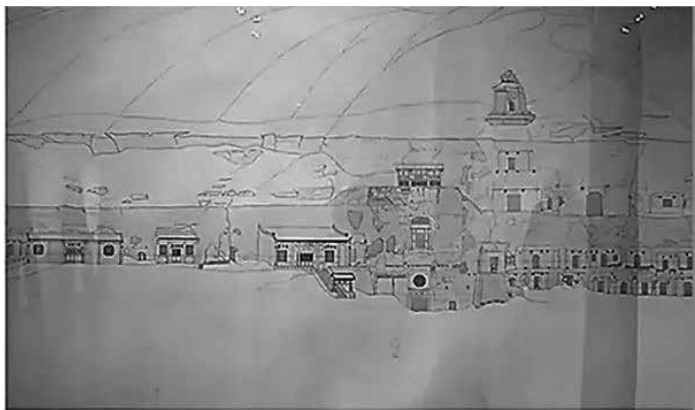
论坛进入下半场，缅希科娃研究员的发言聚焦于历史照片如何为敦煌的重建和可视化提供现实依据。二十世纪初，伯希和、斯坦因及谢尔盖·奥登堡（Sergei F. Oldenburg）等西方探险家先后造访敦煌，探险队中随行的摄影师拍摄了大量历史照片，其中大部分很快都整理公布，成为研究敦煌石窟建筑的重要资料。而罗寄梅夫妇在其后的1943至1944年间拍摄的3000余张照片如今编辑出版，无疑也将促进学界对敦煌石窟的深入研究。

缅希科娃研究员提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敦煌与我们今天所见的面貌大为不同。现代修缮后莫高窟96窟外的木构窟檐气势恢宏，是敦煌石窟的标志性象征。但在1943年罗氏拍摄时，建筑结构残损严重，探险者须借助木梯攀上陡峭的山崖。俄国探险家奥登堡留下的照片与笔记中同样描绘了持杖攀高的探险者形象，运输行李的驼队以及窟外险峻难行的崖壁。这些历史照片也记录下了暴露在空气

中、风化严重的巨像、洞窟和寺庙，忠实还原了二十世纪早期莫高窟的历史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与奥登堡同行的摄影师萨缪尔·杜丁（Samuil Dudin）也是一位专业画家，除了拍摄黑白照片，他还临摹了许多敦煌壁画的彩绘图像。1915年，奥登堡探险队还绘制了崖壁上可见的石窟入口巨幅地图，全图长达二十米。这些宝贵的手绘资料亦为重构敦煌全景提供了重要参考。

随后，缅希科娃研究员对比了敦煌探险者在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留下的照片档案。不同时期洞窟内部环境的差异揭示出探险与修复活动对石窟面貌的影响。以莫高窟321窟为例，伯希和与奥登堡拍摄的照片中两侧所塑的动物均为白狼。此后，武则天时期的白狼塑像原作被带到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在罗氏档案中，空缺之处已被新的海兽塑像所取代。修复者对石窟内的其他元素也进行了改造。与西方探险家图片中残损的塑像对比，罗寄梅照片中西壁佛龕左侧的力士明显亦为四十年代重塑。



探险队手绘地图（局部）

罗氏档案与先前资料间的区别揭示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人们对莫高窟塑像的修复与改动。接下来的一百年间，类似的细节变化也在不断发生。缅希科娃研究员将自己2017年到访敦煌时拍下的照片与历史档案对比，发现不少石窟中的塑像因重塑、修复或自然损毁而发生了改变。绝大部分动物塑像的面貌都与二十世纪大不相同。

另一方面，历史照片也为还原博物馆藏的壁画残片之全貌提供了重要线索。缅希科娃研究员介绍了冬宫博物馆所藏的莫高窟263窟局部壁画，它在20世纪初被奥登堡切割、运送到圣彼得堡。从伯希和和罗寄梅拍摄的不同角度照片可以看出，壁画分栏绘制，上部为五世纪绘制的千佛和供养人图像，底部则是十世纪添加的官员形象。罗氏档案中图片左侧的缺失部分正是冬宫博物馆的壁画残片。综合历史照片与壁画现状，学者们以数字方式重现了石窟图像的本来面貌。

缅希科娃研究员最后总结道，敦煌探险家留下的图像资料意义深远，拍摄于二十世纪中期的罗氏档案更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冬宫博物馆的敦煌相关藏品的布展正有赖于伯希和、奥登堡以及罗寄梅等探险者在二十世纪留下的丰富资料。更重要的是，罗氏档案的编辑出版不仅对博物馆的展陈策划多有裨益，更为莫高窟建筑、雕塑和壁画的研究与复原，石窟的重建与修复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线索。

讨论环节，包弼德教授高度评价了两位主讲人的发言。经崇仪老师特别介绍了《观象敦煌》第九卷，也即研究论文集卷的具体内容。她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够推动

敦煌研究乃至中国艺术史学科新的发展。包华石教授提到，宿白先生在研究中以功能对云冈石窟进行分类，这与林伟正老师的研究关系如何？

林伟正老师回应，从观者视角出发的探讨与传统的石窟建筑研究并不冲突。但彩绘窟既然应“观象”之需所建，其建筑结构本身不只是观看者的物理坐标，更在观看的实践中扮演着积极角色。敦煌石窟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连绵千载的建造和观看传统，工匠和观者共享有关营造和感知石窟空间的知识。在他看来，这才是综合性的“建筑”研究所应试图发掘的维度。林伟正老师还提到，缅希科娃研究员和他本人的发言都提及了敦煌地区鲜活的石窟建筑传统。形式各异、规模不同的修复、重建活动从唐宋以来延绵至今，图像意义在其中的传承、演变和创新同样值得关注。

（撰稿：谢筠婷）



153

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范式反思



论坛现场

2021年12月5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53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范式反思”。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的十余位学者与会，1400余位观众在线观看。

本次论坛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在主持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方诚峰简要介绍后，两位引言人为本次论坛框释了研讨主题和拟探讨的议题。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介绍了我国古代史学界研究现状和“范式”这一概念的发展。上世纪50年代，邓广铭先生提出

了适用于史前史以外的所有时段和国别研究的历史学四把“金钥匙”，即年代、地理、目录和职官制度。四者之中，政治制度史是体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领域。目前该领域的研究非常丰富，业已形成规范，但尚无“范式”一说。“范式”这一概念最早由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尽管学界对此概念的具体内涵颇有争议，但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范式是一种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能够为同领域的相关科学研究提供可模仿的范例。结合我国古代史研究的情况以及“范式”这一概念，曹家齐老师指出，当下中国古代史研究存在一个不平衡现象，即“范

式”的意义并没有为所有研究者重视，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史学研究呈现“碎片化”的现象。据此他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就中国古代制度史的研究而言，我们该如何理性地理解范式？其二是我们最终研究的是历史本身，还是通过研究历史给社会提供一个历史的证据？

本次论坛的另一位引言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孙正军随后发言。他首先回顾了制度史研究范式的发展历程：从本世纪初开始，邓小南、阎步克、侯旭东、刘后滨等学者逐渐推进有关制度史范式的研究，研究内容涵盖问题的选择、研究角度的切入、价值的升华等。其次，孙正军老师认为，史学中的制度史研究与社会学、政治学领域的制度研究的区别主要有二：第一，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更关注制度和行为的关系，研究核心在于行为；而制度史研究的中心在于制度本身。第二，社会学和政治学不仅关注正式制度，也关注非正式制度，甚至会将文化也纳入制度研究的范畴，而当下史学界的制度史研究大抵聚焦于正式制度。因此我们可以思考，是否能够考虑把制度之外的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孙正军老师认为，制度史研究的方法并不单一，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是因应特定史料，关注特定问题，并由特定学者在特定时点提出的，因此，范式在具有某些洞见的同时也难免遮蔽一些其他的现象和问题。最后他总结，20世纪以降的制度研究值得后学继承，但我们一定需要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需要追问什么是制度，怎么研究制度，制度研究的旨趣何在等问题。

上半场

接下来，论坛正式开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祎在发言中首先对制度史研究中是否需要“范式”提出质疑。张祎老师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是一个非常窄小的领域，或许达不到构建范式的层次；且该领域的研究方法多脱胎于前人的研究，而不是革命性的突破发展，或许当下还不是反思范式的成熟时机。以祝总斌先生对于秦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的研究为例，张祎老师指出，祝先生提取自丰富史料的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判断是否是宰相的方法也适用于研究清朝制度，但是在研究宋朝时就会出现龃龉。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学者所处理的问题不同，并非对于前人思想的颠覆性、断裂性的革新。因此，制度史的研究呈现出基于具体问题和情境的后出转精的态势，而没有呈现出范式转化的形式。另一方面，虽然前辈常常告诫后学要从史料中提取业已成型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但随着研究的推进，学者会发现既有概念不一定完全适用。以“皇帝”这一概念为例，清朝入关之后的皇权和入关之前皇太极称帝时的“皇帝”的性质显然不同，如果我们仍机械地沿用“皇帝”的概念，可能会不自觉遮蔽政治体制变革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提炼新的概念，提出新的理论。随着学科不断发展，我们也会逐渐从社会学等其他领域中借鉴一些概念方法作为工具处理研究问题，不拘泥于原始史料和古籍，不拘泥于已有的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胡恒随后发言。他首先指出，制度史在不同的断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针对清朝制度

条文的研究领域尚存在较大空白。其次，胡恒老师分析了制度史研究中的两个趋向。一种是偏重长时段，承认制度独立性、结构性和重视秩序的趋向，代表如阎步克老师的“制度史观”；而另一种取向则把关系、过程、行为引入制度研究，而这也必然使得制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多端的变化，展现了制度“混沌”的一面。因此学者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能在研究中结合制度的“秩序”和“混沌”两个特性。结合自身学术兴趣和研究经验，胡恒老师认为清代是平衡“秩序”和“混沌”的制度整体框架的一个理想断代，因为更晚近的断代在数据方面有更系统性的留存。基于庞大的数据追踪和统计分析手段，学者通过联系多方面的信息能够更好地分析官僚制度，用因果关系和相关性解释官僚政治。此外，这种方法还能处理微观层次的问题，如追踪个体在官场升迁调动的全过程。从微观尺度来看，每个人在制度的约束中都能做出相对独立的选择，因此人的行为就像是制度条文这一“均值”之外的随机值，而利用统计和计量方法能消除一些随机影响，充分结合制度结构和人的能动性。

第三位与谈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孙闻博。他首先指出了目前制度史研究的三种特点，即关注制度本身、关注制度和历史的关系以及制度和人的关系。而在这三者中，核心问题是制度和人的关系，因为制度是以人为中心的，制度是人的实践行为的确切体现。无论是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对于制度的反抗和破坏，或者是对于制度的规避和适应，都体现出了人的能动思考。其次，就制度史研究的第二

个特点而言，学者需要思考制度史相对于历史学的边界何在，即需要明确我们研究的是制度还是历史。最后，就如何研究古代制度，孙闻博老师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是强化对于史料的审定，不同正史所记载的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都是有差异的，出土文献也涉及到制度的规定和实施的差异，这都需要研究者仔细比对；第二是加强通代和断代的结合，因为制度并非在不同断代都呈现出连贯统一的面貌，因此不同断代的学者需要加强交流；第三是从线索中提炼概念，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被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所限定，也能直接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话乃至影响其他学科的研究。

随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古丽巍发言。她回顾近代历史学研究发展历程，指出一方面，历史学界历来都存在对“理论”或“范式”的批评，例如批评上世纪深受马克思主义观念影响的高度理论化的“五朵金花”；另一方面，历史学界又从未停止过对“理论”的好奇心。然而，学者们屡屡尝试却仍难以避免“二层皮”的尴尬。古老师认为这种矛盾的原因或许在于对自我叙述能力的不满，学者们不甘于平庸的思考和表达，渴望拓展写作的深度，但如果选择了错误的发力方向，可能越是努力就越是远离“真相”，因此学者应回归原点，续读文本，思考学术写作的差异性。接着她指出，历史学制度理论的讨论路径和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有很大不同，例如社会学倾向于从理论到史实的自上而下的理解，历史学则是从史学到理论的理解，即通过对具体政

治经济制度的实证研究而抽象出对于时代的系统性理解。最后古丽巍老师总结，范式并不是一种定论或定律，而是一种思考方式和过程，目的在于增加研究者的认知和理解。

上半场研讨会的最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

祎楠以“历史解释中的制度”为主题发言。他指出，历史解释在史学研究中并不罕见，但对不同的因果所产生的理解会使得针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解释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此，当被纳入解释时，制度呈现的意义也不同。以文彦博的“与士大夫治天下”这段经典材料为例，罗祎楠通过比较分析余英时老师、邓小南老师以及其自身的三种解读，阐述了不同的因果理解所“照亮”的材料部分是不同的。其中，余英时先生等学者的解读关注的是政治结构，即皇权与士大夫的权力分配的格局；邓小南老师则注意到了文彦博脱口而出的话语背后反映出一种习焉不察的制度性状态；而罗祎楠老师关注的是历史人物如何能动地构造共在性的情境，因此他提出通过政治生态的视角阐释，即关注分散的行政制度规则如何在历史人物理解世界的过程中被转化为自己可以切身体验的生活经历。当历史学家试图超越片段演说勾勒历史时代的特征，就不可避免地进入认识论的讨论范畴，因此研究者更需要具备反思的自觉性，即



《平定准部四部得胜图-乌什酋长献城降》，郎世宁绘

自问按照什么样的意识构造解释？这种对于因果问题的讨论打开了一扇社会科学的大门，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渗透，历史学对证据的验证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最基础、最底层的资料，而社会科学则在意识层面上为历史学的工作提供了反思的可能性。

下半场

本次论坛下半场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毛亦可主持。首先发言的是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主题为“制度过程中的信息机制”。渠敬东老师从社会学的视角阐释对于制度的理解，社会学家倾向于在动态环境中理解制度，因为制度是一个规则，而规则需要运行，因此制度本身是有生命的，社会学称之为机制，即“像机器一样运动”。而讨论机制必然会过渡到人，因为制度中信息无处不在，而人就是信息载体，人的情境性和在制度中的选择性非常重要。人必然会合理化自己的行动，这些自我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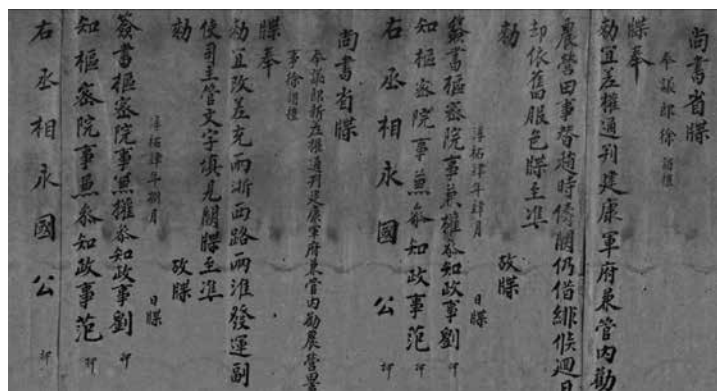
化的解释并不一定是符合制度的规则陈述。此外，为了证明合理化的逻辑自洽，人需要一个庞大的知识库，且往往倾向于引用古人的案例和观点，这就引出了制度研究中的古今关系。

当我们研究古人，首先要明确他们在意的

观点和理念，而不能满足于还原事实，这就构成了一个解释过程。最后他认为，中国制度的特性有三：第一，中国制度的文化性极强，即人的身份、等级、位置、情境都会在制度中产生重要影响；第二，中国的制度是一个关系机制，其中的变量极其丰富；第三，中国的制度是一个信息空间，因此研究者要关注制度规定的内容以及预留的空间。

随后发言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则暂时跳出“制度”和“范式”这两个讨论中的焦点概念，提出关注“事务”。他指出，“事务”这个概念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原生词汇，用于研究则可以联结人、事情、关系、结构等其他概念。正是在普通人不断“做事”的过程中，存在着“守规矩”和“不守规矩”的问题；“做事”的过程也涉及到人的行为模式；“事务”还能再生产出新的结构关系。因此，在侯老师看来，将“事务”从研究对象转为研究工具，可以拓展制度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角度。

下半场的第三位与谈人是中国人民大



南宋徐渭礼文书，现藏武义县博物馆

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他以对《唐六典》的疏证为例，探索制度史作为进入历史逻辑和探究历史脉络视角的可行性。刘老师通过发掘《唐六典》复杂的文本层次及文本生成逻辑，认为其提供了帝制时代制度构建的核心概念与制度书写的经典范式，即“六典-令式-制敕-章奏-人事形势社会经济”。纵向来看比《周礼》更具有制度底蕴，横向来看也比《唐律疏议》更加全面，将其作为切入点是一个良好的解读唐朝历史的制度史视角。

随后，文研院邀访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虞云国围绕“活的制度史”发言。他认为，中国古代整体制度运作过程中人的影响很重要，因此制度史研究尤其应该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由于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特点，君主的优劣影响了一个时段内的政治生态，因此“活的制度史”要考虑政治生态在不同君主治下的变化。最后虞云国老师还提出了“亚制度”这一创新概念。在虞老师看来，历代学者关注较多的往往是一些成文的、显性的制度，但在许多大制度的运作之下，

起具体推动和润滑作用的往往是亚制度和潜规则，其中潜规则是不成文甚至不能言说的规则，而亚制度则是很多具体而微的、能够灵活变通的对于大制度的补充，绕过原定的大制度，或者在其框架下对规定有所改动，对政治生态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制度的过程中，学者不仅要着重研究大典制，也需要密切关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亚制度。

随后发言的是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他就史学和政治学的关系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史学对于政治而言是丰厚的资源，研究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假定要扎根于对中国古代政治的理解。第二，政治学对历史的关注度也很高，因此一些政治学者提出了“历史政治学”的理念。然而，尽管史学和政治学存在如此紧密的联系，学界却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矛盾现象，即政治学中对中国古代及近代政治的探讨，往往多受海外学者而非中国学者的影响。景老师认为，当历史学认为自己的使命不只是还原历史，还有解释历史时，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对话或许会越来越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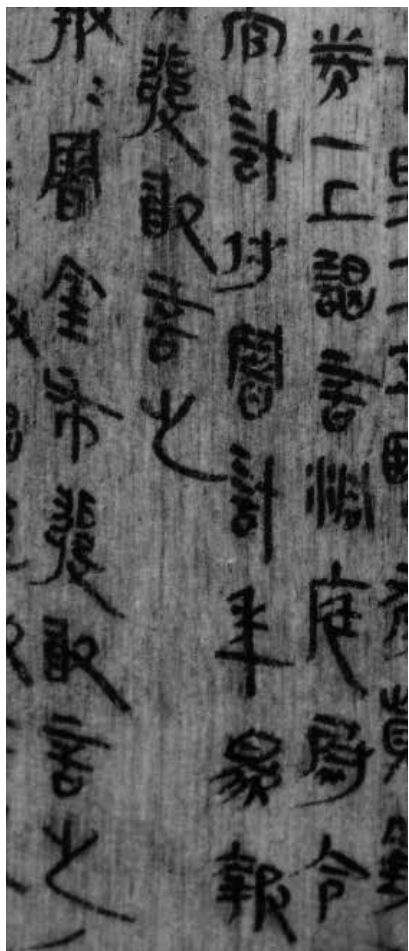
下半场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邓老师首先回应了前面几位学者对于她提出的“活的制度史”这一概念的讨论。她认为“活的制度史”源于教学实践中和学生产生的互动，其“活”的体现并非是一种漂浮的状态，需要寻找一些抓手，例如刘后滨老师用《唐六典》作为抓手来解释唐代历史。这种抓手既可以是过程，也可以是长期积淀的关系。其次，她指出，历史学本身是

一门重视反思的学问，既有对历史事实的反思，也有对叩问历史方式的反思。一方面，制度研究里要特别注重路径，即这条道路怎么走，如何到达目的地；制度的现实往往取决于如何“折中”而不是“初衷”，“折中”塑造出不同的行为模式，限定着国家和政权的特定轨迹。另一方面，学者应当追求扩展制度史研究的传统界限，深化制度史研究；扩展研究边界不是无边界的拉扯泛化，而需要关注制度和其他领域的交叉面，比如制度与政治文化、基层治理、日常生活、历史实践等，这些地方也是积累和创新的切入点和生长点。现在的研究者已不再囿于研究制度的规定，也高度关注制度的运转方式、制度的空转等问题。我们既不能以文献记载规定就认为其有效，也不能因为制度运转与我们心中所想不符合就认为是具文。观察者批评其“空”，体制内的人在意其“转”，这样的认识差异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最后，邓小南老师总结认为，制度史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焦点，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都早有关注和积淀，年轻学者都非常活跃，希望能够保持持续的沟通和对话。

自由讨论

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首先就刘后滨老师提出的历史学科碎片化、历史学科多借鉴西方理论等问题各抒己见。景跃进老师认为，学科分类过于细化以及过分重视量化考评对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些问题；此外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研究脉络顺畅，概念接续，因此能够源源不断对中国学界产生影响。渠敬东老师认为，西方理论对

中国学者的研究影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西方想象的方式不同，而西学的思考和想象方式给我们很多新鲜感。而比起这一现象，他更担心的是“史学论文化”的问题，因为行为科学的范式和方法尤利于发表论文而不利于专著写作。艺术史研究的学者追随国外研究风潮，如社会理论化以及物质史研究思路，但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在最本质的特征层面仍存在不可跨越的隔阂，这种趋势或将导致我们丧失对历史的同情和理解，因此我们需要的



里耶秦简残片，湖南龙山里耶古城遗址出土

是在本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从统一而连贯的视角为我们提供历史场景。

问答环节，现场观众提问道，制度本身的变化以及史书对其的记载应当被纳入制度史范围吗？虞云国老师认为，就史书记载的方式而言，最早是诸史同源，后来是由家族世袭的史官专门记述，直到魏晋时期私人记载的情况都一直存在。但是从唐代开始，历史记载的主要方式无外三种：官订私修、私修官审，或完全由官方记载。从隋唐开始本朝的正史由本朝史官修订，发展到后来前朝的正史也由本朝修订，我们看到的是政治权力极大地侵入到历史记载中，官方记载的可信度在逐渐降低，史学记载中的政治统治意识也越来越多，因此可以认为，修史制度的变化和政治生态紧密联系。毛亦可老师提问，正如几位老师多次提及的，在条文制度之外还有空间、“亚制度”、“制度的空转”等其他要素，这些概念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认为，概念的差异源于学科间的差异，不同学科的提问方向有所不同。例如论证正当性问题时，哲学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规范性原则，法学认为标准在于是否符合业已存在的条文，传统历史学则倾向于追溯到以往的历史实例，而社会学则高度关注社会的认受性，由此制度就和人的行动选择联系起来，制度化水平低的社会人的作用相对更大。在社会学视角下，制度虽然研究和人有关的行为，但注重焦点不在于个体行为，而是具有集体性、共识性、可重复性和再现性特点的行为。

总结发言

论坛最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社会学系教授张静做总结发言。两位学者分别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对制度史研究范式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性阐发。

阎步克老师表示，在方才的发言中，许多论述富有启发，提出的研究设想让人耳目一新。制度史研究

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研究的是结构性和长时段的问题。制度史有其自在价值，不是政治学的附庸。他还回应了讨论中提到的由阎老师本人提出的“制度史观”问题。他说“制度史观”只是一个视角，称不上是范式。一百年前旧体制面临变革之时，即有学者超越了传统的官制叙述范式。传统官制研究采用的是“治乱兴衰”史观，或说“资治”史观，站在皇帝角度思考如何治国，经验性、实用性极其浓厚。近代严复的《政治讲义》申明，他所研究的是“政治之学”而非“治国之道”，由此来申张一种价值无涉的科学立场，区分开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梁启超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借鉴西方政治学，纵论数千年政治之进化，在原理、方法论层面新论迭出，很多成了后人的研究起点。康有为的《官制议》，就传统制度的方方面面，如皇帝、宰相、地方、品秩、俸禄等，就古今中外做综合比较，气象极为宏大，发



张静教授（中）与阎步克教授（右）作总结发言

覆颇多；章太炎《检论·官统》辨析历代等秩阶位，创“官统周秦二家说”，即“法周”和“崇秦”两条线索在不同时代此起彼伏，不仅空前而且绝后，一百年来没有后继者。这些宏观思考，展示了范式更新所能带来的创获。

张静老师随后作总结评点。首先，她分析了“范式”的一些特性。她指出，范式是系统化的，用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概念概括一些现象；范式追求一般性，可概括一类现象和一组事实；范式具有竞争性，即不同范式之间存在比较，更有优势的范式会被多数学者接受和继承。随后，张静老师通过介绍魏昂德（Andrew Walder）教授的一个有关派系问题的研究，指出其处理资料的方式和问题意识或可为我们提供借鉴。魏昂德首先充分分析了从北京几个重要大学获取的历史材料，包括出版物、大字报、家书、日记、申请表等。他根据这些材料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红卫兵要

分派别？随后，他并未止步于这个经验性的历史问题，而是进一步提出理论性的问题，即影响派系生成的因素是什么？最终他得出结论，影响因素在于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补充了马克思提出的“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政治选择”这一理论。虽然他的理论没有完全推翻马克思的主张，但无疑做出了系统性的推进，因为他发现了影响派系生成的新条件。因此，这个研究不仅回答了特殊的经验性问

题，也回答了一般的理论性问题，使得其来自于中国特殊案例的结论更具有普遍性。基于这个案例，张静老师认为，制度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可以从特殊的历史案例里发现一般性，产出系统性知识，从而弥合具体和普遍的鸿沟。

（撰稿：依多）



154

刘永华、赵丙祥等 | 景贤作圣：中国圣贤的多学科探讨

2021年12月19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54期在北京大学静园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景贤作圣：中国圣贤的多学科探讨”。文研院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赵丙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东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鞠熙作主题报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清华大学法学院/新雅书院副教授赵晓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召集人刘永华老师致开场白。他指出，圣贤作为具有超凡道德或才

智的一类人物的代称，其实质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与同一时期的宗教、文化、知识、政治都关系密切，对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论坛旨在邀请历史学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来共同讨论圣贤这一课题。接下来，五位学者依次带来主题报告。

首位报告的是赵丙祥老师，他以“万章的隐忧：虞舜神话的孝悌与政治”为题，重点探讨虞舜故事在历史过程中的生成与流变。他首先谈到，虞舜神话在汉代往往是作为一种“故事”与政治理想和实践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尧、舜并称，但可为每

个社会成员日常追慕并付诸行动的，更多地是舜而非尧。从根本上讲，尧类似于乔治·杜梅齐尔所说的“背景性人物”，更多是被用来确定历史性的框架。虞舜起身于“匹夫”、“以微致显”的人生轨迹符合儒家修齐治平的路径取向，因而作为楷模人物备受推崇。从汉代开始，

尧舜禅让模式往往成为王朝政治交替中的一个环节，如“汉家尧后”说、新莽代汉、曹丕代汉都与之直接相关。

赵丙祥老师提出，仅仅以口头文学的形式理解神话是不够的。诸子作为神话的继承者和创造者，事实上对虞舜神话进行了再造。在《尧典》设定的父子、母子、兄弟三组初始关系中，父子与兄弟这两组关系是后续文献演变、铺衍的重点。通过梳理战国至两汉诸版本异文，可以发现虞舜的社会磨难故事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源头；并且在情节分布的深层结构上，三种见于《尧典》、《孟子》与《诗经·生民》的文本高度相似。相比于《尧典》“诸难”是为舜安排的政治历练，墨子、孟子及战国与汉代诸子更为偏重舜的诸般社会经历。

接着，赵丙祥老师援引实例，继续探讨虞舜故事在汉代的书写与呈现。从汉代画像石所展示的民间情况来看，虞舜故事在东汉时期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如武梁祠画像石虽然刻画的是董永事父，其中“象



赵丙祥老师（左）作主题报告

耕鸟耘”的情节却来自《越绝书》对舜死后“象为之耕”、“鸟为之耘”的讲法。在宫廷和士大夫层面，虞舜故事又呈现出新的变化。又如刘向在《列女传》“有虞二妃”中着重强调了二妃“恪尽妇道”的美好德行，但洪兴祖注《楚辞》所引古本《列女传》却保留了二妃与舜父“斗法”的情节。这表明现实中的王朝政治已经迂回进入了虞舜故事的书写，同时并不与故事本身所传达的孝悌观念及价值观构成冲突。

汉代对虞舜神话的讨论与运用很大程度上是由孟子开启的，因而要将目光重新转向孟子。赵丙祥老师提示我们，孟子只对滕文公及门下弟子言“尧舜”的处理方式值得注意，他对孝道的理解应当结合其所处的战国政治与道德境况；从《万章》篇所讨论的父子、兄弟、王政三个问题来看，孟子通过分别强调心性、礼仪与亲亲尊尊，旨在为复兴周道奠定一个社会基础。通过对比《万章》与《五帝本纪》，可知司马迁对虞舜故事进行了重大改造。对此，



武梁祠画像石“董永事父”拓本

他认为，司马迁的改造一定程度上与其个人遭遇和心境有关，但更重要的在于他看到了孟子师徒问对中间被掩盖起来的裂缝。在他看来，万章真正的隐忧不是舜这个具体的个人究竟是否“伪喜”，而是在“亲亲-尊尊”行动逻辑之下，一旦出现“伪喜”的问题，篡位就是水到渠成的后果，也就是后世学者所指出的潜在的“夺嫡”问题。两汉时期，孝文帝与淮南王刘长事、睢弘“汉家尧后”说与宣帝、明帝与广陵王刘荆事等背后都或多或少有着虞舜故事与现实政治相交错的影子，而王莽与曹丕的代汉篡位则意味着虞舜故事作为政制理想在道德典范层面上的破灭。

在评议环节，赵晓力老师首先提出，战国禅让与尧舜禅让的关系较为疏远，尧舜禅让与舜的家庭关系通常也被理解为两个故事，而《孟子》所记载的匡章故事同样聚焦于父子关系，似乎更具代表性。吴飞老师继续对二十四孝中虞舜故事讲法的形成时间提出追问。王铭铭老师认为，这一报告的背后可能是希望考察家与国、禅让与亲属传承之间的紧张关系。赵丙祥老

师一一作了回应，并补充道，本次报告主要尝试探讨的是在一个长时段中，不同主体根据实际政治局势的需要，对神话故事所进行的不同取舍。

接下来，李霖老师带来以“《史记》中的孔子形象”为题的报告。作为现存的关于孔子最早的传记，《史记·孔子世家》却受到后世读者的不少诟病，其中一项“罪状”是太史公“厚诬圣人”。这使李霖老师意识到，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人，与后人对圣人形象的预设存在诸多不同。本次报告便从《史记》中的孔子形象入手，考察“圣人”形象的不同面相。

首先，《史记》无疑是特别推重孔子的。除了以孔子入世家，《史记》还对孔子施以种种特笔，例如《十二诸侯年表》以孔子之死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足见《史记》特重孔子。所以所谓“厚诬圣人”，绝非司马迁有意为之，而是对圣人形象的不同预设造成的。

在进入《孔子世家》之前，李霖老师概括了《十二诸侯年表》序、《儒林列传》序及《太史公自序》对孔子形象如出一辙

的叙述。在这些文本中的孔子形象，是一个身处王道衰微的时代，却“明王道”的孔子。由于孔子所主张的“王道”与现世格格不入，故而干七十余君而莫能用，最终修六艺尤其是作《春秋》以承载王道。

在明晰了《史记》全书的孔子形象之后，李霖老师重新聚焦于《孔子世家》。他发现，《孔子世家》中的孔子主要事迹可以归纳为周游求仕与修六艺两件事，恰好与全书中的孔子形象若合符节。这样的孔子形象，与我们今天对孔子的印象有相当的差异。例如较之孟子及宋人所强调的孔子形象，《孔子世家》显然较为缺乏“孔子言仁”的记载。《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一句似乎可以作为孔子周游的绝好注脚，但《史记》并未采用。又比如钱穆《孔子传》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作为贯穿孔子一生的大线索，《孔子世家》对此毫不在意；而对于孔子与六艺的关系，是《孔子世家》的重中之重，而钱穆《孔子传》却并不重视，甚至予以否认。对此，李霖老师指出，《孔子世家》更侧重于将孔子塑造为一个王道的承载者，而并不看重孔子个体成德的历程和作为道德完人的圣人形象。具体而言，《孔子世家》一方面着重记孔子周游，刻画孔子积极求仕以施行王道的经历；一方面建立孔子与六艺之间的强关联，点明孔子在“王道不行”的情况下乃作《春秋》以承载王道。

与之相关的一个老问题是，孔子为何入世家？对此，李霖老师认为，孔子所修六艺尤其是《春秋》，因其承载王道而流传后世，是孔子入世家的缘由。与之相关，

陈涉也是因为首事亡秦，其亡秦之事业被后人传承，所以才入世家。正如《孔子世家》小序所说，孔子“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以当王道。同时，《自序》司马迁之所以以“小子何敢让焉”自命继承孔子，绝非自负为道德完人，而是以写作《太史公》书来继《春秋》。此外，历数晋、楚、郑、赵、魏、韩等诸多春秋、战国世家，结合《自序》对三十世家是“二十八宿环北辰”的比喻，可知入世家者应当是天子的股肱辅弼之臣；孔子因其传承王道而在抽象意义上有尊周室之功，故而可以入世家。

在厘清《史记》中孔子形象的基础上，李霖老师辨析了后世认为《世家》“厚诬圣人”及其他与圣人形象相违之处，如野合而生，“季氏飨士，孔子要经与往，阳虎绌孔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孔子语“怪”，孔子自谓“太山”“梁木”“哲人”等等。李霖老师指出，这些记述与《史记》中的孔子形象是一贯的，也符合汉人对圣人的预设，而与后人对圣人的预设有相当大的差异。

之后，与会学者围绕李霖老师的报告展开热烈讨论。对于王铭铭老师所提出的生不逢时是否是成圣的条件这一问题，李霖老师认为，《史记》中的孔子形象就是汲汲于求仕的，最后不得已才作《春秋》。赵晓力老师对《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是否在记载孔子事迹上存在分工提出疑问。李霖老师回应道，相比今天我们更重视孔子教育家的身份，司马迁看重的则是作为教育内容的王道。此后，吴飞老师就《孔子世家》与公羊学的关系，与各位学者展开讨论。李霖老师认为，司马迁

虽然有很强的公羊学渊源，也有相当多的看法与董仲舒一致，但在一些公羊学的经典议题上，《史记》却偏偏不采用公羊学说。实际上，《史记》并不专主一家，而是用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来兼采各家，既有对学术传统的继承，也有司马迁的新见。渠敬东老师也表示，公羊学难以概括太史公的整体气象。同时，他也提示大家注意，六艺在孔子的具体实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是我们今天理解孔子的要害之处。

其后，王东杰老师带来题为“‘乡贤’何以可能？”的报告。从新著《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出发，王东杰老师此次希望探讨的是作为一种观念的乡贤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首先，他对“乡贤”这一概念展开分析。在他看来，“乡贤”概念可视三重意义的交汇：一是对官府而言的教化与社会治理意义，二是对士大夫而言的修身意义，三是对普通百姓而言的神化意义。王东杰老师的思考便围绕这三个层次展开。

首先，在官府层面，乡贤在官方治理的方案中扮演着可供仿效的榜样这一角色。康有为曾给他一位做督学的同乡写信说，学官须兴起学子效法先贤之心，但天下贤哲甚多，不能一一遍师，故而要表彰“乡先生”。“乡先生”即乡里的圣贤，他们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容易激发一个普通士子的效仿之心——此为官府表彰乡贤的意义所在。在王东杰老师看来，乡贤可视教化视野下一种“兴发感动”的媒介，或道德力量的源泉。对于儒家传道来说，人和书为两种最基本的媒介，其中活生生的人和事具有特别的力量；宋儒强调“做

人的样子”，即突出圣贤以自己的“样子”介入与影响现实的价值所在。此外，朝廷与地方对圣贤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相比思想与学说，对乡里圣贤的评判更看重具体的行为与实践，从而在学术层面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颜元仍然可以成为乡贤。这和朝廷层面对入祀孔庙的名单的考量不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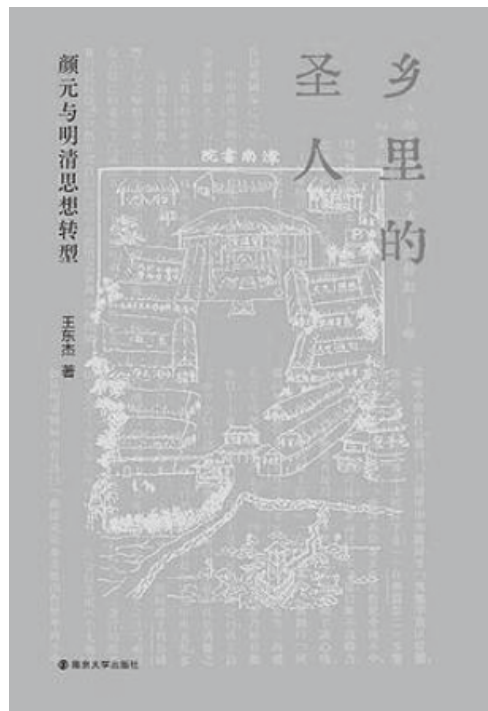
其次，从士大夫的角度来看，圣人并不是一个完型的位阶，而是始终处在一个将至未至的过程。王东杰老师援引《中庸》关于“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的阐述，指出在儒家观念当中，并没有一个终极版的圣人；因而无论是圣人、贤人，还是普通的读书人，乃至匹夫匹妇，都行走同一道路上，彼此之间只有先后与快慢的差别。如同王阳明以精金之纯度来比喻圣贤之间只有“量”而无“质”的差异，儒家更重视的是圣人与匹夫匹妇之间的相同性。由此，乡贤这一概念的产生也得力于儒家思想对于人的连续性的强调。此外，王东杰老师推测，乡贤等圣人之所以在明代大量出现，或与明代以后兴起的体验式文化有关。

最后，乡贤在庶民层面的意义何在？王东杰老师基于《颜元年谱》及民间故事中乡人邀请颜元驱鬼的记载，指出颜元在成为圣人的同时，事实上也被方术化了。在普通百姓眼中，圣人可以跨越正统和异端的界限，分享了部分神的功能与特征。因此，圣人除了提供道德的力量以供百姓学习之外，更多地起到供百姓崇拜的作用。

简言之，圣人供士大夫学习，而供普通百姓崇拜。并且，平民百姓对圣人的崇拜与神化完全基于自身的立场与需要，而不是像朝廷和士大夫那样出于政治的目的。

报告完毕后，与会学者纷纷分享了自己的感想与意见。王铭铭老师就报告内容提出两个问题，一是道士与高僧是否也可以成为圣人，二是能否在报告讨论的三重层次之上找到一个可以统摄三者的总体性。赵晓力老师则对造成颜元和李堪民间形象差异的原因有所疑问。对此，王东杰老师表示，颜元和李堪虽然同属颜李学派，但其在官方视野中的地位和价值可能不同，前者受到了官方更多的关注与改造，故而留给民间的空间就相对较小。吴飞老师的意见是，在乡贤的确立上，百姓似乎相比朝廷与士大夫在事实上更为重要，明代乡贤的大量兴起可能更多与宋代以后的乡里社会有关。王东杰老师回应道，明末的读书人也有不少对圣人的称呼，很可能还是士大夫文化对普通百姓造成影响。

第四位报告的是鞠熙老师，她的题目为“圣贤怎样成神：明清北京的城市土地神”。无论是《庄子·庚桑楚》的记载，还是明清北京的圣贤祭祀场所，都表明圣贤的确可以接受祭祀。但鞠熙老师提出，被祭祀的圣贤，并未真正成神。他们没有“香火”，不会在官方祠宇之外被祭拜，没有人会专门为他们修建新的庙宇，更不会成为灵验故事的主人公。在她看来，神灵的特点是神妙莫测，标志是香火，能力是灵验。相比之下，圣贤的神坛是寂静的、没有生命力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只有韩愈和于谦真正成为了这样的神灵，且都是作为土地神而被崇拜。从



王东杰著《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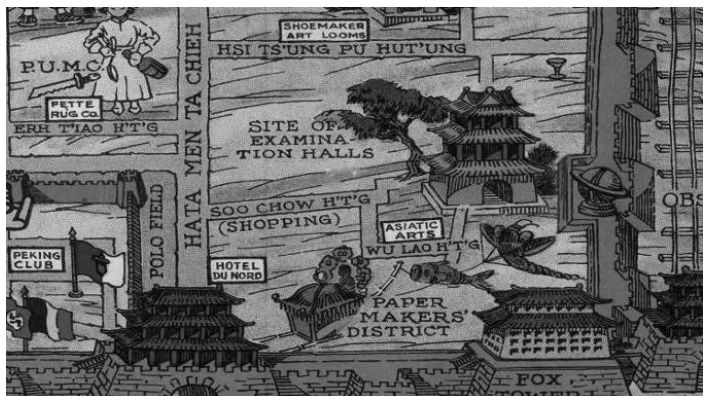
而，鞠熙老师尝试探讨韩愈与于谦成为土地神的原因与过程。

鞠熙老师首先指出，康熙二十七年国子监重修土地祠所书的匾额与对联第一次流露出韩愈成为土地神的迹象。在此之前的明嘉靖《皇明太学志》与清初谈迁的《北游录》都丝毫没有提及国子监有供奉韩愈的现象。而康、乾以后，言及韩愈是土地神的记载却井喷式出现。其中，袁枚《续子不语》“韩昌黎称老相公”条还记录了韩愈作为阴间专门负责科场之事的“老相公”，对口出狂言的秀才陈效曾施加报复的故事。可见，韩愈俨然成为了一个报复心极重的鬼神。相比之下，于谦成为土地神的经过就更为有趣。鞠熙老师发现，虽然于谦一度在北京成为土地神，但其香火

从来都是靠杭州人维持的。相信于谦是土地神的无一例外都是浙江来京的士子与文人，于谦的土地神身份从来没有真正被北京本地人所认可。清初，居住在北京内城的旗人将于谦祠改造成福德庵；光绪年间杭州同乡再度将其购

置下来并举行祭祀，多余房间还成为为杭州举子提供住宿的试馆。

那么，韩愈与于谦为什么可以成神？在鞠熙老师看来，如果做历史性的解释，韩愈与于谦被作为土地神祭祀可视为清初汉族文人在旗人社会中的“飞地”。而之所以选中了韩愈、于谦，可能是因其身上兼具对抗性与复仇性，即老子所说的“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或教主）”。此外，或许也和清初帝王有意识地将理学神学化，以整合多元文明的宇宙观有关。如《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用来描述韩愈的“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就被乾隆反复援引来论证北京是众神的源头，那么以韩愈作为国子监、贡院、翰林院等土地的保护神，也就象征着这些中央机构对全国儒学的辐射与控制。最后，鞠熙老师强调北京土地神更重要的特点是与“社”没有关系。对此，她不同意北京处在皇权直接监视之下，故而没有地方社会的解释。在她看来，明清北京城内土地大多为国有，以及北方社会只有冬季定居的社会形态或可为解答此问题提供线索。



北平风俗地图，弗兰克·多恩绘，1936年

评议环节，王铭铭老师补充介绍了广东土地神的情况，来与报告所主要谈论的北京土地神形成对话。赵晓力老师关注韩愈身份的特殊性，提出其成为土地神可能也与担任国子监博士、祭酒的经历有关。王东宇老师则提示大家，我们并不一定要为某种偶然性的存在找到原因和解释。渠敬东老师补充道，北方土地庙没有以地域为单位的社，可能和北方战乱背景下，社会的移动性、变异性特别强有关。接着，与会学者就祠庙地域性的判断标志继续展开讨论。

最后，刘永华老师带来题为“百神之主：明代政治话语中的君神关系”的报告。刘永华老师首先讲述了问题的由来：君主与圣人本属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君主在某一历史阶段成为了圣人，因而可能有一个君主的圣人化过程。成圣不同于成神，皇帝与神明之间的君神关系值得讨论。在君神关系视野下，神明的敕封，祀典的成立，以及作为祭祀“原型”的皇帝祭祀，都是需要考察的课题。此前，刘永华老师已经关注过乡里层面与地方行政组织层面的神

明祭祀情况，本次报告则主要围绕君主本身，从“百神之主”、“人神之主”等针对君主的表述出发，思考其中体现的君神关系与君神交涉问题以及历代表述的差异。

为了厘清“百神之主”这一表述的形成过程，刘永华老师主要搜集了五经及其注疏、唐宋正史及政书等两方面文献中的用例。他发现，五经及其注疏虽然没有正式出现“百神之主”的表述，但已经呈现了与之类似的概念。如《尚书》中的“俾作神主”指的就是让商汤作为天地神祇之主的意思。这一观念在唐宋时期的官方文书与民间表述中逐渐普及，如唐玄宗诏书的末尾以皇帝口吻自称“承宗庙之福，为人臣之主”，《朱子语类》提及“天子者，天下之主”等等。那么，如何理解这些表述中“主”的含义？刘永华老师结合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指出“主”的字义经过了从祭祀器物，到祭祀主体，再到政治首脑的转变。因此，所谓“百神之主”并不是驾驭百神之主体，而是天地神明之主祭，其重要性在于其在宇宙生生秩序中所具有的枢纽性位置。此外，唐代开始出现的“人神之主”包含有主祭与君主的双重维度，应与“百神之主”有所区分。

接着，刘永华老师择取几则文献用例，来讨论“百神之主”在明代政治话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在灾异或星变背景下，君主作为“百神之主”要有所反省和举措。如沈一贯所上揭帖、钱薇对嘉靖皇帝的劝谏都可以体现这一点。另一方面，君主作为百神之主，具有不同于凡人的属性。如郑庆云以此劝阻君主在宫中建醮、祭祀异端的行为；徐阶认为天子身为“百神之主”，

故而不会受到黑氛等邪气的侵扰；张居正则以天子为“百神之主”为据，论证其不必在大婚日期上遵循民间的吉凶礼仪——它们都展示出帝王在生生秩序中的位置，以及帝王与超自然世界的关系。对此，刘永华老师取得两点初步认识。第一，在“百神之主”的历代表述差异上，经疏多表述为“百神之主”，唐宋多用“人神之主”，明代则多用“天地（山川/四海/民人）百神之主”，“主”的对象、内涵似有增加趋向。第二，在君神交涉问题上，明代政治话语中出现了强调君主具备超越凡俗的特性的表述。

最后，与会学者围绕刘永华老师的报告展开热烈讨论。对于吴飞老师所指出的礼经根源问题，刘永华老师表示，某一表述的出现与其在一定时期被反复提及和使用是两回事，两者都值得重视。针对人神之主与百神之主的差别问题，王东杰与李霖老师都认为就报告出示的材料而言，两者之间似乎可以互相替换，可能只是修辞的差异。刘永华老师最后对五个具体用例所具有的不同意涵和面向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撰稿：徐铖）



155

段德敏等 | 镜像中的文明：《波斯人信札》三百周年

2021年12月22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211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镜像中的文明——《波斯人信札》三百周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崇明、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葛耘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



论坛现场

系学院张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发起人段德敏老师介绍了此次工作坊的初衷，由来自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学者围绕多元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丰富的讨论，在书籍出版300周年之际，纪念并对话孟德斯鸠的著名小说《波斯人信札》。

崇明老师首先以“《波斯人信札》中的政体、人伦与心灵”为题作主旨发言，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背景出发，结合《论法的精神》中的政体性质思想，分三部分评析了《波斯人信札》通过书信展示出的以波斯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政体以及政体所塑造的人伦与心灵的差别。

崇明老师着重评析了不同民族在家庭关系和女性社会角色上的差异所展现出的政体对人伦的塑造。两位在巴黎游学的波斯主人公，观察到在法国丈夫、父亲、主人缺乏权威，女人享有比较大的行动与交往自由。波斯的女人们则被封闭在后院中，法国社会却不采取亚洲的方式束缚和封闭女性。孟德斯鸠通过波斯人调侃法国人轻视妒忌的丈夫，视想要独占妻子的人为公共快乐的破坏者。女性的封闭与自由、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支配和女性对男性的相对自由，构成波斯（东方）和法国（西方）的显著差异，其背后是波斯（东方）的专制政体和法国（西方）的君主制政体的差别。在《随想录》中，孟德斯鸠指出应让人们看到专制政体如何暴虐地对待专制统

治者本人，也就是说要通过每个政体中人们的心灵和激情来理解政体的机制和动力，这种心灵和激情在《论法的精神》中被概括为“政体的原则”。在孟德斯鸠看来，专制政体要求社会服从一种绝对的权威，利用包括专断、暴力、宗教、习俗、礼法等手段建立严格的尊卑秩序以达成社会秩序的安宁，家庭是专制政体的重要一环，稳定的家庭秩序是实现其秩序安宁目标的基础，正如大家庭中儿媳妇每天来向婆婆请安的行为看似微不足道，却在中国礼法社会中必不可缺，因为这是稳定的秩序和权威的体现。

随后，崇明老师探讨了小说中象征微型专制社会的波斯后院对自然和人伦的扭曲。后院的女人和阉奴都是郁斯贝克的奴隶，但二者之间既是彼此的奴隶也是彼此的主人：在日常生活和娱乐方面，阉奴必须听从后院女人们的吩咐；但是在节操风化上，阉奴则可以采取一切严厉手段防止后院女人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这三种人的心灵状态各不相同。阉奴被夺去了性功能，欲望的折磨、挫败和羞辱扭曲了他们的心灵。他们卑贱地活在封闭和孤独中，却又决定着后院的美丽女人们的贞洁和德性。他们的唯一乐趣就是通过“义务”、“道德”、“廉耻”、“端庄”等词指挥和支配女人以使自己变为“男子汉”。后院的女人们为保持德性而丧失了自由和社会生活，却只被主人视作财产。后院的机制使得她们争风吃醋，感情和欲望都无法得到满足，同时倍受阴谋、狡诈、嫉妒、怨恨的折磨。而郁斯贝克呢？他表面上对妻子感情淡漠，只关心她们是否保有德性，

实际上他渴望垄断妻子们的爱，无时不感到嫉妒和对妻子背叛的担忧。

孟德斯鸠正是通过郁斯贝克的扭曲情感讽刺了专制的悖谬和虚弱。郁斯贝克视爱为对他人情感的需要和自我的不足，因此表现得冷酷无情，但却不堪嫉妒之扰。正如卢梭所说，专制的奴役是双向的，同时败坏了主人和奴隶。表面上看来，郁斯贝克在后院是高高在上的主人，但事实上他同样生活在后院的奴役当中，常常被阉奴和女人蒙蔽，甚至被他们支配。后院最终崩溃于混乱、奸情、自杀，正说明郁斯贝克企图通过强制的恐惧实施远程统治的努力是失败的。孟德斯鸠借助这一微型专制社会的崩溃，讽喻大国专制政体效率低下并必然不断走向腐败的本性。最为郁斯贝克宠爱、在他看来最为贞洁的妻子罗珊娜的通奸和自杀结局表明，专制政体下统治者企图诉诸恐惧来维持的德性不过是欺人之谈。罗珊娜的信中写道，“我可以生活在奴役当中，但我始终是自由的，我按照自然的法律改造了你的法律，我的精神始终保持独立。”这隐喻着人的自然情感对专制和暴虐的德性取得了胜利，即便这一胜利非常脆弱。

崇明老师在梳理郁斯贝克政治和家庭生活遭遇的基础上，就孟德斯鸠对君主制政体和专制政体的比较进行了解读。郁斯贝克在波斯宫廷政治和他的家庭生活中的双重失败表明德性与专制不相兼容，人们无法通过专制来建立一种德性的秩序。德性要求自我约束和自主，通过外在的强力和压制来迫使他人获得德性的过程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君主制同样没有多少德性可

言。《波斯人信札》描述的法国社会充斥着虚伪做作、欺诈败坏。孟德斯鸠在对比中呈现君主制和专制的关键差别，在于前者并不运用暴力强制来建立德性和秩序，转而诉诸于每个人的自爱的激情来确立社会秩序。这种自爱主要来源于对荣誉和荣耀的追求，它释放了人们的激情，并赋予社会较大的自由，带来了一定的道德混乱，但也仍然维持了秩序。孟德斯鸠邀请读者在专制东方和君主制欧洲之间进行选择：前者通过暴力专断维持秩序和表面上纯洁的婚姻和民情，后者容忍民情和社会的一定程度的不道德，但允许民众享受自由、安全和宽和。这一选择也是《波斯人信札》出版将近三十年后问世的《论法的精神》的主题。

承接崇明老师的有关论点，葛耘娜老师以“《波斯人信札》中的德性问题”为题，就“德性”这一具体概念的演变及小说文本的两种叙事展开，探讨了两种叙事的交错和“德性”的培养与退场。

德性是孟德斯鸠提出的三个政体原则之一，是政体分类理论的核心概念。但在《论法的精神》中，德性的概念被极度简化为热爱法律和热爱祖国而舍弃自己。葛耘娜老师指出在整个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尔基雅维利再到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传统中，德性概念经历的了明显的瘦身化过程。如何理解孟德斯鸠的这一简化？《波斯人信札》或许能够提供一些线索。《波斯人信札》依照两条主线完成德性问题的展开，一是政治叙事，集中于穴居人预言，二是伦理叙事，集中于后房故事。葛耘娜老师引入“镜像”概念，提出《波斯人信札》描摹出类

似镜厅一样的图景，无数的镜像排列、嵌套，在伦理叙事当中其实也包含了政治的叙事的结构想象。

首先是穴居人寓言引导的政治叙事，郁斯贝克通过这个寓言回答了友人关于幸福基础的问题。葛耘娜老师指出寓言中穴居人从一个人人自利的群体变成了一个利他的群体的结局，非常符合孟德斯鸠描述的共和政体的原则，指出德性是自利的反面，即利他的。孟德斯鸠对于这样一种有德性的生活的描述也十分典型：“到神庙祈祷的，不是祈求自己发财，而是为同胞祈福……他们牲畜都混在一起，就省去了分配的烦恼”。葛耘娜老师指出，郁斯贝克的回信将友人有关幸福的问题转换成了社会存在之基础的问题。而在后房故事中，郁斯贝克的一个妻子在信中说明后房的稳定需要三重保障：分别是义务 [le devoir]，使女人服从丈夫，保持德性；爱慕 [le penchant]，使女人只爱丈夫；法 [les lois]，保障女人只属于丈夫并锁于深闺之中。葛耘娜老师透视郁斯贝克对妻子或说教或甜蜜的话语背后尽然是对情欲的麻木和对控制的渴望，后房故事已超越简单的情色故事或伦理叙事而成为政治的寓言。后房俨然成为最赤裸裸的专制结构，郁斯贝克对妻子德性和情感的唤起，只是权力关系的必要装饰。

接下来，葛耘娜老师指出伦理和政治两种叙事都是培养德性的方式范本。穴居人由历史传承的教化和父辈作为生活榜样的感化，促使子一代推己及人地培养出对同胞的感情。而后房的故事中，郁斯贝克将原本是一种实践的德性，主要通过语言



《波斯人信札》的主人公郁斯贝克和黎加

性的基础是有选择的自由”的古典观点，提倡一种宽和的德性，不是对人性过分要求，也不是抽象说教，而是在相对宽松的相处当中孕育出对同胞的感情、对政治共同体的热爱，这也是他对宽和政府论述的组成部分。

张旭老师作题为“《波斯人信札》中的立法者科学：从穴

居人故事的隐喻谈起”的发言。在以《论法的精神》为参考的基础上，张旭老师关注到两部著作的共同主题，即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问题，以“《波斯人信札》中的立法者科学：从穴居人故事的隐喻谈起”为题发言。后作《论法的精神》充满了对立法者如何立法、建立何种宽和的政治秩序等问题的教导，《波斯人信札》则从人性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出发建设性地先行探讨了何种政治秩序可以被期待的问题，后者实为孟德斯鸠的立法者科学的前奏。

最后，葛耘娜老师提出《波斯人信札》中两个有关德性的叙事，结局都是德性的退场：是穴居人找到立法者并放下了德性的重负，是后房女人撕破了德性约束的外衣。葛耘娜老师联系《论法的精神》，提出专制的德性和爱共和国的德性的亲和性，专制政体权力对个人情感的剥夺同共和政体下对爱共和国的发生机制相同。这说明德性在共和政体和专制政体下都难以长期维持。孟德斯鸠为两处叙事设置德性退场的结局，暗喻着言语说教的方式不能维持德性，而对人性的苛刻的要求最后只会带来两种结局，要么是人在不堪忍受下放弃德性，要么是使用伪装来达到表面的德性。葛耘娜老师总结道，不同于之前的曼德维尔和之后的功利主义，孟德斯鸠秉持“德

居人故事的隐喻谈起”的发言。在以《论法的精神》为参考的基础上，张旭老师关注到两部著作的共同主题，即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问题，以“《波斯人信札》中的立法者科学：从穴居人故事的隐喻谈起”为题发言。后作《论法的精神》充满了对立法者如何立法、建立何种宽和的政治秩序等问题的教导，《波斯人信札》则从人性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出发建设性地先行探讨了何种政治秩序可以被期待的问题，后者实为孟德斯鸠的立法者科学的前奏。

张旭老师从11-14封信中穴居人兴衰变迁的故事入手，提出穴居人在摆脱德性的束缚、推举立法者之后将面临何种政治秩序的问题。参照《论法的精神》第二章关于政体分类的内容可知，穴居人在经历了专制政体、共和政体、社会状态（包括战争与和平两个阶段）后，最终放弃了道德的约束，而选择服从法律，进入由君主统治的政体。虽然郁斯贝克没有提及，但穴

居人在这一结局之后还会面临如何制定法律、建设国家的问题。《论法的精神》明确了制定法律的过程就是政体建立的过程，穴居人需要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这涉及道德、法律、习俗、宗教与政体等之间的关系。在《波斯人信札》中穴居人的故事位于全书的开始，开放性的故事结尾不由得使人视其后的信札为对穴居人结局的回应——回答了需要何种立法者科学和应该如何建立政治秩序的问题。张旭老师认为，穴居人国王及寻求启蒙的两位波斯主人公都是小说中的立法者象征。相较之下，郁斯贝克是专制主义下的立法者，统治着作为专制政体之写照、涵盖了复杂的权力控制关系的波斯后房；而黎加是没有后房、没有专制包袱的活泼朝气的年轻人，是潜在的开明立法者。郁斯贝克面对后房乱局下令清洗并决定回到波斯，这意味着其近10年的启蒙之旅未能消除其专制的取向，他仍是专制的立法者。他自始至终深受情感上的折磨，以至最终陷入近乎绝望的境地。可见，在全然败坏的专制主义之下，主奴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会遭受相互的暴政。作为开明立法者之象征的黎加，则因厌弃波斯生活方式而决定留在巴黎。这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从认知到情感都已成为开明之士的黎加，如果回到波斯并拥有一个后房的话，将会如何统治他的后房？

所谓“《波斯人信札》中的立法者科学”，其中的“科学”又有着怎样的意涵呢？张旭老师通过讨论书中有关理性和激情的不同部分，复现了孟德斯鸠政治秩序构想中对人的整体关照。一方面，书中的科学启蒙之旅是围绕着理性展开的，但另一方面

后房中的情欲、法国女人和教士的丑态等内容都无涉甚至违背理性，而与激情相关。理性与激情，都是构成人的存在的重要部分。张旭老师强调，孟德斯鸠是在通过呈现具体而完整的人来探讨政治秩序的问题，他不仅关照人的理性，而且强调激情的方面。激情虽然不属于现代科学的范畴，但是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而言，激情其实是构成人的科学的重要部分。

“要把人当作有感情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当作只讲道理的人来对待。”（《波斯人信札》，第33封信）

“要求一个感性的存在物不去获得感觉，试图拒斥激情竟至使之得到纠正的机会都没有，……恐怕如此高的道德准则只是推测出来的吧，而且从这样一个距离来



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书影

展示我们应该是怎样的，将使我们看不到我们是什么样的。”（《随想录》）

《论法的精神》强调激情在推动政体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孟德斯鸠以人的根本的存在方式为思想基础，将激情融入政治秩序构建的设想之中。而这样一种人的科学更具有某种古典的色彩。如保守主义思想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所言，“科学的意义是作为对现实结构的真实解释，作为人在其世界之中的理论取向，以及作为人理解他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的伟大工具”。而孟德斯鸠对于人的“科学”的理解与此相契合。巧妙的是，书中基于理性的科学知识都是通过直接异域见闻、学习和交流获得的，而激情和欲望则更多是在遥远的距离所产生的陌生感中被体验到的。通过远离家乡，郁斯贝克更深刻地认识到他自己的以及阉奴和女人们的情欲，同时面对巴黎社会的陌生情状，他认识到了法国社会的种种激情。理性和激情共同构成了郁斯贝克和黎加对于人的科学的理解，这也意味着，孟德斯鸠并未停留在现代科学所关注的层面，而是致力于把人的整体的存在秩序作为思考和书写的对象，这也是他的立法者科学的重要基础。

最后，回到穴居人选出国王后可能的选择，张旭老师分析了书中呈现出的法国和波斯这两种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对立，以及背后所体现的孟德斯鸠的古典理论视野。从古典意义上来说，政体之间的对立突出地体现在人们的精神状况和生活方式中。由此，法国的宽和政体与波斯的专制政体之间的对立，表现为巴黎社会和郁斯贝克后房之间的对立。法国是自由的，伴随着

纷繁驳杂的种种乱象，这正是因为人们的精神和情感是可以得到充分释放的。波斯是专制制度，它压制人们的身体、心灵和精神。在《论法的精神》中，这体现为专制政体的原则（即畏惧），它是一种全方位的奴役。纵观《波斯人信札》，孟德斯鸠在两种生活方式的对比中展示了法国自由政体和波斯专制政体的区别。在这两种政体之下，国家的方方面面相互关联，不论是政治结构，还是风俗习惯、家庭模式以及人的精神状况和行为方式，都是彼此影响和作用的。孟德斯鸠是以古典的整全性视野在打量着自己生活的法国和遥远的东方波斯，在他看来，政治制度的作用是首要的，它从根本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秩序，而同时政治制度又是诸多自然、社会因素的产物，它的继续有赖于特定法律、交往方式和情感模式的支持。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主张，法律应该和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相关联，应该和自然的状况、气候、土地、人的生活方式等相关联，也应该与宗教、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等相关联，这些关系构成所谓“法的精神”。由此看来，关于法律的制定以及与之伴随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孟德斯鸠所秉持的古典共同体视野是一致的，而也正在《论法的精神》中，他的“立法者科学”得到了完整呈现。

发言环节的最后，段德敏老师以“文明的陌生化与普世想象——《波斯人信札》中的文明互鉴”为题发表观点。段德敏老师从蒙田写作的食人部落看欧洲的故事引出有关文明比较的探讨。从欧洲以外的视角看待欧洲文明，欧洲内部的宗教战争是

以宗教的名义去折磨、屠杀他人，比食人部落食死人的行为更加野蛮可怖。但蒙田并非是完全的道德相对主义者，他只是希望在文明的比较之中，找到一种更加自然的人的生活方式。潜于蒙田的文明构建和比较视野当中的，是一种正义与理性，认为生活在文明之中的人们无法得知自己的习俗的全貌，要获得陌生的视角唯有跳出这种文明之外。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也采用了不同的文明之间的比较，两个波斯人在陌生的巴黎的见闻帮助他们反思身处的波斯社会。

随后，段德敏老师例举两位主人公在时间、空间转换中经历的文明冲击，不断凸显孟德斯鸠在小说中批判专制的核心关切。一是空间的转换陌生化了原本熟悉的文明习俗。郁斯贝克和黎伽不仅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社会惯常的习俗产生了疑惑，也对波斯人和阉奴生活在一起是否会降低道德感、不利于培养德性产生了怀疑，郁斯贝克对于阉奴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二是时间的转换深化了郁斯贝克和黎伽对不同政体下的社会问题的认识。他们逐渐认识到在欧洲尤其是法国两性之间较为平等，两性关系很开放。虽然开放的关系本身也招致不稳定和复杂等问题，但相较于波斯，在法国的夫妻之间，他们更能够享受到互相爱慕的感情。波斯的家庭关系当中具有更多的秩序，但是丈夫往往分不清楚自己的妻子到底是自己爱慕的对象，还是自己的奴隶。

在波斯高度威权的夫妻关系当中，其实也存在着弱者的反抗，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制造主人的不安，比如郁斯贝克的

妻子 zelis。段德敏老师引用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写“弱者的武器”，认为这种弱者的反抗类似于马来西亚农民地位地下，受到剥削压迫的武器是消极怠工，增加主人的损失以达到反抗的关系战略。这引出《波斯人信札》的一大主题，即对专制的反思和批评。

同时，两个波斯人眼中陌生的法国社会就是蒙田的视角下反思欧洲文明的镜子。这样一种视角只有通过外人才能够获得。信札中，两个波斯人经常用批评和调侃的态度来讨论法国的国王，此处就呈现出很细微处的视角的转变。段德敏老师在简单的波斯-专制和法国-自由的象征意义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法国君主制滑向专制的可能。欧洲的法国社会虽然代表温和的君主政体，但是借由波斯人的笔谈，路易十四和波斯国王的众多相似之处表明了孟德斯鸠对法国国王权力独断、贵族独立性不断下降的社会现状的批评。孟德斯鸠在此委婉地暗示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和传统的君主政体的法国是不一样的，在某种意义上滑向了某种专制政体。无独有偶，孟德斯鸠借郁斯贝克和黎伽之口将法国社会几乎所有人都调侃了一遍，教师、神父、想出名的文人、女士、炼金术士、投机者等等。在这一透镜下，欧洲社会最奇怪的莫过于宗教教义的纷争以及由此产生的暴力冲突，还有人们对宗教仪式的过分在意等等。

接下来，段德敏老师从小说写作方式的角度阐明了文明对话当中的普世想象譬喻。两个波斯人和其他人通信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第一人称的文明的对话，并在对话

当中产生了关于人和社会的普世主义的想象：人的自然生活到底应当呈现出何种面貌。欧洲社会和波斯社会，都是两种可能存在的生活方式，都有弊端。孟德斯鸠没有直接教导读者何者是更好的选择，或揭示是否存在普遍的自然主义的答案，但他的写作意图已明显地寓于书信之中。段德敏老师认为这非常类似柏拉图的对话结构，从不同主体的意见当中逐渐找到某种真正的知识。各方意见都不是正义本身，但是都包含着真理的某些部分，人们在对话中渐次逼近对真理的认识。此外，在段德敏老师看来，易卜拉欣的故事是《波斯人信札》最接近柏拉图哲学的预言。因为它也涵盖从洞穴到洞穴之外，从地上到天国的结构，故事结尾从天国回到地上，改造现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向上的超越

是最接近柏拉图哲学之处。段德敏老师提到理论一词自于希腊语 θεωρία，词根是旅行的意思。旅行其实就带来了某种视角的转换，就是对熟悉的事物的反思和质疑。沃林（Sheldon Wolin）就曾表示，“政治理论家们从来都是伟大的旅行家，或者去真实的地方，或者去想象的地方。”只有对熟悉的事物有自觉的反思和质疑，才可能有理论、哲学，从习俗超越到自然，从知识上升到意见。

《波斯人信札》中普世主义想象的暗面是其突出的有限性。郁斯贝克虽然经由旅行受到教育而更加智慧，产生普世主义的想象，但无法改变的是他仍然是一个波斯贵族，是后宫阉奴和众妻子的主人。之前时间和空间的这种转换是有利于他的教育的，但在后宫的乱局上是不利于他的，时空的距离招致的结果就是失去对后房的控制。一旦发现曾经的高压惩罚已经不能换来妻子的温情脉脉，启蒙教育带来的对自由等认识的觉醒，就加重郁斯贝克的后房主人身份带给他的挣扎痛苦。段德敏老师以同样的目光审视普世主义的文化和习俗，人们在文化和习俗当中感受到家的温情，而不需要考虑真理正义，但是一旦获得对真理的认识，就难以重返旧架构之中，或至少这一“重返”会带来未曾预料的痛苦。

最后，段德敏老师就《波斯人信札》对理解孟德斯鸠的政体的思想脉络之作用作结语。《波斯人信札》总体而言预见到了孟德斯鸠政治思想当中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政体、政治自由、宽和、政府、宗教等，非常有利于对孟德斯鸠整体政治思想的理解。同时，孟德斯鸠



或将自己的思想之旅也看成一场波斯人的旅行，并非出于否定熟悉的习俗文化和传统，而是为了更好的看待文化。对文化的敏感和好奇是所有严肃的思想家必备的素质，不跳出熟悉的范围就不可能获得新的视角，《波斯人信札》中旅行的意象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

与谈环节，现场听众就如何辨认信札中波斯人在新旧认知策略冲突下真正的思想态度向老师们提问。段德敏老师认为孟德斯鸠实际上是书信体小说的创造者，相较于旁白或其他更为直接的方式，采取对话的维度能避免书中对波斯和法国社会的批评流于偏见，更易被读者接受。崇明老师补充道，郁斯贝克的新旧认知冲突使得他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目光看待波斯和法国社会，但同时普遍主义又是脆弱而有限的。孟德斯鸠实际是将文化多元性和普遍主义的自然之间戏剧性的冲突载于郁斯贝克身上。张旭老师联系孟德斯鸠于1751年所写的《关于〈波斯人信札〉的几点想法》，指出对法国宗教的批评也是为了突出波斯人在当地的陌生感和疏离感。

发言者们还从葛耘娜老师发言中“德性的退场”问题出发，就《论法的精神》中三类政体原则在不同政治文明中的表现展开讨论。葛耘娜老师认为后院结局中德性并非崩溃而是退场，因为两种政体对人的德性的要求过度抽象和严格，至《论法的精神》将德性极度简化。崇明老师主张诚然并非一类政体只存在其标志性的一种原则，但专制政体依靠恐惧维系德性的方式只能迎来革命的结局，说明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是无法培育真正的德性的。张旭老

师认为应当通过辨析是何者主导着政体的运作方式来区分不同政体。共和政体依靠荣誉为本的德性推动，而专制政体中是恐惧而非德性是主导力量，这就是二者的区别。波斯后房的结局并非没有秩序了，而是一种旧有的依靠恐惧运转的秩序不再起作用。

随后，发言者和现场听众还从法国政体所处的君主和专制的中间状态出发，谈及孟德斯鸠政治思想中商业文明与民主制度的关系，由《波斯人信札》中的18世纪波斯与欧洲文明之间的陌生进而讨论到19世纪帝国扩张阶段欧洲主流知识分子对待异域文明的态度，前期对文明多样性的觉察和反思促进了社会进化思想的诞生。

（撰稿：穆晨哲楠）

156

徐正英、常森 | 简帛古书与传世文献



徐正英教授



常森教授

2021年12月31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56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简帛古书与传世文献”。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正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常森作引言，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孟庆楠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程苏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李林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李秀男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论坛为“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活动之一。

论坛伊始，孟庆楠老师介绍了“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论坛和本次讨论主题。文献学既是学科方向，也是一种对文学、史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具有辐射作用的方法。本系列论坛旨在邀请非文献学专业

的学者介绍自己如何将本领域研究与文献学方法相结合。此次论坛的两位引言人都将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为切入点展开讨论。

首先发言的徐正英老师报告的主题是“上博简《孔子诗论》‘小雅’论残简阙文与相关诗

学问题”。徐正英老师认为，《孔子诗论》对《诗经》的讨论可以分三个层面：先分组逐篇解读《诗经》63首（包括6首逸诗）作品的文本内容；再分类归纳评述“颂”“大雅”“小雅”“邦风”四大门类作品各自的整体内容性质与整体风格特征；最后揭示诗、乐、文三大文艺类别的各自本质。其中第二个层面开启了“颂”“大雅”“小雅”“邦风”理论正式研究的先河。徐正英老师本次报告将在他对“大雅”论和“颂”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小雅”论展开。

徐正英老师表示，第三简“小雅”论简文中为“小雅”定性的关键句“小雅□□也”残缺，他将其补为“《小雅》少德也”，理由有二。其一，就情理而言，“大

雅”论简文为“《大雅》盛德也”，“颂”论简文为“《颂》平德也”，因此“小雅”论也应从有无、好坏、大小、盛衰等字中挑选构成“某德”。根据后面的简文称“多言难而悃（怨）怱”，可以判断为负面词汇。又根据“衰矣少矣”的简文，少一般与小互用，所以补为“少”字。其二，就实证而言。上博简的备简中有“小雅亦德之少者也”之文，佐证了上述推断。此外，徐正英老师还对第四简提出了新厘定。他认为，根据字形可以推断，马承源先生厘定的“诗示（其）猷坪（平）门”的“坪”字应为“墉”字，意为广大的城门。第三、四简文合起来表明，孔子认为“小雅”批评少德，主要书写苦难内容和怨愤情绪，以此揭示政治的衰败和当政者的少德。诗歌就像敞开的城门供人出入一样，是供人抒发宣泄情感的宽敞通道。

随后，徐正英老师讨论了简文对“小雅”内容归纳评述的准确性问题。“小雅”论简文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前述对“小雅”的定性，二是在批评少德的作品中，多书写苦难和怨愤情绪，三是另收有书写民众忧患和上下级不和两类作品。通过对读简文中的归纳概括与《诗经》文本，对读简文中对“小雅”20首诗的评述和历代学者成说，可以发现“小雅”诗涉及到内忧之难、外患之难、时事之难等3

种难，忧世伤乱、老矣无妻、怨怼谗言、婚姻不幸、流民遭遇、朋友无情无义等6种怨愤情绪，以及民众自我叙述苦难、民众抒发忧患情绪、对民众遭遇表达同情等3类“民之有其患”，君臣不和、朝中大夫与执政大臣不和、同级官僚的不和、一般官场的上下不和等4种“言上下不和”的情况。总的来看，74首“小雅”作品仅字面上涉及到上述四方面的就有57首，其中直接描写怨怼的有37首，足见简文与《诗经》文本深度吻合。

最后，徐正英老师总结了孔子“小雅”论的三个诗学贡献。第一，孔子在论“国风”和“颂”的简文中都兼谈内容与风格，唯独“小雅”论只有内容概括，没有风格特征。徐正英老师认为这是孔子有意为之，苦难与怨愤的内容书写本身就是情绪的抒发，体现了以怨之情论“小雅”的风格。第二，初步确立了“诗缘情”学说。虽然“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传统都源于《诗经》，

但从传世文献看，两大理论发展极不平衡。《左传》记载孔子六岁赋诗言志说明彼时“赋诗言志”已是成语，《尚书·尧典》标志着“诗言志”学说正式形成。“诗缘情”学说则直到西晋陆机才正式确立。“小雅”论简文的发现将“诗缘情”学说的确立提前了700年。第三，《孔子诗论》虽受季札影响，但亦有修正。比如季札说“小雅”“怨而不言”明显与文本不合，孔子将其修正为“怨怼戚患”。孔子的态度也被后世刘安、司马迁继承归纳为“怨诽而不乱”。

第二位发言的是常森老师，报告题目为“新出土文献与屈原辞”。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发现战国竹简，其地与屈原生活的区域相隔不远。李学勤先生推断郭店一号墓的年代最晚不迟于公元前300年，这与一般认为的屈原自沉之年公元前278年相距不远。上博战国楚竹书被认为是楚国迁郢都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品，也与屈原生活时代有所关联。常森老师认为，上博简、郭店简中的儒典对屈原辞有较大影响，本次报告主要涉及的部分是郭店简《五行》和上博简《孔子诗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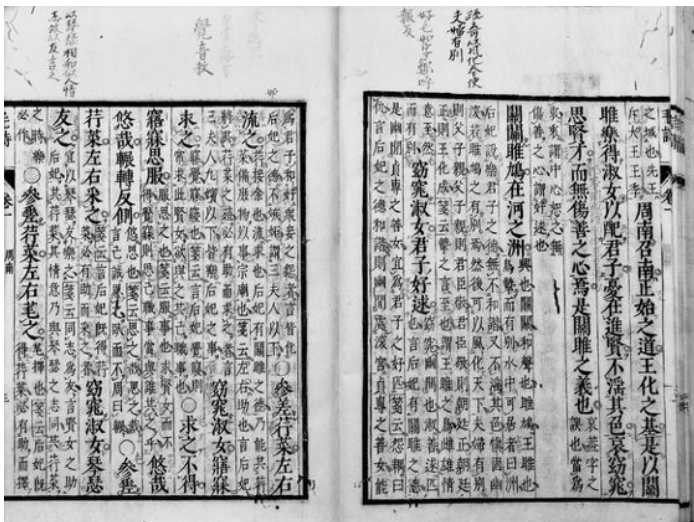
常森老师首先提出，郭店简、上博简中的儒典主要是儒家八派中“子思之儒”的著述。原因有二。其一，郭店简所见早期儒典中有承载子思五行学说体系的重要著作《五行》。其二，郭店简儒典中有记载子思事迹的《鲁穆公昏（问）子思》，还有子思纂录、“记夫子之言”的《兹（缙）衣》等。上博简也有《紃（缙）衣》。

常森老师认为，巫咸降神告吉一事是解读《离骚》所有重要隐喻的钥匙，这正与郭店竹简构成了有组织的文本关联。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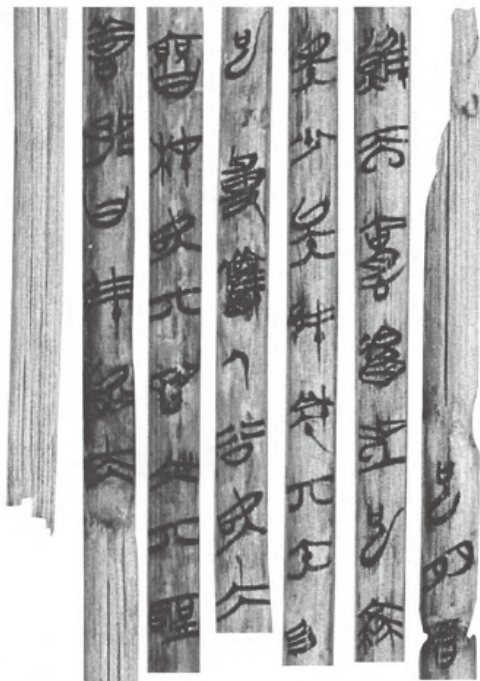
咸降神告吉出现在主人公三次远求美女失败之后，彼时主人公“心犹豫而狐疑”，但巫咸讲完一系列君臣遇合的往事，主人公便“历吉日乎吾将行”。关键在于，这些君臣遇合的往事几乎全部出现在他生活时空中的那批竹简里。郭店简《穷达以时》中提及的舜-尧、咎繇-禹、傅说-武丁、吕望-周文、管夷吾-齐桓、百里-秦穆、孙叔-楚庄七组君臣中只有管夷吾和孙叔-楚庄未在屈原辞中出现。

更重要的是，《穷达以时》所表达的，臣子的穷达是由人所无法干预的天时所决定的观念反复出现在屈原作品中，比如《离骚》“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此外，《穷达以时》提出君子在不通达的时候也不应改变对德行的持守，要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这也正是屈原遭遇现实政治不顺时的选择，比如《九章》“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对于《穷达以时》和屈原辞间的这种关联现象，常森老师称之为“对象文本之间的‘有组织的关联’”。他提出，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在文本上偶然一现的关联并不重要，这种有组织的关联才值得重视。

接下来常森老师以芷兰意象为核心分析了郭店简《穷达以时》、上博简《兰赋》和传世文献《离骚》三个文本两两之间的有组织的关联。以芷兰比君子是屈原辞的最重要隐喻之一，也可见于《穷达以时》和《兰赋》。比如《穷达以时》有“芑（菝/白芷）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嗅而不芳”，《兰赋》更有多个相关文段。此外，《兰赋》也借对兰的描绘，表达了穷达以时、修己待时的观念，因此与《穷达以时》构成了有组织的关联。至此，我们可以推断以芷



《毛诗郑笺》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小雅”论部分内容，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兰比君子、君子穷达以时、修己以待时这三方面的意指以郭店竹书所见早期儒典《穷达以时》为上源，以上博简所见早期儒典《兰赋》为过渡，之后流行为《离骚》等屈子辞，从单纯到复杂，从单向度到多向度，与时俱进，最终在屈子手中蔚为大观。

由于时间所限，常森老师简要介绍了上博简《孔子诗论》、马王堆及郭店简《五行》和传世文献《离骚》等屈原辞三者间以“以色喻于礼”为线索的两两有组织关联。关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他强调虽然出土文献在载体和呈现形式上有其特殊性，但是作为“文本”与传世文献相较并无特殊性。中国古典学的深度取决于深度掘发这两种文献的“互联互通”，而具有

相当程度自明性的“文本间有组织的关联”便是“对象文本的互联网”。

讨论环节，三位与谈人分别就引言提出了一些评论和问题。

程苏东老师提出，徐正英老师的研究启发我们重新认识诗学史中“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理论的发展历程，比如，为何汉人更喜欢“志”的概念？是否可能早期“志”与“情”并没有特别严格的界限，只是后来才出现了分化？程苏东老师对常森老师提出的“文本间有组织的关联”尤有共鸣，并进一步提出，近年来他在研究中越发感到先秦文献可能是相互勾连的一张网，传统的研究单一作家作品的方式也许对先秦文献有很大问题。李林芳老师表示两位老师的研究都非常有启发性，若借由《孔子诗论》反观传统诗经学对《关雎》的研究，可以发现《毛传》在一些方面延续了《孔子诗论》对情的强调，而这些部分在《郑笺》中荡然无存。比如“寤寐思服”之“服”字，《毛传》解为“思之也”，《郑笺》解为“事也”。李秀男老师提出，孔子自身是不遇之人，《荀子》中亦有相关讨论，因此可能关于不遇问题，当时儒家思想体系中已有成说。关于如何确立简帛古书与传世文献间关联的问题，李秀男老师结合自己比对马王堆帛书《十六经》与传世文献《国语·越语下》的研究认为，《十六经》中描述的黄帝战蚩尤的场面很可能借鉴了《国语·越语下》中勾践灭吴的情节。

(撰稿：孔祥瑞)



（四）邀访学者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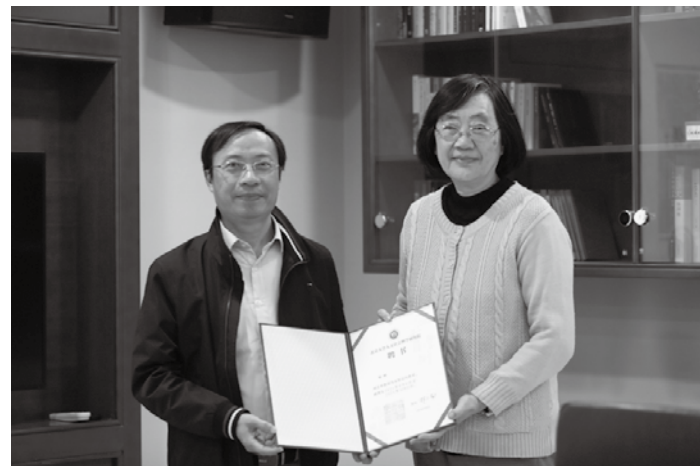
07

刘永华 | 十九世纪徽州乡民的生计与社会关系： 婺源程家的个案研究



2021年11月2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十九世纪徽州乡民的生计与社会关系：婺源程家的个案研究”。第十一期邀访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缪德刚、苏杰、武琼芳、虞云国、於梅舫、张国旺、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罗新、王奇生、赵世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刘永华老师回顾了目前学术界对十九世纪中国乡村生活的认识。十九世纪处于明清史与近代史两个领域之间，这一时期史料上尚无细致的乡村调查，统计数据也不多，因而这个时代虽然离我们不算遥远，但我们对这一时期乡村生活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刘永华教授（左）颁发聘书

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在经济方面，这一时期乡民生计境况与乡村经济的走向还存在不少争议。在社会方面，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变与不变、秩序的继续与崩解也有不同认识。刘老师谈到，2006年他接触到一批徽州乡民所记排日账（记录始于1838年，讫于1901年），开始以此为基础，对徽州婺源程家的生活世界进行了综合考察。本次报告主要介绍了他对程家生计模式、生计状况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他希望这个研究有助于推进对十九世纪乡民生活的认识。

在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调查中，徽州属于水稻一茶区，这个定位有助于了解婺



《太平欢乐图》第81幅“卖盐”，内容引自《两浙盐法志》

源北乡乡民的生计模式。由于山多田少，这一带的耕地每年只能生产不到半年的口粮。为了养活自身，乡民必须在农耕之外寻找生路。从十八世纪起，随着中西茶叶贸易的兴起，茶叶日益成为当地重要的收入来源。此外，山货采集、商品贩卖与挑担也成为乡民的谋生方式。刘老师对 1838 年至 1901 年程家的劳动时间安排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程家的生计来源主要包括粮食种植、茶叶生产、商贩活动（山货采集加工与贩卖、食盐等商品的贩卖、挑担等）三个部分。程家的农场有水田 3 亩左右，另有部分旱地，每年生产的粮食

约为全家口粮的一半。程家在鸦片战争前就已进入茶业，最初主要从事贩卖活动，鸦片战争后转而直接介入茶叶生产。茶叶生产与贩卖所得，太平天国运动前每年可获得一二十银元的收入，运动结束后增至三四十元，光绪九年分家后回落至二十多元上下。此外还可观察到，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程家的生计模式发生了变动，在食盐等商品贩卖上投入的劳力日益减少，而投入开荒的劳力大幅增长，旱地面积有所提高。

接着，刘老师侧重从核心收支比较、最低消费篮子两个方面，对十九世纪程家的生计状况进行了讨论。由于排日账记录本身的局限，全面重构程家的收支（特别是支出）状况困难较大，因此刘老师首先对核心收支（即茶叶收入与余米支出）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在数据相对完整的十四个年份中，只有三个年份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形，而且缺口不大。同时，刘老师还分析了程家的最低消费篮子，亦即维持全家温饱所需的开销，并将之与历年的收入做了比较。统计表明，从 1838 年至 1901 年六十多年时间里，太平天国前、太平天国后至十九世纪末，程家生计状况尚好，太平天国期间生计状况首次出现恶化，十九世纪末则因米价上扬、债台高筑、国际茶市异动等原因，出现了生计危机。

报告还讨论了太平天国结束后程家社会关系的变动。刘老师对太平天国运动后程家所在地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尚未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动，但在社会关系方面可以观察到一些新动向。在阶级关系上，由于茶叶收

入增加、开荒舒缓了口粮问题，程家租入土地的数量有所下降，租佃关系稍有弱化迹象；同时因茶季雇佣外地和本地茶工，程家与茶工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在人际关系上，太平天国结束后生计状况的改善，为程家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经济基础。程家下一代先后成亲，程家自身及其亲属关系都得到再生产。同时程家也营建了新房，在此过程中其人际互动圈子有相对程度的扩大。此外，为改善医疗条件，程家还与当地医者建立了礼物关系。不过在社会秩序方面，太平天国结束后，物业纠纷开始大量出现，盗窃行为逐渐猖狂，跨地

域物业冲突有所扩大，社会秩序开始出现恶化迹象。

最后，刘老师追问了“谁的十九世纪？”这个问题。他认为，生活在不同地域、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对十九世纪可能有不同的历史体验，不过十九世纪生活于东南山区高商业化乡村的小农家庭，很可能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与程家类似的生计与社会动向，当然这一点还有待于更多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的证实。

（撰稿：刘永华）

08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 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文献举要

2021 年 11 月 9 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文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教授



敦煌藏经洞

献举要”。第十一期邀请学者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缪德刚、苏杰、武琼芳、於梅舫、虞云国、张国旺、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付马、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阿依达尔老师从敦煌吐鲁番回鹘文文献在上世纪初流散海外的特殊命运谈起，介绍了回鹘文文献在国内外的收藏和研究情况。回鹘文文献主要为上世纪初斯坦因（Aurel Stain）、伯希和（Paul Pelliot）、勒柯克（Albert Le Coq）、奥登堡（S. F. Oldenburg）等人掠获自敦煌吐鲁番等地的；在国外，主要收藏在英国图书馆、英国博物馆、法国国立图书馆、吉美博物馆、德国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文献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等地。上世纪初，由拉德洛夫（W.

Radloff）、穆勒（F. W. K. Müller）、W. 班格（Bang）等人开创研究先河，并接续至今。

就国内收藏地而言，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敦煌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等，收藏写本包括《弥勒会见记》《华严经》《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等重要文献。近期，学术界连续报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杭州庐江草堂、台北傅斯年图书馆等机构也藏有回鹘文文献，其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收藏的《编年纪》、名词术语与杭州庐江草堂收藏的《玄奘传》《十叶道比喻花环》以及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华严经》等文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

阿依达尔老师指出，国家图书馆是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重要单位。馆藏的回鹘文文献既包括《玄奘传》《阿弥陀经》等大部头作品，也有收录在《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珍》（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任继愈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和

其他未收录的散见文献。其中，《玄奘传》《阿弥陀经》和部分散见文献在回鹘佛教史、西北汉语方音、语言接触史、文化交融等研究方面属于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玄奘传》，又名《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唐代著名僧人、翻译家玄奘的事迹，由他弟子慧立、彦棕等撰写和整理，在公元10-11世纪由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译为回鹘语。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玄奘传》写本约240页，由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袁复礼在乌鲁木齐购得，后捐给北京图书馆。1932年，德国学者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借走，1946年才完璧归赵，葛氏一并归还约瑟夫·克钦（Joseph Kachin）从中东去北京途中所购买的另8叶。1951年，王重民、季羨林先生出版其影印本。同时，冯家昇先生对其进行了初步的考证、整理和研究，出版研究报告《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后来，耿世民先生延续了此项工作，研究刊布了其中占较大篇幅的第七卷。近期也有一些相关的学位论文，比如，上海师范大学林翼培的博士论文《回鹘文慈恩传转写与汉字音研究》，从回鹘汉字音的角度研究《玄奘传》，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现阶段，德国学者利用葛玛丽的转写先行一步，结合圣彼得堡本（92叶）和巴黎藏本（123叶）已完成了回鹘文《玄奘传》各卷的语文学考证，但仍有必要进行一次更深入的汉回对勘研究。

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阿弥陀经》共25叶，耿世民先生刊布了其中的8叶。该经之所以叫《阿弥陀经》，是因为其页眉写有 abitaki 一词。abitaki 其实就是“阿弥

陀经”的回鹘字音，但文献的内容显然与净土三经中的《阿弥陀经》无关。据耿先生回忆，1983年他访问敦煌时，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看到一件写有 abitaki 小字的文献尚有用红墨写有“大白莲社经”字样，所以耿先生发表的论文中经名都冠以“大白莲社经”。该经除国图外，还收藏在圣彼得堡、巴黎、伊斯坦布尔等地，需要整合所有写本进行整体的语文学考证。可据此考察当时回鹘人的净土信仰。

论及国家图书馆藏散见回鹘文文献时，阿依达尔老师重点报告了他近期的研究成果，并以个案的方式详细介绍了《华严经》《阿含经》《妙法莲华经玄赞》等文献的特点。据阿依达尔老师介绍，国家图书馆尚有20余件回鹘文写本，内容多为佛经，除《华严经》《阿毗达磨俱舍论》《妙法莲华经玄赞》《入阿毗达磨论注释》外，《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等部分文献属首次发现，在西域佛教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图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入阿毗达磨论注释》等写本可与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藏品相互互证，表明这些文献的来源与西北科学考察团有关，应由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捐赠。国图收藏的回鹘文《华严经》写本也与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等地藏品和羽田私人收藏图片、兰州范军澍收藏品同属一个写本，至于如何散落各处，其路径值得深究。

（撰稿：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09

赵灿鹏 | “梁武帝时代”的终点：一个虚拟历史的研究视角

2021年11月15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赵灿鹏作主题报告，主题为“‘梁武帝时代’的终点：一个虚拟历史的研究视角”。

第十一期邀请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缪德刚、苏杰、武琼芳、虞云国、於梅舫、张国旺、张浩、张涛，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一、引言

1981年3月，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周一良先生写成论文《论梁武帝及其时代》，收录是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学术论文集》。这是周先生晚年比较重要的一篇学术论文，从梁武帝的统治方式、军事才能、佛道信仰、学术文化成就、性格及其画像等五个方面，讨论了梁武帝统治时代的特点和表现，具



赵灿鹏教授

有开创意义。之后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多篇（部）题目相似、以某个帝王统治时代为研究中心的论文著作与引申研究——例如赵以武于2006年出版的《梁武帝及其时代》一书。

时隔四十年，赵灿鹏在文研院（北大历史系旧址）发表以“梁武帝时代”为主题的学术报告，究其原始，是受到周先生的直接启发，对相关的时代影响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谨此向前辈学者致以钦敬之意。

“虚拟历史”（virtual history）的概念，来源于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著作《虚拟的历史》。通过反思的思考方式（counterfactuals），我们可以对因果关系与必然性制约的历史决定

论进行置疑，探究历史事件的另一种可能。在西方史学中，著名的“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Cleopatra's nose）的典故（注：出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思想录》第162节，原文为：“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如果它生得短一些，那末整个大地的面貌都会改观。”），很早就被用来探讨偶然性与机缘的偶合关系（注：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四编）。采用“虚拟历史”研究视角的真正用意，并不是漫无边际地在反事实假设提问中追寻空虚的答案，而是藉此显现研究对象在历史世界黯淡的光芒中，被遮蔽甚至埋没的内容和意义。

哈佛大学东亚学系教授田晓非在著作《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中指出：梁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辉煌、最富有创造力的朝代之一，也是最被低估、受到误解最深的朝代之一。是何种原因导致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对梁朝的忽视与贬低？这是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史方向的提问，主旨与梁武帝时代的影响问题相关，富于学术内涵。

二、终点一：事实终点

梁武帝萧衍（464—549）的生命，终止于梁太清三年（549）。他在位48年，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与明朝万历皇帝并列排名第四，仅次于清康熙帝、乾隆帝和汉武帝。在明代以前，一直保持第二名的纪录，仅次于汉武帝。梁武帝也是中国古代最长寿的皇帝之一，在历代皇帝中名列第二，仅次于清乾隆帝。在清代以前，稳居排名之首。中国古代皇帝中，享年80岁以上的有4人，即清乾隆帝（89岁）、梁武帝（86岁）、宋高宗（81岁）、

元世祖（80岁）；如果加上武则天（83岁），就是5人（注：参见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五一《庚戌元旦》诗原注，及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四十九章）。

清乾隆帝、宋高宗、元世祖三人皆为寿终正寝，而梁武帝则是被发动叛乱的东魏降将侯景软禁，在幽困中去世，接近于非正常死亡。据史籍记载，梁武帝的死亡原因之一是饥饿。唐代韩愈的名文《论佛骨表》，有梁武帝“饿死台城”的批评。在“侯景之乱”中，建康（今江苏南京）围城内外，有普遍的饥荒和瘟疫，“死者太半”，其中包括众多皇家成员及宗室、大臣、武将。而梁武帝并未感染疾疫，表现出强健旺盛的生命力。如果不是“侯景之乱”的干扰，梁武帝很有可能寿至期颐（注：如同时代稍前的那位享年将近百岁的高丽国王、在朝鲜历史上以“长寿王”著称的高琏（394—491）），创下中国纪录之最。

梁武帝因为佛教修持戒行的缘故，在饮食和性方面成为素食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于医道也有较深程度的研究了解，属于养生型的君主（像清代著名的乾隆帝一样），又有姚菩提、姚僧垣父子（其后人即《梁书》作者姚察、姚思廉）等国手作为宫廷医生，对其生命护养是一个有力的保障（注：见《周书》卷四七《艺术·姚僧垣传》）。

袁文（宋）《瓮牖闲评》卷八有言：“若梁武帝，寿数虽高，遭侯景之乱，狼狈而死，又何足贵耶！惟高宗当天下承平之时，其年尚未及六十，乃以万机之务，尽付之寿皇，方且陶冶圣性，恬养道真，所乐者文章琴棋书画而已。其他子女之奉，声色之娱，初未尝留意焉。此所以五福兼全，独过八旬之寿，自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苟非胸



梁武帝画像二副

中有大过人者，能至此乎？”

这段文字将梁武帝与宋高宗进行对比，试作分析，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遭（遇）侯景之乱”，梁武帝是不是就“足贵”了呢？“侯景之乱”的发生，对于梁武帝一生的论定，有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侯景之乱”的发生与否，造成关于梁武帝截然不同的评价。后人具有的、熟悉的、接受的，是“侯景之乱”发生之后对梁武帝的评价。如果把时间的终点置于“侯景之乱”发生之前，关于梁武帝是否会有另外一种认识？换句话说，是否后人熟悉的、关于梁武帝的认识与评价，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梁武帝时代本来具有的一些面相和意义？这些面相和意义可能很重要。

三、终点二：虚拟终点

《南史》卷五八《韦叡传》附《韦粲传》：“大同中，帝尝不豫，一日暴剧，皇太子以上并入侍疾，内外咸云帝崩。粲将率宫甲度台，微有喜色，问所由那不见办长梯。以为大行幸前殿，须长梯以复也。帝后闻之，怒曰：‘韦粲愿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为其主，不足推。’故出为衡州刺史。”

《梁书》卷四三《韦粲》不载此事，只说大同十一年出为衡州刺史，有所隐讳。《周书》卷四七《艺术·姚僧垣传》：“（大同）十一年，转领太医正，……梁武帝尝因发热，欲服大黄。僧垣曰：‘大黄乃是快药。然至尊年高，不宜轻用。’帝弗从，遂至危笃。”

可为史料佐证。

赵老师在此补充时代背景：梁朝、东魏、西魏，南北朝三国鼎立，呈现“后三国时代”的竞争态势。梁武帝在当时的声望，可见东魏权相高欢语：“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见《北齐书》卷三四《杜弼传》）此事《资治通鉴》系于梁大同三年下。江左在晋室南迁以后，成为华夏文化正统所在。梁武帝恭俭勤政，喜好文学，敦崇儒学，按照传统理想中的圣君标准制礼作乐，梁朝的学术思想文化达到极高程度的成就。

经过大同十一年（545）发生重病的惊险事件，梁武帝安然康复。两年以后，东魏大将侯景投降；再一年，侯景发动叛乱；又一年，梁武帝在幽困中去世。如果梁武帝在大同十一年去世，此时“侯景之乱”并未发生，梁武帝的“圣君”形象不会崩坏轰然倒塌。

《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大同十一年纪事残缺，只记三月庚辰诏、四月魏聘梁、十月己未诏等三事。据《魏书》

《周书》《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是年六月，梁将陈霸先等攻讨交州叛臣李贲，大胜；七月，梁朝遣使庾信等聘问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见《周书》卷四一《庾信传》），再度展现出南朝文化的优越性。

《梁书》卷五六《侯景传》：太清三年，侯景抗表曰：“窃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艺。……宪章文、武，祖述尧、舜。兼属魏国凌迟，外无勍敌，故能西取华陵，北封淮、泗，结好高氏，輶轩相属，疆场无虞，十有余载。躬览万机，劬劳治道。刊正周、孔之遗文，训释真如之秘奥。享年长久，本枝盘石。人君艺业，莫之与京。臣所以踊跃一隅，望南风而叹息也。”相关追述可见北方人士对梁武帝普遍的认识。

四、总结

有关“梁武帝时代”，《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论赞：“……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梁书》卷六《敬帝纪》魏徵论赞：“……凡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魏、晋已来，未有若斯之盛。”《南史》卷七《梁本纪》中论赞：“自江左以来，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古人云“盖棺论定”，生命的终结点是衡量帝王功业的时间界限。长生是帝王的梦想，然而“寿则多辱”的谚语，在梁武帝身上得到应验。“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见毛泽东《沁园春·雪》）。“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可惜梁武帝未能跻身于中国古代帝王的第一序列。

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七六《八月十三日于避暑山庄行七旬庆典即事成什》：

“七旬屈指数今古，六帝因心验法惩。”原注：“三代以后，帝王享国年逾七旬者六帝，汉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其中可法者，惟元世祖、明太祖耳。然亦不能无遗憾焉，其余皆予所鄙以为戒者。”

冯梦龙（明）的《喻世明言》第三十七卷《梁武帝累修归极乐》中关于梁武帝生平的记述，与《梁书》《南史》《建康实录》《资治通鉴》等基本史籍多不对应。鲁迅小说《长明灯》（收入《彷徨》）：“那灯不是梁五弟点起来的么？”梁五弟是梁武帝的讹称。凡此种种，皆可反映明清以来普通民众的历史知识程度，是那个光辉灿烂的梁武帝时代逐渐褪色，以至于光芒黯淡的表徵。

我们能够想像现代普通中国人，把乾隆皇帝写成钱龙吗？！

（撰稿：赵灿鹏）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梁书》书影

10

姜文涛 | 英国 18 世纪的情感与印刷文化——以埃德蒙·伯克之美学观为例



2021 年 11 月 23 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姜文涛老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英国 18 世纪的情感与印刷文化——以埃德蒙·伯克之美学观为例”。第十一期邀请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李天纲、刘永华、缪德刚、苏杰、武琼芳、虞云国、於梅舫、张国旺、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彭春凌出席并参与讨论。

报告伊始，姜文涛老师首先从印刷文化的研究脉络谈起。这起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当时收音机和电视机作为新媒体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甚至也可以追溯到 1930 年代哈佛大学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有关荷马史诗是一种口述传统的猜想。及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巨著《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从宏观层面展开近现代印刷技术对西欧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阿德里安·约翰斯（Adrian Johns）在发表于 1998 年的《书籍的本质：印刷和形成中的知识》（*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一书中则认为并不

存在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印刷文化，从微观层面上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历史性的讨论。这其中，有关口言、口语性（orality）、口言传统和书写、识字能力、文学素养（literary）、文字系统等方面的问题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认为英国的 18 世纪为一个“情感的世纪”（the Age of Sensibility），其时关于情感、感觉、感官的论说是自 17 世纪开始的近代知识形成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后者包括培根的《新工具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欧洲大陆的生理学知识、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等。而 18 世纪的英国又是印刷媒介逐步充满到日常生活之中的历史时期。

这在埃德蒙·伯克关于“崇高”与“优美”的美学理论中有所体现，其“崇高”与“优美”的理论于 1747 至 1756 年之间逐渐成型。他在 1757 年发表了后来成为美学经典文献的《论崇高与美丽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一文。姜文涛老师对这个文本进行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化的分析，将 18 世纪的情感、印刷文化和美学并置在一起进行讨论。

本次论坛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伯克的“同情”观。“同情”是一种身体情绪和感觉，是 18 世纪美学和道德哲学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涉及身体感官层面。在伯克这本书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不可描写的，我们交给同情”。对伯克来说，同情作

为人类“情感”之一是通过身体的美学运作习得的，这种运作反映在字词的描写上，而字词的美学运作未必一定会孕育出同情。伯克强调情感的修辞性功能甚于逻辑，这与古典传统中修辞的定义和功能正相符合。他强调身体、声音在交流中的作用。

第二部分涉及到伯克对所谓“后洛克时代

文体标准”的态度。培根在其《新工具论》（1620）中倡导印刷文化中呈现的客观性、清晰与民主的精神动力学之间的关系，并与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等人提出后来被学者归纳为“普遍性语言”的计划。伯克则在处理感官印象与字词、观念之间的关系时，发展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理论，形成一种历史修辞——强调语言的声音，并将之诉诸于维护英国的习惯和风俗。这种历史修辞也体现在了他 1790 年发表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论述中。

第三部分，姜文涛老师讨论到伯克对于诗歌、绘画等不同艺术表现效果的看法。对伯克来说，模糊不清、不确定、朴素以及面向无限这些因素更重要。相比而言，明晰和确切的效果可以通过具体、模拟性的描写完成，反而不是那么重要。近代书写技术和印刷文化引起了语言交流功能的变化，使得各种感官分离。如多萝西亚·范·穆克（Dorothea von Mücke）所说：“语言开始符合逻辑的规则，并且拥有全副的人类自造的符号，并因此成就了用来分析的完美工具”。伯克所



姜文涛老师作主题报告

采取的则是一种情感中心的美学感觉感官模式，认为身体及其美学的情绪不应该是分开的，而应该存在于一种语言的、富有通感韵律的舞蹈时刻中。他认为诗歌和修辞要优于绘画：它们是更为口言和听觉的媒体，能更多地引起直接（immediacy）和在场（presence）的感觉，它们在新的、更为视觉的感官方式来临之前，面向一种英国的听众。

伯克的美学理论所强调的同情产生出直接的、个人的触知性，而这种由触觉带来的感官方式会迅速地被“诡辩家、经济学家以及计算者”带来的抽象方式取代——后者是塞缪尔·科勒律治称之为“言语真理”（verbal truth）的符号充斥的一种表现。文化史家通常认为，一直到 18 世纪后期，一个引起当代人不安的近代意义上的阅读和写作的世界开始形成。这似乎可以表明一个近代意义上“阅读公众”还未形成之前的文化时刻。

本次论坛最后，姜文涛老师还讨论到了德国、法国以及苏格兰的启蒙传统。

（撰稿：姜文涛）

11

张国旺 | 元代官吏除授文书体系初识



张国旺副研究员主讲

牒。然而随着黑水城文书以及元代文集附录、明代方志和族谱所收录的大量元代文书(包括抄件)的发现,现在可以初步构拟出元代官吏除授文书由“宣命—敕牒—割付—付身”的文书体系。本讲分别讨论了宣命、敕牒、割付和付身的体式、使用范围、发出机构等文书学特点。

张国旺指出《元史·选举志三·铨法中》:凡迁官之法“自六品至九品为敕授,则中书牒署之。自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则以制命之。”可知元代宣命颁授给一品至五品官员,敕牒颁授给六品至九品官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明刊百卷本《临川吴文正公集》附录中收录有蒙汉文合璧的《大元累授临川吴文正公宣敕》十一通,其中封赠宣命、除授宣命各四通,除授敕牒三通,展现了元代宣命和敕牒的体式。张帆《元朝诏敕制度研究》(《国学研究》第十卷)引用这批史料,以研究元代的宣敕(制敕)制度,考察了元代宣命和敕牒的体式。李治安(《元吴澄八思巴字宣敕

2021年11月30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一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副研究员张国旺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元代官吏除授文书体系初识”。第十一期邀访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苏杰、武琼芳、於梅舫、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院务会,第九期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李鸣飞出席并参与讨论。

报告会伊始,张国旺指出,传统意义上的元代官员除授文书主要包括宣命和敕

文书初探》,《元史论丛》第十四辑)则将这批八思巴字宣敕文书进行了拉丁文转写,进而深入讨论了此中所反映的元代高、中级官员除授制度,强调以八思巴字蒙古文为正本,汉书旁注,从而彰显蒙古本位政策倾向。阿风在隆庆本《瑯溪金氏族谱》中发现了《元授震一府君镇抚宣命》(阿风、张国旺《明隆庆本休宁〈瑯溪金氏族谱〉所收宋元明公文书考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九集,商务印书馆,2015年)。通过比照上述宣命,可将元代除授宣命的体式复原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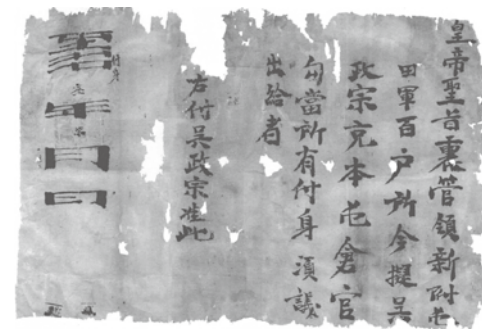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某授某职。宜令准此。年月宝日。

张国旺基于吴澄文集所收录敕牒和明代郑燮所辑《济美录》所收录的《再授郑安尹歙县牒》,复原出元代除授敕牒的体式,进一步指出元初敕牒直接继承金代敕牒而来。至元三年,更敕牒旧式,形成了元代敕牒的基本体式。八思巴字颁布后,敕牒则以“蒙古字书、汉字副本旁注”。《济美录》所录《再授郑安尹歙县牒》是抄录的汉文副本。与宋金敕牒不同,元代敕牒增加了“皇帝圣旨里”的起首语,文字也更加简洁明了。元中后期,敕牒遂成为国家治理地方、封赏军功的工具,甚至进入市场以解除授官员的燃眉之急,从而导致了官僚体系的紊乱。

张国旺认为割付并非仅作为行移文书而存在,也有部分割付为除授文书。比对明隆庆本《瑯溪金氏族谱》之《元授震一府君治中割付》,《济美录》之《授郑安尹歙县割付》《授郑璉婺源县太白渡巡检

割付》,以及弘治《休宁县志》之《承制授程隆休宁县尉割付》后,可以看出元代早期和中后期的割付体式略有变化,但都比较简单。就其源流而言,元代除授割付直接来源于金制,早在蒙古前四汗时期就已行用。其发出机构除中书省外,枢密院、制国用使司、六部、宣徽院、徽政院(詹事院)、太医院、宣政院、通政院以及部分工匠局院,地方机构则包括行省、宣慰司、路、州县等,还有宣慰司都元帅府、万户府和一些专司机构及投下王府。割付的接受者则多为军官中的千户奥鲁,各卫所百户、总把、镇抚所提领、令史、都目,学官、仓库、局院、钱谷、税务、水旱、站官、僧道官等杂职官和高级吏员。

付身,“谓给其授文也”,是吏员委任的一类文书,在黑水城文书中有不少具体实物存在。李逸友、杜立晖对付身的给授虽然都有所讨论,但仍有未尽之处。据资料来看,付身所授予对象的职级或地位显然要比割付所授予对象低。故付身当是元代除授文书中低于割付文书的一种类型,主要适用于包括学官、仓库官、僧道



黑水城吴政宗充新附屯田军百户所仓官付身(《中国藏黑水城文献》)

官等在内的部分杂职官中的低级官员和一些吏员。

张国旺通过上述讨论，利用文书学的方法，结合以文献记载，基本还原了元代“宣命一敕牒一割付一付身”的官吏除授文书体系。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文书体式所反映的政务运行机制的变化、行政体系与

文书体系的关系、“割付”的语言学分析、元代相关文书收集的拓展、元代文化的历史地位，文书词语在语言学上的变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张国旺)



12 张浩 | 农地再延包三十年：政策衔接是关键

2021年12月7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二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浩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农地

再延包三十年：政策衔接是关键”。第十一期邀访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缪德刚、苏杰、武琼芳、於梅舫、虞云国、张国旺、张涛、赵灿鹏，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喻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张浩老师指出，在交流会的“坦白从宽”中，他已提及一直受困扰的问题是农村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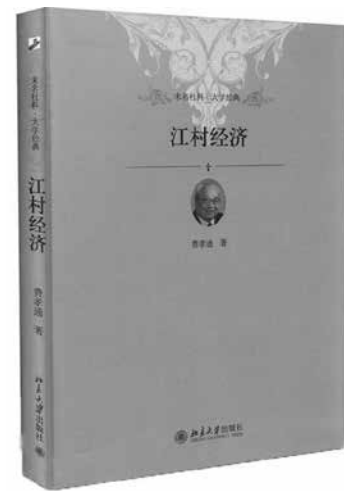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张浩副研究员（左）颁发聘书

得出的判断是农民群体自1949年以来一直受到一系列的体制性束缚，迄今仍有不少束缚尚未解除。社会学的前辈费孝通先生晚年回顾自己的研究，总结为“志在富民”，那么他也立下一个小小的期许，希望自己的研究多少能够有助于还权赋能于民。中国社会一向的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力道太强，民众往往相对被动。所以他在做研究尤其是政策性研究时，往往会下意识地问一句：老百姓会怎么看？

张浩老师提到，改革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土地制度的研究几乎都是经济学家在做，很少听到社会学家的声音。他最初下田野做调研，也没有理会土地问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和田野工作，观念有了改变。一方面在梳理学界前辈关于乡村的研究时，他注意到与社会学相关的一些前辈如梁漱溟等都曾关注土地问题，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就是以苏南地区土地占有上的一种特殊安排作为分析的起点；另一方面这些年在各地东奔西跑，越来越感受到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农民对土地制度安排的诉求。既然土地问题如此重要，学界前辈又有研究的传统，何不重拾起这个研究传统呢？他因此转向对土地问题的关注。

在苏南的江村做调研时，他注意到大部分村组都在进行定期不定期的农地调整，有五年一调的也有一年一调的。苏南地区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之一，农地收入在当地农户全部收入中只占微不足道的位置，农户为什么还这么看重农地呢？这种背离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国家政策坚持进行土地调整的做法在全



费孝通著《江村经济》书影

国范围内普遍吗？这构成了他最初的问题意识。

自改革之初推行家庭承包制以来，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目前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这套基本经营制度背后是一种特殊的土地占有与分配的产权制度安排，包括农村集体的所有权、农户的承包经营权以及新近由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承包权与经营权。有国外学者认为，目前农村土地产权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是政策设计者有意为之的结果，是“有意的制度模糊”，目的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回旋空间和余地。但在张浩老师看来，这种说法其实表明了作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缺乏了解。这样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与其说是“有意的制度模糊”，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在剧烈的政治社会变迁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权宜和妥协之后形成的一种非预期的结果。也因此，家庭承包制在确立之后持续面临外部和内部的压力：外部压力主要是对家庭承包制

本身的质疑，构成了承包制本身的稳定性问题；内部压力主要是土地承包之后持续面临农户要求随着人口变动调整土地的普遍诉求，构成了承包地块的稳定性问题。

从政策走向和制度演化的轨迹看，决策者在综合权衡利弊得失之后选择了一条持续稳定承包地权的道路，包括保持家庭承包制本身的稳定性和保持承包农户与承包地块的关系稳定性。十九大报告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便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又一次努力。

不过，政策的出台是一回事，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是另一回事。广大农户对于

农地再延包政策是什么看法呢？基于一项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张浩老师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农户的认知和态度：第一，对于新一轮再延包三十年政策的看法；第二，对于新一轮承包期内要不要调地的看法；第三，对于进入新一轮承包期时要不要调地的看法。

他进而指出了该项研究所蕴含的政策含义，指出做好下一步的政策衔接是顺利实施农地再延包三十年政策的关键。

（撰稿：张浩）

13

武琼芳 | 敦煌石窟隋代供养人服饰

2021年12月9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三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武琼芳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敦煌石窟隋代供养人服饰》。第十一期邀请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缪德刚、於梅舫、虞云国、张国旺、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

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李娜、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叶子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武琼芳老师先从选择敦煌石窟隋代供养人服饰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讲起。隋朝国祚虽短，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时期。正因有了隋代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积累和铺垫，才使得大唐盛世的空前繁荣成为现实。隋代的服饰染织既融合了南北朝的胡汉多民族影响，又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多重浸染，为影响后世千年的唐代服制

打下了基础，是中国服饰染织发展史中不可轻视的重要一环。然而，目前对于隋代服饰染织的专门研究非常少。

敦煌石窟，是指在古敦煌郡、晋昌郡（瓜沙二州）就岩凿凿之佛教石窟寺，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石窟

等石窟组成的石窟群。它是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化遗产，其千年营建的连贯性能为探究服饰的发展与变迁提供标尺。对敦煌隋代洞窟中保存下来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供养人像进行服饰染织方面的专门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隋代社会各个阶层、不同人群的服饰信息，特别是隋代平民服饰的风貌，以弥补《舆服志》等史料记载更多关注社会上层人物礼仪服饰的缺憾。

由于古代敦煌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敦煌石窟隋代供养人身份具有多样性的特点，研究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物着衣形象，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各民族、各地区的服饰风貌，还能为其他关于东西交通、民族发展、文化影响等研究提供辅助支撑材料。

武琼芳老师的研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服饰的物质性为视角，研究服饰本身的款式和形制、色彩和图案、版型和材质等；第二层次是以服饰与穿着者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为视角，研究人穿着服饰



武琼芳老师

的方式、搭配、场合和礼仪等；第三层次是以服饰的社会性为视角，研究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艺术、民族、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差异性和融合性，以及这些交流和碰撞对各方服饰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敦煌莫高窟和西千佛洞近两千身的供养人像进行辨析，首次完整呈现出敦煌隋代石窟中供养人服饰风貌，从厘清供养人性别比例，到探讨供养人的身份地位、画像的空间排布与洞窟不同营建方式的关系；从分析供养人服饰的形制、搭配、图案、用色和持物，到推测影响服饰演变的各种因素，以及由敦煌石窟所见的隋代审美风尚，一幅敦煌隋代供养人服饰的画卷在大家眼前徐徐展开。

作为与人们生活最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中的首位，服饰是很能引起广大观者兴趣和共鸣的品类。武琼芳老师表示，希望今后能将敦煌石窟中一些典型、特色的古代服饰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介绍和弘扬，结合多媒体或其他技术进行图文并茂、



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

甚至实物复原的展示，使敦煌文物真正“活起来”，让更多的人能更直观地了解我国古人的服饰风貌、生活状态和礼仪文化，从而深刻地体验到敦煌文化贴近百姓生活

的一面，为弘扬敦煌艺术和文化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撰稿：武琼芳)

14 张涛 | “复原”可以作为方法吗？——信息时代《仪礼》研究进路的思考

2021年12月14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涛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复原’可以作为方法吗？——信息时代《仪礼》研究进路的思考”。第十一期邀请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苏杰、缪德刚、於梅舫、虞云国、张国旺、张浩、

赵灿鹏，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兰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张涛老师的报告从《仪礼》这一经典的特性谈起。在中国经典之中，《仪礼》是较为特殊的一部，其独特性在于，除了流传至今的大多数经典都具备的文本属性之外，《仪礼》作为先秦典礼活动规程的详细记录，文本中还充斥着大量的人物、

名物、动作描述，体现出很强的行动的特征。在现代学者详加论述的“礼典-礼书”二分框架下，能够清晰地理解《仪礼》的这一特性。由此，历史上针对《仪礼》一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就与研究其他经典的方法有所不同。清代学者总结概括，以为古人读《仪礼》之法，大体可分为三种：分节、绘图和释例。

张涛老师指出，这三种方法都有很古的渊源，至清代集其大成。其中，绘图方法又较特殊，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礼图”传统。历代礼学文献汗牛充栋，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文字，而礼图则以图像为主，文本为辅，是对礼、礼学经典和礼学思想的图像再现，也是中国文献典籍“左图右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图大致可以分为仪节图和礼器图两大系统。礼器图的产生渊源比较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仪节图是否有比宋代更早的渊源？现在尚不能够做出十分肯定的回答。这不仅涉及到学术本身的发展，还与记录学问的书写媒介有关。在出土文献发现以前，存世最早的仪节图与礼器图都是南北宋人的著作，这不是偶然的。

宋代礼器图的制作受到当时古器物学勃兴的影响，而仪节图的出现也与宋人重视礼仪实践的倾向有关。日渐普及的雕版印刷技术，为礼图的撰写、传播与保存提供了便利。此外，以绘图的

方式来研究其他经典的著作也逐步增多，嗅觉敏锐的出版商也面向普通读者开发出了一系列的“纂图”经书文本，而带有插图的大众读物更是为数众多，销路甚广。虽然普通读者受好奇心驱使，接触的多是以名物为主的礼器图，然而礼图的影响也由此溢出“学术圈”，经典礼仪、礼制，通过时人认可的古代形象，实现“礼下庶人”，向更广阔的市民社会普及。

张涛老师认为，这一“礼图”传统的当代表现之一，就是20世纪中期开启的《仪礼》复原研究。因此，就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复原研究不过是传统“礼图”在当今时代的延续。但是，新媒体技术、信息技术的介入，实际成为这一旧传统展现新形式的重要助推力。1960年代台湾大学孔德成团队、世纪之交叶国良团队分别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借助多学科研究成果，实现了具体《仪礼》篇目的动态影像再现，是对局限于平面图像的传统“礼图”的突破；近年来，清华大学彭林团队联合嘉礼堂、香港城市大学邵志飞团队进行的《仪礼》



张涛副研究员

复原研究工作，则尝试采用真人表演与实景/虚拟场景相结合的路径进行多媒体影像拍摄，制作数字影片与交互应用平台，有望将“礼图”传统向前更推进一步。

影像媒介能否用来表现历史、展示经典内涵？换言之，新媒体是否能够参与到学术写作当中？张涛老师提到，这一议题不但有中国学者参与讨论，曾在21世纪初提出整理二十四史等古籍要考虑采用音像光盘等新手段，而且欧美学界早先就有过实践与讨论。文字与新媒体技术都是人类叙述能力的实现手段，无论论文、著作还是多媒体影片及交互应用，都属于知识人对历史与现实世界的一种解释行为，然而后者在呈现视觉形象方面具有更强的表现力，《仪礼》复原影片内容的丰富程度是礼书文字与传统礼图等形式均难以企及的。当然，影像媒介的解释效能也与传统媒介

有着很大区别，在此方面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史学者所提醒的“这种媒体的危险之处”。长久以来，影像文本都是作为文字文本的辅助而存在。而伴随今后信息技术与视觉文化越来越强劲的发展势头，多媒体影片及交互应用在提升人文学术成果方面可以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历史书写的手段、数字人文方法的优势与限制、新媒体学术成果的学科属性以及古典观念与仪式在当代生活中的延续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撰稿：张涛）

15

於梅舫 | 铸经与破经：康梁师徒重塑中国文化的途径分歧及旨趣离合

2021年12月16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五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於梅舫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铸经与破经：康梁师徒重塑中国文化的途径分歧及旨趣离合”。第十一期邀访学者阿



於梅舫教授

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繆德刚、苏杰、武琼芳、虞云国、张国旺、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於梅舫教授表示，康有为、梁启超既为“晚清今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又是中国文化近代变迁的关键要角，深入了解康梁师徒重塑中国文化的取径与旨趣的异同离合，可以对晚清今古文之争的本来事实与后来描述和近代创新文化的不同取径提供新的认识。

大体来说，清代的今古文分争，如亲历其事的学人所说，“清初诸人讲经治汉学，尚无今古文之争”。（章太炎《清代

学术之系统》）到乾嘉以后，学人虽然分别今、古文，却旨在“欲明汉人专家之学”（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第二书》），以征明古书、古学（章太炎《与支伟成》），并非具有入主出奴、此是彼非的门户派分的见解。晚到清末，“自今文家以今文排斥古文，遂有古文家以古文排斥今文来相对抗”。其中，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树立“今文”经排斥“古文”经，大张“今文”经学门户，引起较长时段内士林官场的连续反响，是今古文学术史论述中的枢纽要事。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康有为，今古文分争在晚清学术史上是



《三礼图》卷十四，所绘为爵



康梁师徒合影

否存在，也并非不是问题，更何况成为清代学术史上与程朱陆王、汉宋议题鼎足而三的大问题。

以《新学伪经考》为例，此书在康氏本人整体学术体系中具有极为扼要的起始一环，所谓撰“《伪经考》而别其真贋，又著《改制考》而发明圣作，因推公、穀、董、何之口说，而知微言大义之所存。”（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全书烙有鲜明的康氏印记，“最富于自信力”地表达：刘歆遍伪群经，故需截然破除古文“伪经”，恢复今文“真经”，进而申说孔子“真经”所匹配的托古改制的义理（康有为将托古改制定为义理）。此类表述，容易让研究者的视角，更关注于康有为确立公羊学的“今文经”立场，又因为康氏今文经学立场中鲜明的孔子托古改制的意味，亦牵及康氏的变法（改制）理论。

于是，今人在研究晚清今古文之争的

历史时，比较自然地出现了以下两种互为影响的倾向。因康氏学说中具有浓厚的公羊学色彩，易于将公羊学与清代今文经学划上等号，故一面以公羊学在清代的发生、兴盛来条理清代的今文经学历史，一面则又以清代中前期流行的公羊学说来解释康有为的学说。事实上形成一个自成首尾的逻辑圈。这很有可能导致一个

结果：既不能正确说明康有为学说形成的历程，同时也消解了清代公羊学自身发展中的丰富意味与现实关系，也难以恰当的把两者的真实关系链接起来。

因此，至少需要将清代公羊学演进的本事本意作为一层。康有为学说的形成史及其因时不同的政学抱负为一层，时人对于康氏学说的接受反响及其政学意涵为一层。

扼要来说，在康氏政学理念演进过程中，受到朱子学说及人格的深刻影响。康氏对于朱子学说的运用或是塑造，因事因时而更易，此种变化，体现康氏抱负与措施之因时递进。《教学通义》在其中地位关键。康氏由中法马江之役的时局所刺激，受师友学说之影响，更受到龚自珍国家衰乱由于人才不兴，人才不兴缘于学术不能复古，学术复古在于回复“六经皆史”一代有一代之治（学、礼、法、道）之“学”的影响，并以编礼书的朱子为典型，撰成《教

学通义》，呼应龚自珍的“自改革”理念，有意编礼书铸经典。至上书受挫则大感世道淡薄，感觉世道大异，教也须大变异，于是发愿如刚果近禅的朱子，“托于教”，诗集与致友人函内大张其旨，遂在回粤乡居的时候，撰《伪经考》。《伪经考》重订“真经”及其传承系统，并发挥原（新）教义，是其立（变）教的重要一环。这一学术操作，与朱熹集注《四书》别出于《五经》、序列“道”的传承、确定新义理的精神极为近似。康氏既以朱熹为偶像，更愿以朱熹之道而为新时代的朱熹。通过运用刘歆伪造经典之说，在立“真经古本”的基础上，“恢复”孔子改制之的“微言”而别于《四书》的“大义”，树立以公羊学“孔子改制”义传承为核心的道统。确立真经的本子（铸经），传承的新道统，而对于“改制”之义的诠释则很具有一些“民权”说的时代特色，显示康有为“世变异则教异”的特质。这一颇具“开放性”的阐释，对于戊戌前士林与官场人士的认识与接受，产生极大影响。

《伪经考》具备双层特质：既有“熔铸事物”，辨析汉代今古文经学历史的“考据”过程。更有在“考据”揭明“真经”、重订“道统”后，打开的发明“素王改制”义理的窗口。康氏发明“素王改制”的义理，又多“因承”于“公、穀、董、何之口说”，本身也带有很强的“康子口说”（包括文字）色彩，因此也包涵了康氏因时而进的政学理念与抱负，其中不时显露出突破中国固有纲常，以师统驾于治统之上的“非常异义”。《伪经考》本身的这一“双面”特质，深刻地影响、约束了当时士林与官场中人

物对于《伪经考》的认识，故出现多歧的政学反应。

当时的士人、官员，因对于《伪经考》特质的了解深浅，出现迥异的认识与反应。大体上说，单纯读《伪经考》文本者，多从学问的角度视之，或称其可成一家言，或惜其考据粗疏，或讥其纯任主观、武断。也便是从“考据”角度，判其“考据”的得失，纯粹出于论学的一面，此一层恰恰不见所谓今古文之争的意味。与康氏有较深往来者，则从其口说、书信中，了解《伪经考》更深一层意思。

於梅舫老师指出，其中人士，大体也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正面视之，如江浙的宋恕、孙宝瑄、夏曾佑等，论学虽未必与康氏完全合辙，却颇认可《伪经考》显现出来的“君民共主”的民主色彩。尤其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中坚，不仅赞同“素王改制”说，且在湖南的南学会、时务学堂、《湘学报》、《湘报》多有推护，也因此引起张之洞及湖南当地士绅的强力反弹。一类对此有所保留、忌讳，如朱一新，由《伪经考》所显露的素王改制义，怀疑康“日新义理”，“独言圣人罕言之理”，颇有“逾义理之学”，便是指其有突破君臣之分。

更进者，如张之洞早先对康氏虽颇表赞同，多加赞助，而在知悉其“素王改制”说后，对其政治抱负顿起忌心。《孔子改制考》不仅因“素王改制”说已经口说大为传播，而且很容易将此与“素王改制”说联结为一体，更是引起极大争议。从张氏一系列行动及幕僚的观察，甚至有将康氏视为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之意，可见对于康氏《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的反对，主要围绕“素王改制”说的“非常异义”、近乎于“教匪”的“异心”，绝非所谓《公羊》《左传》的今古文学问之争，也不能以改革与守旧限之。事实上，最早将张之洞排斥“素王改制”说，与今古文“学术”之争联系起来，并在后续的追忆、书序内不断加强这一说法者，就是康有为本人。而被张之洞引为批驳康学同道的章太炎，也承认“古文”不成专业。然而，在学术史的叙述中，康、章早已成为晚清学术史上壁垒坚实的今古文之争中的典型代表。

康梁师徒往往合称，却多有不同。吴樵致函汪康年称：“窥其旨亦颇以康为不然，而不肯出之口，此其佳处。”而在熔铸中西古今学说中，康有为有铸经（旧瓶）成新学（新酒）之取径，梁启超一开始则以破除孔教经典为开始，以国家学说为圭臬，扛起了道德与学术的革命旗帜。

二十世纪初，受国家思想影响甚深的梁启超，一心想建立“新中国”（取其《新中国未来记》之语），为达此目的，具体的政治主张与实践因应时势而变动，与此政治主张密切配合、联贯呼应的是其“新学”之道。创办取之程朱所释《大学》“新民”之义的《新民丛报》为其重要举措。《新民丛报》以及《新民丛报》的核心文章《新民说》反映此期梁氏的新民理论。“新民”理论架构的根本逻辑非常清晰有力，适于报章鼓动宣传。核心在于“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如何讲新民之道呢？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中称学术是“天

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如旭日升天”，可以左右国家、世界之前途。“新之有道，必自学始。”“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故梁氏“新民”理论脉络可谓由新学——新民——新国家，层层递进。

相比于学术，“宗教今已属末法之期”，显然要超脱康有为的笼罩，确立自己的新学之道。不过这里需要辨析的是，这一理论架构中从“新学术”到“新道德”的描述，看似“新学”居于根本底蕴的位置，实际上这一路径面对的是受众，即梁氏在“新学术”中传递“新道德”。而在梁氏本人理念中，“新道德”已是确定的清晰目标，一定程度上“新学术”转而落于推阐“新道德”手段的地位，而非由“新学术”确定“新道德”。

在《新民说》中，梁氏以“公德托始”，在他的描述中，“人群之所以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而中国素来缺乏“国家”观念，缺乏对应“国家”的“公德”，则国家之新精神亟待发扬，因此梁氏在此期有一决断——“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而新道德与新伦理相应，“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有意突破维系王朝道德的纲纪，反映此期的“革命”性。

新学反而是为这一新道德服务。1902年秋，梁约黄遵宪一道编辑《国学报》，便称：“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

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恃此足以立国矣。”作为早期推动国学运动的领袖人物，梁启超的国学，实际上是要与公德（新道德）相配合。而“泰西”的国家学说下的国民道德居于核心地位，成为“进化”的方向，“革命”性植根于此。故梁氏号召“我国学者”，要善运学术之力，重心其实并不在如“培根、笛卡尔、达尔文”的创造，而在于“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点出“磨洗”的味道。与此相应的是，梁启超又《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以为文明进步，思想自由为其总因。欧洲有今日，皆由“古学复兴，脱教会之樊篱，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孔子之所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故反对“以保教为尊孔子”。意图打破一尊，主张学术与道德的进化与革命。

然而如果去除相对恒定的价值、意义、信仰的来源与根基，主张一切以进化与新为准，实际上即是标准可以随时更改，道德的维系力实际永远出于变动中。19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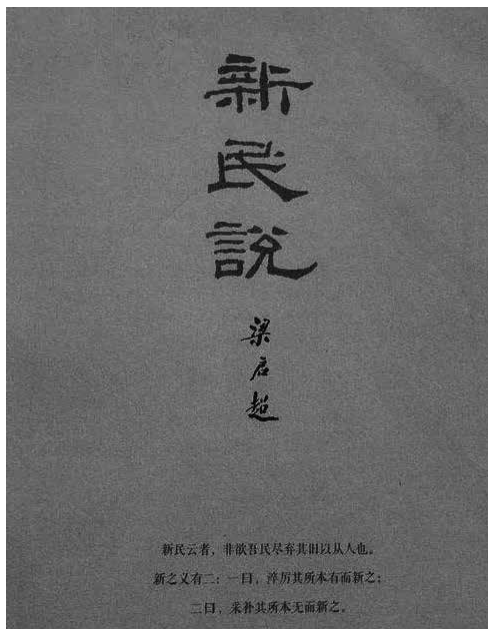
拒俄运动带来的革命风潮，使得梁启超可以目睹革命的真正狂潮，意识到“今之走于极端者，一若惟建设为需道德，而破坏则无需道德……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坏者，其目的非在破坏社会，而不知一切破坏之言，既习于口而印于脑，则道德之制裁，已无可复施，而社会必至于灭亡。”因此反思道德革命之说。好友黄遵宪观察梁“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之足以误国也，乃一意返而守旧，欲以讲学为救中国不二法门。”

1904年，梁启超开始调整新学之道。最能说明这一变化后的理论架构，是《节本明儒学案》（1905）《例言》所说道学与科学的分别与联系：“道学与科学，界限最当分明。道学者受用之学也，自得而无待于外者也。通古今中外而无二者也。科学者，应用之学也，藉辩论积累而始成者也。随社会文明程度而进化者也。故科学尚新，道学则千百年以上之陈言，当世哲人无以过之。科学尚博，



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



梁启超《新民说》书影

道学则一言半句可以毕生受用不尽。”即以道学为锚定，而科学则仍取进化观念。可谓破经后的折衷。

因此，《近世之学术》（1904年）可以一面赞赏清代汉学考证的科学精神，一面可以批评乾嘉时代学人整体上的道德失序。《欧游心影录》反对科学万能提倡精神之学而《清代学术概论》则欣赏清代汉学的科学方法。1920年代大力提倡“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可见其成为梁氏后半生的重要理论架构。

梁启超之前沟通中西有两大架构，一为中体西用，一为体用合一。梁启超则在二者之后，对二者皆有重要修正。梁启超

在戊戌之后尤其是1902年左右“猖狂言革”期间，大反张之洞中体西用说，主张“道德革命”，打破纲常，确立国家伦理，欲将自由、破坏、权利、民权等国家思想输入国内，改造国民，主要持“以西释中”的理念，几乎与主张体用合一的严复一致，事实上寻求的是从学到政的“西体西用”。

至美洲之行后，梁氏对于破坏之说大起反思，反对“瞎闹派”的革命，对于固有道德的追逐成为沟通中西思想的修正之道，因此提出近似于中体西用说的“中体”（根本）以为定锚。然而，他的学、道两分的理论架构，并非要回到中体西用说。对于中体，或者说固本之根本，梁氏绝不同于冯桂芬以至张之洞所要维持的“纲常名教”。相反，虽然此期的梁启超已领会到暴力手段下革命的破坏性，因此强调道德的恒常不变性，不随时势的演变而发展，然其道德说的维持目标，恰恰在于皇朝“纲常”对立面的国家与社会，其建立立宪政治国家以取代专制政府的理想，并未改变。

同时梁氏对于严复体用合一之说，也有修正。最巧妙的地方，在于梁氏所谓“道”，有体之实，甚且有中国固有学说精神之实际，却并不居于或者说强调“中体”的地位。虽然梁氏以阳明学尤其是以黄宗羲为后续发展为核心的良知学说，作为“道”的提倡方向，但在整体理念下，道实际上出于“良心之自由”，故“无古无今，无中无外，无不同一，是无有新旧之可云也。”虽然，行道德，仍受社会性的约束，“因于社会性质之不同，而各有所受。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随此冥然之躯壳，以遗传于我躬，斯乃一社会之所以为养也。”因此，

“道”（体、文化）既无中西之别，为普适的理念，只是因社会性质而表现有异，内在则同，既然如此，注重进化性的科学自然可以在此根基上生长，回应了严复的中西体用合一说。

在梅舫老师看来，梁氏之说，既能因应立宪政治与建立国家的时代要求，使专制政府无借口可言，又避免吸收西学而失去中国固有之精神，以至于最终走向全

盘西化尽“化为西人”。康梁师徒沟通中西文明的不同取径，显现近代创新文化的多样性，而因应时势的变化与保有价值、意义的根本之间的紧张，长期考验着哲人的智慧与眼界。

（撰稿：於梅舫）



16

缪德刚 |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早期学科化



2021年12月21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六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缪德刚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早期学科化”。第十一期邀请学者虞云国、杜斗成、李天纲、陈少明、曹家齐、苏杰、刘永华、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赵灿鹏、姜文涛、张浩、张国旺、於梅舫、张涛、武琼芳，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缪德刚老师即指出，外国经济学说在近代传入中国，中国经济思想



缪德刚副研究员

开始融入外来要素。中国经济思想因此而衍生为两条发展线索：一是外来经济学说在被借鉴于解释中国社会经济现象过程中逐渐本土化；二是通过吸收、借鉴外来经济学说中的理论要素，一些学者试图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解构出能与国外经济思想相互观照的中国经济思想。其中，原本已经学科化的外来经济学说本土化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演进的主流，绝大多数既有研究也是围绕该领域的相关议题展开。与之相较而言，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经济学学科化构建问题需要更多探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科化问题首先涉及的是经济学学科化发展问题。本次论坛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中、欧经济思想的范式分野

19世纪中期以前，东、西方地区皆产生过经济思想，不同地区的经济思想之间还具备一些相通的特点。如古代中国、希腊、罗马经济思想为例，它们重视农业生产，而对工商业持保留态度。18世纪的欧洲经济思想已经呈现出理论架构及分析方法系统化或科学化发展情势，这一点已经被部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者所关注和讨

论，他们采用“Science”来表述经济学的系统化。一些观点认为，《国富论》的问世标志着经济思想在欧洲地区发展成为了系统化的经济科学。

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欧洲地区的经济思想几乎是相对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二者都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停滞，但16、17世纪日益发达的工商业贸易推动了欧洲地区经济思想的革新。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政治学、哲学、科学的繁荣为经济思想在欧洲地区的科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不仅将经济问题分析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它们主张的分析方法也有一定的科学性。经济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并不占主要位置，它不仅没有与其他思想文化分离，也未能从前人的价值观念中独立。限于社会生产方式以及自身浓厚的世俗伦理特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常见于采取规范方法分析现实世界局部的经济现象，直到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科学化进程上未发生重大突破。

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前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在欧美国家逐渐系统化、专门化，同期的中国经济思想未曾发生此种演进态势。《国富论》被部分学者视为欧美经济学说科学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后来所谓的“正统经济学”大多是在《国富论》界定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范畴内拓展，所以演绎成为“正统经济学”采用的重要分析方法。《国富论》完成于工场手工业时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古典经济学由西欧传播到了世界上其他地区，但此后的“正统经济学”长期着重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相关经济问题。在此期间，历史学派、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不仅拓展了经济学适用的社会历史情境，还分别为经济学引入了历史分析、阶级分析、制度分析等方法，丰富了经济分析方法。20世纪前期，这些学说培养了国人的经济科学意识，也影响了中国学者对本土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理化解构。

二、学科化构建成果概略

近代以后，外来的工业文明冲击了本土的农业文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附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外来经济科学的输入满足了中国近代对新经济思想的理论需求，中国经济思想由于外来经济学说的融入初步具备了经济分析特征，外来经济科学也为传统经济思想转型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自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陆续问世。20世纪上半期，出版中文著作超过20余部，发表中文论文逾200篇，它们大多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从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著述的选题来看，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思想是其研究重点领域。如甘乃光著作了《先秦经济思想史》，并认为汉代以后的经济思想只是先秦经济思想的余绪。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仅付梓了先秦部分。中、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类似的观点是近代著述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欧美学界关注的相关问题也得到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呼应。当然，近代学者对传统经济思想的解读也并非全然是正确的。

从近代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经济科学化构建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并不缺乏分析性，而只是在演进过程中未能形成与欧美经济科学类似的“科学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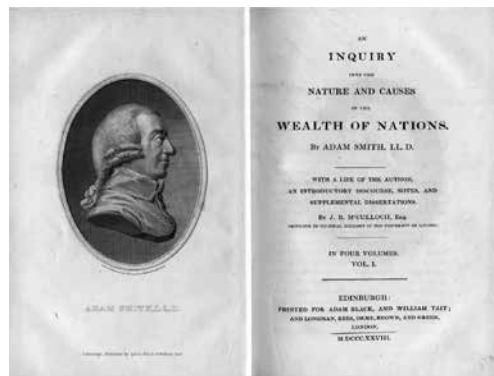
的分析手段。事实上，在中国古代部分经济思想文献中，关于租税、富国、分工、交换等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分析特征。唐庆增等人试图通过科学地改造传统经济思想，实现孕育本土经济学和指导经济建设的目的，但事实上他们仅仅梳理出了一些具有经济科学成分的传统经济思想，未能从中归纳出一般化的经济理论。在近代时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经济科学化构建成果中，《孔门理财学》可谓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科化构建在先声之作。

三、启示

近年来，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当前经济学界进行了大量论证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种资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具有本土特色的经济理论基础要素。从内容构成方面说，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理所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

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科学化探索对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启示意义是：坚持以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土特色；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化理论的实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推进经济学理论完善方面发挥作用。

（撰稿：缪德刚）



亚当·斯密著《国富论》书影



（五）文研读书

32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再发现——《丝路风云》 《他乡月明》出版座谈会

2021年11月10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三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再发现——《丝路风云》《他乡月明》出版座谈会”。本次会议由文研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和商务印书馆共同举办，围绕刘衍淮所著的两部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相关的作品——《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他乡月明——走在中国十五年（1935—1949）》展开。



“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90周年纪念展”展厅，文研院于2018年春季举办

座谈会现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王奇生、罗新，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黄纪苏先生、徐十周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孟彦弘，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馆员秦素银，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高工陈正洪，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助理李霞女士、陈洁编辑、田媛编辑出席。刘衍淮、巴丁娜夫妇的女儿刘美丽、刘安妮、刘艾林女士，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的吴华峰教授、蒋小莉博士在线参与讨论。

引言环节

活动伊始，朱玉麒老师首先介绍了两本书内容丰富而多元的特点，故邀请了跨专业的专家团队齐聚于文研院进行交流，其后对此次座谈会在文研院举办的缘起进行了交代。在1927年5月9日，北京大学的一批师生参与到

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队伍中，他们从北大红楼三院出发，走向了丝绸之路的万里征程。2017年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90周年，文研院在同年12月23日举办了“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高峰论坛和同题展览，科考团的后人纷纷前来参与。刘衍淮先生的女儿刘安妮女士从澳大利亚前来参与此次展览，在展出的资料中看到了父亲刘衍淮的身影。

文研院成功的论坛和展览作为一个重要的契机，使得两个月后，安妮女士代表家人致信朱玉麒老师，希望将父亲刘衍淮全部的西北科学考察日记和相关文献从海外捐赠回国。2018年4月18日，刘美丽、刘安妮女士专程从海外来到北京，在华侨大厦捐赠了刘衍淮生前的文物、文献给中国唯一的西北科考团研究机构——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新疆师范大学接受这批捐赠后，于同年举办“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进疆九十周年暨刘衍淮先生捐赠文物特展”，许多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的后人前来参与，并表示愿意捐赠相关文献供学界整理与利用。

朱玉麒老师指出，在刘衍淮的11册记录西北考察历程的日记被公开前，只有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长徐炳昶的《徐旭生西游日记》在民国时期出版，以及改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出发前在北大三院合影（左三为刘衍淮）

革开放后黄文弼的后人黄烈先生整理出版《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现在加上刘衍淮的日记，学界拥有了三份科考团中方成员的直接记录。刘衍淮的记录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此次科考团考察项目中最重要气象测试的唯一全面记载，科学价值自不待言，同时，它也展现了近代中国和世界丰富多元的面貌，比如其中有他按顾颉刚的要求，为北京大学收集的各民族民歌。日记之外，刘衍淮的文献中还有他将沿途人事画成的速写，以及与外方成员如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互动的摄影照片、贺年卡等等。刘衍淮日记记录之详细，对于学界研究西北科考的学术史大有裨益。

此外，刘衍淮在德国留学时，认识了同在柏林留学的西班牙博士列美·巴丁娜（Remedios Bardina），两人相爱并结婚，成就了一段跨国婚姻。1935年，巴丁娜携子来到中国与刘衍淮团聚，后在1949年迁

居中国台湾，1982年刘衍淮去世，她随子女迁居美国。在那一年，她75岁时，开始撰写自己在中国大陆15年经历的回忆录，成为一部视角新颖的中国大时代的实录，这部英文版的 *My Fifteen Years in China* 在刘衍淮的捐赠文献中，成为西北科考团文献整理的意外收获，这便是现在由蒋小莉翻译为中文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他乡月明》。

朱玉麒老师说，这次文研读书会议的特别之处，是这两部书都与文研院的牵线搭桥直接相关。它们的出版，是“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丛刊”的成果，也是社科重大项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成果，更是对此前在文研院举办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回应。刘衍淮夫妇的日记、回忆录的出版，也让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足迹走出了沙漠，成为近代史和学术史中永恒的记忆。

发言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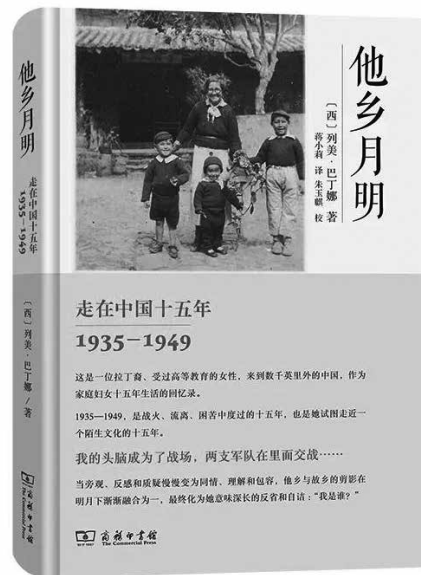
首先，刘衍淮的女儿刘安妮女士分享了对父亲的日记得以出版的感受。她表示自己和姐妹一直希望父亲刘衍淮的日记能够印刷出版，在她们小时候，就听父亲讲述在新疆的故事。父亲去新疆的时候只有19岁，在考察期间跟随着各位年长的前辈学到了很多，这也是他觉得自己最幸运、最快乐的时候。父亲在库车等地的观测经历，是他能够进入气象研究专业领域的开始，也是他从事了一辈子的研究工作。她们作为子女，仍有许多不曾听过的父亲的故事，如今也能够通过阅读出版了的日记

得以了解，也希望这些资料对学术界的研究有所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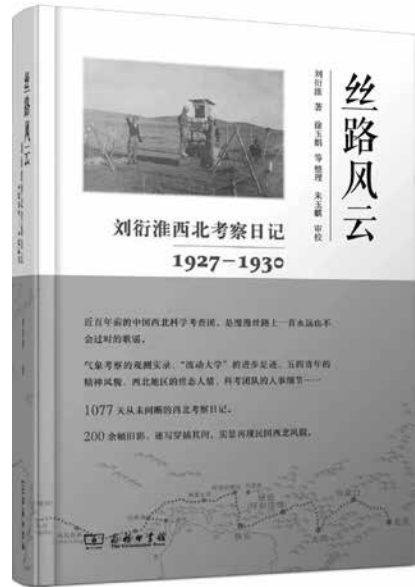
刘衍淮的女儿刘美丽女士为母亲巴丁娜的《他乡月明》一书的中文版撰写了序言，她提到母亲巴丁娜在1982年开始撰写这本回忆录，因为母亲在中国的15年时间里，曾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酸甜苦辣，这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环。母亲后来在台湾任教时，许多学生也都希望了解到母亲在中国大陆的生活经历，可惜在母亲去世前没能让这本回忆录出版。如今，母亲的在天之灵应会很高兴。

接下来，与会的各位学者专家分享了自己阅读这两本书后的感受。黄纪苏先生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黄文弼的哲孙，他讲到自己一直偏爱日记、书信、随笔之类的文字，因为日记十分真实，也能够反映历史现实、当代现实之外的内容。他此前已读过科考团成员中祖父黄文弼和前辈徐炳昶的日记，并对三位成员的日记做了简单对比。黄纪苏先生指出，自己的祖父黄文弼在1927年刚出发时也兴致勃勃，认为这对自己的学术和生活是一个全新的转机，心态犹如青年，不过黄文弼在日记中着墨最多的是和自己学术兴趣相关的话题。徐炳昶先生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成员的组织者，他的视野十分开阔，在西行的路上会有多样而复杂的心路历程与感受。

相比而言，刘衍淮当时是一个年轻人，他的记录亲切而充满好奇，虽然是学习理工科出身，但他的日记并非流水账，而是充盈着十分丰富的情感。如在1928年3月



刘美·巴丁娜著《他乡月明——走在中国十五年(1935-1949)》书影



刘衍淮著《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书影

16日的日记中，刘衍淮记自己听着大羊小羊不住的哀鸣，“加以多思的我，哪能睡得成呢？”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感受十分丰沛而敏锐。此外，刘衍淮面对着未知的新世界十分好奇，有着无数的问号。比如在1928年1月29日，新疆官府的人带一些考查团成员去看猎鹰捕兔，徐炳昶和刘衍淮均前去。徐炳昶先生十分兴奋，他写到那天“日暖风和，天山矗矗，旷野荒荒，飞马驰骤，已令人起一种不可名言的快感”，蕴含着十分古典的审美趣味。刘衍淮则十分详细地记录了猎者如何一步步驯鹰，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人身处于现代中国时期依然十分陌生的区域时，心中有着无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因此，刘衍淮日记的内容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俗各个方面来进行阅读和比较。在刘衍

淮西行的过程中，他也在不断成长，他的日记有时用白话，有时用文言，这种错杂的使用，体现出当时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时的波折与渐进。

孟彦弘研究员赞扬了刘衍淮家人捐赠海量一手资料的举动和朱玉麒老师领导的整理工作。他提到200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成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科学考察活动综合研究”项目组，于2009年出版《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专论》两部著作，但当时可以利用的材料除黄文弼、徐炳昶的日记外，只有斯文·赫定所编《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报告集》56卷，国内也只翻译了2卷，可以说学界长期以来没有见到多少中文材料。而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承担起了收集、保存

和整理发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材料的重任，使得两本书得以出版。商务印书馆也使用了更好的纸张和先进的彩图印刷技术，这都对学术史、科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

吴华峰教授在线上分享了自己参与整理刘衍淮《丝路风云》一书的感受，并利用线上传输的便利，向出席座谈会的老师们介绍并展示了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图书馆展厅的陈设，包括黄文弼捐赠文物展厅、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员展厅（其中收藏有刘衍淮所使用的物品）、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外方团员展厅、黄文弼旧藏拓片展厅等。吴华峰老师提到黄文弼中心接下来的文献整理工作还包括《黄文弼早年文录》、《刘衍淮西北考察与学术史研究论集》等，这都给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罗新教授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介绍了其他西方来华学者对 1920—1930 年代的

中国的记录与看法。罗新老师提到自己最近在读匈牙利的蒙古学家路易斯·李盖提（Louis Ligeti）的日记，李盖提曾于 1928 年前后来到北京，而当时外国人来到中国时，可能与初到中国的巴丁娜有着类似的感受，比如会对黄包车（人力车）感到十分诧异和震惊。罗新老师此前还读到过在 1920 年代任职于美国纽约自然史博物馆的探险家、博物学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的回忆录，安德鲁斯曾率领中亚探险队来到中国发掘恐龙化石，期间曾对中国当时的许多学术机构有所批评，包括 1925 年开始由刘半农主持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在 1925 年后来到中国的外国探险家和学者，他们的考察或发掘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限制，唯一取得成功的就是斯文·赫定与中方合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因此，当下的我们对 1930 年代的中国的了解其实并不够多，如果将此前以民族主义和学术

成长的角度所撰写的历史，和外来的西方人的记录进行比较，可以说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叙述。通过研究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十分有助于理解当时中国学术史的国内和国外大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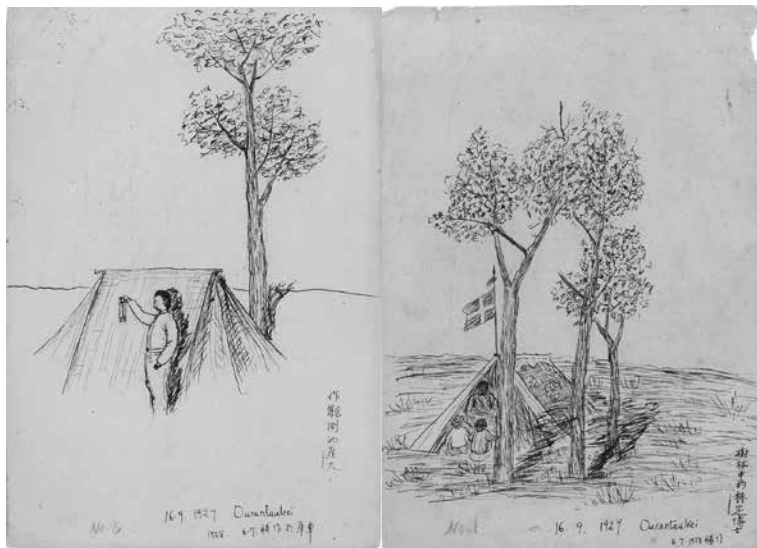
王奇生教授对学界继续整理刘衍淮参与中国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三年之外其它时期的日记表达了殷切的期待。目前整理出版的刘衍淮日记始于 1927 年 5 月 9 日，而就在不久前的 4 月 28 日，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被送上了绞刑架。1927—1930 年是国共战争、新军阀混战的乱世，在 4·12 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国民党对共产党员进行了清洗，许多无辜的青年学生被捕。而刘衍淮先生在乱世中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参与到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的特殊历程中。那个时期中国各地差异极大，东南、西北、南方、北方像是多个不同的世界，刘衍淮所前往的西北地区可能还停留在几百年前的状况。即便民国时期的日记数量众多，但民国时期对于西北的记录依然十分稀少，刘衍淮作为一位五四青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教育，他在大西北的日记同样保留了很多对基层情形的一手记录，十分详细。从刘衍淮 1927—1930 年的日记来看，他应是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中国第一位气象学博士竺可桢的日记现在已经全部整理出版，刘衍淮其后去德国留学，成为中国第二个气象学博士，再后来他经历抗战、国共内战，最后前往台湾，如果他的所有日记都能够出版，这不仅对气象学史、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都会有很大价值。而在《他乡月明》中，巴丁娜女士则拥有十分敏锐的女性视角，她记录下了各种复杂的、感性交织的文化冲突。巴丁娜在中国 15 年的经历，也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时期，所以她会于 1982 年的时候重新书写自己的回忆录。王奇生教授的建议得到了刘氏姐妹的回应，刘美丽女士说刘衍淮先生在西北科考团之后保

持了五十多年的日记习惯，她表示，这些珍贵的记录，将来一定会捐赠给中国。

荣新江教授认为，刘衍淮 19 岁就前去新疆，并且进行气象观测，需要长时间独自驻留，与他同行的同学马叶谦即因精神抑郁而殉职，因此刘衍淮有着了不起的意志和毅力。相比于数量众多的西方学者撰写、出版的西北报告，中国学者中，只有黄文弼的考古报告得以及时出版，但内容仍过于简单。近代中国灾难深重，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许多调查成果都没有写、没有整理、没有发表，很多文献和成果就流失了。2007 年，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 80 周年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及瑞典驻华大使馆曾在北京大学校史馆举办了“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纪念展”，当时展出了许多北京大学收藏的珍贵资料，但现在尚未整理公开。站在北京大学的立场上，我们应当充分整理本校馆藏中关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珍贵档案。而这些前辈学者们的档案、通讯和“科学报告”，都尤其值得被整理和集结，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的“中方队员编”，以资学林。

北京大学化学系严瑞芳老师和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陈诗闻老师在退休后都一直积极关注和支持对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研究。陈诗闻是刘衍淮的同学、著名气象学家李宪之先生的学生，但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前来会场，故委托严瑞芳老师代为发言。陈诗闻老师此前曾撰写《西北科考团和北大的三位学生》一文，刊登在 2016 年 6 月 5 日的《北京大学校报》上，此文后来被北京大学校友通讯录转载，但去掉了关



作观测的崔大（刘衍淮的速写）

树林中的赫定博士（刘衍淮的速写）

于刘衍淮先生的内容。对此，两位老师都主张应该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人物和事迹，也提议考查团的中方团员所保留的珍贵地质资料等文献，都应值得尽快整理和发表。

徐十周先生是徐炳昶先生的哲孙，也是1992年出版的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中译本的译者之一。在阅读刘衍淮的《丝路风云》时，他回想起自己90年代翻译斯文·赫定著作的过程。斯文·赫定书中的很多地名，在刘衍淮的日记中都能够相互对应。刘衍淮的日记中都能够相互对应。刘衍淮的日记不仅充满了生动的语言描写，而且所绘制的图画也让他想起在斯文·赫定书中所看到的各种插图。徐十周先生认为《他乡月明》中对北平的描述十分有趣，巴丁娜女士出生在加泰罗尼亚的中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善良的情怀和心灵，所以她来到北京后，见到“人力车”等事物会感到十分震惊。巴丁娜的书中记录的许多现象也具有社会学的意义，比如她提到自己与刘衍淮在柏林相爱时，两人非常平等地挽着手，但在回到北平后，就变成了男人背着手走在前面，女人则带着孩子走在后面，这一现象即便在现在的21世纪，似乎仍有未变之迹象。

蒋小莉博士是《他乡月明》中译本的译者，她在线上分享了自己翻译本书的过程和感受。她在2018年年底于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阅读到了此书英文版，不久便开始进行翻译工作。《他乡月明》全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巴丁娜的日记，后半部分是附录，包括巴丁娜的家人们撰写的回忆文章，整个翻译过程十分

愉快而享受。正如她在翻译后记中所说：

“译罢此书，巴丁娜女士已宛如我心中的‘他乡明月’。”在翻译完成后，朱玉麒老师和刘衍淮的三位女儿都对译稿进行了审校，刘美丽女士校订了书后增加的英文部分，刘安妮女士比照家藏的刘衍淮在1930年后的日记对内容进行了校订，刘艾林女士则为本书提供了很多图片。蒋小莉博士感慨道，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看到的是刘衍淮、巴丁娜的充满爱的大家庭，日记中也传达了巴丁娜对家人的爱。自己身边的很多女性读者都在书中找到了共鸣，视巴丁娜为她们的精神榜样。很多非学术圈的读者，也通过这本书对中国西北科考团产生了兴趣。

陈正洪先生专研大气科学与气象历史，在自己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的著作《气象科学技术通史》中，已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写入书中。陈正洪先生从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发展史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20世纪20年代后期对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反映出当时中国政府自我觉醒的意识，而我们现在不可能回到20世纪上半叶那种纷争、割据的环境中，因此当时进行的西北科学考察的历史条件不可复制，西北科学考察的历史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更有价值。从气象学角度来讲，气象科学与观测本身具有不可复制性，仅仅相隔几年，现象和数据就会出现很大差距。20世纪20—30年代，竺可桢先生在中国东南地区设立了测量雨量的设备，而在刘衍淮的日记得以整理出版之前，同一时期西北地区的气象科考数据是空白的。尽管在1904年，中国最初的现代大气科学数值预报计划就已提出，但在

世界范围内的大气科学获得重大发展时，中国仍只是停留在西学东渐的起步阶段。从刘衍淮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按照当时西方的科学观测流程进行布局、布站，和今日的方法基本一致，这在实践上填补了20世纪20—30年代大西北气象科学和历史的空白。除了气象科学研究，学界同样应该注意到刘衍淮对气象教育的贡献。当时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有4位气象学先辈，刘衍淮和李宪之后来前往德国留学，归国后成为学者和教育家。刘衍淮培养的许多气象学专业的学生都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多人最终牺牲在战场上，这些内容在将来都应成为气象学史领域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秦素银研究馆员回顾了自己2017年在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策划“万里向西行——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展”的心路历程。关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此前中方公布的资料本身就很少，除了90年代出版的《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新疆档案局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撰写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等作品外，就是由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家属联合出版的《高尚者的墓志铭》、《“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等，可以说私人出版的书籍甚至比学术机构的研究要更多。目前，对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研究终于已经转向学术机构了。自己此前为了筹备展览，也阅读了徐炳昶、黄文弼和斯文·赫定的日记与报告，在阅读这些一手材料时，才能感受到当时的真实情形，并构思如何才能将这些真实的感观以展览的方式传达给观众。同时，她也



希望学者们更多地目光投向博物馆，在学者和机构的监督下，博物馆才能够尽快地整理、公开相关馆藏资料，以资学界利用。秦素银研究员谈到自己十分喜欢《他乡月明》这本书，自己作为一位女性、妻子、母亲，从巴丁娜的经历中感受到了她的很多勇气。巴丁娜克服了很多困难，最重要的是给她的丈夫和孩子带来了健康和幸福，也很坦诚的记录了自己对丈夫的失望，这让我们对回忆录的真实性更加确信。巴丁娜的日记也记录了他们在战乱中辗转的经历，我们只有知道了这些背后的故事，才可以明白刘衍淮的11本日记能够保留下来是多么的宝贵。

李霞女士从出版社的角度，介绍了商务印书馆在未来出版系列图书方面的设想。她说，《丝路风云》附录中的路线图、索

引等内容，都使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刘衍淮的日记不只是一本日记，而是一本学术著作——这是朱玉麒老师所领导的整理团队的努力和成果。而“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将会是不同的学术团队以不同线索整理完成的系列作品，商务印书馆对此十分欢迎。商务印书馆近年在整理中国学术作品方面完成了很多成果，比如“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诸位学术大师的文集和全集等。商务印书馆希望通过系统化的出版工程，同时坚持与学界共同合作，使这些作品能够传世和传播。

田媛博士作为《他乡月明》一书的责任编辑，向朱玉麒老师和蒋小莉博士表示了感谢。她被译稿内容深深地打动。巴丁娜女士十分善于描写自己细腻的内心情感，这都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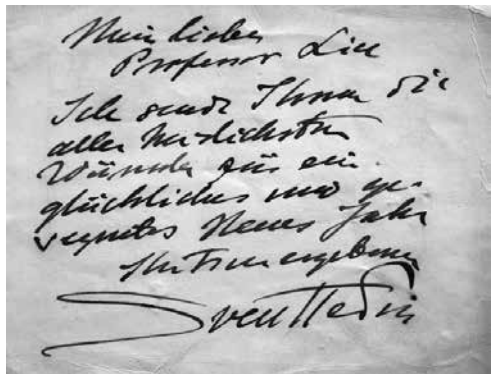
出版座谈会的最后，刘美丽女士也代表刘衍淮先生的后人感谢大家对两部书的肯定和尊重。朱玉麒老师以作家陶子为《他乡月明》所写的推荐语作为引言，进行了总结：

“我们多么幸运，在《他乡月明》这

本书里，看到一个异乡人为我们记录下一个过去世界里的中国、一个在外敌欺侮中的中国，但也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中国。”

巴丁娜为了爱情离开了她的祖国，但她在中国留下了如此重要的一份作品，我们应该感谢巴丁娜女士把她15年观感在笔下写成了“生生不息的中国”。未来，我们对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研究，也一定会从“再发现”走向全新的时代。

（撰稿：李正一）



斯文·赫定写给刘衍淮的贺年卡

33

另一种现代的尺度：《非洲现代史》研读会

2021年12月9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33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另一种现代的尺度：《非洲现代史》研读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作引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刘海方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正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经胜，北京xx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教授李洪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许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刘少楠，原中国驻南非大使、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埃塞俄比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张红军出席并参与讨论。

引言部分

作为《非洲现代史》的作者，李安山老师首先介绍了本书的缘起。李老师说，写作本书，一是出于对非洲的热爱。这种热爱驱使自己每日学习与非洲相关的新知，并总有新的感想与收获。二是出于一个研究历史的中国学者的责任感。曾驻非洲的荷兰外交官维恩所写的《非洲怎么了》一书具有典型性，它一方面表达出了对非洲的牵挂，但另一方面又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这一类历史叙述的流行，使李老师说感到有必要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写一本更富有人文关怀更客观的非洲历史。



李安山教授在讲座现场

三是希望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作一总结。

接下来，李安山老师对本书为何有两个出版社作出了解释，随即对本书书名中“现代”二字的内涵展开了探讨。李老师说，学界对“现代”“现代化”的认识、解释与理论颇多，“现代”概念本身带有一定模糊性。写作《非洲现代史》，既要说明其自身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及多种文明在非洲的遗产，又要说明被欧洲强行纳入国际体系对非洲带来的种种影响。非洲史写作也要具备世界史视野。尼日利亚历史学家伊尼科里的研究指出，非洲人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贡献巨大，就是一例。

最后，李安山老师对“为什么以专题的角度来论述非洲历史”这一疑问作出了回应。任何历史著作在写作过程中都面临选择，包括资料、内容、主题的选择。人类历史无非是由时间、空间、人物、事件等要素构成。若章节按时间排列，则是

将全书重点放在时间线索的梳理；而分为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四个专题，则可以更多地容纳李老师本人对非洲历史的理解。为了使专题性叙述与时间性叙述相结合，李老师有意在书中加入了一个较为详细的大事年表，以期从时间角度做出补充。

讨论环节

董正华老师首先发言。董老师指出，非洲研究的困难之处在于突出的内部异质性。不仅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差别巨大，即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内，又分为东、西、南、中以及重返非洲的移民群体、移民后裔等多个部分；不同部分地理环境、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百色杂陈，政治模式、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程度差异显著。而本书紧紧抓住非殖民化、到民族独立、到区域一体化这一线索，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四个方面探讨现代非洲的历史，既有整体的叙述，更有对各个地区、各个国家民族的

详细分析，很好地在保证非洲史叙述整体性的同时展示了非洲内部的异质性。董老师进一步指出，本书不仅运用详实史料对有关理论概念，如“非殖民化”进行了仔细的辨析，在叙述逻辑与章节安排上也不囿于常规。叙述逻辑上，本书没有受到时代断限的限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把非洲随着欧洲的殖民活动而来的内忧外患、变革、动荡，放在内部因素和外力影响互动的框架里进行分析，对不同地区现代变局的开端与发展、变化做了生动具体的叙述。章节安排上，不同于一般现代发展史书写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入手，本书第四部分围绕“民族”展开，这与民族问题在现代非洲的重要性是相匹配的。此外，关于国家独立后政治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选择、军人与内政的关系、政党与民主化、单一种植业经济与工业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等关键问题，现代非洲也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本书对此均有总结。最后，尊重与弘扬非洲本土文化与非洲人自主意识，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在很长时间里，掌握话语权的西方学者谈论非洲，不是“无望”，就是“遗忘”，纠正这一类谬见，正是这部巨著的要旨。

王逸舟老师指出，本书写出了中国人对非洲的独特观察视角与深厚感情，既非不动声色的远距离观察，亦非编年史式的陈述，而是表现讲述者鲜明爱憎的思想史。虽然近年来非洲研究在中国有较大发展，但如本书这般扎实厚重、充满思想个性的作品似乎不多。王老师认为本书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亚非问题研究在北大建制以来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

董经胜老师指出，本书的写作目标是完成一部整体的非洲史，而由于非洲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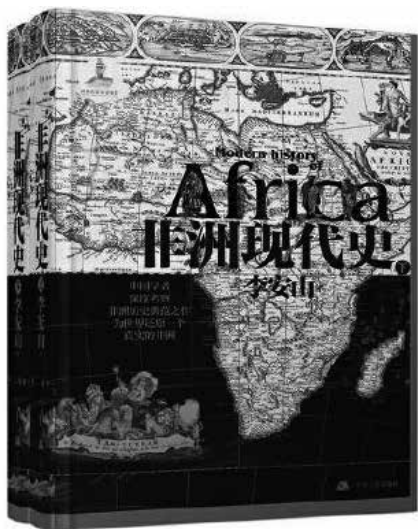
不同国家差异很大，一人完成一整部非洲史是极具挑战性的，国内国际学界均鲜有学者做如是尝试，故而本书的工作具有开创性。从写作体例看，本书分为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四个专题，在专题叙述的基础上围绕更具宏观性的问题展开论述，每一部分之间又有内在逻辑联系，对学术写作颇有启发。从写作内容看，本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实证研究向来为国内历史学界所重，而理论研究则一度受到忽视。事实上，中国学者要在国际学术界有话语权，需要提出自己的理论创见。此外，本书有很强的时代感与现实感，关注到了诸如中非合作等现实问题，这种现实关怀赋予了历史研究更强的生命力。

李洪峰老师从事法语非洲国家研究，认为本书可以帮助相关专业学生从更加整体、宏观的角度理解非洲，并进一步分享了自己的三点读书心得。其一，本书回应了读者在两个层面对历史的期待。雷蒙·阿隆曾提到两个“历史”：“一个是我们花力气去思想搞清楚的历史，一个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对于前者，本书帮助读者从“远观”的角度，了解非洲文明的发展脉络及一些留存至今的历史问题的缘起。对于后者，随着中非合作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人们将不仅仅是从网络、新闻中了解非洲，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与非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人文交集。本书也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正在发生的历史。其二，本书体现出了中国学者的立场与情怀，促使中国读者思考自身。本书提到巴西、印度等国与非洲的交流合作早已展开，分析了人口流动因素在不同国家与非洲国家交往中的作用，这些内容对思考中、非之间如何建立更加长久、互利共赢

的友好合作关系均有诸多良益。其三，本书启发了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再思考。本书对非洲文化着墨颇多，但并非简单地描述非洲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而是从深层次探索非洲思想的发展过程、文化运动作为非殖民化运动的作用、非洲文化的自我表述以及非洲哲学精神的底蕴和非洲人文社科领域当下的发展及其全球意义。

闵雪飞老师认为本书为葡语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锚”，即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精神与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启发研究者从欧美的主流叙述逻辑中跳脱出来。此外，非洲葡语国家的文学中，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国家建构过程的叙述与思考，牵涉到语言、身份建构等相关问题，显示出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存在相互补充的空间。

许亮老师主要从与李安山老师的三次谈话切入，分享自己作为李安山老师学生的体会。第一次谈话发生于许老师前往哈佛大学深造之前，李老师鼓励他说“中国人有个勤奋的优点，去哪里都行得通。”事实上，勤奋二字正反映了李老师多年如一日的坚守。第二次谈话发生于许老师刚回国教书的时候，李老师点拨他，中非在历史经历以及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具有共通之处，如果说欧美学者研究非洲受益于其长期在非洲殖民的经验（所谓殖民的“优势”），那么中国学者研究与理解非洲，则有发展的优势。第三次谈话是好几次聊天的集合，李老师鼓励许老师多向非洲学者学习。李老师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位系统介绍非洲本土史学流派的学者，也是少数与非洲第一代和第二代史学家有过直接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之一。最后，许老师转回对本书的谈论，指出历史著作大体分为叙事（narrative）与



李安山《非洲现代史》书影

历史学 (historiography) 两类, 本书强在历史学, 叙事部分则有所欠缺, 但不失为对既有的叙事型非洲史教材的重要补充。

刘少楠老师从两个方面谈了本书启发之所在。其一, 本书中关于非殖民化的内涵、实现方式和意义均很有参考价值。非殖民化既包含了自下而上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也包含了自上而下的殖民宗主国的或主动、或被动的反应, 同时经济和文化的非殖民化又令其外延获得时空上的大范围拓展。黄金海岸的案例可以比较好地说明自下而上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自上而下的殖民规划之间反复拉锯、互相影响并最终走向独立的过程。葡属殖民地进行的非殖民化改革较少, 但独立日期却相对较晚, 这点值得与英属、法属非洲殖民地进行比较。其二, 非洲研究的非殖民化是一个曲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非洲民族主义和非洲史研究的黄金时代, 而80年代后由于经济衰退导致的非洲大规模人才外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非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似乎实现了“再殖民化”, 非洲研究的中心几乎完全转向美欧。在非洲史数字化飞速推进的当下, “数字帝国主义”或数字化“瓜分非洲”的风险依然存在, 西方学者牢牢掌握着数字形式非洲史料的选择权和使用权, 这一点值得注意和警惕。最后, 刘老师向李安山老师提出了在非洲现代史教学过程中如何呈现更加积极的面向、消除学生对非洲的刻板印象的问题。

李安山老师对刘少楠老师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关于第一个问题, 李老师指出, 英国、法国和葡萄牙在非洲殖民方式与退出方式都对今天有很大的影响。英、法直到今日在非洲仍有很大的影响力, 葡萄牙的影响力则很微弱, 应与英、法主动、

有条件的撤退方式有关。关于第二个问题, 李老师认为, 现在对非洲学者移民欧洲、知识生产以西方为中心作评论可能为时尚早, 目前看到的一些西方产生的颠覆性研究, 可能确实很难在非洲本土产生。关于第三个问题, 李老师提出, 虽然非洲现代历史中充满艰辛与动荡, 但这对非洲的发展也是一种重要的遗产, 西方对非洲的统治不会永远持续, 非洲崛起应在情理之中, 但这有赖于非洲各国人民的努力。

钟建华先生从自身外交经验出发, 针对中国学者研究非洲是否有优势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钟先生在与南苏丹建国者交流的过程中感到, 南苏丹建国者们带有很强的革命者色彩, 而南苏丹面临的许多困难与中国解放初期也十分相像, 这些相似性使得南苏丹对中国共产党建设政权的经验十分关注, 一再表示要认真研究。而中国与非洲的这一共鸣, 也是中国学者研究非洲的优势。

张红军先生从自身在埃塞俄比亚经商的经历出发, 提出商人到非洲投资一定要建立在对非洲历史了解的基础之上。张先生指出, 非洲国家现代化, 主要是解决三方面问题: 经济发展、民族融合与政治民主化。以埃塞俄比亚为例, 之所以现在仍发生战乱, 正是由于政治民主化问题没有处理好。由此带来的政治动荡与战乱, 导致经济发展急速倒退。在中国败于甲午战争时, 埃塞俄比亚成功抵抗了意大利的侵略; 但百年过去, 中国成功从失败中走出来, 实现了崛起, 埃塞俄比亚却一直在“原地踏步”, 近期发生的战争更使其退回三十年前的发展水平。内中原因, 非常值得研究。

(周聪琪根据校订版现场实录整理)

(六) OCAT 年度合作讲座

【编者按】

“OCAT 研究中心年度讲座”项目致力于促进当代艺术史研究, 每年邀请一位艺术史领域的一流学者举办主题讲座, 以体现“知识、思想与研究”的学术主旨, 提倡当代艺术史及人类精神史、观念史、思想史和视觉文化史整体结合的学术研究传统。

由 OCAT 研究中心和文研院共同主办的“2021 年 OCAT 研究中心年度讲座”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至 31 日在线举行。本次年度讲座邀请到美国盖蒂研究中心主任、古代美洲艺术研究专家玛丽·米勒 (Mary Miller) 作为主讲人, 以“形成中的艺术: 玛雅艺术制作” (Art is in the Making: The Making of Maya Art) 为题, 展开为期三天的讲座。三场讲座先后聚焦前西班牙时期物质的物质性及其来源, 玛雅名城帝卡尔的杰作和成就, 以及欧洲殖民者入侵后的美洲艺术, 尤其是玛雅艺术的命运。此外, 每一讲还邀请到相关领域学者做主题回应并参与对谈。

01

玛丽·米勒 | “形成中的艺术: 玛雅艺术制作”系列讲座——玛雅世界: 对材料的探索及对物质性的把握

首场讲座中, 玛丽·米勒教授首先谈到, 美洲大陆的居民最早是从亚洲步行迁徙而来的。然而, 早期人类的证据却鲜有留存。虽然犹他州沙漠中发现的人类足迹



讲座现场



阿兹特克太阳石，现藏于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

化石可佐证 23000 年前美洲人类的存在，然而文明进化的证据却直到 6000 年前才出现在美洲大陆。一些位于美国境内的现存泥土构建的城市遗址也只能使我们一窥那些伟大早期城市的规模而已。直到近些年，这些早期文明的发展演变及其城市建造内部的复杂结构，才借助激光雷达技术得以向世人展现。

在美洲早期居民向南迁徙的过程中，他们主要通过猎杀大型哺乳动物来获得食物。在美洲定居后，他们先后驯化了葫芦、富含营养的黑色干扁豆、以及玉米作为主食作物。土豆则是南部安第斯文明饮食结构的主要构成。可可是南北方贵族阶层都享有的消费品。蜂蜜因其产量低，也成为了昂贵的贸易商品以及稀有的贡品。印加人还种植菠萝、草莓等水果。总体而言，因为缺少被驯化的哺乳动物、乳制品以及橄榄等，美洲饮食结构中脂肪和维生素 C 的比例很低。在美洲的热带地区，人们只能通过牛油果获取的脂肪，依赖贝类、鱼

类和昆虫提供额外的蛋白质，并从辣椒和西红柿中补充摄取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C。

在日常用品方面，美洲人民圈养火鸡、兔子、狗和豚鼠，并以此为制作床具的皮毛以及纤维的来源。美洲还是烟草的主要产地。在西班牙人入侵后，玛雅人的“Tzi' gah”一词演变成为国际通用的对香烟的称谓术语，“cigar”。不仅如此，香烟的销售也都一直遵循美洲本土传统的二十进制，以 20 根为一包。在现代社会，没有任何其他的商业产品还保留着这样的计数系统。由于一方面缺乏驮兽，另一方面并未将轮子投入实际生产生活，北美原住民主要依靠人力来运输。在安第斯地区，长途旅行主要依靠芦苇船和由巨大热带树木雕造而成的独木舟。

美洲北部和南部所具有的物质材料都有其独特性。直到西班牙人入侵之际，南北之间对其各自所拥有的物质及对物质的认知都鲜有沟通和交流。尽管如此，美洲的北部和南部的宇宙观却共享同一种关于颜色与方位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他们还都以 20 为基本单位进行计数，并由此演变出了严谨的计数系统，以及历法系统。

在环境方面，美洲地区的野生生物大多具危险性，除了美洲狮、美洲虎等猫科动物以外，还有狼、鹞鹰、秃鹰、蛇、大西洋中鲨鱼，和太平洋里的虎鲸等等。在气候和地理条件方面，中美洲北部两岸不同的洋流、安第斯山脉的阻隔、位于南美洲太平洋海岸的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以及位于南美洲北部的世界上水流量最大的亚马逊河，共同将美洲划分成了环境特征截然不同的几个区域，也将美洲与世界其他

地方区别开来。美洲原住民正是在这样独特的环境构造中，征服了这片危险且具多样性的土地。

在这片土地上，美洲居民开始对物质性进行利用和改造。虽然美洲北部和南部生产的棉花有所不同，但他们均利用本土的棉花品种掌握了纺织技术。最初促成纺织技术发明的动力可能来自于捕鱼时对渔网的需求。美洲人民还利用靛蓝染料创造出著名的“玛雅蓝”，利用胭脂虫生产红色染料等。早期的编织技术有可能还促进了素烧陶器的发展。虽然美洲人从未使用过釉料，但是他们通过将矿物颜料混入化妆土中，并进行低温烧制的方法为陶器增添了色彩。这些颜料也同样被运用在纸张上。

石料因其硬度、颜色，和稀有程度而被美洲人民赋予多重价值。诸如石灰石等较常见的材料，就常被用作石碑的基体；至于滑石或石膏等较不常见的材料，其柔软的表面则被用来铭刻历史记录。在特奥提瓦坎，钟乳石和石笋等洞穴堆积物以及方解石大理岩常被用来制作面具。这些面具完美呈现了所使用石料的纹理，表现出当地人对材料特性的精确掌握。美洲另一大自然资源火山也提供了丰富的石料资源。厚重、敦实且耐久的玄武岩火山岩被奥尔梅克人用来制作早期的纪念性雕塑；量轻的凝灰岩是玛雅雕塑家在科潘创造立体雕塑和建筑装饰的原材料。为了使图像得以长久保存，阿兹特克人利用同样耐久且质密的安山岩制作大型雕塑，阿兹特克太阳石就是其中一例。另有一种玻璃质火山岩，黑曜岩除了具有实用功能外，还可作仪式

之用。燧石作为火种来源，被玛雅人认为形成于闪电击中的地下世界，具有闪电神卡威尔（K'awiil）的特性。

工具的形式本身也可以受到尊崇，尤其是“斧头”或斧头状的工具。一方面，这种工具可以用来砍伐森林以驯化环境，使其适宜人类的居住；另一方面，这种工具也具有象征意义。例如，绿岩斧头可以象征玉米神。中美地区人民几乎都被坚硬的绿岩所吸引。孔雀石在玛雅人看来有一种“异域”的特质。在帕伦齐，那位被人称为“红皇后”、但实际身份不明的女性统治者死后所佩戴的面具即是由孔雀石制作而成。到了阿兹特克时期，已几乎无新的玉石原材料流通，所以人们开始挖掘并再利用古玉。例如，帕卡尔王死后的玉覆



女性统治者“红皇后”死后所佩戴的面具由孔雀石制作而成

面上就有很多块古玉。除了玛雅低地地区，在奇琴伊察也可发现对古玉再利用的例证。公元900年左右，绿松石开始在中部美洲地区变得流行，其地位甚至超过了曾主导一时的玉石。将这种蓝绿色的绿松石镶嵌点缀于逝者的面具上，人们可以通过颜色的细微差别，来强调人面部结构中带有特殊力量的部位，如前额、颧骨、鼻梁等。

与欧洲所使用的色环不同，美洲人偏好将相互对立的颜色一同使用，例如并置使用红色与绿色的材料。这种并置对美洲人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朱砂因来自于火山，故而代表着炽热与危险，它可以激活来自于寒冷且黑暗地下的玉石，又或者产自冰冷深海中的海菊蛤。由此可见，这些物质性的源头也是具有意义的。

除了海菊蛤之外，贝壳同样也被美洲人开发并利用。帽贝既是食物，也是重要的装饰品。一些观点认为，帽贝装饰物因其形状而具有女性象征。和玉石一样，贝壳也可被用作乐器。贝壳极其适于刻画，且其表面所绘图案的主题常与对声音的表现相关。鱼骨可用于针线活或作为抽血的工具。实际上，各类骨头也是构成物质性的一个重要部分。人类的股骨，被认为可向外辐射巨大的力量。在仪式活动中，祭司会使用鹿角或鹿的胫骨。

虽然金和银是可见于中部美洲的材料，但是金银制品其实更常见于南美洲。制作金属的技艺，例如雕金工艺以及失蜡法，就是于公元1000年左右，先从安第斯传到奇琴伊察，再进而流入中部美洲的。实际上，中美洲很少使用银。但即便如此，太阳代

表金，月亮代表银的观念却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于中部美洲。

地理构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洲人民的信仰体系，是美洲生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水和洞穴被神圣化，人造建筑被视作与自然世界沟通的媒介。对中美地区人民来说，神祇是自然力量的化身。某些中美地区的文化是有单一权利中心的，例如阿兹特克的首都提诺奇蒂特兰，以及在此之前的特奥提瓦坎。但是玛雅人却不同。虽然他们同属一种文化和文明。无论是在科潘、帕伦齐还是帝卡尔，人们都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书写，共享同一种信仰体系、技术，以及价值系统。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中心或都城。贯穿玛雅人历史的是城邦之间不断的竞争、彼此之间的战争和压迫、间或有结盟和重组。但也正因如此，玛雅人所创造出的诸多杰作，才为现代人提供了关于差异和传统的材料。他们遗留下来的大量铭文和多样的艺术传统，使我们得以一窥这些前现代时期热带地区的不同文化。

玛丽·米勒教授认为，在玛雅艺术中，物品的规格、形制、颜色都可以服务于审美目的，因此我们现今所看见的与物质或材料本身所要表现的可能是不同的。不管是在建筑、陶器，还是雕塑方面，古典时代晚期的玛雅（约为公元600-900年）都具有不二的创造力。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发现使得玛雅历史叙事的复杂性逐渐展开，也让世人见证了玛雅人对物质性的惊人掌控力。玛雅艺术家们受训于传统，却不受制于传统。古典时代晚期的艺术家们在战事或削减的经济支持的影响下，仍能推陈

出新。尽管如此，由于时局的变换，创新不一定永远是唯一的答案。第二讲就将谈到创新与重复之间的张力，以及在何种情形下，玛雅人会舍弃变化转而选择不变与重复。

本场讲座有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新伟任回应嘉宾，对谈环节由OCAT研究中心执行馆长巫鸿作学术主持。与谈人从自身的研究领域出发，围绕讲座主题作出回应，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疑问。

李新伟教授作了题为“仰韶文化彩陶的鱼鸟化生主题”的报告。李新伟老师表示，由动植物等各种物质独特自然环境，孕育出中美地区文明特有的观念及意识。中国的独特环境，也孕育了中国早期文明的特质，催生出多种艺术形式，其中就包括仰韶文化（约距今7000-5000年）彩陶。中国学术界对玛雅世界及中美洲文明的关注是从张光直先生开始的。他曾提出中国文明和玛雅文明不仅有共同的祖先，而且都有一种萨满式的认知世界的观念。他将这一观点的文化背景称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并对仰韶文化表现出萨满式的观念做了开创性的研究。

仰韶文化中最繁荣的庙底沟时期距今约6000-5300年。庙底沟的彩陶纹样多种多样，其中主要的纹样有鸟纹、花瓣纹、回旋勾连纹等。对于庙底沟时期彩陶呈现的复杂且丰富的图像解读应追溯到仰韶文化早期，即距今约7000-6000年的半坡时期。半坡时期彩陶图案主题明确，即为鱼纹，其表现形式既有写实又有抽象。到了半坡晚期，彩陶纹样主题发生了变化，开始出



鸛鱼石斧图彩陶缸

现“鱼中有鸟”等鱼鸟主题。庙底沟彩陶明显受到这种装饰纹样的影响，以或写实或抽象的表现方式，延续了这样一种鱼鸟组合图案的主题。庙底沟时期的所谓回旋勾连纹实际上也是鱼鸟组合图案的表现。鱼鸟组合图案有的完整且复杂，有的则是简化版本，甚至还有的是图案化的鱼鸟组合图像，例如泉户村出土的彩陶上的图案。在这个观点的启发下，我们可以对临汝阎村出土的鸛鱼石斧图彩陶缸上的图像进行重新阐释——这一图像或许是在表现鸟从鱼体内诞生后战胜鱼，代表了一种神圣力量的成功转化。一旁的斧钺代表了瓮棺葬中逝者的军事、世俗的权利，而鱼鸟组合图案则代表了其具有的宗教、神圣的权利。在半坡晚期的彩陶纹样中，除了鱼鸟组合图案的出现，还可见对卵的形象的多种描绘。综上可推测，仰韶人对如鱼和鸟等卵

生动物应该曾有非常细致的观察，由此才产生了很多，例如二者可以相互转化的观念。《庄子·逍遥游》中提到的鲲鹏之变的传说所蕴含的观念，或许在仰韶时期便已形成。

在玛雅文明中，也存在类似地表现不同动物之间转生的图像。例如，在科潘遗址 8N-11 号贵族院落中发现的镶嵌在墙上的马赛克式的雕刻，就表现了一只带有龙头的神鸟从冥界之水展翅飞出，其展开的翅膀为刨开的海螺壳的形状，其身体中有一个玉米神正在诞生。随着玉米神的重生，其头顶十字花纹多代表的太阳也重新从冥界升起，带来新的一天和万物的繁荣。玛雅的彩绘陶器上也有同样的龙头之鸟、玉米神和海螺壳的翅膀的组合图案，其中有的图案中鸟嘴里叼着一条鱼。对这种组合图案的解释可以诉诸于玛雅神话中的记叙。在玛雅神话中，玉米神曾被冥王杀死，骨头被磨成粉撒入河中。鲶鱼吃下玉米神的骨灰后，又被神鸟捕食。由此骨灰在神鸟体内完成转化，重生为玉米神。而龙头作为一个通道，协助了玉米神的重生。由此可见，相互转化是萨满式神话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所谈论的玛雅时期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到唐朝这个时间段，但他们的观念却和中国商代以前的观念雷同。反观我们对庙底沟彩陶纹样的新解读，其实也是一种为“玛雅—中国连续体”观念提供的新依据。

这样一种诞生于 6000 多年前的鱼鸟化生的观念在中国早期文明后期也得到了延续。良渚文化中有许多陶器纹样就表达了类似的观念。在良渚时期的陶壶和陶豆上

都可见带有螺旋状、卵状图案的蜷曲蛇身，与鸟的形象相组合出现的图案。此类图案很可能同样表现了水生动物孕育神鸟的主题。此后的石家河文化创造的鱼尾鸟泥塑，以及“抱鱼人偶”陶塑上也体现了类似的鱼鸟转生的主题。从庙底沟文化到石家河文化，鱼鸟转生的主题常表现在日常所用的陶器上面，并未与高级仪式联系在一起。但在后来的三星堆文化中却可见用高级的例如玉、金等材质，来表现鱼鸟主题。在三星堆文化中，这种吉祥的、孕育生长的信仰已明确上升为一种宗教的核心观念，帮助完成鱼鸟转生这个过程也已经成为一种最高级别宗教法力的代表。此外，三星堆出土物中还发现了大量细长的鱼形金箔片，形似于刚破卵而出的小鱼，由此也可见三星堆先民对卵生动物的观察也极为细致。

通过对这些具体案例的研究，我们可洞见在张光直先生提出的“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概念谱系下所暗示的中国早期文明与玛雅文明观念上的相通性。对中美地区文明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自身早期文明的了解。在这种相互对比的视角下，我们自身文明的发展脉络将梳理得更为清晰。

对谈环节，巫鸿教授认为，最近几年美术史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到“物质”或更抽象的“物质性”（materiality）。米勒教授谈论的“物质”概念，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媒材，而带有非常广阔的意义，它指向一个物质世界。人的生活与艺术创造都是在一个物质世界中进行。米勒教授追溯了自冰川时期以来的美洲物质世界，在

一个物质环境中考虑包括艺术在内的人的活动。通过对玉米、矿物、昆虫等多个物质层面的逐个分析，丰富了“物质性”的内涵。这样的物质世界是一个历史世界，关于物质性的理解都建筑在考古学、地质学等学科的研究基础之上，对物质和物质

性的研究因此相对于过去的图像解释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巫鸿教授据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物质研究和图像研究的关系是怎样的？在玛雅艺术研究的学术传统中，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转化？如果存在，那么这种转化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米勒教授通过举例进一步说明“物质或物质性的转向”可能引发的新的思考。比如，“技术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更多东西。通过在 X 射线下看到的陶瓷内部在制作时留下的纹理，我们可以还原每一个玛雅个体艺术家旋转盘绕将陶器制作出来的过程，揭露在制作过程中展现的意义。在物件的完整性已永远无法复原、考古学证据缺失的条件下，重新赋予物件以一种看似已经丢失的、有关其创造过程的历史语境。又比如，在陈列于耶鲁大学美术馆的一件股骨雕上，有一小段留存下来的铭文，写着“他看见它了”，赋予了这条人类股骨一种视觉能力。与图纸上的物件形象不同，这段铭文只有呈现在这件骨雕的物质性母体上时才具有最强大的力量。



与会嘉宾线上讨论

类似地，看到一个奥尔梅克陶杯，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用来喝水，这样一来，它内部的一些东西就被掩盖了：简略抽象的图案、弯曲的嘴唇形状、状似葫芦的构造。这些例子表明，只有在给予物件一种物质性，关注一件器物是如何被设计制作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思考它是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识到一些曾被忽略的部分和特征的存在，发现每一件器物的独特性。

巫鸿教授接着提出另一个问题，回到中国古代视觉文化的研究，如果把物质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一个中心，是否可以想象当时的人在运用物质时与物质世界发生的互动？李新伟教授认为，艺术的物质性指的是表达艺术的物质载体，除物质功用外，这一载体还具有特别含义。要理解赋予艺术品的物质性，首先要对一件艺术品进行恰当的解读，然后才能讨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物质去做，进而理解这种物质的物质性可能是什么。在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中，制作陶器的粘土被认为是一般的材质，并不能赋予陶器特殊的内涵。陶器之艺术



夏绿松石龙形器

价值和艺术内涵不在于其材质，而在于其造型、制作工艺，以及器物上绘制或刻画的图案。更能表现艺术品物质性这一主题的珍贵材质是玉，它是中国史前时代和玛雅世界共用的。

物质对于观念及艺术物质性的塑造来源于它自身特殊的形态和材质。比如颜色，中美地区认为绿色是生命之色，珍视所有绿色的东西，包括翠鸟的羽毛。在玛雅世界，绿色的蛇纹石、绿色翡翠是最高贵的材质，玉被认为是凝聚了天地的生命之力才得以呈现翡翠之绿。正如米勒教授介绍的，牟塔瓜（Motagua）河附近有中美地区唯一的翡翠矿，很多装饰品都用高质量的翡翠来制作，像帕伦齐的帕卡尔大王（Pakal the Great）的面具，他们认为佩戴这样材质的装饰品人也会充满生命之力。在中国史前时代，虽然今天看到的很多良渚玉已经是所谓的鸡骨白的颜色，但是良渚的先生们都说，玉原本的颜色应该是偏绿色的，红山玉很多也都是绿色。所以，中国的史前玉器也很可能和中美地区一样，看中它这样一种绿色的材质。

又比如产地。米勒教授提到的海螺壳，它来自海洋，代表一种来自海洋、冥界的水的力量，一种孕生的力量，所以海螺壳还可以被做成表现女阴的形象。再比如黑曜石，它是火山喷发形成的，是来自地下的力量。这些物质的物质性是由它们特殊的来源与美感所赋予的。在中国史前时代与之类似的对应物是丝。这关联到吐出丝的蚕以及中国史前时代对昆虫蜕变和羽化能力的信仰。早在 8000 年前的兴隆洼文化中就发现了用玉雕刻的昆虫，红山文

化也出土了很多用绿色的玉雕刻的蝓蛭与蝉；萨满文化中通神的状态类似昆虫的蜕变，人们认为佩戴用绿色的玉雕刻的昆虫可以使自身获得灵魂沟通的力量；二里头出现的绿松石龙是用 2000 块小绿松石片镶嵌成龙的图像，由一片一片绿色镶嵌物构成的身体似乎也呈现了一种类似昆虫裂变的状态。回到丝本身，已故的浙江考古学者牟永抗先生讨论过中国史前对丝的重视，认为这很可能源于对蚕的关注。因为蚕可以结茧，完成一种神奇的羽化，所以将蚕结成的丝制成丝绸披在身上未必是想要利用丝的“世俗”的丝滑的物质性，而是想要获得其神圣的物质性，获得一种昆虫蜕变羽化之力。总的说来，物质性的观点为理解中国早期艺术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它的延伸和转化也非常值得探究。

巫鸿教授提出中国还有原本属于生态环境一部分，后来进入艺术品，并最终变成一种象征的材料，例如女娲造人用到的陶土，铸造九鼎用到的铜，将来的考古应该更加留意物质研究的角度。巫鸿教授认为，古代中国和玛雅遵循的逻辑并不属于西方古典的“representation”，不是再现或者表现一个真实的东西。因为这种再现或表现的过程中往往有一个媒材，而这个媒材往往容易消失，留下的是所造之像（image），是被表现之物（the represented）。但古代中国与玛雅的艺术似乎不一样，它们并没有把这个材料仅作为一种媒介、一种物质，在利用媒材表现出一种图像之后把它隐藏起来，而是仍然完全展现媒材本身。比如中国与玛雅用玉等物质制作艺术品的时候，常常还是把材

料放在第一位的。在两种文明中，材料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为平等的互动。因此，巫鸿教授进一步追问在物质性与再现或表现的层面上，中国和玛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可能的联结？

米勒教授对从发掘艺术表现的相似主题得出两种文明直接联系的做法保持警惕，但是她承认在二者之间的确能够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巧合，比如都认为月亮与兔子之间有某种关联，在这些早期文明中，人们的脑海里可能存在某些相似的观念。最早期的艺术表现有可能是抽象的。人们或许有能力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简化成一些可识别的、共有的概念，这些概念可能与信仰系统有关。但如果不处于这个信仰系统之中，除非看到确实的证据，否则难以判断所见艺术究竟是否是一种再现或表现（representation）。

抽象概念的构建不一定是某个系统的终点或起点，而是一种具有自身完整特征的东西，米勒教授感兴趣的是人们是如何在物质或材料的指引下思考事物的。以纺织为例，实际上，在纺织过程中，局部就足以代表一个整体。在安第斯地区保留了很多传世的丝织物以及对这些丝织物的描绘，纺织设计尺寸的习惯也许影响了一种“可变的”概念的形成，再比如，经纬线作为纺织工艺的一种特征，也许可以被理解为人们思考方式的一种投射。

李新伟教授也认为玛雅跟中国文明确实有很多神奇的相似性。在科潘 8N-11 遗址中的一块石拓上雕着一位抱着玉兔的月亮女神，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因为两种文明有共同的旧石器时期祖先，很多基本



科潘遗址发现的石榻上刻有怀抱兔子的月亮神

的观念可能在 15000 年前甚至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形成。

具体到物质性方面，中国和玛雅有很多相像之处。以玉为例，中国古代用玉来雕刻蝉，可能只是一个抽象的几何形的图案，并不一定要很写实，重要的是玉这个材质，只有用玉来制作，佩戴才能发挥功效。在玛雅艺术中也有类似的体现。玛雅玉器，包括一些轮廓比较模糊的玉器、玉珠、玉首饰。也都不是精雕细刻的，人们更看重的是材质本身。再比如贝，玛雅很重视海螺，会在上面雕饰很精美的图像，但是不会对海螺的形状做丝毫改动，因为海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材质，它的物质性绝对超过其上所雕刻的形象，形象只是一种辅助。在中国，西水坡遗址中有用贝摆出来的龙虎图案，最近在南京北面的高淳又新发现了用贝壳摆放的鳄鱼图像，这些图像并不是很生动，所以我们可以推测用贝来摆这

样的艺术品应该具有特殊含义，比如可能和孕育生长有关。

就材料与图像的关系而言，李新伟教授认为古代中国确实有物质性超过图像内涵的艺术品，但是这可能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划分的事情，即便在同一个文明传统内部，对不同材质也有不同的表现。中国也有些器物中图像形象的重要性是超越物质性的，例如新发现的石峁古城所镶嵌的石雕，这个石料是很一般的物质，但它所表现的神像具有特殊含义。同样地，即使在古希腊古罗马应该也有一些类似的重视材质的艺术品。最后李新伟教授还对青铜类器物的物质性表现在什么地方提出了一点疑问，比如是在于青铜闪亮的光泽，还是因为它能够融石为金，进行特殊变换，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撰稿：OCAT 研究中心)

02

玛丽·米勒 | “形成中的艺术：玛雅艺术制作”系列讲座——玛雅艺术：艺术如何变化，如何保持不变

第二场讲座中，玛丽·米勒教授首先指出，玛雅艺术和建筑的历史常常被解读为变化与革新的历史。这种观点最初形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 Tatiana Proskouriakoff——普罗斯古利亚可夫在《古典时期玛雅雕塑》（*Classic Maya Sculpture*）一书中，对年代与风格之间对应关系所作的分析。在她的观念中，这些公元第一千纪的作品都是艺术。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写作的背景，恰好是在二战后为理解绘画、雕塑及建筑等提供重要思路的三大艺术史研究问世前夕。虽然普罗斯古利亚可夫 Proskouriakoff 的研究先于这三者出版，但是其诞生很可能受到了一种独属于 50 年代的释读上的“心理习惯”（*mental habit*）的影响，即将传统放在历史、技术演变，以及社会思潮的背景下去理解。

这三大研究之一是米勒德·梅斯（Millard Meiss）于 1951 年出版的《黑死病之后佛罗伦萨与锡耶纳绘画》（*Painting in Florence and Siena After the Black Death*）一书。梅斯的论题主要围绕乔托（Giotto）建立的艺术轨迹展开，尤其关注帕多瓦的竞技场礼拜堂（Arena Chapel of Padua）。乔托过世后，其学生戴迪（Daddi）不幸死于黑死病。随着戴迪艺术工作室的解体，乔托的创新艺术风格也遭遇了中断。梅斯认为，是圣职人员的信仰虔诚阻碍了

那种 14 世纪竞技场礼拜堂呈现出的人文主义式的、富有情感的冲动的发展。在该书出版的同年，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也开启了对西方基督教罗马式传统向哥特式演变过程的解读。他的《哥特建筑与经院哲学》（“*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一文认为阿伯特·叙热（Abbot Suger）主持重建的圣丹尼斯（Saint Denis）大修道院教堂遵循了当时的“心理习惯”。潘氏认为礼拜实践行为的习惯与建筑实践行为的习惯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潘氏看来，叙热将这座教堂建筑视作是诸





讲座现场实景

多同质的微小部分的排列组合体，而非一个整体。这暗合了当时基督教世界兴起的思想潮流的典型特征，而这个特征的最大化表达最终催生了哥特式建筑的诞生。潘氏论文发表的几年之后，汉斯·彼得·洛朗热（H.P. L'Orange）在其书《罗马帝国晚期的艺术形式与市民生活》（*Art Forms and Civic Life in the Late Roman Empire*）中对公元300年左右罗马艺术发生的巨大转变进行了解释分析。他认为戴克里先（Emperor Diocletian）为化解公元3世纪早期的政治动荡带给统治者的威胁而建立的四帝共治制，为社会和经济都提供了一种标准化的模式。这种标准化的模式进而波及到了当时的建筑与雕塑，使清晰度和等级顺序优先于个体特征。这种转变在洛朗热看来并不是一种保守性的发展，而是一种进步性的发展。

在对公元第一千纪的玛雅缺乏足够认知的前提下，这三种强调社会历史与艺术生产之间关系的历史叙事，为我们

提供了很好的解题思路——这三者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文献、他们所处时代的最新研究，以及对包含考古发现在内的物质文化的细致记录。回到本讲的核心话题，究竟什么是变化，什么又是静止呢？我们应如何理解玛雅艺术中的这些发展趋势？玛雅的艺术风格没有一个单一权威中心，其构成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各地区风格的独特性，以及各地风格中连续性的形成。从公元前50年左右的圣巴托洛（San Bartolo）绘画中就已经可知，当时训练有素的艺术家是遵照已有的模版去作画，并有效掌控颜料以及笔触以清晰表现他们的信仰体系。即便如此，精准的复制却要到公元4世纪及5世纪左右特奥提瓦坎人入侵玛雅低地，并将模制塑像引入玛雅艺术实践中后，才在玛雅艺术中得以彰显。模具的使用使得标准化的图像变为可能，但正如哈伊纳岛小雕像（Jaina figurine）所展示给我们的一样——几乎一模一样的几件小雕像之间仍存在细微差异，在复制中玛

雅艺术家仍保有创新和想象的能力。

玛丽·米勒教授继而表示，当论及玛雅雕塑领域时，极为接近的雕刻图案却鲜有出现，更不要提完全一样的图案复制。普罗斯古利亚可夫的研究表明，创新一般发生在远离大型城市中心的地方，有时是当地的物质性使然。例如，南边的卡拉科尔（Caracol）和西边的帕伦齐（Palenque）。相较之下，在普罗斯古利亚可夫看来，危地马拉的帝卡尔的7世纪到8世纪左右的雕塑风格发展轨迹可以说是最为保守的。实际上，由于公元378年特奥蒂瓦坎人的异族入侵带来了社会激荡，在4世纪和5世纪左右，帝卡尔的艺术风格曾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与革新。但因为这个时期的纪念碑几乎都已被损毁或掩埋，我们现已很难还原这段时期的历史。在445年复辟后，帝卡尔又于6世纪前后连续遭遇了卡拉科尔和卡拉克穆尔（Calakmul）的侵袭。在这段时间，帝卡尔几乎没有任何建造、庆典以及纪念活动。在771年落入卡拉克穆尔之手后，帝卡尔以公共形式呈现的艺术表现出高度的标准化倾向。直到7世纪末，旧时的帝卡尔王朝才重新强大起来。以哈萨乌·产·卡威尔（Jasaw Chan K'awiil）为首统治下的帝卡尔开始建造一种新的标志性建筑与雕塑的复合体——双金字塔群（Twin Pyramid Group, TPG），并以M, N, O, P, Q和R来标识组别。

建造双金字塔群的平台通常较低，仅约3米高。这个被限定的区域的東西两侧的金字塔既为通向平台中心的广场提供了通道，也阻碍了这个通道，尤其是在视觉上阻断了底下的人看到双金字塔群的中心。

两座金字塔指示着方位，它们巨大的躯体上没有任何上部建筑，只有东侧的金字塔前排列有九个光秃的石柱和圣坛，对于其他的双金字塔群来说，通常有四到六个。这些石碑上没有留下任何绘画颜料的痕迹。这不禁让人疑惑，这种矩形的建筑复合体存在的意义究竟为何？它们看起来属于玛雅人世界观表达中的一部分，作为一种集合时空在内的宇宙图而存在。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双金字塔群严谨的几何结构及其简明扼要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字面义以及比喻义上指涉特奥提瓦坎的矩形直线型城市呢？特奥提瓦坎城不仅是公元第一千纪中美地区最伟大的城市，也是帝卡尔城4世纪侵袭者的故乡，也当然是帝卡尔王朝血脉中的一部分。双金字塔群每二十年，即一个卡吞（k'atun）建造一次。虽然每组双金字塔群之间并非完全一致，但每组内部的关系却足以表明其独有的性质。东西两侧的金字塔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直线将二者连同其面前的阶梯二等分割开来。或许正是这种特殊的对称性在主导着双金字塔群的建造构想。

这些双金字塔群中的雕塑纪念并庆祝着每一个卡吞的完成。按照建造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双金字塔群的雕塑序列由风格迥异的M组石碑30、N组石碑16、O组光秃石柱、P组石碑20、Q组石碑22，以及R组石碑19构成。这个序列所呈现的帝卡尔石碑，拥有全新的、且严格遵照这个新的传统的形制。第一组M中的石碑30所展示出的不同寻常的艺术风格，暗示着建造它的雕刻师可能来自卡拉科尔。这个石碑为其他双金字塔群的石碑树立了风格典

范。在紧随其后一个卡吞修建的石碑 16 上，人物的服饰、仪式用具，以及其他一些细节都与其保持一致。只是在石碑 16 上，帝王被描绘成了正面站姿，而这一点在 8 世纪的帝卡尔艺术中并不常见。

这个序列中最惊人的一个转变莫过于 O 组北侧建筑中的光秃石柱。结合历史叙事来看，这个光秃石柱是在第 26 号统治者哈萨乌（Jasaw）——也即石碑 16 上所描绘的统治者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伊金（Yik'in）第 27 号统治者上位之前，为庆祝第 15 个卡吞完成而建。一个可能的猜测是，O 组光秃石柱的出现是为了纪念一个从未继承王位，但同时又具有重要家族地位的皇室成员。伊金继承王位后，在其统治的第 5 年修建了石碑 21，但因为并不是用于庆祝一个卡吞的完成，所以并没有纳入到双金字塔群当中。石碑 21 沿用了石碑 16 上



哈伊纳岛小雕像

的人物服饰，但人物描绘却从正面转向了侧面，仿佛是在对其父的去世表示哀悼和致意。石碑 21 为之后的王朝继承者们建造的石碑树立了形式及风格上的典范，被不断地重复、复制。伊金修建的第二个纪念碑——石碑 5 重复了石碑 21 上的人物姿势以及服装，但将权杖重新改为竖直握持，并在所描绘的统治者脚下增添了一个被捆绑的囚犯。自石碑 5 之后，这个图像就被分割成以一个石碑和一个圣坛的组合形式呈现。石碑 5 及其相对应的圣坛 2 的出现是为了纪念对玛雅人来说另一个重要的数字，13 这个周期的完成。对玛雅人来说，13 是最为神圣的数字，对应着天堂的层数，其中第一层则是地球的表面。

伊金的儿子雅什·阿因二世（Yax Ayin II）主持修建了下一组双金字塔群，Q 组，也是所有双金字塔群当中最大的。其后一个卡吞修建的石碑 19 紧邻石碑 22，它们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其相应的圣坛也都十分相似。这几对同一的石碑-圣坛，标志着帝卡尔王朝的统一性、连续性，以及不变的特性，而这些都是气候变化和政治动荡的压力下应运而生的一座城市的重要特征——正如早先在 4 世纪和 5 世纪面对同样的压力时帝卡尔城以创新来做出回应一样。到了公元 800 年，玛雅低地南部的大多数城市基本都已停止建造纪念碑，双金字塔群复合体也在 790 年停止了建造。但后来建造的石碑 24 和石碑 11 仍从石碑 22 和石碑 19 甚至是石碑 21 上有所借鉴。从石碑 24 和石碑 11 体现出的视觉一致性可以看出，持续性和静止的特性并没有随着帝卡尔即将到来的没落而停止。

如果说石碑的建造是基于一个特定的

模版，那么对于那些置于石碑面前的圣坛来说，似乎就并非如此了。从 M 组的圣坛 14 开始，序列发生了变化。圣坛 14 所表现出的正面性具有一种“暂停”的特质，仿佛是一个句末的句点。在其后建造的圣坛 5 上，帝王哈萨乌立于左侧，而他的一位贵族随从立于右侧。这种成对出现的人物描绘，以及图像所表达出的建筑的纵深感，都是从未在帝卡尔的大型圆形石刻上出现过的。另一个特殊案例则是后来建造的与石碑 5 配对的圣坛 2。虽然其表面已经不可见，但其边缘所呈现的特征仍值得研究。边缘展示了一系列风格化的羽毛图案。这种羽毛图案的边缘也同样是 Q 组和 R 组的圣坛 10 与圣坛 6 的标志特征。这种羽毛图案常见于墓葬中承装祭品的大型成组陶盘的装饰图案中。这些陶盘上所描绘的人物，头上反戴饰有羽毛的帽子，呈一种谦卑的进贡的姿态，而这种帽子常为商贸之神所佩戴。从后来的阿兹特克人那里，我们可得知，富裕的商人须向统治者提供祭牲。若将圣坛 2、6、10 上呈现的这类图像放在一个呈现供奉和祭品的语境下去观看，它们则展现了超出对统治者本身的描绘以外的创新和变化。

回到双金字塔群建筑设计本身，其另一个特性是具有增长性，即像一个洋葱一样，每一层都与之前的层相关联。今人与先人所造层层相连，形成权利的中心和通过其相邻性以及密度进行沟通的记忆的中心。但是到了公元 692 年，帝卡尔建造的新的金字塔却摆脱了这种特性，开始突出展现每一个体。双金字塔群的比任何其他一种建筑形式都要更加干脆地对彼此进行复制，即便不是大小完全一致，也是拥有

一样的建筑比例。这种程度的复制首先需要玛雅人作出精确的测绘。这不仅需要长线，还需要类似 T 字尺的工具去确定角度，而后者已经在特奥蒂瓦坎发现。双金字塔群建筑所呈现的明晰的经纬线，以及一个经过精确测量界定出来的三维框架，就像是任何一个稳定社会所必须的网格或编织线一样，为帝卡尔的城市和社会整体构建树立了一套标准。也只有在这套标准之上，文字、艺术以及想象所具备的多样性才得以施展。

在严格遵循复制这一原则下，随之而来的除了模版和范式，还有模具、图章和印章。图章和印章在中美地区早期文明中就已有运用，然而模具投入使用的时间比较晚。此前谈及的哈伊纳岛的小雕像则是其参与实际艺术生产的一例。很多小雕像是通体使用模具，而另一些则是部分使用了模具。即便这些小雕像表面所用的颜料以及人物服饰或肢体的一些细节，有时会让人误以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小雕像，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出自同一个模具。然而，以哈伊纳小雕像为代表所呈现的这种标准化的传统，同样大约于公元 900 年前夕就迅速终止了。

技术发展既可以推动又可以阻挠变化与革新。正如钻子加速了罗马晚期艺术的标准化，模具的出现也限制了小雕像的进一步创造。如果我们将文字看作是一种技术的话，我们将看到许多玛雅城市实际上都在利用文字实现标准化，而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比帝卡尔将这一点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虽然古代玛雅人并未有类似潘诺夫斯基所引用的各类哲学及宗教学文本一样的文献遗存，但是玛雅文字在某种程度上

却可以提供同等的证据。我们并不清楚，是否在公元 800 年左右的玛雅，出现了类似梅斯所述的出现于十四世纪意大利的黑死病一样的瘟疫。但我们知道，在公元 8 世纪末期，玛雅地区出现了长达 100 年左右的持续干旱。这导致了人口减少及流失，大量城市也遭到遗弃，与此同时创造的动力以及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也一去不复返。梅斯指出，在黑死病之后，意大利艺术几乎耗费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得以重新实践乔托所创造出那种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艺术。然而对玛雅人来说，公元 800 年后的艺术在静止和重复的轨道上越走越远。在最后几年的纪念碑制作中，这种趋势远不止出现在帝卡尔。而这一点正是 Proskouriakoff 在 1950 年书中所指出的，但她也仅止于此，并未进一步声明促成创造的是社会的崩盘，或政治的失败，抑或是后被摒弃的宗教实践，而又正是这些进而导致了她所谓的“衰退”的发生。和黑死病之后的社会状态不同，玛雅世界并没有回到一个“新常态”。突如其来的无常席卷了一切，洗清了玛雅的历史，也为在 21 世纪探寻复杂且充满挑战的玛雅世界的各个方面的我们种下了深远的疑问。

第二场讲座中，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副教授王海城任回应嘉宾，对谈环节由 OCAT 研究中心执行馆长巫鸿作学术主持。与谈人从自身的研究领域出发，围绕讲座主题作出回应，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疑问。

王海城教授作了题为“艺术沿革随想”的回应报告。他表示，米勒教授的讲座中涉及到了艺术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解释连续与变化。对于影响连

续与变化产生的诸多因素，我们可以从六个主题切入做讨论和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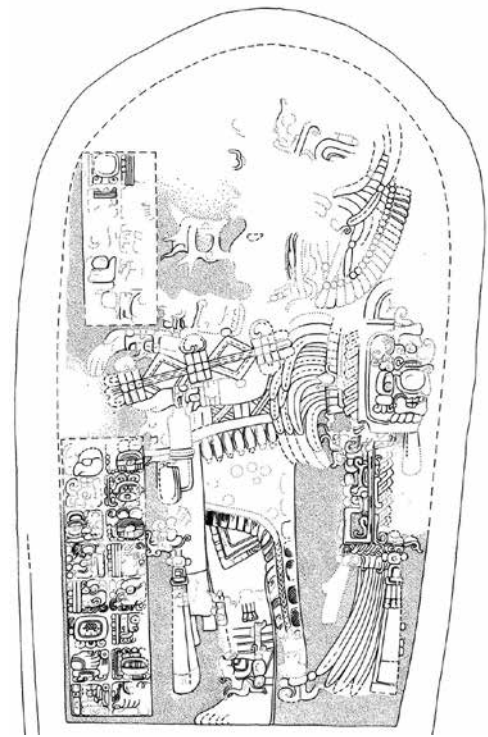
第一个主题是原材料，也即米勒教授第一讲的重点。古代中国、埃及和中美洲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各有所好。中国对于玉、漆器、丝绸和工艺复杂的陶器的偏好到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就已经形成。但与中国相反，有纹饰的衣服并不为古埃及人所用，即便是地位最高的人，其穿着也是经过浆洗的白麻布。亚麻布从很早开始就是古埃及人珍视的原材料之一。此外，古埃及人还看重金子、象牙与水波纹燧石等材料。而古代中美洲人重视的材料与前两者又有不同。他们偏爱热带雨林中的木材和海洋中的海菊蛤。即便如此，各民族各地对材料的选择和喜好也有相似之处。例如中美洲和中国都偏爱玉器，且重视玉斧这种形制。在法国也发现过类似的玉斧。那么，究竟是斧头这种形状更为重要，还是原材料更重要呢？有可能加工玉料的石匠仅仅出于实用性的考量，在加工时第一个想到的恰好是斧头而已。在艺术的历史上，存在连续性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某些原材料坚定不移的依恋。五、六千年以来，中国人对美玉持之以恒的热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导致艺术的历史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也是原材料。当原材料的供应发生变化时，艺术的变化也就相应产生了。由于 751 年发生的怛罗斯之战切断了贸易往来，原本依赖于阿富汗生产的青金石而研制出的蓝色颜料自此从敦煌壁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石青，也即蓝铜矿。这就导致壁画中蓝色的色彩明艳度由强转弱。此后，当阿富汗将其青金石贸易转向

欧洲市场后，很快使得这种蓝色成为欧洲画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圣母玛利亚的长袍。另一个例子在米勒教授的《玛雅艺术和建筑》（*Maya Art and Architecture*）一书中可以得见——在玛雅古典时代晚期，科潘的森林木材因大量砍伐而匮乏。这从而导致燃烧石灰石以制作灰泥时所需的燃料紧缺。因此，在科潘的第 16 号神庙下面所叠压的两座神庙中，只有建造时间较早的那座神庙被各色粉饰灰泥覆盖，而另一座晚期神庙仅由白色的石灰石雕刻而成。在这个例子中，原材料的匮乏改变了科潘建筑的外观。

第二个主题是技术。人们需要处理、加工原材料，才使其能变为艺术。刺绣、漆器、黑陶等器物的制作背后都需要技术与经验的日积月累，而这一积攒的过程也正体现出了艺术历史中的连续性。同时，在技术积累和传承的过程中，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化，工匠能否掌握这些复杂的工艺也就决定了艺术是否产生相应的变化。无论是中国的瓷器还是西方的炆器的制作，都需要高超且复杂的技术。工匠不能单纯展现陶土的固有品质，必须要有彻底转化原材料的能力。即便是像玉这样的重要材质，琢玉工匠的技能也远远不止把原料的品质展现出来。

第三个主题是培训。复杂的过程和技术需要代代相承。任何复杂的技术都需要系统的学徒培训。在学习技术的过程中，学徒自然也会学习师傅所从事的题材和器物类型。如果作坊的师傅是为教堂做宗教绘画的画家，学徒就会练习宗教题材和制作祭坛装饰屏风一类的东西；当学徒学习如何制作和使用青金石颜料的时候，同时



双金字塔群 R 组石碑 19 示意图

也是在学习如何画圣母玛利亚。技术训练之所以是维持艺术延续性的主要机制，正是因为学徒所传承的不止是技术。但同时，技术、题材和器物类型有时也会因为技术转变或者雇主主要求的变化而产生变化，那么艺术表现也就会随之产生变化。

第四个主题是赞助人或雇主。赞助人或雇主的个人意愿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艺术家的创作。例如，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就下令修改了前任统治者们沿袭下来的雕像样式，开创了自身统治形象的新模版。又如，清代宫廷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中曾记载，雍正皇帝对于设计和作工的要求近乎苛求，亲自参与各种细节的制定，并常会数次下令对样品进行修改。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高彦颐 (Dorothy Ko) 对雍正有过一个评价：

“他不知道他喜欢什么，直到看见他不喜欢的样子，他才知道”。这个总结抓住了赞助人和艺术家的互动之中很重要的一面。

第五个主题是多样化。清宫造办处的各个作坊中最知名的景德镇御窑厂采用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模式。制作雷同的产品会趋于单调，而复制工艺却又常常启发艺术家寻找新的方法来避免单调。米勒教授在讲座中已经详细叙述了哈伊纳岛陶俑如何在复制的过程中，通过细节变换来呈现多样性。中国也有一个相似的案例，即秦始皇陵兵马俑。兵马俑也是先用模具制作出陶俑的主要身体部位，再通过面部和发型的细加工得到具有“个性”的不同的士兵。古希腊公元前五世纪里亚切青铜武士像（Riace warriors）的两座躯干也是由同一模型铸造而成，并通过个别单独铸造的部件来显示出二者的差异。

然而多样化并不是批量生产模式的一



古希腊公元前五世纪里亚切青铜武士像

种副产物，而是艺术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根源在于人类认知系统中寻找规律的机制——具有规律的事物容易被人们快速掌握而后忽略，而艺术家当然希望他们的作品受到关注而不是被忽略。规律固然因其简单易懂而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绝对的规律会变得枯燥乏味，只有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才会引人继续探索。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书法有很多例证。东晋王羲之所作的《兰亭序》中对重复的字采用不重样的书写方式，已经成为中国古往今来的书法家们所共同追求的一个原则。罗马皇帝图拉真所树立的纪念碑（Trajan's Column）上的铭文也是一个案例。每一个字母比例以及其间的间隔留白都不尽相同，字母的线条也不是呆板的直线而是有变化的曲线。重复造成反应迟钝，变化则得到关注。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尤其如此。艺术发生变化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重新点燃观众的热情，赶走审美疲劳。

第六个主题是变化的速率或速度。在米勒教授讲到的帝卡尔的双金字塔群这个案例当中，每一个双金字塔群前都会有纪念建筑落成的石碑。如果如米勒教授所说，建筑是为纪念二十年一循环的卡吞而建立，那么一致的建筑外观则给观者传达了一种即便时光流转也不会改变帝卡尔王朝统一稳定的现状的信息。因为要传达的信息是不变，所以这里的变化速率就是零。类似地，日本皇室奉为始祖的天照大神所居住的伊势神宫从公元7世纪以来，每隔二十年就要举行更新仪式并按原样重建。但实际上，因其所在外部世界发生了改变，完全一模一样的重建是很难达成的。受到外来佛教文化的影响，它在时人印象中的外观特征

逐渐从建造之初的精致，转为了一种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日本美学中所追求的“最精致的粗糙”。

与这种冻结在时光中的建筑相对，欧洲建筑中曾发生过一些急剧变化。在法国和英国，公元1000年左右建成的基督教堂以木头做屋顶、用巨大的石墙在四周做支撑。这种教堂实用且稳固，主教们完全可以一直沿用它们。然而，两个世纪之后，这些教堂改用石头来砌建屋顶，而支撑墙的墙体大部分也都改选了不太能承重的玻璃材料。这不禁让人疑惑，这些急速且急剧的变化发生背后的动力何在？在1951年，米勒教授讲座中提到的著名的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对此做出了回答。他认为这种新型的建筑是当时神学辩论中一种辩论新风格的产物——神学家发明了一种新的阐释风格，它为包括建筑师在内的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所熟知。在建筑师建筑教堂的时候，不自觉地在这种新的文学风格转化成为了新的建筑风格。潘氏是从文献入手去寻找答案的，但他并未能解释新的建筑风格是如何从神学理论的组织结构中得来的。实际上，公元1000年到1200年这段极富创造性的发展过程是受客观现实的推动才得以发生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首先是大量的金钱财富；其次是富裕的城市和富裕的主教之间，对于希望建筑最高大的教堂的激烈竞争；最后是得益于精准的石块切割技术而诞生的工程结构方面的革命性创新。这个过程中没有一项发明来自于神学家。在中国，商代青铜礼器的发展也可用类似的语言来描述它的过程。导致器物造型外观发生变化的因素，同样是财富、竞争和快速成长的技能，以及对设计

永无休止的实验。

除了上述六个主题外，还有一个涉及艺术的变革和延续的课题就是对于因果关系的讨论。艺术的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延续性，都是因为艺术家和赞助人的出发点是已经存在的艺术品。影响艺术的变与不变的因素还有很多，本次回应受时长所限，只能展示其中的一部分。在米勒教授的《玛雅艺术与建筑》以及约翰·赫斯科特（John Heskett）的《工业设计》（*Industrial Design*）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不断地发觉，一个简单的解释绝不会是故事的全部。

巫鸿教授认为，两位教授的讨论都围绕着艺术中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关系来展开。米勒教授在这一讲从历史的角度切入玛雅文明，这里的历史不是属于文本的历史，而是属于物质的纪念碑式的历史。这个历史充满了连贯性，同时又充斥着断裂性，有发展与兴盛，也有衰落的过程，在这里我们通过考古学和艺术史对纪念碑的研究看到了这种历史。不管是玛雅还是中国的艺术史，延续（continuity）和断裂（rupture）都是很重要的概念。巫鸿教授认为连续性是一个大概念，包含了很多构成连续性的不同的机制（mechanism）和技术（technologies），比如王海城教授提到的一种变化速率为零，处于冻结状态的连续性，又比如米勒教授提到一种看似在复制，实则是在变化的连续性。两位教授还都谈到了速度，讨论它是长时间的连续，还是短暂且高频率的变化。连续发生在时间里，和连续性相对立的就是断裂。艺术史不光是生产，也是一种销毁，有时二者是缠绕在一起的。像一个洋葱一样的双金字塔群建筑设计体现了一种消灭和建筑同时



罗马皇帝图拉真所树立的纪念碑上的铭文

进行的过程，它把老的墓葬和纪念碑包裹隐藏起来，但老的东西依然存在，而且它的存在也有可能因此变得更加神圣。因此，我们不能把连续与断裂说成一种简单的现象，它是非常复杂的机制。

“重复导致乏味，变化使人提神醒脑”，米勒教授和王海城教授都承认重复和一致导致帝卡尔的石碑序列整体显得有些无聊。但王海城教授认为，尽管帝卡尔石刻具有程式化的特征，帝卡尔艺术却不乏复杂精细之处，比如木制过梁和骨雕，由此形成强烈的对比。于是他进一步追问这种反差背后可能的原因，这是否意味着对不同材料的处理方式会因材料属性或功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米勒教授指出双金字塔建筑的特殊形制是为了让人们以为自己应该在这些小型神庙中看到一些什么，但实际上他们看到的仍是非常无聊的东西。几乎所有木制过梁都被放置在最高金字塔顶端，高高在上，距离观者非常遥远。而骨雕是在一位国王的墓葬中找到的，属于非常小的私人物品，别人无法看得见。米勒教授提出了两个疑

问点：其一，以有关队列游行的巨型主题绘画为例，木制过梁上的图案可能已经用纸张或布料等极易腐坏的材料制作过，但人们依然将所见主题以涂鸦的形式记录在木制过梁上；其二，除帝卡尔外，双金字塔群只在雅什哈（Yaxha）出现，其他的玛雅城市都没有采用这种建筑形式，所以她推测双金字塔群既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玛雅建筑的典型。

王海城教授提出在一幅苏弗里卡亚（La Sufricaya）壁画中有一些红色的长方形网格，每一个方块中都有玛雅人的小画像，而卡尔·陶布（Karl Taube）认为这实际上是特奥提瓦坎的地图。米勒教授在谈论双金字塔建筑群时，也提到其具有几何感的网格型布局可能是在指涉特奥提瓦坎的布局。综合这些发现，王海城教授对帝卡尔艺术提出了一个猜想：在帝卡尔经历入侵后，祭司和书吏等后人可能是在保留早期的特奥提瓦坎的真实地图。

米勒教授认为，可以肯定的是，特奥提瓦坎的神圣知识得到了传承。在帝卡尔展开的最新光学雷达（Lidar）探测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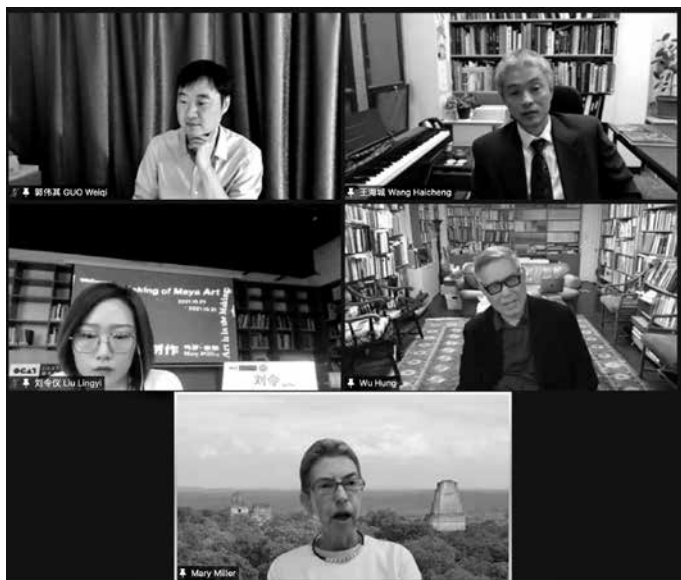
显示，特奥提瓦坎人不但入侵了帝卡尔，他们还留在了那里并参与了建造。埃德温·罗曼诺（Edwin Romano）最近的考古挖掘就暗示了特奥提瓦坎人在4世纪时曾在玛雅定居。但是他们并没有出现在卡拉克木（calakmul），而是存在于瓦沙克吞（Uaxactún）以及其他受外来者影响很大的地区。双金字塔群的特质之一，即是对这些早期经历的内化。但4、5世纪帝卡尔丰富多样的建筑雕塑在之后都被抛弃、破坏和掩埋了，这是因为帝卡尔恢复统治权之后希望用一种更为直观且稳定的叙事方式来讲述自身历史，来面对站在双金字塔群前面更为广阔的观众群体。大约50-60多年前，参与发掘帝卡尔双金字塔群遗址并就其写作了博士论文的克里斯托弗·琼斯（Christopher Jones），就对其展现出的二十年一循环的周期进行了研究。

王海城教授由帝卡尔的案例联想到日本的伊势神宫（Ise Shrine），后者也使用木制过梁，以二十年为一个建筑周期对同一个建筑反复重修。关于利用雷达技术得出的最新发现，他还联想到另外两个例子：日本学者稻田武（Takeshi Inomata）在其报告中讲述了如何用光学雷达发现早期奥尔梅克（Olmec）文明和与之同时的前古典时期玛雅遗址上的大型建筑；此外，澳大利亚学者罗兰·弗莱彻（Roland Fletcher）及其团队将光学雷达技术运用于以吴哥窟为例的热带地区考古学研究。王海城教授希望中国的考古学者也能从中有所借鉴。

巫鸿教授接着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断裂性之外，是否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复古（archaism），即后人有意地返回到原来

的历史上的一个瞬间？无论是连续、断裂还是消失，都是一个在向前走的线形的时间，而复古就将这种时间性变得更复杂。第二，当我们在解释大型的、纪念式的物品时，往往倾向于将其与王朝的发展相联系，但是正如王海城教授所说，神学家并没有盖教堂，国王也没有盖金字塔，那么是否有证据可以说明设计者或工匠在制作过程中发挥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agency），或者相反，他们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针对第二个问题，米勒教授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帝卡尔非常有趣的一点在于统治者是按其统治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的，而现有序列中又缺失了一些序号，所以也就知道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叙事并不是全部。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说明，提醒着我们现在获取的知识是有所欠缺的。用编号系统来记录朝代对帝卡尔来说有着独特的意义。当我们将特奥提瓦坎的入侵过程解码之后，就会发现被颠倒放置的石碑上所蕴藏的艺术家的能动性。因为石碑上的文字没有规范地写在正确的方块内，而玛雅文字一直都是非常有序地以方格式规范书写的。而且石刻艺术家们虽然知道如何找到上好的石料，但他们却选用了可以说是品相最差的石头，最后再涂抹上颜料，试图让石碑变得稍微好看一些。米勒教授据此联想到耶鲁同事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对八大山人画的鱼所做的论述，虽然他没有用叛逆这个词来形容画家的画法，但在其中也能看到不畏权势的精神。她还联想到一只玛雅的陶罐，上面刻画了一只超自然的兔子正在偷一位神祇的帽子。而帽子是一种在墓葬艺术中很常见的元素，一些其他



与会嘉宾线上合影

作品显示出当商人要向国王进贡的时候必须摘下帽子，以此来显示自己完全服从于国王。这显示了一种幽默，而这种幽默是在艺术家手中才得以呈现的。这种幽默的表达也同时使我们在作品中洞察到了人性的存在，并且引得后世的我们的爱慕和敬仰。

谈到艺术家的能动性，王海城教授还注意到无论是陶器还是雕塑，很多玛雅的艺术家会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作品上，与手写签名近似。然而在中国早期艺术中看不到这样的东西。这可能是因为在玛雅艺术家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精英，而非平民百姓。

米勒教授再次引用到陈列于耶鲁大学美术馆的那件股骨雕作品，艺术家将他们的名字非常优美地留刻在了上面。一个更特殊的例子是皮埃德拉斯·尼格拉斯（Piedras Negras）的石碑 12，雕刻家的名

字被写在俘虏身上。因为国王的官方雕刻形象非常精致，没有任何的不规范性，所以我们可以明确知道，这里的反常是刻意而为的。巫鸿教授从辽墓研究的角度补充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墓葬艺术家是被捕的囚犯，他们在这个墓葬中劳作，并且有意改变了壁画的主题来反映这种情况。

针对巫鸿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王海城教授认为刻意地复兴确

实时有发生。举例来说，公元前 5 世纪，山西的青铜器也是用成块模具来制作其表面图案，而来源之一就是有意选取几百年前的商代青铜器的图案，并以不一样的方式呈现出来。例如，陶寺北墓地发掘的一对铜壶上面就是很典型的商代主题。

提及“复古”问题，郭伟其教授想到中国艺术上另一个“复古”的例子：董其昌的书画。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他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里面提到这个案例，对于一个业余的文人从事专业的行政工作，一个业余的画家进入专业的艺术史表示惊异。后来高居翰（James Cahill）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认为董其昌是在复古的制约下从事创新和发明的。

围绕艺术变与不变的关系，郭伟其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建筑的

内部与外部的变化速率可能是不一样的，在西方艺术史中内部往往发展得比外部快一点，例如一个建筑外部是巴洛克的时候，内部已经是洛可可了。那么，类似地，玛雅金字塔在外部保持不变的状态下，它的内部结构有没有发生变化？第二，梅尔·格林·罗伯逊（Merle Greene Robertson）描述帕伦齐壁画时，曾指出玛雅的艺术“打扮”起墙上的人物形象来了，它们就像真人一样由里到外一层层穿戴衣物，艺术家每画一件一幅都要先上一层灰泥，将里面的人物形象覆盖掉，然后再画上装饰品。这样一来，虽然艺术品的外部没有改变，但实际上它的内部程序在变化，这种变化虽然被覆盖掉了，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发生过。顺着这样的思路可以追问，在艺术品外部维持原样的情况下，其内部的制作程序有没有发生变化？

米勒教授认为第二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艺术中表现（representation）的本质是什么。帕伦齐壁画的制作过程是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用小石头镶嵌在灰泥上，从而搭建了一个矩阵网络作为框架，然后再画出人的身体。他们可以说是部分地完成了对身体的描绘——使得其大部分可见，其余部分如生殖器则不可见。于是掩盖在表层之下的躯体是否完整以及有多完整就成为一个问题。在躯体之上，画家还会画出装饰物，装饰物上有可能又绘有另一层装饰物，最后再用颜料对绘画进行上色。这里有必要回到物质性，在石头上进行刻画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创新的，而灰泥这种材质却给了创新以非常大的空间。如果你想要静止不变，那么给我一块石头，告诉我应该

复制什么东西；但如果你给我一块灰泥，告诉我你想要得到什么东西，那么米勒教授认为应该有很多变化创新的余地。

对于第一个问题，王海城教授认为外部不变而内部发生变化的情况尤其适用于描述大型建筑。例如哥特式教堂的内部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有机体，新的东西不断建筑在旧的部件之上。玛雅或中美地区的建筑与此类似，新的物件被不断从外部包裹添加。王海城教授还特别提到，变与不变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可用资助资金的多少，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变化也可能会戛然而止。例如，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包括石材、木材、金属等等在内的几乎所有东西都要依赖进口，这给艺术生产造成了巨大压力。

米勒教授认为相对财富（relative wealth）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如，当一个重要的人物逝世后，属于他的珍宝便会随着他被埋藏入土，其他人再不得见。同时新的东西需要被制作出来。但如果没有旧的模版，就有很多空间可以进行创新变化。她推测帝卡尔并不像它的巨型金字塔显示出来的那样富有，而相比于帝卡尔，帕伦齐有大量可用的农田，人们可以获得数量惊人的木材作为烧制灰泥的燃料，帕伦齐没有金钱，但他们有丰富的资源和财富。不过，米勒教授认为只要有足够的女性劳动力，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生产制造出精美的织物，这是一类普遍的艺术形式，有关印加帝国“织女”（weaving women）的完整记载和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的帕拉卡斯（Paracas）织物可以印证这一点。

（撰稿：OCAT 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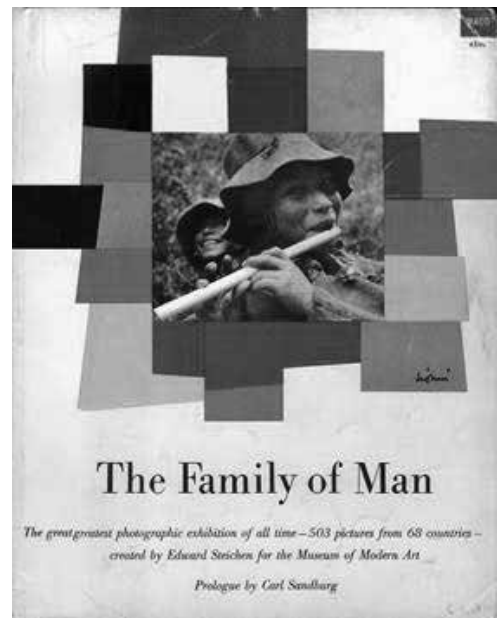
03

玛丽 米勒 | “形成中的艺术：玛雅艺术制作” 系列讲座——玛雅艺术：现代语境下的玛雅艺术

本场讲座，米勒教授聚焦现代语境下的玛雅艺术。她表示，艺术的历史是复杂的。它不仅包含关于所有权、文化遗产、盗窃等的历史，还包含如今保存艺术品的地点与过往宗教实践和经济的力量相结合的历史。推动着信仰前行的，不仅是艺术家们对其使命的完成，更是艺术家们对艺术的创作本身。艺术赞助人之间的竞争有时会导致艺术品的观者仅局限于一个小范围的特定人群，但有时也会导致艺术品的大量复制。与此同时，艺术是否可以进入市场，与艺术创作者的身份也有诸多关联。回到本次系列讲座所探讨的话题，拍卖行及竞

拍又是如何将前西班牙时期的艺术推向艺术市场、博物馆和公众视野的呢？对前西班牙时期艺术的探寻早在其市场形成前就已存在，这种探寻始于一种对满足好奇心的渴望，一种对所谓宝藏的探求，而非对艺术品本身意义与重要性的追寻。

在西班牙人入侵美洲之时，绘画并不是他们所首要寻求的东西，而是诸如黄金等全球通用的贵金属。因为缺少对西方教堂体系之外“艺术”的认知，入侵者们仅仅搜罗各种黄金制品，却将当地价值系统中视为珍宝的织物和玉制品熟视无睹。西班牙人对当地的宗教以及文字系统一无所知，当然也不会认为他们所见是艺术。但正如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urer）所记录的那样，他们的确从这些物品上见证了除了绝对价值以外的艺术性、工艺、美，以及那种诱人的奇异的特质。新大陆的发现激起了欧洲人对美洲文明的巨大好奇的同时，也挑战了犹太基督教的创世神话，从而引起了他们的焦虑与不安。在欧洲人的统治下，美洲本土的知识系统和物质性遭遇了重重危机。在那些运输到欧洲的艺术品中，一些幸免于火灾、战争等灾难，但却被误解或重新利用。例如，欧洲人在一件奥尔梅克的玉制头颅上加了绿色的陶土手臂，将其改造成了一个怪异的神龛。这种误解和再利用使得那些对于



“人类一家”（“The Family of Man”）的摄影展

欧洲人来说原本新奇的东西，变成为他们所熟知的事物。

到了18世纪末，随着墨西哥学者开展本土考古学实践，那些纪念性艺术杰作逐渐浮出水面。诸如阿兹特克历法石（Aztec Calendar Stone）等杰作在成为墨西哥这个新兴国家的身份象征的同时，也从欧洲世界的话语中脱离出来。而后，墨西哥的独立促使世界对于前西班牙时期艺术品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外交官、旅行者和收藏家在这一时期扮演了关键角色：被派遣到墨西哥的第一位美国外交官乔尔·波因塞特（Joel Poinsett）带回了大量前西班牙时期收藏；英国的收藏家亨利·克里斯蒂（Henry Christy）对墨西哥文物的扩充收藏而后极大惠及了大英博物馆的馆藏；法国旅行家德西雷·查奈（Desire Charnay）以摄影去记录其在中美洲的探索发现的创举，推动了后来大量印刷带有这些珍贵图片的书籍，以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前西班牙时期艺术品的纳藏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心，其中，1846-1848年间的美墨战争或许即为一例。但是这种好奇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却因1862-1867年间的法墨战争变得更为复杂。虽然马西米连诺一世（Maximilian I）并不是一位成功的政治领袖，但却对墨西哥的前西班牙时期历史有着真挚而浓厚的兴趣。他一直致力于搜集欧洲皇家收藏中的艺术品以归还给墨西哥。但在马西米连诺被处决后，那些曾经消失于公众视线的藏品又重新回到了欧洲收藏之中，并吸引了一系列现代研究。

对于欧洲和美国来说，前西班牙时期的历史是一种可收藏物。在以美国研究者为首制定的“野蛮的 - 未开化的 - 文明的”这样一种看似“科学”的阶梯中，种族被制度化成为了一种呈现文化可能性的概念性结构。从19世纪中期开始，种族，尤其是有关北美印第安原住民和美国黑人这两个族群，在美国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热门话题。到了1900年，博物馆这个概念风靡一时，但在这个概念中，却通常不包含对前西班牙时期艺术的探讨。其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墨西哥文物更多被赋予了商品价值，而非被视作艺术。它们被判定为“原始”人所创作的作品，因而被当作“原始艺术”划入人类学博物馆，而非艺术博物馆。美国，甚至是全球现今最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因考虑到非西方艺术并非他们的主要收藏方向，而在1936年决定将他们于1900年前后获得的前西班牙时期收藏，遣送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与此同时，许多现代“西方”艺术家们开始在传统艺术史叙事之外找寻灵感，但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人关注前西班牙时期的艺术，毕加索、高更、亨利·摩尔等艺术家就位居其列。随着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被纳入纯艺术的正典之中，收藏家和捐客们也开始对其作品的灵感来源，即所谓“原始”艺术加以关注与接纳。彼时艺术博物馆与人类学博物馆的藏品类别之间仍旧泾渭分明，以及这些艺术家们的原素材仍受制于人种志的标签下，但市场的风向变化不得不迫使博物馆随之做出改变。

第一波改变的浪潮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活跃于纽约艺术圈，包括马吕斯·

德·扎亚斯 (Marius de Zayas)、欧内斯特和伊姆雷·布鲁默 (Ernest and Imre Brummer) 等在内的富有影响力的画廊主, 对前西班牙时期艺术品的关注。即便布鲁默两兄弟的客户大多是藏家而非博物馆, 考古学家帕尔·凯莱曼 (Pal Kelemen) 出版于1943年的《中世纪美洲艺术》(Medieval American Art) 一书中所包含的他们两兄弟所代理的作品, 仍协助推动了这些作品应该被视为艺术这个观念的形成。在两兄弟从墨西哥裔艺术家罗伯特·蒙特内格罗 (Roberto Montenegro) 那里购入一件玛雅玉器的同月, 蒙特内格罗和其他三位墨西哥裔策展人, 一道策划了迄今为止在美国举办过的最重要的一场关于墨西哥艺术的展览。这一事实表露了画廊的艺术品交易与正式的展览组织之间相互的影响力。与此同时, 活跃在纽约的艺术品经纪人皮埃尔·马蒂斯 (Pierre Matisse) 对前西班牙时期艺术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并尝试建立并推动包括超现实主义和壁画主义等在内的现代欧洲艺术和身在墨西哥城的艺术掮客之间的关系。

到了30年代后期, 由于厄尔·斯滕达尔 (Earl Stendahl) 的出现, 使得不断膨胀的前西班牙时期艺术市场再次发生了变化。与马蒂斯和布鲁默一样, 同为艺术商人, 斯滕达尔与如迭戈·里维拉 (Diego Rivera) 等墨西哥现代艺术家之间也建立了密切往来。比起里维拉本人的绘画作品, 斯滕达尔对里维拉所藏的前西班牙时期的陶器更有兴趣。除此之外, 与前人不同的是, 斯滕达尔还亲自前往墨西哥, 从当地考古学家那里搜集出土物, 扩充其商品清

单的来源。斯滕达尔不仅打入了彼时因战争和娱乐产业而在经济上蓬勃发展的加利福尼亚南部市场, 而且还驱车前往波特兰、西雅图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地, 向当地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展示并销售其藏品。斯滕达尔可谓是先驱式的人物, 他率先游说各大机构, 将在欧洲之外的艺术品认作是艺术而非人类学范畴内的产物。他所售的藏品对二战后在美国迅速崛起的“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 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任期内盛行的理想主义也鼓励了多样化的博物馆馆藏的形成。这种自由派的理想主义鼓吹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全球主义, 一种集体性的人类身份, 推崇“同一个世界”的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和平。这种主张的一个具体体现即是1955年在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举办的名为“人类一家” (“The Family of Man”) 的摄影展。策展人爱德华·史泰钦 (Edward Steichen) 在展览图录的前言中, 看似和谐统一地, 但在今日看来实则居高临下地将展览主题的范围界定为“从原始人类到联合国的理事会”。这种叙述方式继而为美国博物馆和画廊的收藏多元化进程指示了一条轴线, 其两端一个是非西方艺术, 另一个是先锋派最新的作品。“从前西班牙时期艺术到抽象表现主义”这样一个看似暗示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一种视觉文化中的扁平化及平等的光谱, 影响了很多包括安德烈·艾默瑞奇 (Andre Emmerich) 在内的画廊主以及藏家。

在前西班牙时期的艺术作品从19世纪末期开始, 由考古收藏逐渐进入画廊和博

物馆的艺术收藏的过程中, 伪造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其中, 最著名的一桩案件即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于1947年从斯滕达尔那里花费一万美元购买的一座“查克木尔王的雕像”——这是斯滕达尔出售的最昂贵的前西班牙时期的艺术品之一——后被证伪。在美国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不断从像斯滕达尔和艾默瑞奇等画廊主手中收购前西班牙时期的艺术品之时, 一个重要的问题却被忽略了——在不断变化的法律法规以及政治形态的影响下, 博物馆的藏品作为文物本身的出处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追溯、探寻, 以及妥善的记录和留档。在上世纪后半叶, 前西班牙时期艺术的来源以及所有权历史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实际上, 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的整体形态都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 它们都在不断被时代的审美趣味所重塑, 然而这种修饰是难以被身处时代当下的我们所发现的。现代性或许在不断创造新的作品, 但它也同时抑制了对我们所未知的过去的揭示, 尤其是对文物所有权历史的揭示。但是考古发现以及考古的历史却可以将过去与当下对峙, 将我们所不知的视觉文化的背景与我们所已知的艺术史研究的前景相行比较, 使其间的差异得以显现。

1950年后, 非法劫掠在中美地区变得越来越猖獗。为获取木材而进行的森林开采和砍伐也使得多处处于无保护状态下的或此前未被发现的遗址暴露于世。大量的新发现从中美地区被运送到中间商那里, 再辗转抵达纽约、洛杉矶和巴黎等地的掮客手中, 成为画廊拍卖的热门拍品。它们大多被笼统草率地归为“非洲、大洋洲和



厄尔·斯滕达尔

前哥伦布时期艺术”这一非西方世界艺术的门类下, 登上图录、艺术出版物或是杂志的广告封面, 被大肆宣扬。

但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发现, 均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通过对玛雅文字的解读以及对宗教实践与信仰体系的解码, 作品之间的关联变得逐渐清晰。玛雅艺术家们既可以通过作品上的签名被识别出来, 也可以通过比对实物上所体现出的技巧、笔法, 以及书法技艺被辨别出来。实际上, 如果不是这些被掠夺的物品的问世, 仅凭对中美地区历史的考古知识, 那么, 在20世纪、甚至是21世纪的今天, 我们都无法洞见中美地区艺术家们在其作品上所巧妙传递的讽刺、幽默以及评议和注解。如帝卡尔的艺术家们刻意强调国家的权威而抑制个体性所表现出的那样, 玛雅艺术家们很少去宣扬和推销自我, 这是其

信仰体系中固有的宗教结构使然。即便如此，玛雅艺术家们在艺术表达上并不总是处于一种中立立场，受制于有权势和经济实力的委托人。一些诸如评论、注解、甚至奚落或讥笑等个性化的表达仍可见于一些私人物件上。这是玛雅艺术家们对其作为创作者的主体性的暗自宣誓，也是对其所处周遭世界的个人见解及看法的表达。

由于旧时外来人口的侵略以及玛雅各个城邦之间的战争，玛雅本土的历史遭受过多次侵蚀。现代人对玛雅的开采以及大屠杀等行径，也使众多玛雅古代城市遗址被毁坏。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重塑那些或因在过去被交换或呈作贡品，或因在当下在艺术市场中被交易而流散各地的物件之间的关联，并将其置于所有权的历史中去理解，从而还原往昔的历史。现代世界需要了解当代的玛雅文化，

同时也需要认知昔日的玛雅世界。今天的我们应力争更好地展示那段历史、重视文化差异，并保护本土知识。

最后一场讲座有幸邀请到上海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徐坚任回应嘉宾，对谈环节由 OCAT 研究中心学术总监郭伟其作学术主持，OCAT 研究中心执行馆长巫鸿参与。与谈人从自身的研究领域出发，围绕讲座主题作出回应，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疑问。

徐坚教授作了题为“发现，再发现：西方世界的中国艺术收藏”的回应报告。他首先指出，米勒教授的演讲内容主要是在西方艺术传统中如何遭遇和定位玛雅艺术。回应以中国学者的视角，聚焦西方世界如何发现、遭遇、定位中国的艺术，集中讨论西方博物馆中的中国艺术。

“发现”这一词汇是具有争议性的。

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是一个殖民主义词汇，认为遗址及其所包含的艺术品早已存在，例如奇琴伊察等地的传统一直为现今当地居民所传承和使用，无需西方的“发现”。无论是玛雅、东南亚还是中国的艺术对于西方艺术传统而言，都是陌生且格格不入的，也就是所谓一种“异质”性的艺术。因此，西方艺术传统如何“发现”从玛雅到中国的艺术和文

化传统，也就是一个如何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安置他者的艺术和传统的问题。如果借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两个关键概念，“知识型”（*épistémè*）和“有效史”（*effective history*）；以及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物的社会生命”（*social life of things*）的观念，那么使用“发现”一词或许也未尝不可。因为艺术的生命并不会终止于艺术家或艺术赞助人，艺术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艺术在其形成后的流传历史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部分。艺术在当代世界的“被接受史”也是关于艺术的知识史。正是艺术流传的变化，使得“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值得关注的侧面”，以及“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艺术”也随之而变。因此，玛雅或中国艺术或许确实是被“发现”的，而且这种“发现”是在不断地更新、重置，并随着其所处情境的改变而更改其内容。

然而，相对于玛雅、吴哥或者约鲁巴艺术，中国艺术具有一种不同的发现和再发现的历程。与前者不同，中国艺术并未被西方世界直接打上一个“原始的”标签。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之一，日本风和中國風（*Chinoiserie*）的诞生，使得西方世界提高了对中国艺术的期待。同时，中国艺术收藏变成了一种“可能不易被理解的艺术形态”的收藏。对中国的狂热，在 19 世纪逐步减退，甚至由狂热变为憎恶，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艺术的际遇。

中国艺术在西方世界的发展可以被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水平层面上的，即博物馆中的中国艺术收藏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的两个主要来源。另一个是纵向层面

上的，即博物馆中的中国艺术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其中，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孔雀厅（*Peacock Room*）作为一个关键的个案，精准地介绍了中国艺术进入博物馆时的知识性遗产及其早期际遇。日本风和中國風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改造和安置提供了一个知识背景。

早期，西方对中国艺术的安置有两个传统，其一就是美学传统。该传统由大英博物馆东亚部的主管、诗人、文学评论家宾雍（*Laurence Binyon*）开创。宾雍对顾恺之的名画《女史箴图》的描述并非是从其中国性出发，而是站在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的立场，用来自诗意和文学的词汇来欣赏这幅画作。这种描述方式引领了当时的风尚。在温索普（*Grenville Winthrop*）广泛的收藏中有很多中国玉器，在他去世后，这些玉器被捐赠给了哈佛大学美术馆，形成了在中国以外最好的中国古玉收藏之一。但他对中国玉器的收藏并非因为他对其有任何倾向，而是因为中国玉器表达了他的一些美学判断。因此，在他遗留下来的笔记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些非常抽象的关于审美的表述。以同样的方式建立其收藏的弗利尔（*Charles Freer*）在收购孔雀厅后，将其原有四周架子上陈列的中国青花瓷移除，增添了很多来自日本、朝鲜、甚至西亚的陶瓷器，来对展厅进行改造。这种改造则来源于弗利尔只关注美感和质量，并不关心物件来源何处的观念。

除了以纯粹的美学观念建立的收藏之外，还有在另外一种传统下，即人类学传统中建立的另类收藏。其中的两位代表人物分别是德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美国人类学博物馆收藏的中国艺术主要贡献来自劳佛

Boas) 和劳佛 (Berthold Laufer)。他们在德国均属于以阿道夫·巴斯蒂安 (Adolf Bastian) 为代表的的人类学传统之中, 认为收集这些艺术品是为了保留历史上人类艺术的样本。美国人类学博物馆收藏的中国艺术主要贡献来自劳佛, 他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学术界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劳佛采用人类学方法, 曾先后四次前往中国展开调查。1898 年考察了中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 1901-1904, 1908-1910 两次考察均前往西藏未遂, 但却借此几乎跨越了整个中国。他在北京、上海、西安和成都收购了大量的艺术品, 而他的旅行收获造就了美国两家博物馆——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中的主要中国艺术收藏。虽然有人批评劳佛的收藏比较庞杂, 但也有观点认为这些收藏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最真实和本真的一面。在被纳入菲尔德博物馆的收藏中, 有一些在传统上被我们认为是艺术的门类, 例如碑刻拓片和传统印刷的书籍。形成这种收藏的原因之一, 可能是因为虽然劳佛自身的学术训练继承了德国人类学的传统, 但在其四次访华的过程中, 其学术倾向逐渐向汉学转型。

从纵向上来看, 西方世界对中国艺术的发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不断经历再发现的过程。回到弗利尔美术馆的孔雀厅这个个案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艺术在西方收藏中的历时性变化。弗利尔晚年将其收藏捐赠给了史密森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e), 由此建立了弗利尔美术馆 (Freer Gallery)。虽然在弗利尔美术馆于 1923 年开幕之时, 弗利尔本人已

经去世, 但其在世的最后几年曾亲自参与了开幕式的展陈设计。在现存档案中, 我们仍然可见弗利尔的设计手稿, 其中每一件中国艺术品都孤立地陈列, 仅依靠自身的美感来获得其陈列的位置。虽然弗利尔本人并未亲眼见证开幕式的举办, 然而开幕式上的展品最终陈列方式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弗利尔的判断。在弗利尔过世后, 洛奇 (John Lodge) 作为策展人接手了弗利尔美术馆的收藏, 并开始对其展陈进行修改。他认为中国艺术不应该纯粹依靠其美感来进行陈列, 而应该展现中国艺术的独特线索。所以, 他按照中国艺术的编年史重新设计了艺术品的展陈方式。这也侧面反映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艺术史写作的风尚。最近十余年的一个显著改变是, 弗利尔美术馆不再试图展示一个完整的中国艺术史, 这样一种任务应该交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来做。所以他们大量减少展品, 将其余的以专题的形式呈现, 使展览与艺术品自身的情境结合得更加密切。随着对 20 世纪之后的中国考古发现的密切关注, 弗利尔美术馆对展品与其在中国文化史或者历史中所处的特定时刻之间进行了更加紧密和清晰地结合。

弗利尔美术馆的中国艺术展陈所经历的这一次变迁, 体现了美术馆已无意展示完整的中国艺术史, 而转而专注展示中国艺术的若干个高峰。这是在切割自身与非西方艺术传统的关系。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 作为异质性的中国艺术是否有可能在西方变为本我的艺术中的一个分支?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在今年 3 月举办的为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而表达立场的展览, 就



《女史箴图》(隋唐官本), 顾恺之绘,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是一次很好的尝试。这样的从异质到本我的转变, 其实已经发生在美国本土绘画艺术、非裔美国人艺术、北美印第安人艺术上, 或许也还会发生在其他目前仍然属于异质性的艺术上。

与谈环节, 郭伟其教授指出, 两位教授分别从玛雅艺术和中国艺术出发, 讨论了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间它们是如何进入艺术史并在博物馆展陈的。米勒教授在本讲进行的是一种对艺术史学史的反思, 围绕着艺术史与博物馆收藏史之间的关系展开。比如, 米勒教授提到了斯蒂芬斯 (John Lloyd Stephens) 的美洲之行与墨西哥战争之间的关系。尽管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 (Frederick Catherwood) 所写的游记中没有交代他如何直接参与战争, 但作为美国的外交使节, 斯蒂芬斯实际上带有一种使命感, 他与英国的考察人员之间有一种竞

争关系。其中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细节, 比如说他在科潘考察的时候觉得太耗时间, 就用 50 美元将科潘遗址买下来慢慢考察。这些历史活动都影响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对玛雅艺术的研究。

郭伟其教授将八大山人的画作为米勒教授讲话与徐坚教授回应之间的一个连接点。八大山人的画通过周围的题跋给出了一种反转和再反转的语境。画作中画出了一条离经叛道的鱼的形象, 接着在周围辅以文字说明, 比如对古代经典的表述“习与性成, 圣贤同归”, 同时旁边又说这条鱼可以用于烹饪,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多个反转。综合这些反转和徐坚教授提及的西方世界对中国艺术的“发现”和“再发现”, 郭伟其教授联想到乔治·库布勒 (George Kubler) 在《时间的形状》中对格式塔完形分析的质疑。库布勒在书里提到一个历史

瞬间或者一个横截面不是辐射状的，而是马赛克状的。以荷马史诗与希腊瓶画为例，库布勒认为我们很难找到其间的一种直接关联。《时间的形状》正式出版于1961年，而库布勒对于玛雅的一系列研究也大概在这个时间开始陆续发表。因此，郭伟其教授提出了一个关于总体性的问题，即在玛雅艺术的研究视角从人类学转向艺术史的过程中，具体研究方法是否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如果过去对于所有的玛雅艺术研究对象人们似乎总有一个萨满的总体印象，那么20世纪中期以来的玛雅艺术史的研究以及博物馆对玛雅艺术的展陈在多大程度上突破了以前的研究成果？对于格式塔的研究是否转向了多元化？

米勒教授提到当乔治·库布勒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前西班牙艺术时，相关的资料少之又少，尤其是相关的艺术书籍，因此对玛雅艺术的记叙在当时是没有定论的。米勒教授猜测库布勒在《时间的形状》的兴趣也和博物馆展陈的不断修改有关，即当我们找到一个序列，并试图在其中找寻一个关键的切入点的时候，我们究竟要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正如帕梅拉·李（Pamela Lee）所写，如何认识到序列的存在以及如何进入一个序列等问题是受到某些二战后的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的影响后产生的。库布勒对科学与工程学很感兴趣，习惯思考不同事物之间是如何相互连结。讲演中展示了耶鲁大学美术馆20世纪60年代以来是如何展陈前哥伦布以及非洲艺术的。实际上在米勒教授去到耶鲁大学时，展陈就已经是如此了。过去她问库布勒先生为什么要这样摆放这些艺

术品时，他回答说这是为了“随机分散”（random scattering）。这一尝试打破和破坏的概念在她看来很有意思，库布勒不想将艺术品放置在一个简单的序列当中。但米勒教授的展陈观点有所不同，她认为同一个墓室中发现的并排放置的男性与女性雕像就应该被重新放置在一起陈列或储存，因为当一个物品被以某种形式制作出来以后，我们就应该去聆听它们的声音，而且，多数艺术品是历经曲折来到美术馆的，其中有些甚至不是被考古挖掘，而是在被盗窃或掠夺后运送来的。但就库伯勒的角度而言，他希望我们能够从对艺术品的情感投入中抽离出来。库布勒本人及其艺术史研究都落在一个“原物”（Prime Object）上。作为一名学者，他没有过去，只有未来，而《时间的形状》中对序列及“原物”到底是否存在的思考也一样是开创性的、历史性的。

郭伟其教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艺术史进入西方艺术史视野的时候并没有像玛雅艺术一样被当作原始艺术，这就导致西方的艺术史家在书写中国艺术史时，会直接使用到一些西方艺术史的概念和分类方法。比如，依照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对古典主义和巴洛克的界定，有的西方学者会将公元一千年左右的中国艺术归为古典主义，将南宋时期的作品也会被称为巴洛克艺术。对此，郭伟其教授给出的一点猜想是，也许是因为中国艺术和玛雅艺术进入艺术史的时间节点不同，后者走进艺术史时，风格学、形式分析、图像学等潮流已经成为了过去的方法论，所以它才不同于中国艺术史，得以摆脱这种

西方风格概念的格套或桎梏。于是，郭伟其教授进一步追问，在玛雅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是如何发明出一套自己的不同于西方艺术史的风格语言的？

米勒教授谈到，对于玛雅艺术而言，尤其是公元第一千纪的艺术很多时候会被认为是“古典的”（Classic）。但是究竟什么是“古典的”呢？是否和“古希腊”（Classical Greek）一词中的“古典的”（Classical）意思相同？这个词是有问题的，但我们很难避免使用这个词。更加有问题的一个词汇是“后古典的”（Post-Classic），更加糟糕的一个词是“古典末期”（Terminal Classic），在英语里听起来好像我们在一个公交站一样。因为这些术语存在的问题，米勒教授通常倾向于直接用西元纪年来描述，因为它们在厘清事物中显得更加中立。因为如果用“古典的”（Classic）去表达“古典玛雅”和“古典特奥提瓦坎”，那么我们就将二者放在同一时期。但是特奥提瓦坎在公元550年左右就已被烧为灰烬。当其中一个城市已经在走向衰落之时，如何能说两个城市是处在同一时期呢？所以年代学也不总是友好的。

就对玛雅艺术的理解进程而言，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产生了影响。他创造了一些即便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成立的概念，他坚信所有美洲本地人都具有相同的文化发展路径，不认为中美地区具有文化复杂性。大约在美国内战时期，他写了一篇名为《蒙特祖玛的晚餐》（“Montezuma's Dinner”）的论文，指出蒙蒂祖玛的筵席根本子虚乌有，这只

是西班牙入侵者编撰了一个故事来宣扬他们的荣耀，因为美洲印第安人并没有筵席传统。即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误读，但这种错误仍延缓了后来对玛雅艺术所达成的伟大美学与知识成就的理解。

这使米勒教授再次联想到信仰审判（auto-da-fé, act of faith）的问题。在西班牙入侵之后，人们将玛雅人所写的书拿来烧掉，以证明他们并没有与基督教信仰相违背，玛雅文字系统被禁止使用。这种暴力终止当地知识的延续的行为成为了一重挡在我们面前阻碍理解玛雅艺术的障碍。如果玛雅的读写传统被延续下来，玛雅人或许就可以继续用自己的文字作出巨大的知识贡献。这是历史被切断的另一重案例。实际上，库布勒就是想让我们去思考这种历史的分裂和非连续性，不希望我们把过去和现在理解为同等连续的，他非常坚持这种思考方式。与此同时，玛雅象形文字也在不断地被解码，很多新的物件、雕塑、城市等等都在不断地被发现。库布勒于1996年去世时，玛雅艺术的物质性在不断地被唤醒，一个“发现”接着另一个“发现”，



查克木尔雕塑，墨西哥



线上对话实景

人们对玛雅文明的理解和认识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不断刷新。所以或许库布勒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原物”，但他是处在一个充满挑战和困难的时代去成为一个“原物”的。

徐坚教授接着也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墨西哥保留了查克木尔雕塑，特奥提瓦坎金字塔现在也有很多人参观，无论是雕塑还是金字塔，都会被墨西哥当地人用来建立自身的文化认同。那么在墨西哥，玛雅艺术是如何系统地被使用的？它们是否会被用来宣扬或证明什么东西吗？第二，在美国是否有一些族群会宣称自己与玛雅艺术具有更密切的关系，从而使用玛雅艺术来表达自身在文化或政治上的诉求。这两个问题具有同一个核心，即文化遗产是如何服务于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当代需求的。

米勒教授回应道，在美国，人们经常以其国籍来称呼墨西哥移民，例如他们是

墨西哥人，危地马拉人等等。这些移民很多是中美地区原住民，玛雅语言能力者，或者是玛雅人的后代。在加州，尤卡坦的后裔大多住在旧金山，而危地马拉的后裔大部分住在洛杉矶。米勒教授认为，在学习中教育这些移民的下一代认识美洲的伟大传统并了解他们正是来自这样的传统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这也和解决亚裔美国人的问题以及新冠疫情以

来的对文化身份的焦虑相关。另外，在美国也常有对从墨西哥或经由墨西哥移民而来的人的诋毁。米勒教授认为尊重移民者固有的文化传统和背景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不总能完全正确理解，但关键在于尝试。

另一方面，米勒教授通过举例来说明在墨西哥或危地马拉的玛雅人如今怎样审视自身文明。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对原住民免费开放，在墨西哥也有很多地方美术馆，比如在尤卡坦地区就至少有三、四个。在讲座中展示的包括帝卡尔在内的很多玛雅城市遗址本身也是很多玛雅本地人工作的地方，并且很多本地人也都会去学习和参观这些遗址。米勒教授认为，地球上可能只有三个地方存在非常高密度的古代文明，分别在中国、意大利和墨西哥。在这些地方，过去的历史总在不断被“再发掘”与“再发现”。在墨西哥，每当有大型考古发掘成果出现时，都是一个大新

闻。例如在对阿兹特克首都的多年考古发掘过程中，项目总负责会在墨西哥晚间新闻中汇报新的考古发现。这有助于建立一种国家身份，帮助当地人更加了解过去的历史，从而尝试更好地保护那段历史。

在本场讲座的最后，巫鸿教授作总结发言。巫鸿教授首先回顾了本次系列讲座的主题。米勒教授通过三场讲话，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一个鲜活的复杂的玛雅艺术整体，其中有空间和创造，有过去的经验，也有今天的命运，从而提供了接近和认识玛雅艺术的不同渠道。在本场讲座中，徐坚教授的回应与米勒教授的讲话形成了呼应。双方都从西方接受异文化的角度来谈，但是由于历史经验、思想史的发展以及文化关系的不同，西方对于这两种非西方文化的接受也不尽相同，形成了另一个复杂而丰富的面。同时，本次系列讲座还揭示出中国艺术和玛雅艺术之间有很多平行的共通的视角和经验，这个层面在今天显得尤为强烈。

米勒教授的讲话和徐坚教授的对谈是开放的，引导我们去想很多问题，而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结论。巫鸿教授就此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西方接受中国的雕塑或雕刻的非常晚，根据阿部贤次 (Stanley Abe) 以及巫鸿教授个人的研究，直到 20 世纪初，1904 年，斯蒂芬·布谢尔 (Stephen Bushell) 在其发布的《中国艺术》两卷本中仍然说中国没有大型的石雕。那么，中国雕塑怎样变成一种艺术？雕塑在中国原来的文化中并不作为艺术，而是属于宗教范畴，作为墓葬美术，因此雕塑成为艺术就并变成了一个故事。中国雕塑被收藏实

际上是通过了日本。日本先通过明治维新将美术史和考古学介绍进国内，1895 年左右日本学者冈仓觉三在发现了中国龙门石窟雕像和宝庆寺石像后，激动不已，声称终于发现了中国的雕塑。之后就像在玛雅发生的一样，大批的石刻被砸下来运走。波士顿美术馆正是通过冈仓觉三收集了很多中国石雕并在 20 世纪初成为了收藏中国石雕数量最大的一家西方美术馆。随后西方博物馆对中国雕塑的收藏热情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巫鸿教授认为这段历史可以和玛雅构成非常有意思的对话，他还进一步提问，为什么到 20 世纪初西方人还不知道龙门之类的中国石雕？他揣测可能和政治有关。当时中国并不是完全的殖民地，中国的通商口岸只设在海边，内陆仍有很多限制的，所以这和西班牙对玛雅的人侵很不一样。

最后，巫鸿教授还针对美术馆研究传统提出一点思考。在美国研究非西方传统普遍对遗址非常重视，但是研究中国雕塑的老一代的研究者，更多的是对雕像进行风格分析，觉得这些雕像没有一个地址 (site)。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值得进一步探讨。受人类学类型的研究的影响，巫鸿教授希望把中国的考古美术材料和遗址研究结合起来，认为美术研究牵涉到美术本身的历史，也牵涉到怎么研究这些美术史的历史，也就是学术史。

(撰稿：OCAT 研究中心)



（七）北大文科创新论坛

02

姚洋 | 儒家政治——理解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一个视角

2021年11月26日下午，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文研院联合主办的“北大文科创新讲坛”第二讲在线举行，主题为“儒家政治：理解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一个视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主讲，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强世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仰海峰、郑开、干春松评议。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讲坛以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在线观众500余人。

姚洋教授作题为“儒家政治：理解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一个视角”的主讲报告。在开场白中，姚洋老师点明了他问题意识的由来。作为经济学家，姚洋老师最初的关注点是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奥秘。他认为此问题缺少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来回答“为什么是中国”。从这一经济学研究出发，姚洋老师逐渐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他提出，中国共产党需要找到新的政治哲学理论，这一理论需要



姚洋教授做主旨报告

既能解释当代中国的成就，又能与中国人民的底层心理结构相适应。

出于以上考量，姚洋老师及其合作者秦子忠回到儒家政治，尝试用现代哲学的方法来实现儒家的现代化，提出儒家政治的基本原则和宪法结构，进而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展开思考。在接下来的报告中，姚洋老师从儒家人性观、儒家政治三原则、儒家政治的宪法结构、儒家政治的历史兴衰、当代中国政治体制这五个方面分别进行了阐释。

随后，姚洋老师尝试从儒家政治的视角建构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新叙事。他认为，人性是多样和可塑的，因而国家

的政治结构应该具有层级，个人的资质是进入不同层级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由公民中的优秀份子组成，构成国家的中央机构，职责是选拔人才、提供立法思想以及制定大政方针。国家的主权归人民代表大会，它的职责是对党提名的人选和给出的政策建议做出裁决，并将党的立法思想转变为正式法律。政府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其成员由党来选拔，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党和政府实施监督。国家保护个人自由，鼓励个人资质的发展，并在资质的基础上给予每个人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这是一个混合体制，足以保证个人自由以及经济和社会繁荣，实现良治。

评议阶段，郑开老师首先肯定了姚洋老师这一论题的意义和价值，认为其对于跨学科的创新具有重要价值。随后，郑开老师主要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一，从中国哲学的视角来看，郑老师倾向于用历史文化意识来统揽人性概念及其理论的讨论。其二，郑老师介绍了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对于人性论的最新研究。在中国哲学中，心性论是对一般的人性论的一个提升。他认为，在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叙述中应该将心性论的结构予以合规律的展现。其三，郑老师认为儒家实践所强调的“持中”和我们一般所说的实践、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李泽厚的实用理性、美国的务实主义等并不在一个层次上。最后，郑开提议，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可以利用不限于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

干春松老师在评议中先为姚洋老师对于概念和理论的简单化使用进行了辩护。他认为，如果要对中国文化进行一种大的

概括，那么大的概括和具体分析之间的不匹配是不可避免的。随后，干老师提出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和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之间的差异性。他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时，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在于墨家。最后，干老师还比较了墨家和儒家关于“尚贤”的理解差异。

仰海峰老师在评议中赞赏了姚洋老师为不同学科展现的开阔视野空间。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三类文化的内在融通、重新建构是文化领域的重要问题。随后仰老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出发，对姚洋老师的报告做出三点评价。其一，仰海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来理解人性。由此出发，人性概念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作为理论的基础，这一点需要进一步讨论。其二，仰老师更愿意将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理解，将传统政治、传统教化 and 传统生活方式看作一体。最后，仰海峰希望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能揭示出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的核心。

最后，强世功老师对本次讲坛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北大文科创新讲坛”的开办是为不同学科的学者提供对话的平台，通过各个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将这些学者联结起来。姚洋老师在本次演讲中提出的问题对各个学科均构成挑战，这可以激活各个学科的研究，推动中国的学术创新。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供稿）

03

渠敬东 | 透纳：风景画中的历史与神话

2021年12月24日下午，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文研院联合主办的“北大文科创新讲坛”第三讲在线举行，主题为“透纳：风景画中的历史与神话”。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评议。

在专题报告中，渠敬东老师聚焦于18世纪至19世纪英国的著名画家透纳，围绕透纳的历史与神话题材的绘画作品展开分析，阐释了透纳通过绘画所表达的对于世界历史和西方古典文明的理解。在他看来，透纳不止是一个画家，还是一个思想家。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重新理解艺术，艺术不止是一种技艺和表现，而是对于一个时代综合的、全景式的理解的展开过程。



渠敬东教授做主旨报告

渠敬东便以此为视角切入，诠释透纳一生中的创作。

随后，渠敬东老师在报告中详细解读了透纳的多幅画作。透纳将历史、神话、宗教作为一道自然的风景来呈现，而这种呈现带有人的思想和激情。通过《爆发中的维苏威火山》《海上渔夫》《巴米特尔湖及克洛梅克湖一角》等风景画的创作，透纳展现了他的自然观和宗教观，尝试从自然中体会神意。《霜晨》是透纳对于风俗的刻画，揭示了他所处时代的英国思想中“不安”要素。在《狄多建造迦太基》《迦太基帝国的衰落》《从梵蒂冈远眺罗马》《贝亚湾，阿波罗与女先知》等画作中，透纳描绘了古典文明，其眼中的历史总是呈现出辉煌和衰败相互纠缠的特征。在《尤

利西斯嘲弄波吕斐摩斯，荷马的《奥德赛》中，透纳重新回到元素来构建对神话的哲学解释。《退役后被拖去解体的“无畏号”战舰》《奴隶船》《雨水、蒸汽和速度——大西部铁路》等画作反映了透纳对于工业世界的隐喻，同时他还将上帝审判、末日、

魔鬼、创世纪等圣经元素融入画作。在《金枝》中，透纳将科学技术指导下的世界视作巫术的时代，文明成为了魔法锻造的幻景。《日出，海怪》《洪水》等画作则展示出人类重回文明的创生根源。



《从梵蒂冈远眺罗马》，透纳绘

评议阶段，丁宁老师在评议中补充了关于透纳和18世纪英国的历史背景。丁宁认为，透纳在一定意义上是英国视觉的代表，具有重要的地位。18世纪的英国具有非凡的文化吸引力，艺术行业繁荣，而透纳正处于这样一个文化兴盛的时代。此外，英国在透纳的时代保留有大量的教堂废墟，给予了透纳特别的历史情怀。丁宁特别强调，透纳在绘画中采用各种方法呈现心中所想，其对于历史的情怀、对于神话的再重构和想象等使得他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对象。

张祥龙老师则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解读透纳的艺术创作。他注意到，有评论家认为透纳的创作特点之一是直接表现自然而非观察自然。观察是带有主体性的，而透纳追求的是一种摆脱了习惯的观察方式的纯感觉。从现象学的角度看，透纳的这种纯感觉是非对象化的。张祥龙还从西方美术中透纳等人的非对象性的绘画方式联想到中国的写意画，并与主讲人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最后，渠敬东老师对上述评议和观众提问进行总体回应。他认为，透纳的纯感

觉画法试图采用一切手段来最好地表现此时此刻画家与自然的关联处，从而在自然与人之间实现对象性的双重破除，这和中国写意画法有共通之处。渠敬东也关注到艺术的本质问题，他认为艺术是艺术家和世界、心和物之间的共同创作。他还强调，研究艺术是一种自我教育提升，我们需要不断重返曾经的伟大艺术，如此才能真正回到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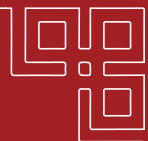
强世功老师在结语中表示，艺术不止是技法与表达，而是一个思想与哲学问题，艺术的本质是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不同的文明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所以艺术又是一个文明的问题。中国的艺术家要回到文明的根源，而非追随西方的表达路径。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供稿）





文研回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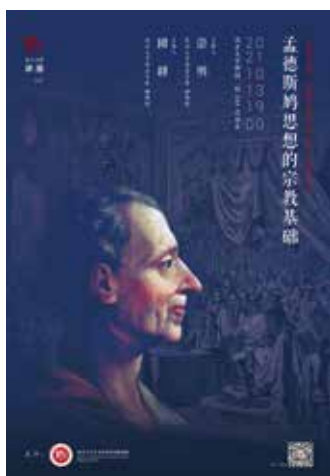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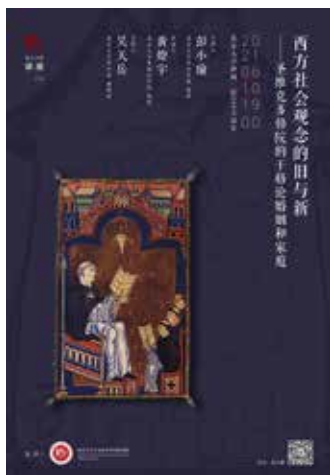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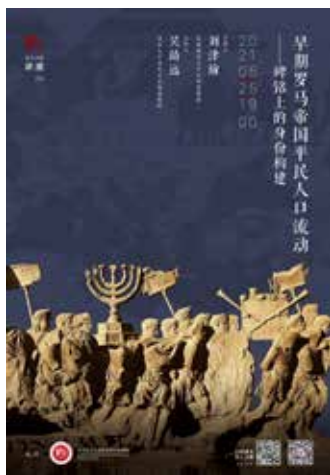


牛津大学古典学系荣休教授奈杰尔·威尔逊 (Nigel Wilson) 主讲西方古典文献学系列讲座

文研院一直关注多文明的互动与比较。为了呈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复杂关联，自2009年起，文研院策划推出了以“文明之间”为总题的长系列讲座，至今已举办三期。2021年春秋学期，文研院推出该系列讲座的第三期“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邀请9位学者从多元文明的视角重思“欧洲”，深入欧洲文明的某个特定时段与特定主题，并展开欧洲与其他文明相互构造、关联、嵌入与映照的历史过程，该期讲座已于近日结束。

欧洲文明的“两希源头”是常谈常新的命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晏绍祥教授以“古典希腊文明起源中的东方因素”为题为本期系列讲座揭开了序幕。他强调，古希腊文明兴起过程中汲取了外来文明尤其是古代西亚和埃及的诸多因素，但本质上仍是古希腊本土的产物。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穆宏燕教授在讲座“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古希腊早期哲学”中指出，琐

罗亚斯德教对古希腊早期哲学米利都学派、古希腊辩证法哲学、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等都产生了影响，古希腊哲学的灿烂辉煌是其与周边文明互动的结果。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高峰枫教授的讲座题为“雅弗的神话与欧洲扩张”，他以对雅弗神话的解读为例，聚焦于19世纪英国和美国有关殖



民和奴隶制的争论，考察有关雅弗的预言如何被运用到“文明的冲突”中，呈现了解经学对解决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内诸多现实问题的重要作用。

不同族群何以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政治变革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观念变化、身份认同建构等也是跨文化研究的重要面向。美国德堡大学古典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津瑜在讲座“早期罗马帝国平民人口流动——碑铭上的身份构建”中讨论了公元一世纪到二世纪罗马帝国相对和平时期西部的碑铭案例，通过探讨平民（特别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地域流动的相关问题加深了对罗马帝国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乃至罗马帝国整体运作的了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彭小瑜教授的讲座题为“西方社会观念的旧与新——圣维克多修院的于格论婚姻和家庭”。彭小瑜提到，兴起于11和12世纪欧洲中世纪人文主义为西方文化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元素，圣维克多的于格等12世纪人文主义者不仅赞美夫妻之间的合意、柔情和忠诚，积极鼓吹他们心目中的男女平等和社会平等理想，也在他们对卡塔尔派异端运动的批评中战胜了以善恶二元论为内核的极端主义，为欧洲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正国研究员在讲座“苏格兰启蒙与亚洲”中，在苏格兰启蒙的“欧洲/基督教，英国/政治与国家，苏格兰/地方与文化”这三个维度之外加上了亚洲维度，讨论了英国与亚洲接触后对英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以及中国历史对苏格兰启蒙在建构文明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东方主义”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

本期讲座的后三讲主要关涉“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主义、宗教与哲学等领域的话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崇明副教授的讲座题为“孟德斯鸠思想的宗教基础”，他强调，孟德斯鸠致力于通过分离政治和宗教权力来建构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提倡宗教宽容，勾勒了西方现代政治的基本理论框架，其宗教思考构成了其政治思想的基础，对理解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以及西方政教关系的演变也具有意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谷裕教授在“活人祭与骑士爱情——《浮士德》海伦剧中的古希腊与中世纪”中提出，歌德认为，古希腊的美唯有在基督教文明庇护下方得以免遭毁灭的命运；也唯有在基督教-人文主义框架中，其价值方得到认可和尊重，受此结论启发，可以认为人文主义以古典知识和艺术形式为用，以日耳曼-基督教文明为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副教授以讲座“躺椅背后的摩西——弗洛伊德思想与犹太传统”为本期系列讲座闭幕。他指出，作为一种科学的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用以对抗全世界对犹太人的敌意、征服世界，并在最后帮助现代世界的人找到自我认同、认识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人的必经之途，在发展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弗洛伊德真正实现了他对摩西的自我认同。

“文明之间”系列讲座通过线下讲座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吸引到校内外师生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

(本文于2021年12月20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赵相宜)

文研院“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系列讲座圆满结束



线上讲座实景

文研院一直关注多文明的互动与比较。为了呈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复杂关联，自2009年起，文研院策划推出了以“文明之间”为总题的长系列讲座，至今已举办三期。第一期讲座以“文明之间：交融与再造”为主题，贯穿了2019年的春季和秋季学期，该期的十场讲座聚焦亚欧大陆的古典文明，在对文明的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观察中揭示了文明的多元性和复合性。2020年，在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震荡尚未消隐之时，“文明之间”系列讲座进入第二期，主题是“文明之间：现代世界的多重构造”。该期的九场讲座关注从中东到南亚、东亚以至非洲、拉美等有着深厚文明传统的政治体和区域，探讨了它们如何筚路蓝缕，融入现代文明的宏大篇章。2021年春秋学期，文研院推出该系列讲座的第三期“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邀请九位学者从多元文明的视角重思“欧洲”，深

入欧洲文明的某个特定时段与特定主题，并展开欧洲与其他文明相互构造、关联、嵌入与映照的历史过程，该期讲座已于近日圆满结束。

欧洲文明的“两希源头”是常谈常新的命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晏绍祥教授以“古典希腊文明起源中的东方因素”为题为本期系列讲座揭开了

序幕。他强调，古希腊文明兴起过程中汲取了外来文明尤其是古代西亚和埃及的诸多因素，但本质上仍是古希腊本土的产物。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穆宏燕教授在讲座“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古希腊早期哲学”中指出，琐罗亚斯德教对古希腊早期哲学米利都学派、古希腊辩证法哲学、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等都产生了影响，古希腊哲学的灿烂辉煌是其与周边文明互动的结果。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高峰枫教授的讲座题为“雅弗的神话与欧洲扩张”，他以对雅弗神话的解读为例，聚焦于19世纪英国和美国有关殖民和奴隶制的争论，考察有关雅弗的预言如何被运用到“文明的冲突”中，呈现了解经学对于解决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内诸多现实问题的重要作用。

不同族群何以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政治变革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观念变化、身份认同建构等也是跨文化研究的重

要面向。美国德堡大学古典系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津瑜在讲座“早期罗马帝国平民人口流动——碑铭上的身份构建”中讨论了公元一世纪到二世纪罗马帝国相对和平时期的西部的碑铭案例，通过探讨平民（特别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地域流动的相关问题加深了对罗马帝国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乃至罗马帝国整体运作的了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彭小瑜教授的讲座题为“西方社会观念的旧与新——圣维克多修院的于格论婚姻和家庭”。彭教授提到，兴起于11和12世纪欧洲中世纪人文主义为西方文化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元素，圣维克多的于格等12世纪人文主义者不仅赞美夫妻之间的合意、柔情和忠诚，积极鼓吹他们心目中的男女平等和社会平等理想，也在他们对卡塔尔派异端运动的批评中战胜了以善恶二元论为内核的极端主义，为欧洲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正国研究员在讲座“苏格兰启蒙与亚洲”中，在苏格兰启蒙的“欧洲/基督教，英国/政治与国家，苏格兰/地方与文化”这三个维度之外加上了亚洲维度，讨论了英国与亚洲接触后对于英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以及中国历史对于苏格兰启蒙在建构文明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东方主义”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

本期讲座的后三讲主要关涉“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主义、宗教与哲学等领域的话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崇明副教授的讲座题为“孟德斯鸠思想的宗教基础”，他强调，孟德斯鸠致力于通过分离政治和宗教权力来建构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

序，提倡宗教宽容，勾勒了西方现代政治的基本理论框架，其宗教思考构成了其政治思想的基础，对于理解法国大革命起源以及西方政教关系的演变也具有意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谷裕教授在“活人祭与骑士爱情——《浮士德》海伦剧中的古希腊与中世纪”中提出，歌德认为，古希腊的美唯有在基督教文明庇护下方得以免遭毁灭的命运；也唯有在基督教-人文主义框架中，其价值方得到认可和尊重，受此结论启发，可以认为人文主义以古典知识和艺术形式为用，以日耳曼-基督教文明为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副教授以讲座“躺椅背后的摩西——弗洛伊德思想与犹太传统”为本期系列讲座闭幕。他指出，作为一种科学的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用以对抗全世界对于犹太人的敌意、征服世界、并在最后帮助现代世界的人找到自我认同、认识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人的必经之途，在发展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弗洛伊德真正实现了他对于摩西的自我认同。

“文明之间”系列讲座通过线下讲座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吸引到校内外师生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

（本文于2021年12月30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石子莹）



文研院“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讲述活动在线举办

2021年12月，文研院在线推出新一期的“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讲述视频。“传承”系列讲坛是文研院的特色活动之一，旨在邀请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讲述北大学术传承、治学机缘和为学理念，彰显北大代代相承的优秀学风和辈辈学人不断追求的骄人风采。自2018年4月以来，文研院已成功举办五场讲述活动，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二十余位资深学者和青年学者参与其中，分享他们融入北大传统的求学、教学、治学之经历。

本期“传承”讲述邀请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韩敏中教授、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韩茂莉教授、哲学系

朱良志教授、经济学院王跃生教授，围绕“学缘传承”的主线，讲述他们的求学历程、师承因缘与育人理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剑葳、艺术学院刘晨老师担任主持。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韩敏中教授1963年进入北大读书。数年以后，当她离开山区，以研究生的身份再度踏入燕园，曾经熟悉的一切都变得弥足珍贵。她热切地渴望弥补错失的读书时间，平静地重新回到经典中去。伴随着寻求超越的思想冲动，再次读到史诗故事时，她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同情。“再给我三五年”，病中的杨周翰先生表达着跟时间赛跑的心愿。韩老师动情地回忆起受训于杨周翰和李赋宁两位先生的点滴往事。杨先生学问广博，看似不苟言笑，令人生畏，实则幽默风趣，充满热情；李先生性格谦逊，待人接物和气友善，却又不乏坚决果断。面对周珊珊和张祥保两位先生，成为青年教师的韩敏中在内心依然保持着学生的姿态。透过耳提面命的教学训练和平淡朴实的生活细节，两位先生流露出的专注与从容也影响了韩敏中老师后来的教学风格——“老师是怎么教我的，我就怎么教学生”。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韩茂莉教授讲述了整个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历程。拍摄期间，韩老师带领我们回到顾颉刚先生的故居——禹贡学会旧址，在那座四合院中将故事娓娓道来……1934年，顾颉刚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组织禹贡学会，



“传承”讲述活动录制现场

将中国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推进到近代阶段。历史地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登上历史舞台，与当时国难当头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在抗战面前，顾先生一代学者坚守民族大义，呈现出文人的士节。这样的气质同样体现在后来加入到学会的侯仁之先生身上。在侯仁之先生一辈人的努力下，历史地理学形成了历史文献和野外考察相结合的研究传统。侯先生提出将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限扩展到史前时期，以全方位展示人地关系的进展这一核心问题。侯先生秉承顾先生经世致用的学科理念，以北京为专题的城市地理研究为建国后北京城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韩茂莉老师先后师从史念海和侯仁之两位先生，在协助史先生历史地图集编撰工作时，她开始接触历史农业的相关研究。这一方向也得到了侯先生的鼓励。“在大学，教书是我们的本业”，

她希望自己像侯先生一样，在推进研究的同时坚持以课堂为主的教师本分。

2000年初，朱良志教授正式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执教。初到北京的日子里，研究带给他最大的支撑。朱光潜、汤用彤、宗白华、张世英、叶朗……从这些先生身上，朱老师感到当时北大给他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朴实。“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学问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淡然地对待学术本身，淡然地对待做人，做人也很本真。朱老师从师者身上真正体会到北大质朴的一面。在这种精神的浸染下，他也勉励自己做实实在在的研究。在对传世石涛款作品的真伪给出判断之前，朱老师出入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上。“艺术中间，可感，可思”，“可感”是诗性的，“可思”是智慧的。张世英先生曾寄语“超脱凡俗



只有两条路：一是诗，一是哲学”，二者寄托了同一份理想：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以及如何超越困境。在朱良志老师看来，对这一问题的关切乃是人文学科的应有之义，失去了“苍生之恋”的学术是黯然无色的。他努力将前人在融入世界时领悟到的世界之美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达出来，和更广大的读者群体分享。在教学相长之余，他尤其看重学生志趣格调的培养，“向壁而思，思力要深”，学问要落在人心中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跃生教授是1979年考入北大的“新三届”，1985年底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到今天已在北大度过四十余年。其间，诸多前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世纪老人陈岱孙先生的论著与发言中，他感受到一种持续的精神力量；授业恩师厉以宁先生率先将西方经济学系统引进课堂，令他受益匪浅；同样难忘的还有陆卓明先生，课堂上，陆先生绝不照本宣科，各学科知识触类旁通，信手拈来。同时期他的许多老师身上也都显示出传道授业者“中道正直、恪尽职守”的师者本色。四十余年的耳濡目染使王跃生老师描绘出一幅北大经济学人的生动群像。追溯北大经济学科的发展脉络，有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最早可追溯至1902年京师大学堂商学科；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后，成立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门；1952年院系调整，包括陈岱孙先生在内的一大批学者来到北大；1985年，伴随“新三届”的毕业，与20、30年代留洋一代、50年代留苏一代形成三代荟萃的局面。顺着时间的流动，文脉得以延续。北大经济学科的传承也先后汇聚了四代人的“遗韵”。四个时期的

特点“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共同构筑了北大经济学科“中西合璧，兼容并包”、“经世致用，家国情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与时俱进，时代脉搏”的基本色调。

学者的成长，需要优良传统的滋养，需要前辈风范的召唤。学术需要积累，要有厚度，在大学中，要倡导正气与学脉的传承。文研院自成立以来，先后举办“老校长与北京大学”系列专题展览、“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系列讲述、“文研纪念”等活动，追忆前辈学人的精神品格和思想传承，展现了北大校园中流动着的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学术风貌。

（本文于2022年1月10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周诗雨）



文研院邀访学者项目第十一期圆满结束

2021年岁末，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访学者带着对这座精神家园的不舍，对难忘的驻访生涯作出总结。第十一期邀访学者项目自2021年9月开始，于12月末结束，16位学者加入文研院学者大家庭。他们来自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或机构，研究专业覆盖了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相关领域。

“近者悦，远者来”，邀访学者项目是文研院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

学术共同体建设，文研院在4个月里组织了30余场报告、茶叙等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还举办了一系列高端学术讲座、读书会或论坛，学者们在此研究切磋、深度交流、涵育学术、激活思想。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在北大多个院系授课或开展讲座，多样的学术活动，不仅活跃了北大的学术氛围，也推动了基础研究的传承与发展。以下简要介绍本期邀访学者驻访期间开展学术活动的情况。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历史与典籍的研究，兼及现代学术文化。访问期间，虞云国就“刘子健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学术研究发表了报告；分享“我为什么要研究宋代台谏制度”的治学历程与体会；参加文研论坛“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范式反思”；主持3次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宋史方向研究生关于“南宋本朝史论”读书班。

杜斗成，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兰州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创建人，从事考古学与敦煌学的教学与研究。访问期间，以“丝绸之路上的佛教（石窟）艺术”为题，为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开展了4次讲座，讲座内容涵盖“印度、新疆、河西走廊、陇东、陇南及造像题材和各时期的特点”。此外，与同期邀访学者也分享了敦煌佛教石窟艺术以及自己为什么要从事考古学和敦煌学的研究。





李天纲，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为中国宗教、中国思想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访问期间，参与了多项学术活动，其中包括发表“宋恕与经学”和“从‘中国礼仪之争’到‘金泽’：我为什么研究中国宗教”两次邀请学者内部交流，并主讲了虚云讲座“华梵融通意自圆：近代佛教复兴与亚洲主义”、严复学术讲座“传统知识的近代转型：以经学与经世学为例”两场北大哲学系学术品牌讲座和“亚洲古学会：战前亚洲佛教共融运动的夭折”工作坊。同时，李天纲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学术讲座系列主讲“关于儒学、儒家的宗教性问题”。此外，李天纲利用北京大学丰富的电子图书资源，基本完成编辑《马相伯年谱长编》和《马相伯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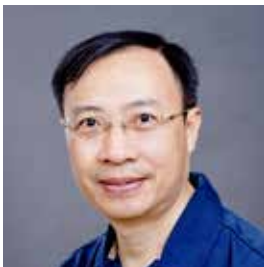
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第八届、第九届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中国的经典解释传统、人文科学方法论等。访问期间，陈少明发表了题为“‘精神世界’的时间向度”的学术报告；分享了“我为什么讨论《兰亭序》”；同时加强了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术交流，主讲了虚云讲座“物、人格与历史——从‘特修斯之船’说及‘格物’等问题”和严复学术讲座“道器形上学新论”两场公开学术讲座，还参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三校哲学系联合举办的“做中国哲学：思路、方法与实践”学术工作坊，并作会议引言。此外，陈少明在驻访期间出版了《梦觉之间——〈庄子〉思辨录》（三联，2021年）和发表了论文《经典世界中的〈兰亭序〉》（《哲学研究》2021年第9期），并基本完成撰写《物、人格与历史》和《道器形上学新论》两篇论文。



曹家齐，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致力于宋辽金历史与文献、中国古代交通史、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访问期间，曹家齐发表了“南宋遗民情怀与元明浙操江操琴曲”学术报告，与同期学者分享了“我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史”，组织了“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范式反思”文研论坛，并发表引言。同时，曹家齐还参加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宋史专业师生的读书会；以及受邀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发表“琴曲《潇湘水云》意境与解题”，列入北京大学本科生“古琴经典艺术欣赏”课程。

苏杰，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献学与古籍校释学。访问期间做了题为“《抄工与学者》——写本书时代西方古典文献传播与校勘的历史回顾”的专题报告，并在交流会上对“我为什么研究西方校勘学”作了讲述。同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了题为“中西校勘学比较刍论——从胡适说起”的讲座。在文研院期间，苏杰邀请了牛津大学古典学教授威尔逊先生开展题为“西方古典文献学四讲”的系列讲座，分别是：“西方校勘学历史漫谈：古代和拜占庭时代”“西方校勘学历史漫谈：中世纪以及之后的西欧”“古文书学作为辅助学科的价值”和“两个传承之间的区别：重写本”。这个系列讲座不仅对中国的西方古典研究有所促进，对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西方古典文献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有所促进。以该讨论为契机，苏杰与北大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中心、英语系的中青年教师，在文研院发起了“中西写本学比较研究”工作坊。





刘永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明清社会文化史、明清社会经济史。刘永华于访问期间交流了自己从事人际关系研究背后的学术诉求，报告了自己对 19 世纪徽州乡民生计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同时，组织、参与了以下北大的学术交流活动，主要包括：组织了“景贤作圣：中国圣贤的跨学科探讨”工作坊，发表以“百神之主：明代政治话语中的君神关系”为题的报告；线上参与“时间·空间·人：全球史视野下的地方近世史”论坛，讨论了沈爱娣教授的新著《传教士的诅咒》；参与政府管理学院罗祎楠老师组织的“多学科视野中的田野工作”沙龙活动，分享了田野经验，并谈了田野工作对史学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价值；参与社会学系张帆老师主讲的研究生课“历史人类学”，介绍区域社会史学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此外，发表了《祀典仪式视野下的明清省制演进》《从田野和跨界中探索新知——刘永华教授访谈录》《何为抄本？谁之文化？——抄本的解读方法及其问题》，完成了书稿《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的修改，将送交出版。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访问期间，主讲了学术报告“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文献举要”，并以“我为什么研究回鹘文文献”为题，介绍了回鹘文演变历程，反映的社会经济信息等现实意义。同时，阿依达尔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语系为梵巴专业师生开设了每周两节的“回鹘语”课程（共 13 讲），通过对回鹘文文献介绍与选读，让同学们基本掌握识读回鹘文文字和阅读回鹘文文献的能力，并与东语系师生形成团队展开国家级科研项目。此外，阿依达尔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发表了题为“鲁尼文碑铭文献相关问题研究”的讲演，并与历史学系付马老师合作研究相关文献，尝试撰写回鹘佛教史；并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分别发表题为“从‘玄奘’到‘玄赞’——宋代翻译家胜光”和“从胜光到安藏——回鹘的译经工作”的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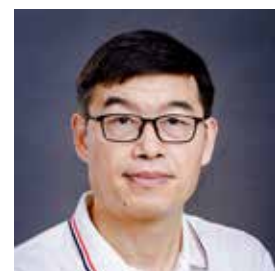
赵灿鹏，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宋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与古文献学研究。访问期间作了题为“‘梁武帝时代’的终点：一个虚拟历史的研究视角”和“我为什么要研究南朝散佚史料”的主题报告，并参加了由文研院和北大中古史中心主办的“衲史今昔：张元济校勘手稿与‘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中的百衲本”讲座，发表“《梁书》百衲本及张元济《梁书校勘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还发表了“梁武帝的选择与运气：‘侯景之乱’前夕历史场景的一个分析”学术讲座。此外，在访问期间，赵灿鹏发表《〈梁书〉百衲本及张元济〈梁书校勘记〉校读琐记》和《南朝梁元帝〈职责图〉题记释文校证》，即将出版。

於梅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晚明以来的学人与学术。访问期间，於梅舫就“铸经与破经：康梁师徒重塑中国文化的路径分歧及旨趣离合”主题进行了学术报告，希望通过历史上的学人与学术，切入近代中国人在遭遇“二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之时，尤其是在固有的价值、秩序、信仰崩塌后，如何调动各自视野、学识以内的思想文化资源，以重建中国文化的多样取径。此外，於梅舫就“我为什么研究清学史”进行了学术研究历程的分享。



姜文涛，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 18 世纪的情感研究与印刷文化、比较文学、文艺理论和数字人文。访问期间，他发表了学术报告“英国 18 世纪的情感与印刷文化：以埃德蒙·伯克之美学观为例”，并分享了自己为什么研究英国漫长的 18 世纪文学；完成书评《美学形式与社会形式的回归？——凯瑟琳·莱文的〈形式〉与新形式主义批评的可能》，及编辑《数字人文》期刊。

张国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访问期间，发表了题为“元代官吏除授文书体系初识”的内部学术报告，并以《从宣命到付身：元代官吏除授文书体系的建立》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同时就“我为什么要研究元代社会经济史”与同期学者进行交流；组织本期访学学者虞云国、曹家齐两位教授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张帆、党宝海两位教授在中国社科院古代史所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时代”的探讨，从多角度，多层面来思考“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时代”的众多问题。



张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农村社会学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乡村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张浩在文研院作了“农地再延包：农户怎么看？——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实证研究”和“我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两场报告，还参与组织了由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农村社会学研究工作坊。

张涛，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学史、礼制与礼学、清代学术史，关注经学文献的整理研究与传统礼制的现代转化。张涛在访问期间于文研院作了主题报告“‘复原’可以作为方法吗？——信息时代《仪礼》研究进路的思考”，并作了“我为什么学习经学文献”的分享交流。



武琼芳，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服饰染织史、敦煌石窟美术史。武琼芳发表了题为“敦煌石窟隋代供养人服饰”的学术报告；分享了“我为什么研究敦煌服饰”；并进行了文化遗产活化创新的研究探索工作，策划敦煌主题的新形式展览，以及将敦煌美学引入当下设计制作创意产品。此外，她修改完成系列画册《从印度到敦煌》之《吴哥窟》卷的文稿和图版说明；修改论文《敦煌石窟隋代男供养人首服研究》，即将发表。

缪德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副主任，关注国民经济核算、农村经济、经济思想“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等领域的基础性理论与方法问题。访问期间，缪德刚从学科分类、和经济史的区别、学科变迁和门槛、研究方法更新等方面简要介绍经济思想史，并分享了自己为什么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学科化问题，同时以“近代时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科化解构”为题进行学术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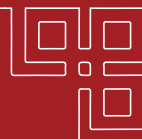
目前，文研院已为迎接2022年春季学期访学学者（第十二期）驻访做好了准备。文研院将继续养成一方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天地，努力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建成一种天真纯净的清新风气，让学者们畅快呼吸，感受到学术真正的希望和力量。

（本文于2022年1月19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关雪）



文研纪事





文研纪事

02

2021-11

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十九世纪徽州乡民的生计与社会关系：婺源程家的个案研究”。第十一期邀请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缪德刚、苏杰、武琼芳、虞云国、於梅舫、张国旺、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罗新、王奇生、赵世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 76 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1830 年的世道与人心——《红与黑》与‘贝尔德案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王斯秧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映虹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田庆生评议。

08

2021-11

“北大文研讲座”第 230 期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主题为“活人祭与骑士爱情——《浮士德》海伦剧中的古希腊与中世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谷裕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本次活动为“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系列讲座之一。

09

2021-11

逢“第 30 届全国消防安全日”，文研院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参加消防演习并学习相关安全知识。

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文献举要”。第十一期邀请学者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缪德刚、苏杰、武琼芳、於梅舫、虞云国、张国旺、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付马、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出席并参与讨论。

10

2021-11

文研院座谈会主办“现代化研究的反思”主题研讨会，讨论中国史学界对世界现代化历史和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进展。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正华作引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与会。

“北大文研读书”第 32 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再发现——《丝路风云》《他乡月明》出版座谈会”。本次会议由文研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和商务印书馆共同举办。

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 77 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就地造景与资本平台——农村高端民宿的兴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杜月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评议。

11

2021-11

“北大文研讲座”第 231 期暨“北京大学虚云讲座”第 53 讲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物、人格与历史——从特修斯之船说及‘格物’等问题”。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主讲，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系教授王博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林合、郑开出席并参与讨论。

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七次）在静园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浩和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姜文涛老师作主题交流发言。张浩交流题目为“我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姜文涛交流题目为“我为什么研究英国漫长的 18 世纪文学？”。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张涛、曹家齐、陈少明、刘永华、张国旺、李天纲、缪德刚、苏杰、

於梅舫、虞云国、杜斗成、阿依达尔、武琼芳、赵灿鹏，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12

2021-11

北京大学文科创新发展座谈会在线举行。北京大学社科部部长、法学院强世功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森杰教授，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翟崑教授，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章永乐与会。文研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发言。

13

2021-11

“北大文研讲座”第232期在线举行，主题为“苏格兰启蒙与亚洲”。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正国主讲，浙大城市学院校长、罗卫东教授主持。本场讲座为“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系列讲座之一。

15

2021-11

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赵灿鹏作主题报告，主题为“‘梁武帝时代’的终点：一个虚拟历史的研究视角”。第十一期邀请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缪德刚、苏杰、武琼芳、虞云国、於梅舫、张国旺、张浩、张涛，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西方古典文献学四讲”系列讲座第一讲、“北大文研讲座”第233期在静园二院208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西方校勘学历史漫谈——古代和拜占庭时代”。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古典学教授奈杰尔·威尔逊主讲，文研院院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苏杰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出席并参与讨论。

16

2021-11

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78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历史与实验——胡适‘文学革命’的思想史逻辑”。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季剑青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教授王凤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评议。

18

2021-11

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八次）在静园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作主题交流发言。虞云国交流题目为“我为什么要研究宋代台谏制度？”，曹家齐交流题目为“我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史？”。第十一期邀请学者阿依达尔、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缪德刚、苏杰、武琼芳、於梅舫、张国旺、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22

2021-11

“西方古典文献学四讲”中的第二讲、“北大文研讲座”第234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西方校勘学历史漫谈——中世纪及之后的西欧”。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古典学教授奈杰尔·威尔逊教授主讲，文研院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苏杰教授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英语系高峰枫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研究所赵益教授出席并参与讨论。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王子林一行到访文研院，与院务会成员商议合作举办“故宫与故宫学”系列讲座事宜。故宫博物院研究室资料组组长、副研究馆员多丽梅，资料组副组长、副研究馆员杨安，研究组副组长、馆员栾林与会。

23

2021-11

第十三次“北大中国史”编撰项目讨论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就断代史项目前七卷写作进度与出版规划展开讨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辉教授、朱凤瀚教授、陈苏镇教授、韩巍副教授、陈侃理副教授，三联书店编辑孙晓林、冯金红、杨乐，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姜文涛老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英国18世纪的情感与印刷文化——以埃德蒙·伯克之美学观为例”。第十一期邀请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李天纲、刘永华、缪德刚、苏杰、武琼芳、虞云国、於梅舫、张国旺、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彭春凌出席并参与讨论。

24

2021-11

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79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举行，主题为“石窟寺建筑研究的角度与问题——以龙门石窟为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彭明浩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怡涛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评议。

25

2021-11

文研院举办“文研漫谈”午餐会，邀请北大青年教师交流经验，以期加深对不同学科学者的理解。25日中午，第一场午餐会在111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利平、艺术学院助理教授陈轩、中文系助理教授高冀、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贾岩、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焦长权、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刘未、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吕晓宇、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苗润博、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庞亮，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

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九次）在静园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和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作主题交流发言。李天纲交流题目为“从《中国礼仪之争》到《金泽》：我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宗教？”，陈少明交流题目为“我为什么要讨论《兰亭序》？”。第十一期邀请学者阿依达尔、曹家齐、杜斗成、姜文涛、刘永华、缪德刚、苏杰、武琼芳、於梅舫、虞云国、张国旺、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26

2021-11

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文研院联合主办的“北大文科创新讲坛”第二讲在线举行，主题为“儒家政治：理解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一个视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主讲，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强世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仰海峰、郑开、干春松评议。

28

2021-11

“北大文研论坛”第151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对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庆新、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孙键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前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纯艳出席并参与讨论。

29

2021-11

“北大文研讲座”第235期在静园二院208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史诗的内部张力与《江格尔》类型群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斯钦巴图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副教授史阳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阿地里·居玛吐尔、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陈岗龙评议。本场讲座为“史诗遗产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之一。

“西方古典文献学四讲”系列讲座第三讲、“北大文研讲座”第236期在静园二院208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古文书学作为辅助学科的价值”。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古典学教授奈杰尔·威尔逊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刘淳主持，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陈正宏，文研院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苏杰，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李文丹出席并参与讨论。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前往兰园书院商谈“口述史项目”相关事宜。

30

2021-11

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一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副研究员张国旺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元代官吏除授文书体系初识”。第十一期邀请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苏杰、武琼芳、於梅舫、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院务会，第九期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李鸣飞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论坛”第152期、“观象敦煌：‘罗氏档案’中的莫高窟与榆林窟照片”系列论坛第一场在线举行，主题为“敦煌‘罗氏档案’的整理与使用”。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经崇仪（Dora C. Y. Ching），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荣休教授韦陀（Roderick Whitfield），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孙志军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刘晨主持。本场论坛为“敦煌学”系列活动之一。

01

2021-12

文研院首期Newsletter发布。首期内容包括文研院成立五周年纪念活动、年度荣誉讲座、21年秋季邀请学者介绍，以及相关学者的动态、文研院活动汇总等。以电邮形式发至文研院邀请学者、合作机构、及相关活动学者等一百余位。

02

2021-12

北京大学社科部部长强世功来访文研院，与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商谈合作推进北大文科建设、深化核心议题研究相关事宜。

05

2021-12

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80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俄国对中亚草原的征服与现代中亚的形成”。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施越主讲，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袁剑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评议。

“北大文研讲座”第237期在线举行，主题为“语言的流动——全球史视野下近世欧亚大陆东部的翻译浪潮（约1200-1850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敦分校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来臣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日本成城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陈力卫、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王宏志与谈。

“北大文研论坛”第153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范式反思”。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的十余位学者与会。

06

2021-12

“北大文研论坛”第152期、“观象敦煌：‘罗氏档案’中的莫高窟与榆林窟照片”系列论坛第二场在线举行，主题为“国际视野下的敦煌学——作为史料的敦煌与作为空间的敦煌”。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林伟正（Wei-cheng Lin）、俄罗斯冬宫博物馆东方部高级研究员玛利亚·缅希科娃（Maria L. Menshikova）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刘晨主持。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包华石（Martin Powers），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经崇仪（Dora C. Y. Ching）与谈。本场论坛为“敦煌学”系列活动之一。

07

2021-12

“西方古典文献学四讲”系列讲座第四讲、“北大文研讲座”第238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两个传承之间的区别：重写本”。

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二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浩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农地再延包三十年：政策衔接是关键”。第十一期邀请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缪德刚、苏杰、武琼芳、於梅舫、虞云国、张国旺、张涛、赵灿鹏，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喻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出席并参与讨论。

09

2021-12

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古典学教授奈杰尔·威尔逊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林丽娟主持，文研院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苏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睿出席并参与讨论。

09

2021-12

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三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武琼芳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敦煌石窟隋代供养人服饰”。第十一期邀请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缪德刚、於梅舫、虞云国、张国旺、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李娜、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叶子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读书”第33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另一种现代的尺度：《非洲现代史》研读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作引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刘海方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正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经胜，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教授李洪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许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刘少楠，原中国驻南非大使、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埃塞俄比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张红军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81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法意’——传统中国制度思想中一个基本概念的演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孙明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评议。

14

2021-12

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四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涛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复原’可以作为方法吗？——信息时代《仪礼》研究进路的思考”。第十一期邀请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苏杰、缪德刚、於梅舫、虞云国、张国旺、张浩、赵灿鹏，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兰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来访文研院，与院长邓小南商谈学科建设相关事宜。

15

2021-12

“北大文研讲座”第239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躺椅背后的摩西——弗洛伊德思想与犹太传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主持。

16

2021-12

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五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於梅舫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铸经与破经：康梁师徒重塑中国文化的分岐及旨趣离合”。第十一期邀请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刘永华、缪德刚、苏杰、武琼芳、虞云国、张国旺、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17

2021-12

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82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国际劳工组织、治外法权与民国劳工保护”，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一峰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爱玉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闻翔评议。

19

2021-12

“北大文研论坛”第154期在静园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景贤作圣：中国圣贤的多学科探讨”。文研院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赵丙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东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鞠熙作主题报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清华大学法学院/新雅书院副教授赵晓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出席并参与讨论。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纪念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21

2021-12

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六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缪德刚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早期学科化”。第十一期邀请学者虞云国、杜斗成、李天纲、陈少明、曹家齐、苏杰、刘永华、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赵灿鹏、姜文涛、张浩、张国旺、於梅舫、张涛、武琼芳，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22

2021-12

“北大文研论坛”第211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镜像中的文明——《波斯人信札》三百周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特聘副教授崇明、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葛耘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出席并参与讨论。

24

2021-12

“北大文研讲座”第240期在静园二院208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故宫文献学的价值与意义”。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王素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凤瀚主持。本场讲座为“故宫与故宫学”系列讲座之一。

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文研院联合主办的“北大文科创新讲坛”第三讲在线举行，主题为“透纳：风景画中的历史与神话”。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评议。

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余浚一行来访文研院，与院务会成员就合办邓广铭先生学术展进行商议。

27

2021-12

第十一期邀请学者欢送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本期邀请学者、文研院院务会、行政团队参加。

29

2021-12

“北大文研讲座”第241期在静园二院208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关于西方认知史上一个被忽略的概念中介——解析荷马史诗《奥德赛》里 *sēma* 和 *sēma eipe* 的坐标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中梅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副教授史阳主持，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陈岗龙、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陈斯一评议。本场讲座为“史诗遗产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之一。

30

2021-12

文研院院务会受邀参加燕京学堂院长换届暨新年茶话会，院长邓小南致辞。

31

2021-12

“北大文研论坛”第156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简帛古书与传世文献”。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正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常森作引言，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孟庆楠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程苏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李林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李秀男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论坛为“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活动之一。

04-07

2022-01

文研院于线上平台推出“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学者讲坛第五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韩敏中、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跃生以视频讲述的形式分享他们所经历的学科发展历程与学术传承因缘。

10

2022-01

文研院召开线上海外学术恳谈会，多位海外青年学者参与，共同就文研院海外学术活动开展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与会人员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边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文欣、康奈尔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杜乐、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郑小威、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左娅、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王锦萍、新加坡国立大学汉学系助理教授刘晨、香港城市大学助理教授徐力恒，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

11

2022-01

《文明》期刊筹备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办，文研院院务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特聘副教授崇明、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就期刊宗旨、组织架构、出版周期与内容、栏目设计等进行讨论。

14

2022-01

文研院工作委员会会议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就文研院发展的各项问题进行商讨，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介绍2022年工作规划，副院长杨弘博介绍2021年运行情况。工作委员高峰枫、陆扬、李猛、刘云杉、邢滔滔、张辉、张亚光、周飞舟与全体院务会成员出席。